

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复印报刊资料来源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ISSN 1001-5973

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2020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1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56 (Bimonthly)

(社会科学版)

1956年创刊 (双月刊)

2020年第1期 (总第288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商志晓

副主任：王志民 张文新 万光侠 (常务)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光侠 王宏 王玮 王卓

王志民 毛锐 任建兰 李松玉

李宗刚 李海鸥 李掖平 杨存昌

杨守森 时晓红 张文新 张宗斌

岳海涛 夏同水 徐继存 高峰强

高继文 商志晓 葛书林 程奇立

魏建

主编：李宗刚

副主编：时晓红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从“启蒙文学”到“民族文学”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架构的另一种解读 宋剑华(1)

《黑白李》与老舍小说的思想“风景”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再解读 逢增玉(12)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的世界性意义诉求与民族历史认知 刘起林(24)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歧路灯》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杜贵晨(36)

□ 文艺学研究

时尚修辞的自由

——修辞学视域中罗兰·巴特大众文化新论 张爱红(44)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的基本要求

..... 王增福(55)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 王清涛(65)

□ 法学研究

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及规制····· 刘云亮(76)

□ 历史学研究

论班固“山西出将”说····· 杨兆贵(85)

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时晓红(95)

□ 管理学研究

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社群自尊的调节作用····· 朱 瑾(105)

□ 教育学研究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的社会学分析

——以山东省域数据调查为例····· 傅海伦 张 丽(116)

心理发生视域下学习进阶机制的研究····· 高 嵩(126)

□ 语言学研究

《史记》三家注引《孔子家语》考····· 王其和(135)

□ 文化学研究

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

——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 李 华(143)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Vol.65 No.1 (Serial No.288)

MAIN CONTENTS

From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to “National Literature”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Song Jianhua(1)

The Black and White Lee and the Ideological “Scenery” in Lao She’ Novels
 ——Re-Analysis of the Classics of Modern Literature Pang Zengyu(12)

Universal Meaning Appeal of International Mutual Aid Themed Anti-Japanese Novels
 and Cogni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Liu Qilin(24)

Qiludeng Compared with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Water Margin*
 Du Guichen(36)

Freedom of Fashion Rhetoric
 ——A New Discussion of Roland Barthes’ Mas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Zhang Aihong(44)

Road Independence and Cultural Autonomy: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Wang Zengfu(55)

Unity of the World i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ang Qingtao(65)

Legal Value and Regulation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Liu Yunliang(76)

On Ban Gu’s View of “Army Generals are produced in Shanxi” Yang Zhaogui(85)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fficial admonitions and its modern value Shi Xiaohong(95)

How Online Community Climate Influences Customer’s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munity Self-esteem Zhu Jin(105)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Rural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ial data survey Fu Hailu,Zhang Li(116)

Research on the Mechanics of Learning Progression Based on Psychological Occurrence
 Gao Song(126)

A Textual Criticism of *Kongzi Jiayu* in Three Annotated Editions of *Shiji* Wang Qihe(135)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ementation of Mencius’s Benevolence and the Prosperity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Wen and Jing Li Hua(143)

英文校译:李玉麟

本刊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

本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赞助费、版面费。

从“启蒙文学”到“民族文学”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架构的另一种解读^{*①}

宋剑华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5632)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以不断自我否定的运行方式去推动其自身现代性的思想转型。五四启蒙文学以“人”的解放,否定了封建专制文化体系对于人之“个性”的残酷扼杀;左翼革命文学则以“阶级”的解放,否定了“个人”解放的理论合法性;而抗战文学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用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统一了中国作家的思想认识。因此,只有“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才能激发起中国作家的爱国情绪;它不仅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也更生动地反映了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文学;革命文学;民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001-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1

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②理论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几十年。但现在重新思考一下,却发现这一命题是个伪命题。因为“启蒙”本身就属于“救亡”的范畴,只不过“启蒙”是“救亡”的表现形式,而“救亡”才是“启蒙”的终极目的。如果将二者视为一种对立关系,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无疑是本末倒置的反逻辑说法。

探讨新文学从推崇启蒙到游离启蒙的深层次原因,不能不分析思想启蒙的自身局限性,而不能简单地用“救亡压倒启蒙”一句话,让“救亡”去替“启蒙”背负起一种莫须有的历史罪名。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明确指出,新文学创作之所以会从狂热走向沉闷,是因为“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稿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③。鲁迅这段话大有深意:“歌唱”显然是指新文学的思想“启蒙”,而“听者”则是指那些被启蒙的社会“大众”;当思想“启蒙”根本就没有“听者”时,人们开始质疑新文学的“启蒙”效应,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一、启蒙文学自我消隐的历史必然性

五四启蒙的思想精髓,其实就是“个性解放”。这种见解源自于胡适《易卜生主义》中的一句话:“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④毫无疑问,胡适将个人与社会

* 收稿日期:2019-11-15

作者简介:宋剑华(1955—),男,辽宁丹东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文学伦理叙事研究”(18AZW021)的阶段性成果。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③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3-244页。

④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5-490页。

截然对立,不仅给个人反抗社会提供了合法的理由,同时还营造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时代情绪,以至于造就了一批像萧军那样的狂妄青年,竟会毫无顾忌、口出狂言,想用他们自己的“个性意识”去同社会意识形态相抗衡。^①朱自清很早便发现,五四启蒙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于西方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它在中国“只发展了任性和玩世两种情形,而缺少严肃的态度”,因此“这些影响非根绝不可”。^②

在近代西方社会,个性解放是一种思想解放的理论主张,它强调人的“精神自由”而非“行为自由”。这种观点直接铸就了西方社会的民主思想。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社会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度”问题,已经从理论上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精神自由”一旦绝对化,就必然会导致人的行为脱离社会的制约性,“其赤裸裸的意义就是人人都我行我素”^③。因此,他们强调“个人”的自由度不能超越“社会”的规范性。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只有当许多人联合起来其力量超过任何单个人并足以对抗所有单个人时,共同体中的人类生活才可能”^④。有意思的是,西方学界认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开启了一种由精神自由走向行为自由的“生活模式”,并且把“离家出走以改进一个人出身带来的命运”,演变成了“个人主义者生活模式的核心特征”,进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将个人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并由此强调他自豪的自给自足和目中无人的孤独这种趋势”^⑤。这无疑使西方社会深感担忧,因为过分强调个人自由的神圣权利,势必会导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强烈对抗性。所以,达朗贝尔称赞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是赋予“自由”以社会生活的绝对公平性,即“这种契约的目的是在不同人群中确立一种平衡”^⑥。叔本华对此说得更为直白,法律固然有趋于专制的可能性,但自由又趋于无政府主义,“它会时时刻刻地将灾难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因此,任何宪法应当更加接近专制政治,而不应当接近无政府状态”^⑦。叔本华的意思无非是说,由于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故只有“专制政治”的契约精神,才能保障每一个人都充分地享受“自由”。

新文学之所以会逐渐地消解“个性解放”的启蒙主张,关键就在于作家只关注“个人”价值而否定“社会”价值。因此,那些被文学所塑造出来的叛逆者形象,几乎都无法“独立”地在“社会”上生存。比如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她只知道“离家出走”,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所以一个人在北京不是无所事事地喝着牛奶、看看报纸,就是在苇弟和凌吉士之间玩弄一些没有情感基础的“恋爱”把戏,根本就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正是由于莎菲把自我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也不容许她这样混下去,所以她才会“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思想意义集中体现了新文学作家的“后五四”情绪,而这种情绪又是以对思想启蒙的强烈质疑,预示着新文学必将面临着一次新的思想转型。

首先,是“女性解放”口号的自我消解。“女性解放”曾是一道思想启蒙的靓丽风景线,它告诉广大新女性只要“离家出走”,去实现自己的人格独立,其他诸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许多女

①萧军在1948年3月19号的“日记”里便这样写道:他“和共产党人之间矛盾,主要是文化思想上领导权问题。它们是不甘心属于我”。《萧军全集》(第20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②朱自清:《生活方法论——评冯友兰〈新世训〉》,《朱自清全集》(第3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28-829页。

③[英]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选择、契约、协议》,陈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④[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⑤[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26页。

⑥[法]达朗贝尔:《〈论法的精神〉解析》,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8页。

⑦[德]叔本华:《伦理反思》,《叔本华论说文集》,范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02页。

性以自身的生命体验,清醒地意识到女性问题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性别问题,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故“决不是靠了一点纸上谈兵,或是头痛医头的局部方案所能得到解决的”^①。她们认为,如果不把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有机地联系起来,女性仍然会“流着无穷尽的血泪,做着罪恶制度下的牺牲品”^②。这不禁使我联想到凌淑华在小说《转变》中所讲述的那个“女性解放”的悲剧故事:主人公“徐宛珍在我记忆中真是了不得的女子”,上大学期间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全部学业,还靠打工还清了家里的所有债务。大学毕业后她更是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既要负担5个弟妹上学的读书费用,又要负担母亲住院治疗的医药开销。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塑造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新女性形象。然而,作者却笔锋一转,使故事的后续发展完全出人意料——当“我”8年后再见到徐宛珍时,突然发现她已经彻底“变”了,穿戴华丽、派头十足,“俨然是一个主妇”,依偎在一个比她母亲还大两岁的男人怀里,做起了享受荣华富贵生活的“三姨太太”。面对“我”无比困惑的质疑眼光,徐宛珍则轻描淡写地回答道:“我早就不坚持原来主张了”,“人的理想时时刻刻要变的,理想常常得跟着需要变是不是?!”她甚至还充满苦涩地自嘲说,“我从前常常骂女人是寄生虫、堕落种”,“现在若有人给我一千块钱叫我再骂一句,我都不忍心骂了”。作者的困惑也是读者的困惑,曾经以人格独立著称的徐宛珍,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庸俗不堪?恐怕这才是小说《转变》所要表达的思想所在。原来,徐宛珍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饱受歧视:学校校长排斥异己,财政厅长道貌岸然,学生家长不断骚扰,最终使她走向了崩溃。徐宛珍对于自己甘为人妾,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再也不用东奔西跑地求爷爷告奶奶地找几十块钱养家了”,“你看一个月四百块,一点事不用做,爱吃便吃,爱穿便穿,爱玩便玩,谁也不敢哼一句闲话”。《转变》主题的深刻性,就在于它向社会揭露了一个事实:在一个由男性掌控话语权的社會中,所谓的“女性解放”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

其次,是“个性解放”幻想的彻底破灭。启蒙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并将个人自由置于社会伦理之上,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加以解释,都是违背人类生存法则的无稽之谈。休谟曾明确地指出:“公道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状态和状况,它们的起源和实存归因于对它们的严格规范的遵守给公共所带来的那种效用。”^③他认为一种有效的社会道德体系,是人类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不满意社会对它的道德制约性,却不能违背大多数人所坚守的道德原则,否则就会像一个离开了生命系统的单个细胞,因缺乏系统的养分支持而走向死亡。鲁迅的小说《伤逝》,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伤逝》故事的叙事重心,不是子君同家庭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涓生同社会之间的对抗关系;子君同叔叔“决裂”,但她还可以“回去”并被接纳,而涓生同社会“决裂”却只能沦落到无法生存了,这才是鲁迅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在子君出现以前,涓生虽然“寂静和空虚”,可他却并没有割断同社会的所有联系;然而为了“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选择了盲目的“爱”,于是便同社会发生了冲突。其实,涓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与子君同居不久,便萌生了向社会妥协的强烈念头。比如,他对子君说:“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含义,无非在提醒子君注意,“活着”是“爱情”的前提条件,而“社会”又是“活着”的前提条件;若想要在社会上“活着”,个人就必须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所以涓生才会痛下决心,为了“活着”而抛弃子君。在《伤逝》的结尾处,涓生“将真实深深地

①陈衡哲:《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独立评论》1935年第159期。

②上官公仆:《三年来的中国妇女运动》,《女子月刊》1936年第4卷第3期。

③[英]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页。

藏在心的创伤中”,并以“遗忘和说谎”作“前导”,独自一人去“默默地前行”。鲁迅这里所说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假定就是“个性自由”的启蒙理想,那么鲁迅为什么又让涓生用“遗忘和说谎”去作“前导”呢?我个人认为,“真实”是指涓生知道在人与人关系总和的社会中,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说谎”是指涓生为了能够使自己“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使用各种谎言对子君所作的情感欺骗;“遗忘”是指涓生在对子君作出忏悔后,必须重新回到他过去的的生活状态。毫无疑问,用“遗忘和说谎”去遮蔽“真实”,恰恰是涓生对于自己虚伪人格的一种否定。因为鲁迅非常清楚,“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能搬动,能改装”^①。在现代文明还未发育成熟的社会环境中,鲁迅并不主张那些涉世未深的新青年们去狂热地追求什么“个性解放”;而是暗示他们应收起咄咄逼人的思想锋芒,并以稳健而理性的“韧战”精神,去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

再者,是“个人奋斗”理想的全面崩溃。五四启蒙鼓励知识分子通过“个人奋斗”去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现状,但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幼稚想法,立刻被严酷的社会现实击得粉碎。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经典文本。《倪焕之》的最大看点,并不是倪焕之在参与新式教育实验失败之后,受革命者王乐山的启发和影响去积极参加社会革命,而是他从沉沦、亢奋到失望、幻灭的个人奋斗历程。倪焕之应蒋冰如之邀,想在教育界大搞一场“革命”,他们认为“现在有我们这学校,又有五个初等小学,一个女子高小。只要团结一致,大家当一件事情做,十年,二十年,社会上就布满了我们的成绩品。”他们坚信:“教育事业是培养‘人’的,——‘人’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子?‘人’应该怎样培养?——这非有理想不可。”但现实却是十分残酷的,倪焕之与蒋冰如的改革之路,阻力首先还不是来自外部社会,而是来自教师内部的不同想法。那位从旧教育体制过来的陆三复,认为教师职业本身就是一种混饭吃的营生,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就不错了,还谈什么教育救国的伟大理想?那位半新不旧的徐佑甫,其“务实”思想更为严重,他说办学就像经营一家商店,“货真价实,是商店的唯一的道德,所以教师拆烂污是不应该的”。至于顾客怎样去处理他们拿到的商品,“那是顾客自己的事,商店都可以不负责任。”尤其是学生家长,听说学校要办“耕读教育”,一个个义愤填膺地质问学校:“家长把子弟送进学校,所为何事?无非要让他们读书上进,得一点学问,将来可以占个好些的地位。假如光想种种田做做工,老实说,就用不到进什么学校了。”在学校内外的一派反对声中,蒋冰如和倪焕之的教育改革不仅沦于失败,而且蒋冰如本人也在革命的浪潮中,被民众视为要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倪焕之再次感到绝望,于是他来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并希望通过“革命”去促进“教育”。不过,在他临终前所出现的幻觉,却很是发人深思:“他看见许多小脸相,奸诈,浮滑,粗暴,完全是小流氓的模型。倏地转动了,转得非常快。被围在中心的是个可怜的苍蝇。看那苍蝇的面目,原来是自己。再看那些急急转动马上把苍蝇擒住的,原来是一群蜘蛛。”其实,这种奇妙的幻觉已经把作者的创作意图表达得十分清楚了——“苍蝇”原本就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昆虫,作者用它来形容倪焕之等改革者的个人奋斗,又以“蜘蛛”对其进行蚕食的可怕隐喻,含蓄地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个人奋斗一旦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无论理想多么美好,都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拥护。

“女性解放”与“个性解放”是伪命题,“个人奋斗”的道路又行不通,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呢?叶圣陶让倪焕之突然想到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则需要有“民

^①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气”作支撑。尽管倪焕之对“革命”的概念还不十分清晰,但他毕竟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无论是“个性解放”也好,还是“个人奋斗”也罢,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根本力量,绝不是知识精英而是社会大众。叶圣陶主张的“民气”说,实际上就是对五四启蒙的一种否定。诚如戴维·麦克莱伦所指出的那样,“当条件还没有发展到使意志的产生成为可能之前,这个‘意志’的出现也只是存在于意识形态家的想象之中”^①,而无法使其变成一种社会现实。既然启蒙“意志”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需求,那么新文学抛弃“个人主义”的启蒙价值观,并从社会内部结构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便顺理成章地构成了新文学后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革命文学迅速崛起的历史必然性

1928年“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其目的就是要以“革命”价值观去取代“启蒙”价值观。“革命”不是对“启蒙”的围剿,而是“启蒙”自身的合理转化。因为“革命”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启蒙”,它与五四启蒙的最大区别,只是在启蒙对象的认知方面存在分歧罢了。五四启蒙强调“个人的解放”,“个人”被理解为启蒙的对象;革命启蒙则强调“社会的解放”,“社会”被理解为启蒙的对象。由于后者是从前者那里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所以它更具有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意义。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去重新理解“革命文学”的发生机制。郭沫若以他固有的诗性语言,向全社会大声宣布:“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然而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的呻吟,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他认为现在的时代已经是革命的时代,“这种革命的呼声便是无产阶级的文艺”^②。紧接着,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个人”与“集体”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他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③。如果说郭沫若对“革命文学”的贡献,是公开否定五四启蒙的“个人主义”,那么蒋光慈对于“革命文学”的贡献,则是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去划分作家的政治立场。如此一来,“革命文学”便从作家之间新旧观念的对立冲突,直接演变成了他们之间不同政治立场的对立冲突。“革命文学”口号之争,反映的是中国文坛将向何处去的重大命题,究竟是继续坚守五四启蒙的个人立场,还是立刻转向“革命文学”的阶级阵营,它迫使每一个新文学作家都必须去作出选择。“革命文学”口号既点燃了青年作家的狂热情绪,同时也推动了鲁迅、茅盾等人的思想转变。他们加入“左联”组织的这一事实,则是默认“革命文学”时代合法性的行为表现。

“革命文学”口号之争,直接促成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思想结盟。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都一致赞同,革命文学的思想宗旨就是要“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④。这充分说明,从“革命文学”到“无产阶级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功利目的性,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了。就像鲁迅自己所坦言的那样:“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⑤毋庸置疑,就连鲁迅这样的个人主义者,都认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这证明五四启蒙文学转向左翼革命文学

①[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

②麦克昂:《英雄树》,《创造月刊》1927年第1卷第8期。

③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第2期。

④记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报道),《拓荒者》1930年第1卷第3期。

⑤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

完全符合新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性,而与“救亡压倒启蒙”毫无关系。不过,即便是左翼革命作家,由于他们对社会矛盾根源的思想认识不同,故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如何去看待社会矛盾和表现社会矛盾,也就形成了以下三种有关社会叙事的常见模式。

第一种是由“恋爱”向“革命”过渡的叙事模式。“革命”与“恋爱”绝对是一种奇妙的组合,因为“恋爱”是“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而“革命”则是“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能够将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交织为一体,足以说明初期“革命文学”对于“革命”认识的思想混乱性。“革命+恋爱”小说之所以刚一问世便受到社会的猛烈攻击和一致诟病,究其根因无非是主人公只知道“革命”,却并不知道为什么“革命”,“革命”在“文学”中更像是一场“游戏”。因为“革命+恋爱”小说中的那些主人公,往往都是在他们的“恋爱”受挫之后,才会去借助“革命”暴力的刺激性,逃避自己内心深处的失落感。比如蒋光慈小说《野祭》中的女主人公章淑君,原本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只因发现陈季侠不“爱”自己时,才莫名其妙地爆发一种“革命”的冲动:“我要去革命——我想这样地平淡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倒有味道些。”而男主人公陈季侠则更是无聊至极,他除了会讲一些“革命”的大道理,主要活动就是同几个女性谈“恋爱”,根本就看不出他有什么崇高的“革命”理想。钱杏邨曾为《野祭》开脱说,无论是章淑君还是陈季侠,都是作者针对中国社会现实有感而发,“是要把那时代的青年的矛盾心理的冲突表现出而写的”^①。钱杏邨表面上在替蒋光慈辩解,其实却是在为他自己辩解,因为他在《人生》中对于青年人的“革命”动机,阐述得更令人大跌眼镜:“人生的经过,是应该像辣椒那样富于刺激性的,我们应该过狂风暴雨的生活,我们应该过低层阶级的生活,我们不应该过平凡的生活。杀人也好,打倒也好,这都是我们要干的事!总之:生活应该是波澜型的,否则太没有意义!”^②几乎所有的“革命+恋爱”小说,都是在讲述一个人“革命”的悲壮故事,甚至还呈现出越“刺激”就越“革命”,不“刺激”就不“革命”的怪异现象。比如蒋光慈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便是这类作品的经典文本。“曾当过女兵,曾临过战阵”的曼英,大革命失败以后来到上海,沦落成了一个出卖自己肉体的风尘女子;可她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正在堕落,反倒申辩说这也是一种“革命”方式,因为“当她觉悟到其它的革命的方法失去改造社会的希望的时候,她便利用着自己的女人的肉体来作弄这社会”。曼英觉得自己的“精神很伟大,因为——因为我是一个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战士呵”。既然自诩为一个“革命”战士,曼英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战斗武器,当她得知感染了“梅毒”,已经不能同“革命”恋人李尚志亲密接触时,于是便“利用自己的病向着社会进攻了——让所有的男子们都受到她的传染罢,横竖把这世界弄毁坏了才算完事”。这就是蒋光慈所赋予曼英的“革命”意义。“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把五四时期新青年因“恋爱问题”同家庭之间的强烈对抗,转化为后五四时期革命青年因“恋爱问题”同社会之间的强烈对抗。从表面上看,这仿佛是对用“革命”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推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纠缠于个人的情感生活,丝毫没有触及“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借助“革命”,去彻底消除贫富差别的社会现象。

第二种是揭示“丰收成灾”背后原因的叙事模式。“丰收成灾”虽然是为了配合“左联”提出的创作规范,但比“革命+恋爱”小说更加贴近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真相,因此也具有更大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茅盾的《春蚕》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就是描写“丰收成灾”的代表性作品。《春蚕》开篇描写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望着“官河”里来来往往的

①钱杏邨:《野祭》,《阿英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60页。

②钱杏邨:《人生》,《阿英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8页。

“小火轮船”，并以中国农民的经验理性，去琢磨“真是天也变了”的其中奥秘：在老通宝的记忆中，“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天贵起来”，再加上受“一·二八”抗战的影响，镇上多数茧厂“都关了门不做生意”，尽管老通宝的蚕茧获得了大丰收，可是“上好的茧子！会没有人要，他不相信”。但这却是现实，为了还高利贷，老通宝只好把茧子贱卖，自己也被气得大病了一场。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同样是从经济层面去探讨中国农村的破产问题：一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江南农民，通过自己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获得了稻米产量的大丰收。可是，当他们满怀希望以为能卖个好价钱时，没想到市场上的稻米价格却出现了大跌。原因是今年粮食丰收是一个普遍现象，“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出来”，而且国外的洋米、洋面也正在由“大轮船”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赔了钱的农民破灭了一切希望，他们只能聚在船上去借酒浇愁。《春蚕》和《多收了三五斗》的共同之处，是把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直接提升到民族矛盾的认识高度，进而把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原因都归结为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预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①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平衡关系则需要各自政府去宏观把握，简单地用“经济侵略”去解释“谷贱伤农”的社会现象，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春蚕》和《多收了三五斗》都只是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却没有直面政府无能这一根本原因，仿佛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农民就可以衣食无忧、安稳度日似的。

第三种是用“阶级斗争”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叙事模式。毫不夸张地说，在“革命文学”的强大发声中，“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是一种最接近中国问题本质的表现方式。因为它既不像“革命+恋爱”那样辞气浮躁、情感张扬，又不像“谷贱伤农”那样语焉不详、似是而非；而是直接把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视为中国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且指出只有依靠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在这一方面，叶紫的《丰收》与《火》是最有价值的作品文本。叶紫在《编辑日记》中曾告诉读者，《丰收》与《火》绝不是艺术虚构，而是他自己家族的血泪史：“云普叔是我自己的亲表叔，当家乡那里来一个年老的公公告诉我关于他们的状况时，我为他流了一个夜晚的眼泪。自己做了流浪的人，家乡的消息茫然了许久，不料竟有这样大的变动。立秋已经被团防局抓去枪毙了，是在去年九月初三日的清晨。为了纪念这可怜的老表叔，和年轻英勇的表弟，这篇东西终于被我流着眼泪的写了出来。”^②真实的云普叔和立秋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丰收》和《火》中却能看到他们的不幸和反抗：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冲破了堤堰，毁灭了云普叔一家的全年希望，为了使全家人能够度过眼下艰难的日子，他只好把年仅10岁的女儿英英卖掉。故事写到这里，无非在讲述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属于阶级压迫的“人祸”了。云普叔一家通过补救措施，终于迎来了秋天的大丰收，可是稻谷刚一收获，何八爷便带着一帮人，把稻谷全都拿去抵了债。云普叔家里不仅没剩下一粒粮食，反倒新欠下了三担三斗五升的“保甲捐”。叶紫并非只是简单地复述中国农民的苦难人生，更是形象化地描述了中国农民因不堪生活重压而奋起反抗的壮烈场景。在革命者癞大哥的思想启蒙下，立秋和云普叔不仅懂得了“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②叶紫：《编辑日记》，转引自胡从经：《叶紫年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

久的世界,一定是我们穷人的”革命道理,而且还明白了为什么会贫穷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们跟随着癞大哥和众多乡亲,愤怒地捣毁了地主何八爷的庄园,以及压迫农民的“团防局”,随后便进到“雪峰山”去开展武装斗争。如果不是有过这种农村革命的亲身体验,叶紫绝不可能把农民暴动的历史场景写得如此真实。小说《丰收》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归结为农民问题,并由此说明如果不彻底解决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一切关于未来中国的美好想象都是欺人之谈。

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待“革命文学”对于“启蒙文学”的全面消解?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当然是希望通过个人的觉醒去带动民族的觉醒,但是“个人”脱离了“社会”根本就无法生存,所以启蒙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革命文学”强调只有全社会的解放,才能最终导致“个人”的解放,它的确以“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然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使命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革命文学”就是“民族文学”的一个阶段,民族振兴与民族利益才是它的终极目的。这就意味着一旦时机成熟,“革命文学”必然会过渡为“民族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三、民族文学全面覆盖的历史必然性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各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形成了空前团结的社会局面。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也标志着新文学从追求“个人解放”“阶级解放”,进入到追求“民族解放”的历史阶段。我们姑且将这一过渡时期称为民族自救的思想启蒙。这种启蒙不同于以往的思想启蒙,它强调民族利益至高无上,消除了不同党派之间的心理障碍,只要是爱国的中国人都不会有任何怨言。这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国破山河在”的苦难岁月里,“个人”与“阶级”都变得十分渺小,因为对于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来说,如果失去了民族这个精神家园,“个人”与“阶级”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革命文学”作家迅速转向:“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是需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创作呢?这是明显的,第一个是为求得民族底解放;第二个是求得人类底解放,一切是为这‘解放’而服务。”^①在所有关于抗战文学的理论阐述中,陈铨提出的“民族文学”口号,最能够反映出当时作家的共同心愿。他在《民族文学运动》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有它特殊的血统、特殊的精神、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传统风俗。假如一个民族,不能够把它的种种特殊之点,在文学里尽情表现出来——不但文学是没有价值的文学,民族也是没有出息的民族。”陈铨还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高度概括为“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逐次递进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大家认为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社会自由;第二个阶段,刚好翻过来了,大家认为没有社会自由根本就没有个人自由。——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思想界不以个人为中心,不以阶级为中心,而以全民族为中心——中华民族第一次养成极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第一次认清他们自己。中国的文学,从现在起,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将来。因为,我已经说过了,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②陈铨有关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阶段论,是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他把新文学的发展脉络梳理得既准确又到位。

实际上,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等词汇,几乎

①萧军:《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萧军全集》(第11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43页。

②陈铨:《民族文学运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2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570-575页。

变成了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词汇,而这些词汇又被中国作家转化成了一种文学表现上的时代精神,那就是为民族而英勇战斗、为民族而不惜献身的爱国主义情怀。诚如郭沫若所言:“我们要牺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至死不已!”^①弘扬民族精神的首要前提,便是“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我们的民族性——只有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的优秀传统,才能在作品中更强烈地表现出对于民族的热爱,才能创造出真正地含蓄民族底色彩与光泽的典型底艺术”^②。正是因为如此,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 的 1938 年,顾颉刚便发起了一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大讨论,他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角度,认为民族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概念,而是一种具有文化共识的国家体制。所以,他郑重声明:“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绝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以种族概念,去实现他们分裂“中华民族是一个”^③的狡诈阴谋。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命题,并不是一个纯粹学理化的抽象判断和表达,而是一个事关中国领土完整的政治问题,因此得到了学界的普遍理解和支持。^④

“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争,不仅统一了史学界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思想认识,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奋起抗战的巨大热情。仅以文学创作而言,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都是自觉地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他们为中华民族而战的钢铁意志同样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像朝鲜族诗人金学铁的《战歌》、纳西族诗人李寒谷的《献诗》、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的《觉醒》、蒙古族作家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白族作家赵式铭的《军歌》、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辘下》、壮族作家华山的《鸡毛信》等,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抗战精神。可以说,抗战文学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最有血性的情感表达。每一个进步作家都自觉地投入到了抗战工作中,他们不分党派、不分政见,活跃在抗战的前线和后方,力所能及地去为抗战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当时各大战区创办的报刊杂志,很多文艺副刊不仅是由左翼作家在主持,而且撰稿人也大多是曾经提倡“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如碧野在河南南阳主持《阵中日报》的文艺副刊,臧克家、姚雪垠在第五战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等等,这些足以说明“党派”与“政见”已经让位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如果我们对庞大的抗战文学体系作一次简要的梳理,从数量到质量都是可圈可点、令人赞叹的。在诗歌创作方面,比如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臧克家的《走向火线》、穆旦的《森林之魅》、任本命的《国殇》、杜运燮的《滇缅公路》、海男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记》、曹树莹的《沐浴火海》等,都是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李辉英的《松花江上》、王平陵的《东方的纽伦堡》、阿垅的《南京血祭》、魏伯的《多多河》、陈瘦竹的《抗争》、王西彦的《海的喧嚣》、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尹雪曼的《战争与春天》、陈铨的《狂飙》等,都写出了中华民族的顽强斗志与英雄气概。在话剧创作方面,如曹禺的《蜕变》、老舍的《残雾》、洪深的《飞将军》、阳翰笙的《前夜》、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宋之的的《国家至上》、陈荒煤的《打鬼子去》、于伶的《夜上海》、陈白尘的《魔窟》、陈

①《新华日报》报道:《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 1 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年,第 9 页。

②周钢鸣:《文艺批评的新任务》,《周钢鸣作品选 文艺评论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年,第 124 页。

③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马戎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39、43 页。

④费孝通当年曾与顾颉刚争论此问题,他说后来完全理解了顾先生的真正意图,便自动终止了关于这一问题在学术上的讨论和商榷。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马戎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29 页。

铨的《野玫瑰》等,更是深受广大群众和士兵的欢迎。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如谢冰莹的《新从军日记》、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于方简的《在伤兵医院》、冉洮曲的《临死之前》、汝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柏山的《苏州一炸弹》、骆方的《走向战斗着的黄土层》等,都是以战争纪实的表现方式,真实再现了全民抗战的动人场面。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它极大地统一了广大作家的思想认识,并使抗战文学在其内容表现方面,都围绕着“抗”与“战”而共同发声。实事求是地讲,最早以“民族”观念去消解“党派”和“政见”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出自于左翼革命作家之手,反倒是出自于被左翼革命作家所误解了的黄震遐。早在1932年11月,也就是上海“一·二八”抗战刚刚结束不久,黄震遐便以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毁灭》强烈表达了他主张全民抗战的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而左翼革命文学却是到了1935年,才由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对抗战作出了正面的回应。所以我认为,是黄震遐的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毁灭》,首开中国文坛正面描写民族抗战的历史先河。《大上海的毁灭》究竟是如何描写抗战的,在这里我们姑且可以不谈,我主要想说的是,黄震遐在这部作品里面向社会发出了一种明确的时代信息:中华民族应该摆脱政见分歧、枪口一致对外,就像大上海保卫战中那样同仇敌忾、共赴战场——无论是穿“西装的,短打的,长袍的,在房顶上跨来跨去,无论是洪门,三点会,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现在都是同志,而且是不欺不骗的共生死的同志”。毫无疑问,黄震遐还是深明大义的,他深知民族矛盾要远远大于阶级矛盾,中华民族如果不及时觉醒,很快就将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直到1937年,左翼革命作家才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比如,丁玲写于“七七事变”前夜的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也表达了与黄震遐完全相同的思想见解:一个年仅13岁的红军小战士,在被杀之前却面无惧色地对一位军官说:“连长!还是留着的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那位连长便立刻崩溃了,“从许多人中跑出来用力地拥抱着这孩子”,并对他们打内战而不抗日的行为深感自责。这个故事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管从时间节点上来看,《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出现得有点晚,但却预示着在中国文坛上,一个民族文学时代的即将到来。换言之,如果说黄震遐是以《大上海的毁灭》的故事叙事,去呼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那么丁玲则是以红军小战士的思想境界,去唤醒中华民族的抗战觉悟。这充分说明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作家,在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面前,都愿意冰释前嫌、共赴国难,进而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学从“革命文学”向“民族文学”的顺利转型。

既然是全民抗战的“民族文学”,所以出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军人”也就不再具有党派的政治色彩,而是作家心目中充满敬意的英雄形象。尤其是那些曾经坚守革命立场的左翼作家,他们习惯于用政治思维去塑造“中国军人”的不同形象,如今“中国军人”在他们的眼里,早已变成了保国安邦的民族脊梁了。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在梳理历史资料 and 阅读作品文本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左翼革命作家一旦置身于抗日前线,在他们笔下所呈现出的“中国军人”形象,都是一些值得我们后人去景仰的民族英雄。比如曾克的短篇小说《渡》,不仅文笔优美、情感充沛,而且情节紧张、感人至深:一位吴姓连长,在娘子关战役中,奉命带领一群受伤的战士,负责掩护大部队后撤转移。每一个士兵都知道牺牲就是自己的最后结局,却没有一人表示怯懦和动摇。当他们出色地完成任后撤时,河边已被敌人层层包围。连长在牺牲之前,让那个年轻的小号兵渡河逃亡,可是面对冲上来的日本鬼子,年轻的小号兵却从容地拉响了手榴弹——“于是,河岸一阵爆裂的火花,毁灭了一群强盗,毁灭了那在苦难中为祖国而战的青年号手。”其实,左翼革命作家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

的至理名言都体现在了“中国军人”前仆后继的悲壮牺牲中。碧野的长篇小说《南怀花》,更是以诗性语言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一群年轻的中国士兵,守卫在自己的阵地上,“敌人的炮弹像十二月的冰雹打向南怀花村来,带着一种巨人般的吼音”。但是,没有一个人感到畏惧,因为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誓死捍卫祖国母亲的神圣尊严。这部作品将“祖国”“母亲”与“军人”“责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但深刻地诠释了这场民族圣战的伟大意义,同时也热情讴歌了“军人”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便是现在读起来仍然会令我们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从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到“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再到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学”,这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架构。它所反映的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运行轨迹,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从苦难到崛起的艺术书写。所以,“民族文学”的深远意义,是以“抗战”为契机调和了民族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使中国文学开始注重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并赋予了“中国”二字以极其鲜明的民族特征。这就是为什么《红高粱》《白鹿原》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能够脱颖而出、享誉世界文坛的重要原因。无论是“高密东北乡”还是“白鹿原”,都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自觉表现了中国文化仁者无敌的宏大气势,都明确阐述了民族传统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重要意义。所以,只有“民族文学”,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文理想——绝不是以追求个人“小我”的利益为目的,而是以实现民族“大我”的复兴为宗旨。

From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to “National Literature”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Song Jian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5632)

Abstract: Bas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d its own moder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of continuous self-negation. The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ith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negated the cruel killing of “human individuality” by the feudal autocratic cultural system. Left-wing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negated the theoretical legitimacy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by means of “class” liberation. Th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taking “national” liberation as its mission, unified the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writers with national spirit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only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literature” can arouse the patriotic sentiment of Chinese writers. It not only embodies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but also vividly reflects the firm belief in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national literature

责任编辑:李宗刚

《黑白李》与老舍小说的思想“风景”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再解读*^①

逢增玉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24)

摘要: 老舍1930年代发表的小说《黑白李》,是一篇主写兄弟情义、互为牺牲的主题,类似于中国语境的道德说教小说,但在其表层显性主题之下,也暗写了关于革命、革命者与伦理道德和底层人民的关系,其中看似平淡的叙述,却涉及了生存正义、伦理正义、历史正义与革命正义的关系及其装置和转换问题。联系文本内外的中外政治社会与文学史现象,对这一小说隐舍的问题予以细致分析解剖,可以窥究这篇小说的内奥和老舍小说的独特性。

关键词: 老舍;《黑白李》;1930年代文学;人力车夫

中图分类号: I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012-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2

老舍的文学创作,题材种类繁多,有小说、话剧、戏曲、散文和民间文艺等,不仅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无人能替代的价值与贡献,而且其中蕴含的思想价值也是历久弥新,就像一座思想的富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化,人们总是能从中发现以往认识不到、或尚未发掘出的有价值的思想矿藏。当然,老舍的小说不是故作高深或以思想的大纛耸立飘扬于文学界,而是在经过作家择取和构思的看似平常的生活故事中、在平白如话甚或幽默调侃的叙述中,将自己感觉到、体悟到的蕴含于日常生活叙述中的思想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价值、意义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意义,具象地呈现出来。樊骏的《认识老舍》一文,已经对老舍创作包蕴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成为老舍研究的经典之作。本人拟在有所借鉴的前提下略陈己见,以加深对老舍小说思想内涵的认识,同时也力图解释在五四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诸多现代小说大家的创作文本中,为什么老舍的小说至今仍然受读者欢迎且不断被改编为戏剧上演?在被认为长于表现老北京市民生活特别是贫民生活及其他题材的内容里,除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怜悯和寓于幽默中的沉痛批判,还有哪些可能具有永恒价值性的思想内涵“深度存在”,以至于为当代的人们接受和赓续?本文拟以《黑白李》为例,蠡探黑李与白李二兄弟形象中关于牺牲者、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以及文本内外蕴含的更为深广的意义。

《黑白李》是老舍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小说。它以隐含作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北京城里一对父母双亡的哥哥黑李和弟弟白李互为对方着想、舍己利他的兄弟之情,以及在兄弟

* 收稿日期:2019-06-21

作者简介:逢增玉(1957—),男,吉林长春人,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唤醒中国与百年文学主潮及叙事”的阶段成果。

怡怡背后透露出的实质上的兄弟之间的隔膜和互不了解。老大黑李明显具有中国式家庭中长子身份和责任伦理带来的一般心理和人格征候，如现实中鲁迅的长子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留学时把弟弟周作人带去，周作人结婚花销大，他就先回国做事养活弟弟一家，再把弟弟一家接到北京住进自己买的大房子里，直到被周作人夫妇撵出家门，成为“宴之敖”者。^①这样的经历，鲁迅在小说《弟兄》《伤逝》和散文及散文诗《牺牲谟》《颓败线的颤动》中都有隐晦书写和表达。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中的封建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即大哥觉新，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长子形象之一，也是对大家庭的长辈尽孝、为父母双亡的弟妹庇护而自我牺牲的典型——事实上，巴金的大哥也确实是这样一位牺牲者。老舍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作家，对整个社会和知识界都知晓的鲁迅兄弟失和之事，应该是了解的，对巴金的小说，当然也是阅读和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作为“原型”和启示性的潜在文本，是进入了老舍的文学视界、思考和文本的，二者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文”关系。

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文学和思想资源的老舍，在其小说《黑白李》中塑造的黑李形象凝聚了他的生活、思想与价值观交融构成的独特质料。黑李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大家庭中长子形象的特点，如潜在的“代父”意识和立场化为哥哥的伦理责任感，无微不至地照顾弟弟和为弟弟忍让、牺牲一切，哪怕弟弟抢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也不计较，只要弟弟喜欢和不分家。正像古训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样，父母留下的家和房子无论如何是不能分开的，即使都给了弟弟也行，就是不能分，这已经成为他的人生哲学和信仰。传统中国文化的长兄为父的兄弟爱与父爱的混合，基督教信仰与精神，以及老舍熟悉和爱恨交织的老北京市民的凡事让三分、忍三分、退三分的作揖主义，谦和、善良、包容和包容中的安雌守弱，懦弱中的守老礼的讲究和执着乃至固执，甚至不问是非原则但求一团和气的老北京市民保守主义底色的市民伦理，即北平式的仁义与和善，共同铸造和形成了黑李的性格、人格与心理品质。如此，黑李身上又包含着老北京人自己的传统和地域文化带来的特质，与现实中的鲁迅和文学中的觉新等大哥长子不尽相同。这样的黑李不懂得弟弟同情解放下层人民的“革命”及其大道理，但他却天然地善待拉车的下层人和劳动者，乘坐自家车夫王五的车子外出时，怕车夫累着，总是找各种借口，诸如买点东西之类，中途下车，耽搁磨蹭一阵子，目的是让车夫休息一会儿。这也是五四时期胡适写的《人力车夫》所表达的知识分子对待底层劳动者的人道主义态度。黑李不是知识分子，也不知道胡适和五四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他只是以基督教的和老北平的、传统中国人的富而仁义的善良^②，力所能及地在自家车夫身上实施善良，这是一种民间的天然的人道主义情怀，但却与五四时期胡适等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即反对整体的破坏性极大的革命，提倡一点一滴的、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积小善为大善的温和改良，具有一种精神行为的同构性和渊源性。由此不难看出，经历过五四的老舍的小说，积存着来自五四时期文学与社会的许多遗留，其中有不少与此前的社会和文学思考“互文”的现象。换言之，它们作为潜文本和前文本，不露声色地进入和融入老舍的小说中。

黑李对待弟弟的革命也是如此。他根本不了解弟弟从事的革命的性质、手段、方式、道路、理论、目的，也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正义与否、价值几何。他只是从单纯的兄弟之情、手足之义，即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为强大的支援意识和无需证明的伦理正义和规约出发，以殉道者的成圣行

①“宴之敖”为鲁迅的笔名，隐喻他是被家里的女人即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赶走的被放逐者和被驱逐者。

②老舍的散文《宗月大师》，写的就是富人仁义的事情，而老舍作为穷人的孩子，就是被这样的富人改变命运的。

为,完成保护弟弟生命、牺牲自我的伦理正义和至高道德。因此,他的代弟弟牺牲,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彻底实践和最高实现,也是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践行和实现了他恪守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圣”规训。其次,他是通过为弟弟牺牲、杀身成仁的方式,客观地为弟弟从事的、他丝毫不了解的革命作了牺牲。换言之,他是通过为革命弟弟的牺牲而为革命作了牺牲。这一点,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几分相似:阿Q向往可以随便分东西和女人,可以像赵太爷一样使役他人,误以为这就是为明朝崇祯皇帝复仇的反清革命,他一点也不知道和了解革命的性质及意义,欲参加革命而不成,最后稀里糊涂地被迫做了革命的牺牲品——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的所谓“革命者”以他的头颅来维持“革命”后的秩序和“以惩效尤”。但二者的牺牲都有意义:黑李为他不了解的革命牺牲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救弟弟的命,代弟弟而死亡,死亡中消失了生命和肉体而彰显和成就的是黑李维护践行的伦常道德。阿Q无辜送了性命、牺牲了肉体,证明了自己的愚昧和杀他的“革命党”人的糊涂,以及辛亥革命的悲剧与喜剧。

黑李同样对弟弟的革命丝毫不了解,也不想参加。他平时对待任何事物都像老北平人那样不认真,有点马虎和对付敷衍,唯独对一奶同胞的兄弟情义和伦理正义坚守较真,认死理,一条路跑到黑,最后通过为弟弟牺牲自我的方式被动参与了革命,客观地而非主动地成了为革命牺牲的“沉默的大多数”,从而通过伦理正义的实现而通达了历史和政治正义。这一点又与阿Q大不一样。但是,尽管方式不一样,鲁迅和老舍的小说通过这样两个人物形象,都极为深刻地表明:在中国,辛亥革命那样的革命,会出现革命吞噬或牺牲向往革命、参加革命的革命者或准革命者的现象,即那些所谓无意革命的“沉默的大多数”,往往成为“革命”胜利的“客观”牺牲者,他们以被动参加或牺牲的方式成为了“革命”的基石之一。老实说,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其实对革命并没有很深刻的政治认识,他不是政治家而是生活感受远远大于政治认识的生活哲学家和作家。他所认识的革命就是革命党人带领穷人造反,为穷人谋利益,对于革命的性质内容和革命党人的政治理论与组织并无清晰的了解。对于黑李的性格、心理、行为,他看重的是其中包含的文化和伦理价值而非政治价值。但是,形象大于思想,黑李为伦理道义替代弟弟牺牲自我,从而客观为革命献身的行为——如上所述,确有超出这个形象自身包含的更广大的历史意义。

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自《新青年》创刊以来就不断批判国民性的病弱安忍。有的作家如沈从文将其称为“阉寺”人格,并认为是中国几千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奴性等级制度和思想造成的,于是大力倡导强悍尚武、雄迈大力甚至“野蛮精神”“青皮精神”“毒蛇怨鬼”式的执着坚韧。故此,五四后的新文学不断表现和批判以阿Q为代表的愚弱的国民、巴金《家》中以大哥觉新为代表的软弱者形象,塑造敢于“扎硬寨”“打死仗”的“虎雏”和流浪汉式的人生冒险者与反抗者。而老舍笔下的黑李,作为比较典型的传统文化和北平文化育成的“凡事忍耐退让的作揖主义”者,属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批判的软弱者,那种造成他退让忍耐的旧文化和伦理,却使他在危机关头舍生取义——兄弟的情义,最软弱的人身上爆发出最强大的勇气,这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思想与美学的双重背反——弱者在重要关头的“雄起”和大力爆发,成为老舍小说的一道重要的风景。在《离婚》《牛天赐传》乃至于《四世同堂》那里,都能看到如此的描写和叙述。何以平时不起眼的、看似懦弱普通的人最终却能够铁肩担道义、勇于任事甚至敢于牺牲拼命?这涉及老舍的思想和文学的另一个问题。

二

弟弟白李,既是有传统伦理正义的好北平人,又是具有政治正义和理想的革命党人。和黑李

一样,他也具有浓厚的兄弟情义和伦理仁义。他之所以不懂事闹分家等,为的都是不连累哥哥——深知自己暗中从事的革命危险性极大。不过,细读作品,会清晰地感到白李形象意义的复杂性。老舍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寄托和思考,通过叙述者的讲述和眼光,也较为复杂隐蔽和内敛深邃。

首先,白李的革命内容之一,是领导人力车夫打砸电车。这是发生在北平的一件真实事例。老舍将此写入小说,家中的车夫王五也被白李带着参加了这次革命性的造反。人力车夫集体砸电车事件,为的是不让电车取代人力车,砸了穷苦人的饭碗。从正义论的视角看,这符合生存正义即自然正义。生存正义的本质是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生存至上原则,即极度饥饿、濒于死亡的人偷盗他人粮食,抢夺不属于自己的面包,寒冷冻馁中的山民砍伐私人和国家园林树木烧火取暖,是符合自然道德和生存正义的——人本主义认为个体的和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生存第一要义,是人的权利和自然道德。但是这只限于极端环境和原始性社会,有环境和文明发展阶段的条件制约。进入文明社会后,生存正义必须有伦理正义、宗教正义、历史正义和法律正义的规范制约,不能不顾及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等。就现实社会而言,穷人盗取或抢劫他人面包固然符合生存正义与自然正义,却违背了伦理正义和法律正义。从生存正义来看是合理的,从伦理正义看是不道德的,从法律正义看是犯法犯罪的。因此,白李领导车夫打砸电车,以维护人力车夫的生存,固然有符合生存正义及其自然伦理的一面,却也违反了社会伦理正义和历史正义。毕竟,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电车取代人力车也是近现代落后于世界现代文明的中国,在被迫追赶现代化的潮流中,必然会发生和不可阻挡的,且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善。善恶的内容和标准首先是历史和文明进步发展的合目的性(历史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才是道德范畴的价值判断。

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发源国英国,在19世纪的伦敦也曾经发生过马车夫阻碍汽车、限制汽车的事件并由市政府制定了“红旗法案”,规定汽车速度不能超过马车、汽车为马车让路、每隔一段路就有警察挥舞红旗,警示汽车不能超过6公里等真实而可笑的事件,也曾经发生过乡村农民不允许蒸汽火车通过田野的抗议和争执。但是,这种反现代化的行为终究阻挡不了现代化的文明步伐,即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目的行为,成为后发展国家的类宗教意识形态的大规模制度设计与组织实施的行为。

车夫造反符合生存正义而有悖于当时的法律正义和程序正义——革命者不会承认当时所谓社会的程序和法律正义,因此要大力破坏之以图建立新国家新政权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正义。革命夺权的最终目的还是在革命性领导下实现现代性,故此以砸电车为方式和目的的革命也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和文明正义,也不符合革命的根本性质与目标。这种革命的手段与暂时利益,同革命的根本性质和终极目标内在矛盾、二律背反的事实,就内在颠覆或解构了白李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正义性——合乎生存正义性却违背历史正义性的革命,是逆现代性的,甚至是“反进步”性质的。因而白李的革命与车夫的造反,必然是阶段价值性和根本价值性颠倒的——一方面有革命正义的意义,一方面革命意义又被历史正义所消解,是历史的正剧与悲剧和喜剧的混搭。

其次,从白李的革命的手段、方式来看,白李虽然也是肯为哥哥着想、不想因为自己的革命连累哥哥、显示出北平文化的老派礼数和传统伦理道德在其身上的影响与体现。但其表现的方式却是不断忤逆哥哥使之难受尴尬,是不断的“犯浑”和对兄弟情义背后的礼教和礼数的伤害与打击。其内在的兄弟伦理与外在的表现形式之间构成了极大的对立和紧张,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哥哥的性格与行为的蔑视和自己的高人一等,内在显示是老舍所写的白李的高傲和自大。哥

哥牺牲后,逃到外地的弟弟提到哥哥时,说的是:“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砸地狱的门呢!”这是对兄弟二人生死两隔的真实叙说,这叙说里其实即包含了对哥哥行为的道义高扬——为弟弟牺牲的哥哥不会下地狱只会进天堂,同时也包含对一向懦弱忍让的老北京人哥哥的几分不自觉的“低看”评价:像哥哥那样的人是难以在地狱里、现实中生存的——他们安于现状、保守无为的弱者心理与行为,只配在花团锦簇、一片祥和的天国里生存。些许的低看与无言的蔑视,就包含在这看似悲悼哥哥的话语里。老舍是以内在伦理道德禀赋和外在行为的对立与距离中,书写白李的革命者形象的。尽管除了写带领人力车夫砸电车事件以外,老舍对革命党和革命的实际内容不甚了解,也使得他没有写出白李革命者的内在世界,革命和革命者在白李身上更像是一个符号和标志,信号的意义大于信息的具体构成。

就是这个内在与外在构成对立紧张关系的革命者白李,他的革命行为的过程和结果,也是动机和结果的背离——他想保护哥哥不至于因为自己的反抗旧世界的行为受到连累和伤害,结果却出人意料地让哥哥反而为保护自己而丧命。张扬强悍的弟弟和看似软弱无能的哥哥,两个人都互为保护和牺牲,结果却是哥哥黑李送命。这道德动机与事实结果的背离,也对白李的革命者形象及其革命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构成了一定的内在消解。言外之意可以表述为,真正秉持兄弟伦理的弱者哥哥能够真正为伦理大义、为弟弟牺牲,同样具有但显然弱于哥哥那样强烈伦理情义的、因性格和革命而显强悍的弟弟,保护哥哥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葬送了哥哥。软弱者实际成为强悍者的保护者和牺牲者,保守者成为激进者的牺牲者。白李的革命及其结果是牺牲哥哥、革命行为的动机与结果之间的背离、革命者身上的新道德与被牺牲者身上的旧道德的善恶冲突,这些内涵于其中的问题,是小说思想深刻性的构成要素之一。

如上所述,在五四启蒙主义性质的文学里,叛父者和牺牲者的软弱大哥,是常见的形象和叙述的主题。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已经出现了殷夫那样的参加革命的富家子弟,与哥哥代表的旧世界势力告别的诗篇——《别了,哥哥》。诗中的哥哥和现实的殷夫的大哥,与其说是旧世界和统治阶级的代表,毋宁说只是技术官僚,而且自小到大一直对弟弟关照有加。但是与旧世界决裂和宣战的殷夫,却把大哥当作了要永别决裂并埋葬的敌人,大哥不再像巴金小说里那样值得同情。老舍不是左翼作家,更不曾参与任何革命与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小说《黑白李》的革命者白李也丝毫没有把哥哥当作革命对象、要决裂和埋葬哥哥的政治伦理和阶级斗争大义,但是,爱着哥哥的革命者白李及其行为,依然是客观上把哥哥推进了地狱。

在这里,天堂与地狱,似乎也还包含着另一种历史性的复杂意义。在老舍教书于英国和回国后的时期,不论是欧洲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评价,还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界对苏联革命的认知,都有对于苏联革命及其政治装置里地狱与天堂的争论和不同评价。中国知识界当时在“仇俄”抑或“友俄”讨论中的这种认识和评价,自然会影响和传播到社会中,成为一种思想的现实,而这样的思想现实,在老舍的此篇小说中革命者白李的语言和语言背后的知识与思想的谱系中,似乎也隐约地存在和表达出来——白李的革命动机和目的不是先造地狱再造天堂,他是一开始就要砸烂拆毁地狱,但结果是把他不希望受到地狱之害的哥哥送进了地狱。这种非革命者白李所愿的结果,其实正好揭示出“地狱”旧社会的残酷和黑暗,也是老舍在《骆驼祥子》等小说中擅长表现的社会的整体性黑暗对善良人民的无所不在的压迫和戕害,同时也说明白李领导穷人砸电车闹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对此,小说虽然没有充分揭示,却也客观呈现出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黑李那样的过于忠厚乃至无用的好人都杀害的社会,还不应该通过革命将其砸毁吗?

三

从白李作为革命者的思想与对待底层人民的行为方式看，老舍的此篇小说还透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内在深刻”——老舍可能没有清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不了解革命、党派与阶级政治的老舍，没有写出革命者白李的任何革命的思想与理论。从全部的描写来看，白李属于中产阶级的、贵族范儿的革命者——类似于俄国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现代的中国革命，也曾出现大批的富家子弟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事例，像韦君宜所写的那样一大批抛离富贵权势家庭参加革命的“丽莎”们，艾青诗歌写的农民之母养育了地主之子的故事^①，地主之子就是艾青自己。这样的革命者具有天然的民粹主义关怀，和为穷人的利益与阶级的解放翻身敢于“砸烂地狱之门”的奋斗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老舍笔下的白李这样的革命者，算不上大富大贵，至多算个老北京城里的中产之家，但却同样关心人力车夫，鼓动和领导他们造反砸车，舍弃家庭和阶级地位带来的利益和自我的幸福，为广大人民谋幸福，几乎丧命却不改革命意志。这与现实中老舍其实并不多么熟悉和了解的那些真正革命者的思想与行为路径异曲同工。

然而，小说里却以车夫口吻说了这样的事情：过于忍让懦弱仁义的哥哥出门坐车时，总是找各种借口下车，为的是让车夫王五休息一会儿，免得过于劳累，又不伤及车夫的面子。这种爱屋及乌、慈悲为怀、融佛教和基督教之仁爱为一体的善举，显示出黑李的天然的人道主义和儒者爱人的仁义情怀。相反，白李坐着车奔走，忙于革命，带领穷人们造反，有一种“安得广厦千万间”、为穷人舍得一身刚的大关怀，但他却从未想到、也未做到让辛苦奔波的王五停下来喘口气，抽口烟，擦擦汗，喝点水，休息休息。这样的小事小善不屑为、没想到、只忙革命大业——有父母留下的产业和哥哥为之操劳的革命者白李，以往在优渥富裕的生活中，不会想到关心下人、洒扫庭除之类的小事，也没有这样的积习，以至于在干革命的时候，自然不会为这些小事操心费心。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描写和叙述，揭示出内在包蕴深广的关于革命、关于革命者的有意味的问题，那就是：这种贵族范儿的、富家出身的、高尚的革命者，他们对于革命的认识和献身，是出于宏大性的政治信仰和理想关怀，是从接受并强烈信仰的政治和革命理论、理念出发，从而产生了阶级论的、政治化的为人民解放献身的类民粹主义的思想并付诸革命行动，因此他或他们会强烈关注阶级与政治理念中天然代表历史和社会正义的、广大的下层民众及其利益，为理想化的、信仰中的、革命理论中的人民，以及他们代表的集团和阶级的整体的解放而奋斗。

与此同时，有些富家出身的贵族范儿的革命者，却往往对其阶级政治信仰和理论之外的人民中的个体的穷苦人、具体境遇中的具体的底层劳动者及其生活，缺乏具体的关心和爱护。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为一种政治和阶级理论体系中抽象化、概念化、正义化的复数的人民及其利益，萌发正义冲动、革命热情甚至革命狂热，不惜牺牲自己为之革命和奋斗，不少人往往可以干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但在现实中，在自己的生活中，却不会“多能鄙事”——关注具体的个人是否苦累艰辛、需要休息，关心一个具体人的具体生活，不会像黑李那样“琐碎”和具有婆婆妈妈的小“人道”。总之，白李这样的革命者就其以往的生活积习和思维方式来说，为了大多数人谋幸福，连个人的生命安危都置之度外，自然就没有余暇去关心具体和个体的车夫是否辛苦劳累了，这由此显示了白李作为革命者所具有的那种“大情怀”。

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理性的英国人对法国大革命、对罗伯斯庇尔等革命家的行为认识、对

^①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媒体中苏联革命的报道和评价,应该是有所知晓的。故此,私下臆测这种中国和世界性的思想的背景与风景,也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老舍的思想和写作,所以会在白李的革命行为中写出这样的细节,并且把黑李与白李对待车夫的行为作了对比性描写和展示。虽然是细节,但兹事体大,意旨深远,意在文内又意在言外,其中蕴含超出细节的重要且有深意的东西:对白李这样的革命者的全面认识和评价,以及这样的描写和评价的历史与思想史价值。如果老舍不是受到风靡世界的中外思想界关于苏联革命与现实的知识 and 认识的思想影响,而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察中得到的认识,那就更饶有意味了。老舍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读书获知中形成的北京市民意识里,带有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存,他既不反对时代的大变化和历史的大趋势,但也以市民的眼光质疑现代的时髦,这在小说的叙述关系中和不同层面上可以透析出来。

值得思索和指出的是,车夫王五作为下层百姓和需要照顾和解放的穷人,他自己对黑李的照顾自己的“小善”行为感谢而不感佩,反而对白李的为自己所属的阶级的利益而奔走革命的“大善”、坦然地让自己拉车奔跑而毫无体恤的革命党人的行动,并不计较,却很佩服白李的“革命范儿”。黑李体恤照顾车夫、坐车还担心车夫累着,王五觉得他只能解决自己具体的眼前的劳累,而无法解决电车通行会砸了很多人力车夫饭碗的大苦难,因而和黑李在一起,感觉他和气温婉,对他只有感激之心而无敬佩之意。相比之下,他更愿意跟着白李没黑没夜地奔跑,觉得那才畅快有劲头有奔头,快活敬佩在心里头。尽管跟着白李闹革命的结果可能是牺牲,可他依然尊敬敬仰并愿意听从白李的调遣,拉着他满城跑,跟着他造反和闹革命。用他的话说:“二爷来的小,四爷来的大。四爷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二爷是家长里短,可怜我的腿,可不管这儿”,“用烟卷指着胸口说:‘这儿,咱可是爱四爷’”。王五觉得二爷黑李对待自己再好,“一看天气热就叫我多歇会儿”,但彼此还是主仆关系,而四爷白李“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这样的细节和情节,实质也触及和揭示了同情与悲悯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与以暴力方式试图根本解决社会公正和底层民众生存之道的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善举善行的社会性反应和效果差异,以及穷人对待良善好人和革命者的价值认同度与取舍,探究了穷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同个人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环境下底层大众要求经济和政治解放、但少有人本主义的 personal 价值和个体自由诉求的思想状况。自然,受到英国式的人道主义和保守主义、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老舍,他自己在生活和文学中,是更为看重黑李和宗月大师那样具体地解决和体谅穷人苦难的好人善人的,这在他的为人和文学书写中都有诸多的表现。而这样的思想与文学的价值倾向,在《黑白李》兄弟形象的塑造和描写上也不动声色、自然而然地“内存”和流露出来,成为一道看似微不足道、信手拈来的细节和“小道”、实则意蕴深远的文学现象背后的思想风景。

如果再引申开来,黑白李对自家车夫的态度和车夫对待他认为代表小善与大善的黑白李兄弟俩的不同态度,实质也触及了五四启蒙主义的历史吊诡和难题,即涉及到了现代史和思想上一直存在、使五四新文化启蒙集团和知识分子纠结的问题: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与救亡和革命的关系,以及何者对现代中国而言更为紧迫和重要、成为历史大潮和主旋律?启蒙和人道主义何以在人民眼里只是枝节性的小善而非根本之图的大善和“道”?人民大众更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和拯救、更需要跟谁走?五四式的启蒙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救治及道德同情、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何以衰落退场?

五四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对待人民,一直存在两种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居高临下

的启蒙视域，视人民为精神改造、再造国民性的对象；而人道主义又使下层人民成为关怀和同情的对象，思想层面的平民主义和同情人民，与文学上的倡导平民文学与创作“下等小说”，都是这种启蒙思想和新文化的内容构成。故此，鲁迅一方面写了《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药》等以现代性的“外来者”目光，探视古老中国和国民性愚弱、志在改造国民性的小说，也写了《一件小事》《明天》等悲悯人力车夫和底层人民困苦的小说。胡适也写作了诗歌形式的《人力车夫》，写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下层人民似乎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不绝如缕的主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老舍的《黑白李》和《骆驼祥子》，都把人力车夫作为文学的聚焦人物，甚至成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如左翼艺术家沙飞的著名摄影作品，就有《人力车夫》。

不论是启蒙主义的对人民大众的精神唤醒改造还是对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悲悯，都是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写底层的思想与物质贫困，还没有写出底层人民自己对于来自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的、现代性的批判或同情的态度与感受。同时，来自现代性知识分子的启蒙或人道主义同情，在现实和历史的发展与逻辑中，在他们的文学叙述中，已经感到无力或处处失语和碰壁。鲁迅小说中从外部、都市回乡的知识者，他们的现代性目光固然看到了古老中国和人民的落后与愚昧，却几乎无力改造和振兴，人民也拒绝接受他们的批判性视野和现代性思想，他们遭遇到的是无能为力、无法穿透的一堵堵厚墙。而对于人力车夫之类的底层人民的同情，也陷入人道主义的尴尬：同情悲悯无助于解决他们的生存困苦，至多只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小善——知识分子和教授们同情他的劳累辛苦、或从人人平等的人道主义出发感到不应该像老爷似地乘坐人力车，感到于心不忍和不公平，而车夫们面临的是不拉车就要饿肚子甚至饿死的现实困境，他们需要的是彻底解决生存困境的现实的、社会的、制度性和普遍性的实际行动——革命及其彻底翻身解放的历史的大善，而不是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改良。从鲁迅到胡适，尽管新文化启蒙集团实质的启蒙诉求存在差异，这差异是新文化运动解体的内在原因，但他们共同的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及其行为，却深切地感受到此类行为同样陷入自我矛盾和困境，自我解构和颠覆了人道主义的现实合理性和价值性。也就是说，他们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都无法真正满足和解决人民的思想与物质贫困问题。人民既不接受他们居高临下的思想启蒙，也不接受他们的这种小善——思想和道德上的同情与悲悯。因此，五四的思想启蒙和人道主义面对人民大众时出现了双重的失语与失败，必然性地退场和被压倒，不只是被救亡压倒，而是救民族国家之危亡和救人民之生活与命运的革命，这种历史和时代的大需求，远远盖过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及其构成的精神现代性诉求。鲁迅的呐喊式的启蒙小说，胡适的诗歌，都内在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文学、精神改造与文化救国救民的无力和悲剧。他们思想诉求的内在差异矛盾和外在的与社会历史大趋势和要求的脱节隔膜——隔膜是五四文学的普遍主题^①——这种双重的因素导致五四启蒙新文化运动的盛极而衰。而革命和翻身解放的政治与文学，成为历史与时代的主旋律和滚滚大潮，革命主张的通过改变社会制度彻底改变人民命运的宏大叙述，自然就会吸引普罗大众的响应和跟随。人民更需要这样的领袖，更愿意跟着革命者及其领袖走，尽管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苦难和牺牲。老舍的《骆驼祥子》出版后，某些不仅希望写出祥子的接连不断的穷苦人的悲剧、也希望写出穷人出路的读者的要求，就反映了一般人民大众的心理。故此，《黑白李》中的车夫对黑李的小善和白李的大善的态度，才会有如此的不同；对革命者白李和行仁义的好人黑李的跟随选择，才会泾渭分明。这样的描写如果联系到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革命史的历史内容来看，同样包蕴深

^①叶圣陶也写过这类表现知识分子与人民脱节和隔膜的小说，1922年，他的一本小说集就叫《隔膜》。

广——历史的丰富内容以细节的形式、以历史文本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中,内在地表明何以底层劳苦大众对道德的同情和悲悯等小善予以历史的扬弃,而对能够带来彻底解放的革命主张作出历史性选择。如此一来,小说就以悖论的方式颠覆了小说叙事者与隐含作者对革命者和革命的质疑,换言之,对革命者及其革命正义性和正当性的怀疑和颠覆也被瓦解和颠覆。

四

《黑白李》这篇小说的叙述视角和人物关系等隶属于小说修辞学的艺术问题,也是饶有意味的,完全可以用罗兰·巴特的叙述矩阵的方式予以分析。表面简单的小说情节和内容及其黑白分明的人物,其实都是内涵丰富的。黑李与白李的关系,黑李与车夫的关系,白李与车夫的关系,黑李与女人的关系,白李与女人的关系,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既作为故事的讲述和叙述者,又是在场人物,是黑白李兄弟的朋友,是车夫对兄弟二人的生活与“故事”及其车夫的评价的倾听者,是唯一直接到那个兄弟二人都交往的女性“她”那里去见面的人,是看到黑李被押赴刑场并为之收尸的人,是看到白李的消失和逃亡、后又与之在上海见过面的人,是车夫王五逃跑前请求代为照顾老母亲的人。“我”参与到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关系之中,是其中所有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表面看,“我”与他们每个人的关系都是中立客观的,没有态度和臧否评价的。实质上,通过细节和讲述,这个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者的“隐含”作者,其实对每个人、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发生的故事,都在向读者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经意地表露了立场和态度。比如,对那个女人“她”,黑李表示弟弟既然爱上她,把传统兄弟伦理看得高于一切的他自然不再“争”她,为了一个女人而牺牲兄弟情义不值得,他可以让渡出去,只要弟弟喜欢高兴就行;而弟弟争抢“她”的目的是为了“气”哥哥,目的是让哥哥感到实在不能与弟弟过下去,达到分家的目的,分了家他就可以无牵无挂地闹革命而不会连累哥哥。兄弟二人的动机和目的都具有来自兄弟伦理的高尚和“禅让”道义,但在叙述者“我”的讲述中,却内在表达出兄弟高义背后依然深潜于其思想情感深处的传统道德,他们都把女性作为“他者”来对待。

而“我”为排解兄弟二人在女人身上的矛盾而前去会见“她”的一小段场面,也披露了对于这种女性的态度:她没有具体的肖像和名目,只是个“她”。而“我”对“她”美丑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却有直接引语构成的间接描写:替好朋友黑李惋惜,以为他找的是什么仙女,却不过是个会把自己当作商品待价而沽的自我物化的新时代时髦尤物,她对黑白李兄弟都不满,对黑李尤其不满,却不放手而把他当个“标本”和“备胎”;对白李好几天见不到,但是白李敢于强吻她的行为也照单全收,接受白李,在兄弟二人之间玩弄乱伦式的恋爱而毫不在乎。所以,“我”的心理评价就在叙述中以间接引语的方式表达出来:“她”根本就不是黑李应该配有的“仙女”,只是个在黑白李兄弟之间搞三角恋爱、朝秦暮楚的“恶女”、现代的“吃”男人的时髦女人和都市魔窟里的妖精,就像五四以后新时代“吃教育”的老张(《老张的哲学》)、“吃”婚姻的留学生(《文博士》)、“吃”祥子的红袄绿裤子的虎妞(《骆驼祥子》)一样。这是“太爱”老李的叙述者对该女的形象和内心的描写与揭示,叙述者的腔调和语句中充满对新时代以自由恋爱为时髦的现代女性的反讽。有人说老舍及其小说对女性的描写和评价是传统的和非“五四”的,老舍小说里对所有摩登、现代、时髦、时尚的人与物都流出质疑和反讽,表现出反现代性的一面。而在《黑白李》上述的小场面的叙述中,确实不经意地表现出老舍小说里的一种对待时髦的现代女性的嘲讽,而这种嘲讽就存在于兼有叙述者和在场参与者双重身份的“我”的叙述中。

对待兄弟二人的态度,“我”在表面上不偏不倚,中立客观,但是在小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

对待黑李，“我”是更多地通过直接与他交往、看他做事和苦恼、为他的恋爱去见那个“她”，并直接作出“她”不是仙女配不上黑李的评价，表达出与黑李的友情和自己“太爱老李”的态度。而对于白李，作品只有一段直接的写“我”与他交往的情节，即白李委托我去与黑李说分家的事，劝哥哥黑李答应。在这一过程中，“我”通过几个细节揭示出要干大事的革命者的道德情怀和人品。一是运用间接引语方式暗示在白李心中“我”与哥哥是一对“糟蛋”，即时代的落伍者和不配与白李为伍的低下者；二是通过白李讲述自己与女人的恋爱关系故意伤害哥哥，披露白李式革命者的两性道德观；三是在白李与“我”的对话中，在拜托“我”去劝说黑李分家的话语中，有如下的对话：

“你是不是叫我去对老二去说？”

“一点不错。省得再吵”。他又笑了。“不愿叫老二太难受了，究竟是兄弟”。他似乎很不喜欢说这末后的两个字——弟兄。^①

最后一句从直接引语转入间接引语的叙述，表露了在对待兄弟二人的感情上，兄长黑李的浓厚的传统伦理之情和对弟弟的无条件的爱。相反，弟弟白李却似乎并没有哥哥的情义浓厚，而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比兄长重要，其情感已经薄弱。“弟兄”是不能抹杀的事实，但他已经不喜欢让这样的事实和伦理关系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而是越来越轻。闹分家、兄弟伦理已经越来越成为闹革命的手段，二者的天平早已经倾斜。最后白李的一大段要“我”对哥哥转述的劝他早结婚生娃娃、自己去做革命者、20年后再做叔叔回家当落伍者的话，说完后小说又用了间接引语方式加了一句：“他叫我明明白白的觉出来，这一句（谢谢你）是特意为我说的，他并不负说的责任。”

这一句间接引语非常之重要。它表明白李虽然也有爱兄弟的伦理，也对“我”有所信任和拜托——他知道“我”是黑李的“糟蛋”好友，故此才有话语转达，但是，一者他对“我”的谢意是聊以塞责，并非真的感谢，只是像叫王五拉车快跑一样把我当作传话的工具，并没有真正的感谢之意，或者说谢意是表面的；再者，那些需要转述给黑李劝他早分家、对女人少磕头多强吻的高人一等的话语，他说完以后黑李做不做，那是黑李的事情，他不管黑李理解与否，不再承担任何分家和占女人的责任——他没有这样的责任伦理。

这样的表面具有兄弟伦理情感的白李，其内心世界和道德伦理世界的更加简明而带有非道德因素的、敢于革命也敢于无情、敢于牺牲自己也敢于牺牲他人的人格结构和心理结构，就清晰地透露出来。而这样的描写和叙述方式与视角，这样的细节与情节，既内在隐蔽地揭示出白李的内心世界，也微妙地传达出叙述者即隐含作者对待二人的道德与价值评判，对革命者白李行为的动机与后果的价值态度：这样的革命者是大胆坦率的、理想主义的，也是存在传统道德的瑕疵和责任伦理的浪荡的波西米亚人。他领着穷人砸车闹革命的行为，是他作为看不起“时代落伍者”的“狂傲少年”为了“树立住自己”“他应当到处做领袖”“每一句话，他不是领导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绑在断头台上”，以证明“这个时代是我的”的一种时髦选择，而生为现代人和时代的弄潮者当然就要一切“时髦”和赶潮流。革命是现代的时尚的，所以他就要把握好这个时代，等到年龄大了跟不上时代了，也愿意回家当黑李式的含饴弄孙的落伍者和保守者。当然，叙述者作为小说中在场人物，他与白李的对话和对话中的自我感受与评价性态度，无疑揭示出白李革命的时代动因和个人动因——有赶时髦的因素掺杂其中，有富家子弟青春冲动的领袖欲望，

^①老舍：《黑白李》，老舍：《老舍小说精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未必有极其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这个叙述和讲述者作为隐含作者,不完全等同于老舍,但有作者的寄寓和内在态度,其对革命者白李及其革命的评价标准,对黑白李兄弟的不同的道德评价,特别是对闹革命的白李的充满反讽的叙述,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而是既有道德层面的对比与臧否,也有老舍小说经常表现的现代与传统二者的时代命运及其悲喜善恶的复杂对比和褒贬。

同样,对待车夫王五一类下层人民的革命和革命要求,下层人民对待实施小善的好人和实施革命解放大善的革命者的态度与评价,也是在与叙述者“我”的接触中直接表达出来的。王五干革命的生存正义要求及其解决穷哥们儿集体命运的朴素的政治要求,他所代表的阶级对现实社会和未来社会的诉求,是由他的现实阶级地位导致的,更有来自白李的启发和引导。小说用王五对黑白李兄弟行为的讲述及其评价的间接描写的方式刻画黑白李兄弟二人的形象,既从另外的、他人的视角深化和补充了二人的形象的丰富性,弥补了作为与王五阶级地位不同的“我”的视野不及之处,也表现了“我”所不了解的黑白李兄弟行为道德对于社会下层人的意义以及底层人民对小善与大善的态度,以及黑白李兄弟的社会价值。它们都与“我”的态度和评价构成对比,增强了小说叙述的戏剧性。而“我”在事后对王五讲述的讲述,不仅丰富了黑白李兄弟形象性格的丰富性、真实性与差异性,也勾勒出王五作为底层人民代表与传统和现代、与人道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关系,以及黑李形象的更深沉的悲剧性——不仅白李不理解他,他善待的下人也不真正需要他,不敬佩他,不会与他成为没有阶级差异的“弟兄”,传统的善德与善行被下层人民真正需要的革命需求消解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至此,通过“再讲述”他人讲述的方式,把车夫与黑白李兄弟的关系及其内含的意义,把三人的形象和关系及其意义,把隐含作者态度的叙述者对三人的态度和认知,也把王五的形象性格和叙述者对他的隐含评价——敢于革命造反、知善恶但不要小善、需要根本改变阶级命运的历史之大善、有传统的孝心、甘当革命与造反的“马前卒”——一并传达出来。人物关系与隐含作者的态度,都通过叙述者的在场参与倾听,通过他事后的追忆性的复述和讲述,客观而又有倾向性地呈现出来,把看似简单的人物形象和关系中包含的复杂意蕴,凝聚于叙述中,真正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当然,《黑白李》对白李代表的革命者和革命的认识,虽然是通过小说叙事者的“讲述”表现出来的,并不完全代表作者的观点,但其中也部分地隐含作者的立场、态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发现者、批判者和表现者的老舍,由于自身经历,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他批判的市民阶级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对真实的革命和政治是不完全了解和理解的,甚至难免带有市民阶级和社会的偏见与局限。因此,其小说中描写的革命与革命者,一方面掺杂着市民阶级思想局限影响的“想象的革命”,另一方面也明显存在“失真”、油滑和概念化之弊,从而影响到小说人物塑造的丰富性和内容的真实性,这也是必须指出的。

***The Black and White Lee* and the Ideological “Scenery” in Lao She’ Novels**

——Re-Analysis of the Classics of Modern Literature

Pang Zengyu

(School of Humanit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Published in the 1930s, Lao She’s novel *Black and White Lee* mainly depicts the theme of brotherhood sacrifice. It is similar to the novels of moral teaching in Chinese context. Nonetheless, beneath its superficial and dominant theme, the novel impli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volution, revolutionaries and ethics and morality and the underclass. The seemingly plain narrative is actually quite sophisticated. Intrinsicly, it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justice of survival, justice of ethics, justice of history, and justice of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of forms and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link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political society and the literature history within and without the text, makes a meticulous analyse and dissection of the implied topics in these novels. The inner sophistication of this novel and the uniqueness of Lao She’s works can be observed.

Key words:Lao She;*Black and White Le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rickshaw coolie;the literature in 1930s;rickshaw puller

责任编辑:李宗刚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的世界性意义诉求 与民族历史认知^{*①}

刘起林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以世界性意义诉求为审美旨归,讲述战争灾难与创伤,重塑中国战时形象,表现出一种侧重与遮蔽并存的历史认知策略。在思想观念层面,以国际互助义举为叙事框架,人道主义为价值立场,建构战争罪恶及其深重创伤的“历史证言”,揭露人性在战争中的蜕变与异化。在中国战时形象建构层面,侧重讲述战争苦难、讴歌中国道义、批判文化病态等意义维度。国际互助元素的历史“边缘性”特征和创作者赢得国际认同的急切心理,导致了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借鉴与模仿痕迹明显、历史核心特征难以充分展开、人性逻辑建构与历史事实基础脱节等审美局限。

关键词: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世界性意义诉求;人道主义立场;中国战时形象;“边缘性”资源

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024-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3

一、世界性意义诉求与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的兴起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抗战题材作品长期处于社会影响广泛而学术赞誉度不高的境地。一个至关重要的批评性观点,就是抗战题材作品的国际性认同度、跨文化影响薄弱,难以“在一个廓大的平台上与世界文学对话”^②。“能够代表一个国度的战争史诗的分量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杰作,令我们翘首企盼的时日真是太久了”^③,这一语道出了文坛内外对中国抗战文学尚未走向世界的失望之心。于是,能否“为推进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接轨做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④,就成为抗战文学创作发展的关注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以鲜明的审美针对性出现于新世纪文坛,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的创作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渐成阵势的过程。早在2000年代,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就已开始出现。如朱秀海的《音乐会》(2002年)表现东北抗联战士为保护进入队伍的朝鲜烈士遗孤而付出的惨痛牺牲,阎欣宁的《中国爹娘》(2005年)、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2007年)和《小姨多鹤》(2008年)讲述日本战争遗孤的中国战后命运,张雅文的《盖世

* 收稿日期:2019-09-15

作者简介:刘起林(1963—),男,湖南祁阳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新世纪的国际性题材抗战小说及其中国形象建构研究”(201803050107)的阶段性成果。

② 石一宁:《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创作成就斐然视野尚需拓展》,《文艺报》2005年6月2日。

③ 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5年第8期。

④ 朱向前:《炮火硝烟中的人性观照——我读朱秀海的战争长篇小说》,《北京日报》2002年5月12日。

《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2002年)、严歌苓的《寄居者》(2009年)展示德国法西斯种族迫害之际中国人的国际救助义举。这些作品已经表现出创作者既有关注视角的同一性,又有发掘视野的宽广度。2010年代,相关题材创作更为丰富多彩。2010年,阎欣宁的《美国来鹰》以一个浪漫爱情故事为线索,讲述了美国空军援华作战的功勋;2011年,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表现了南京大屠杀中外人对中国百姓的救助之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后,从2014年张新科的《远东来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2015年黄国荣的《极地天使》、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徐广顺与丛培申合作的《大遣返》、朱定的《中国伞兵突击队》,再到2016年熊育群的《乙卯年雨雪》,2017年张翎的《劳燕》、范稳的《重庆之眼》,加上2017年在国内出版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郑洪的《南京不哭》,相关题材力作密集出现,国际互助题材创作一时成为了抗战史叙事的亮点和热点。

文坛内外都对这种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首先,各大权威文学期刊相继登载。《人民文学》早在2008年第3期就发表过《小姨多鹤》;2015年一年之内,又在第8期、第11期分别发表了《极地天使》和《疯狂的榛子》。《收获》杂志也相继发表了《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和《劳燕》。其次,各种文学评奖和小说排行榜大力推介。《音乐会》早在第6届茅盾文学奖中,就进入了初评入围23部作品的名单。2008年,《小姨多鹤》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获第1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2015年,《疯狂的榛子》入选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获第4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极地天使》获第4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的“特别奖”。2017年,《劳燕》入选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获《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重庆之眼》入选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推出的年度“中国好书”。再次,刊物转载和影视剧等改编频繁。《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6期转载《远东来信》,2016年第2期转载《乙卯年雨雪》,2017年第5期转载《劳燕》。《音乐会》《小姨多鹤》《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均被改编为电视剧,《金陵十三钗》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中国爹娘》被改编为评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另外,《南京安魂曲》和《南京不哭》本是在美国用英文出版,又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再度推出,这也有助于强化国内相关创作的声势。

各种宣传、推介性评论,体现出关注者从作品国际性特征出发的思维方向共同性。作家出版社的《小姨多鹤》封底宣传语中,称《小姨多鹤》具有“跨国作家的辽阔视野”,堪称“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稀世之作”^①;《长篇小说选刊》的“卷首语”,介绍《远东来信》“以二战期间中国百姓保护犹太移民的真实历史为素材,是近年来抗战题材小说中的特异之花”^②;新世纪之初的《音乐会》,因为“选择了两个异国少年(金英子和松下浩二)的角度来反思战争,并不拘囿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被推崇为“获得了超越党派、民族乃至国家进而达到人类共性的高度”^③;2015年的《疯狂的榛子》,也因为聚焦“世界情境之下的国史与人学”,展现了“从国际阵营起始又到地球村渐大的历史进程”,被赞誉为“至少是具备了杰作的涵养”^④。很显然,“跨国作家的辽阔视野”和“人类共性的高度”,正是这些作品被推崇为“稀世”“特异”的根本原因。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的创作者,也确实显示出在世界性意义平台上讲述中国战争灾难与抗战贡献、谋求跨文化认同的审美意识。

①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封底。

②编者:《卷首语》,《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6期。

③朱向前:《炮火硝烟中的人性观照——我读朱秀海的战争长篇小说》,《北京日报》2002年5月12日。

④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5年第11期。

中国军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但长期以来,中国抗战史并未有效地融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认知格局,“我们的某些数字和结论在国际学术界难以得到更多的认同”^①,甚至“在欧美人心中,伤亡人数达三千多万的中国军民在二战期间的作用微乎其微”^②。战后的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的罪责和战后国际新秩序,也屡屡表现出不承认、不遵循的态度,还不断因该类问题与中、韩等国闹出大大小小的外交“摩擦”事件。结果,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这样“悲惨的大事件在它发生后的六十年中,始终被否认、篡改或忽略,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它是一段继续在被凌辱、被残害的历史”^③。

众多作家对此具有深切的感受和鲜明的理性认知,于是力图在国际关联的视野中来述说中国军民的苦难与创伤,使中国的抗战史叙事“打到国际上去”^④。郑洪义愤于某次国际会议大谈日本的“广岛事件”却对中国的南京大屠杀视而不见,决意以“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的思想态度“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⑤,从而创作了长篇小说《南京不哭》。严歌苓不断参加美国华人社区和中国南京的各种南京大屠杀事件纪念活动,“在参观一个个大屠杀刑场时,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⑥,终于写成了《金陵十三钗》。哈金在美国每年都去看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会,“慢慢地就成一块心病了,老想这些事”^⑦,最终决定“在国际经验的背景下”^⑧创作一部《南京安魂曲》。《重庆之眼》将笔触延伸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战后对日索赔事件,并着意展现日本友人帮助中国受害者申诉的过程和动机,目的也在于更有力地“清算战争责任找回公道与正义”^⑨。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作家如朱秀海、黄国荣、阎欣宁、张雅文、范稳、熊育群等,往往是不经意间发现了抗战历史中的国际互助因素,于是以高度的艺术敏感展开相关题材的创作。《极地天使》就是作者偶然参观山东潍县的同盟国侨民集中营遗址而发现了创作素材;《音乐会》以朝鲜烈士遗孤为主人公,《重庆大轰炸》讲述战后对日索赔事件和日本友人的帮助,则是基于创作者在相关调查中的发现。哈金、严歌苓、张翎、袁劲梅、郑洪等海外华人作家关注中国抗战史本身,就是源于跨文化语境的现实生活感触,他们对建构国际互助性情节具有更充分的理性自觉。科学家郑洪在《南京不哭》中虚构一条美国科学家约翰帮助中国进行军事科研、从而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情节线索;《金陵十三钗》在国际色彩鲜明的基督教堂和外国神父的参与中,展开南京风尘女子的侠义故事;《南京安魂曲》以美国人明妮·魏特林在日军暴行中救助中国百姓为中心。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创作者感知视野国际性的具体表现。

不少作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借国际互助事件重塑“中国战时形象”的审美意图。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中国支撑起了“二战”东方主战场的抗日战争,则成为一种面向世界重塑中国形象的优质历史与文化资源。但是,中国抗

①王建朗:《抗战研究的方法与视野》,《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

②张新科:《站立》,《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6期。

③严歌苓:《从“rape”一词开始的联想——The Rape of Nanking 读书心得》,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2页。

④胡平:《抗战文学创作关系国家软实力》,《百家评论》2015年第5期。

⑤郑洪:《南京不哭·敬致中国读者》,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页。

⑥严歌苓:《悲惨而绚烂的牺牲》,《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

⑦朱又可:《哈金:“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南京安魂曲〉的逻辑》,《南方周末》2011年11月24日。

⑧哈金、傅小平:《文学最高的成就在深入人心——关于哈金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的对谈》,《黄河文学》2012年第2期。

⑨孙小宁:《对话范稳:写抗战也在思考战后问题》,《北京晚报》2017年7月13日。

战形象的崇高性并不具备广泛的国际认同度。张新科留学德国时,就“深感西方对中国人在国际主义胸襟,人道主义情怀,对人性的悲悯关爱等诸多方面微词颇多”,认为“中国军民只是为自己而战”“不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①。所以,他“一直希望寻找一种东西方之间均能接受的‘载体’,希藉此‘载体’于无声处来呈现中华民族大爱、大仁、大义的民族本性”^②。1995年,张新科“无意间从一张德文报纸的夹缝中看到了……二战期间的中国上海收留近三万名犹太人的事实”,于是“心底激起了巨大浪花”,觉得以这种中国国际救助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可以有效地将思想意图落实到文本叙事建构的实处,“为自己的民族发声了”,进而历时18年进行《远东来信》的酝酿和创作。张新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自己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杀的时候,还在无私地庇护着大批的犹太难民”。^③中国百姓以仁爱之心舍命保护犹太战争孤儿的《远东来信》,正是这种思想意图的艺术结晶。《极地天使》《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作品,都以展现中国民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对世界各国军民的救助恩情为艺术旨归。由此可见,从最具精神沟通效应的国际互助故事出发来塑造“中国战时形象”,已经成为许多创作者呼应时代文化需求、建构中国战时形象的一种路径和手段。

二、侧重与遮蔽并存的历史认知策略

当代抗战文学是一种历史题材性质的创作,必须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但历史真实本身就存在着丰富的侧面和复杂的层次,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解读,进而形成不同的文本意义建构。中国抗战史的国际互助因素就可具体分为军事合作与民间救助两个方面。国际军事合作方面,既有苏联空军志愿兵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也有中美联合航空飞行队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还有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与英美军队复杂的联合作战。周恩来在1963年6月陪同朝鲜访华官员时甚至表示:“东北抗联实际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④国际民间救助方面,既有南京大屠杀中国际友人对中国无辜百姓的保护,也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国际共产党人的援华医疗队、美国记者白璧德等各类国际专家对中国抗日阵营的助力;既有中国民众对山东潍县侨民集中营、沈阳盟军战俘营受难者的帮助,也有根据地军民有组织的、敌占区军民自发形成的救护美国跳伞航空兵的举动;还有何凤山、钱秀玲等人对德国侵略者铁蹄下的犹太人的保护。更多的民间救助故事则散落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敌对阵营的日本和中国,在战争对垒关系之外也存在着民众相互救助、共同抵御和疗治战争创伤的历史关联,日本反战同盟的斗争生活和日本战争遗孤在中国的战后命运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这种历史事实的背景下,新世纪的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主要出现了四种类型:一是融入国际民间救助的情节线索,来表现中国的战争灾难事件。《南京安魂曲》《金陵十三钗》和《南京不哭》对南京大屠杀的书写,都存在国际友人救助中国受难百姓和见证日军屠城罪恶的线索。《重庆之眼》和《太阳底下》既体察重庆大轰炸和南京大屠杀所造成的惨重灾难与深远影响,也存在日本平民从行为和精神上帮助中国百姓的情节。《劳燕》则以中美对待中国平民战争创伤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为着眼点,展开文本意义建构。二是以美军飞行员和特种兵为中心,来展开对中美军事合作故事的挖掘。朱定的《中国伞兵突击队》描述了中国学生兵李成以译员身份加入美

①郑晋鸣、陆金玉:《一位大学校长的〈远东来信〉》,《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1日。

②高秀川:《〈远东来信〉:另一种救赎》,《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4日。

③郑晋鸣、陆金玉:《一位大学校长的〈远东来信〉》,《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1日。

④韩光:《注意研究东北抗联历史问题》,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国伞兵突击队,神出鬼没、九死一生地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的故事。《疯狂的榛子》《美国来鹰》以中国时尚姑娘与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行员惊世骇俗、热烈癫狂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来呈现中美军事合作过程中的战斗情谊与价值观传播。三是表现中国百姓舍身救助世界大战灾难中的外国难民的故事。从《远东来信》中河南百姓救护流落中国的犹太孤儿,到《极地天使》中各方民众齐心协力帮助集中营的国际难民,再到《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中远在比利时的中国女性金玲利用特殊关系救护当地民众,都表现出这一特征。四是书写日本战俘和遗孤的中国命运故事。《日本八路》《大遣返》着重描述在中国军民帮助下日军内部的分裂和反战行为;《音乐会》《乙卯年雨雪》主要揭示日军战俘在与中国人互动、互助过程中精神的矛盾与人性的蜕变。《小姨多鹤》《中国爹娘》等作品,表现了日本战争遗孤在战后融入中国家庭时的独特遭遇和身心命运。

从历史与文学对照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侧重与遮蔽。首先,创作者发掘和叙述的大多是中美之间的故事,中朝、中苏、中印、中英、中缅合作的故事相当匮乏。就笔者阅读视野所及,这类题材只有《音乐会》一部作品。其次,创作者侧重于讲述各种民间救助故事,或是从民众视角来展开军事合作叙事,对军事合作的正面表现甚为少见。从《南京安魂曲》《金陵十三钗》到《极地天使》《远东来信》,都聚焦战争事件中的普通百姓命运和国际救助故事。《疯狂的榛子》《美国来鹰》等作品反映军事合作,也以军民爱情故事为中心侧面表现,只有《中国伞兵突击队》中正面表现了军队基层的合作战斗行为。描述日本军人反战情绪的只有一部《日本八路》,而表现侵华士兵或来华百姓与中国军民在两军对垒之外交往状况的作品,则有《中国爹娘》《小姨多鹤》《太阳底下》《乙卯年雨雪》《大遣返》等多部。再次,创作者在描述国际救助故事时,往往伴随着对救助者文化观念乃至宗教背景的赞赏与推崇,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与作用却被淡化处理。在《极地天使》中,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都作为民间救助的后盾而存在;《南京安魂曲》渲染基督教精神,《远东来信》推崇和强化中国民间的仁义品格,均显出一种关注救助者民间文化基础的倾向。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赢得国际认同和跨文化接受的意义建构路径,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侧重与遮蔽并存的历史认知策略之上。

三、人道立场的战争创伤证言和人性蜕变揭露

从这种侧重与遮蔽并存的历史认知策略出发,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本意义模式。

首先,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从“人本”“贵生”的思想观念和“同情”“关怀”的行为立场出发,将战争灾难置于一种国际救助的叙事框架中来表现,在谴责战争罪恶的同时,着重彰显施救主人公的人格之美,其人道主义立场由此得以体现。

作品主人公的种种赞誉性称呼,就充分表现出这一特征。从《南京安魂曲》中的“慈悲女神”明妮,到《极地天使》中的“极地天使”苗雨欣,再到《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中的“比利时母亲”“国际英雄”金玲和《中国爹娘》《远东来信》中的“中国爹娘”,无不显示出一种将救助者人格“神性”化、完美化的倾向。创作者还着力描述了人道救助的难度,以强化救助者的人格之美。《南京安魂曲》《南京不哭》表现救助者在日寇铁蹄下的冒险,《远东来信》《中国爹娘》描述救助者在灾难与贫困中的苦难,都属于这类笔墨。《极地天使》中的苗雨欣和《中国爹娘》中的杜鹃都有被日军强奸的经历,创作者以此来增添救助者忍辱负重的精神崇高性。救助者的人格之美,也表现在对侵略者阵营“非对垒”状态的人物所秉持的人道主义态度上。《乙卯年雨雪》中的中国

乡民虽然不断有矛盾和纠结,但从战斗者祝典奕到老者左太乙,源于各种细微的认同与怜悯之心,始终未杀手无武器的日军女俘武田千鹤子,后来甚至对其进行了保护性藏匿;《极地天使》中的苗雨欣对强奸她的日本军官山本正浩恨不得千刀万剐,但是对山本正浩年幼的儿子山本太郎却表现出慈母般的爱护之心,最后当山本正浩决定父子一起自杀时,她还坚决地将山本太郎救了出来。《重庆之眼》和《太阳底下》描述日本平民决心以一己之身为本民族的侵略暴行赎罪和忏悔,更借助无力实施人道者的负疚心理,反证出人道主义价值观所获得的深广认同。

其次,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超越二元对立的战争功利思维,以人性蜕变揭示的思想眼光来探究“人”在战争困境中的特殊存在状态,表现出一种跨越民族经验的人类自我反省意识。这种文本意义建构主要存在于牵涉日军战俘的情节模式中,《音乐会》的人性异化揭示、《乙卯年雨雪》的人性复苏探究堪称典型例证。

在《音乐会》中,作者描述日军用狼狗将金英子弟弟英男活活咬死、将抗联女战士秋姑一块块撕碎,表现他们与“滔滔滚滚逆流而上的灰黄色波涛”一般的狼群整整三天的疯狂血战,充分展示了侵略者比猛兽更凶残的特征。作者也毫不避讳地表现了抗联战士因血海深仇而滋生的原始兽性。英雄汪大海目睹妻子秋姑被日军的狼狗撕碎,为发泄内心的愤怒与仇恨,竟活剥了一只“浑身上下刮风般地打着寒颤”“凄惨地号叫着”的幼狼,还想尽办法活捉了一名日军士兵,打算“用杀死幼狼的办法来杀死”他。与此同时,作品又强有力地表现了人道主义的存在和人性拯救的可能。金英子实在受不了狼谷中人杀狼、狼吃人的惨烈,在同一只公狼的血拼中救下了企图逃跑的战俘松下浩二,与松下浩二共同经历了日军的追杀和恶狼的噬咬,最终“认敌作弟”、获得了情感的融通,并与母狼“花花”结下了值得信赖的友谊,从而体现出人道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芒。对于战争环境中人性异化的无法避免和难以修复,作者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攻下狼谷的密营后,日军在火堆里烤吃了女抗联战士安福顺、卞霞和母狼“花花”一家,金英子在生下的儿子死后就疯了,“见啥吃啥”,“我不知道那些日子里我是不是也吃了他们丢在火堆里的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很可能“我吃过亲人们的肉,吃过‘花花’的肉”,她“一辈子难受的就是这个”,因为“我到底还是被他们——日本人——变成了吃人的野兽”。而且,金英子本来向往着去音乐学院学习、开一场美妙的音乐会,置身残酷的战场后,却心智扭曲,在各种战斗场景中无数次“幻听”到了音乐会;战后真正进入音乐学院时,音乐课的曲子却又总是变成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战场上的惨叫、呼喊、枪声与狼嚎。这种“幻听”的病症甚至终生都无法去除,战争创伤导致人性扭曲的印迹始终无法抹去。通过这种层次丰富的描写,创作者“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悲剧”^①的历史认知就充分表达出来。

《乙卯年雨雪》在中日长沙会战的宏大背景下,细致地描述了一对遭受蒙蔽而误解中国的日军夫妻,在战斗过程中对中国善良百姓的逐渐了解和人性的逐渐复苏,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作者探索战争人性的审美眼光。

再次,创作者还通过历史审视战后思维和情节叙述纪实倾向有机融合的方式,将人性审视和人道主义立场推进到了彻底否定战争暴力、关注战争创伤终极解决路径的层面,力图建构起一种“历史的证言”^②性质的审美品格。

以人性、人道主义眼光审视战争的最终价值指向,是人类的和平状态和人间的正常生活。国

①朱向前、徐艺嘉:《山重水复照眼明——新世纪军旅文艺一瞥》,《艺术评论》2011年第8期。

②范稳:《重庆之眼》,《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

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以此为基点,将关注视野延伸到了战争创伤的战后解决状态。从《南京安魂曲》的“尾声”交代明妮自杀结局和战犯审判结果,到《极地天使》披露“天使”苗雨欣最终远嫁英国,再到《劳燕》表现阿燕在身心创痛中重生;从《疯狂的榛子》揭示当代社会的战争文化遗患,到《小姨多鹤》体察家庭内部的中日关系磨合,再到《重庆之眼》书写重庆大轰炸的战后对日索赔,创作者从战后生活的历史空间,全面展现出战争罪恶与创伤的延伸状态和未了结局。《劳燕》推崇宗教对主人公疗治创伤、安身立命的影响,《南京安魂曲》揭示宗教面对人间罪恶的无奈;《疯狂的榛子》批判文化的痼疾,《小姨多鹤》展现生活的强大,这些都与创作者探究战争创伤的终极解决之途密不可分。《音乐会》强化“音乐会”与残酷战争之间的反差,《疯狂的榛子》渲染美国航空兵在作战中看到日本飞行员金牙与内裤的恶心感,则从“平时伦理”和“战时伦理”对比的角度表达出对战争暴力彻底否定的态度。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还以纪实性的叙事品格,有效地夯实了主体认知的历史基础。《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和《南京安魂曲》都存在人物形象及其人道义举的历史原型;《南京安魂曲》还因“主要细节基本都在历史资料中出现”^①过,而显示出一种“纪录片般的真实感”^②。《重庆之眼》将重庆抗战史上重要的大轰炸事件、文艺界的“文化抗战”景观和大轰炸受害人的对日索赔案,都融化在故事情节中严格地“实录”。《音乐会》描述战争的凶残与兽性充满传奇色彩,作者的创作灵感却来自一位抗联老战士的真实讲述,“老人用苍老的声音回忆起日本人是怎么在一次成功袭击抗联营地后将和她年龄大小相仿的一位抗联女战士的肉拿来烤着吃”^③。就这样,创作者或直接采用纪实的笔调,或即使情感激越也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为基础,一种“历史的证言”性质的、既真实可靠而又令人警醒的艺术力量油然而生。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来展开对战争创伤和战争人性的书写,形成“历史的证言”性质的审美品格,其中实际体现的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观念。所以,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试图融入世界话语体系,其实是融入西方人文话语的意义框架和价值视野,由此形成的文本意义建构,则体现了中国抗战史叙事从战争功利话语向战争人文话语的历史转型。

四、新维度建构的中国战时形象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述抗战史也就和重构中国战时形象紧密相关。历史上的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民族反侵略斗争,又是一次从不断失败和退却到苦苦相持、却算不上强有力战略反攻的全国性军事行为,还是一种在因袭沉重、积弱积贫而内部矛盾尖锐的状态中出现的中外文化碰撞,所以,这场战争所形成的中国战时形象必然既蕴涵复杂、又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以抗战史国际性因素为叙事中心的文学创作内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差异极大。抗战时期,创作者都以国际性因素叙事服务于救亡的时代总目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巴金“抗战三部曲”《火》的第一部表现中朝联合对敌,老舍的《四世同堂》关注英国传教士和日本老太太的人道态度,徐讷的《风萧萧》描述“国际上海”的交游生活和梅瀛子、海伦等美国人的形象,

①哈金、傅小平:《文学最高的成就在深入人心——关于哈金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的对谈》,《黄河文学》2012年第2期。

②余华:《我们的安魂曲》,哈金:《南京安魂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③朱秀海:《发现和创造军旅文学独特的美——我写长篇小说〈音乐会〉及其他》,《解放军报》2015年10月31日。

谢冰莹的《梅子姑娘》、雨田的《罪》、碧野的《花子的哀怨》、王火的《天下樱花一样红》和布德的《第三百零三个》《四层包围圈内的黑点》《手的故事》等一系列作品,揭示日本侵华官兵的精神之苦和正义之心、反战投诚之举,徐迟的《一塌糊涂》讲述西班牙马赛尔医生援华抗战却拖累于烦琐文件之中,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朝鲜亡国少年果里的身心创伤和刚强灵魂,都表现出这种特征。革命文化范畴的抗战史国际因素叙事,则着力讴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从周而复的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和哈华的《浅野三郎》《回到金日成伯伯那里去》,到克扬与戈基合作、在20世纪70年代改编为电影而影响广泛的《连心锁》,直到80年代初王火的《外国八路》和林滔的《哗变的“皇军”》,都属于这种思路。新时期以来的抗战史国际性因素叙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在新的格局中对史实进行创新性呈现,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黎汝清的《漠野烟尘》、罗先明的《远东战争风云》,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格局着眼来展开叙述;张廷竹的《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落日困惑》,揭示了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的悲壮历史。二是从人性的角度颠覆和解构“日本鬼子”脸谱化、模式化的传统形象。尤凤伟《生命通道》中的高田军医在参与枪杀的过程中,又对中国人实施着保护和救治的“生命通道”计划;孙少山的《要塞》中,毕业于东京土木工程学院的山田建造东亚最大的要塞并抗拒到底,竟为了实现个人“生存价值”。这种种描写,都是为了从不同角度体现日本兵心理的内在复杂性。

新世纪的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转而从人性、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出发观察和描述中国抗战史,中国战时形象也随之发生重要的改变,出现了新的意义维度。

其一,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建立在日军人道罪行和中国战争灾难的背景下,中国战争苦难的历史蕴涵得到了有力的丰富与强化。

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作品,都存在一个国际救助者、中国协助者和无辜受难者的人物关系模式。《南京安魂曲》中的美国女传教士明妮、中国助手高安玲和玉兰、本顺、大刘、美燕等受难者,《金陵十三钗》中的英格曼神父、舍己救人的玉墨等“金陵十三钗”和书娟等被救学生,《南京不哭》中的美国科学家温思策、中国科学家任克文和大屠杀受难者陈梅,均是如此。

在这三类人物中,受难者的灭顶之灾和身心痛苦毋庸赘言,其背后所体现的是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的重大国难事件。国际友人作为中国受难百姓的救助者和日军屠杀、抢劫、奸淫等暴行的见证人,同样承受着生命的威胁和精神的痛苦。《南京安魂曲》的明妮本是挽救了众多中国难民性命的救助者,自己却在战后精神崩溃,走上了自杀之路,这强烈地表现出日军野蛮大屠杀对基督教世界精神信仰的动摇。中国的救援协助者兼具人道英雄和罪恶见证者的特征,高安玲是明妮实施人道救助的得力助手,玉墨在更孱弱的女学生即将惨遭凌辱时挺身而出,她们最后又都以“证人”姿态坐在了侵略罪行审判的军事法庭上。但这样的人物同样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高安玲作为受害国的出庭证人来到日本,却无法与日本儿媳怀中的孙子正常相认;玉墨虽然有幸从侵略者手中逃脱,最后却毁容而面目全非。所以,不管是蒙难者、幸存者还是国际人道救助者,实际上都承受着侵略罪行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战争苦难的历史蕴涵之深广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其二,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描述中国百姓在战乱环境中对他国难民和日本战俘遗孤的救助,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军民无私对待战争受难者和牺牲品的仁爱精神、道义品格。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极地天使》和《远东来信》,都以中国百姓保护法西斯恐怖统治下的他国难民为题材。《远东来信》中的穷苦百姓救护流落中国的犹太孤儿,典型地体现了

中国百姓含辛茹苦而不弃仁义之心的民族品德。河南上蔡别津村的百姓对犹太孤儿雷奥处于完全陌生的状态,初见这个据说是毒太阳晒卷了头发、海风吹陷了眼球和掀翘了鼻梁、空气中的盐分腌白了脸蛋的远乡人时,乡亲们甚至惊呼为“鬼”。但他们或者基于对雷奥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友情,或者始于对亲戚的承诺,或者源于对丈夫的支持和对“可怜娃儿”的疼爱,或者是担心雷奥有闪失则这一家“绝了后”,就以血缘和乡缘为纽带,当仁不让地形成了从上海到河南的救助链条,在濒临死亡边缘的穷苦、屈辱的泪水和无名的牺牲中,一环接一环地保护和温暖着这个异国的弱者。作品以谢东泓从中国到欧洲对雷奥8封书信进行“文本分析、实地调研”的过程涵盖全篇,更从“二战”史国际关系的高度,把这孤立的民间救助故事升华到了战难环境里国际人道恩情的层面,“道义中国”的形象于是成功地建构起来。

描述日本战俘和遗孤中国命运的作品,则从另一层面表现了中国军民正义与人道兼具的人格形象。《中国爹娘》中的中国母亲杜鹃抚养日本遗孤小河清水所体现的挚爱与责任,《小姨多鹤》中的原配妻子小环对作为传宗接代“工具”的多鹤在复杂情感中的体谅与维护,都体现出中国劳动妇女粗粝中饱含宽厚与仁慈的美德。《乙卯年雨雪》中武田千鹤子态度的转变和武田修宏人性的复苏,最重要的原因都是中国百姓仁德之举和怜悯之心的人格感召。《大遣返》中,战败后的日本政府任由百万东北“开拓团”的难民自生自灭,中国军民却克服种种苦难和危险,承担起将他们遣返回国的国际人道使命。不甘心失败的日军还不断进行报复性破坏,战犯青山重夫为实施“山里的樱花”潜伏计划,甚至不惜用自己女儿的生命作为交换的筹码。两相对比,中国民族精神的道义品格更有力地突显出来。

其三,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尖锐地揭露和反思了战争历史进程中体现的社会弊端与民族文化痼疾。

《疯狂的榛子》在揭露社会文化弊端方面独具深度。作品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军衔编制”特征和效忠精神、面子文化,到战争内外无所不在的腐败和“总是将王子变成癞蛤蟆”的“中国魔法”;从飞机场“中国苦力”的卑贱、贫穷,到“范水人的‘忍’劲儿”,对种种隐藏在战争历史进程中的封建局限、专制弊端及其社会文化基础,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批判。创作者还通过描述一个从中国黑社会发财的美国老兵汤姆森的形象,更深切地体现了中国腐败文化的严重后果。《劳燕》则集中批判了存在于战乱环境中的国民性弱点。村姑阿燕惨遭日军凌辱之后,虽有未婚夫刘兆虎母亲的呵护,却也有不少的村里人指指点点,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追着她节奏分明地喊叫:“脱裤子!脱裤子!”癫痴头不仅在阿燕出门砍柴时糟蹋了她,而且堵着门骂“日本人做过的贱货,还装什么清白”,以至进一步加深了阿燕的心理创伤。曾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刘兆虎接受过先进思想观念的洗礼,也能怀抱国恨家仇勇敢地投身抗日军营,却没有勇气突破传统贞洁观念的束缚,终至背弃婚约,辜负了苦难的阿燕。凡此种种,有力地体现了传统伦理文化病态深化战争创伤的严重后果。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的这种种审美开拓,改变了中国抗战文学以战争功利追求者、复仇的强者和精神成长者为核心的“英雄中国”审美传统,呈现了众多抗战史英雄叙事所遮蔽的历史真相和文化隐秘,揭示了反侵略战争中隐含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规律和忍辱负重、厚德载物的民族文化精神,从而拓展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话语空间与意义维度,显示出重要的民族历史认知价值。

五、抗战史认知的偏失与局限

从根本性质上看,国际互助因素是一种“边缘性”的历史资源。一方面,国际互助因素虽然历史文化意味别具一格,但在中国抗战史的整体格局中并不具备完整的历史地理形态,只是些远离主流的小概率事件,时空涉及面相当开阔,在“正史”叙事中却属于几笔带过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中,尽管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但在西方的视域中,依然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片面认知,以致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全局的丰富联系未得到应有的体现。所以,国际互助因素实际上是国内、国际两类历史事件“异质共生”所形成的“边缘效应”的产物。

所谓“边缘”,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指远离中心的周边、临界地带。现代人文科学的“边缘文化”概念,一是指与“主导社会的象征、价值和信仰的中心区域”^①相对应的非主流文化;二是指不同文化交流、互动产生的“杂交文化”“共生文化”。“边缘性”资源一方面因“多样共生”“异质共存”而具有信息含量丰富、富于价值活力的优长,在不同价值体系之间也更易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又因远离“中心”和“主流”,而可能出现以边缘取代中心、以特殊性遮蔽普遍性的偏失,还有可能为追求价值活力而过度推崇异质性的意义元素。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驻足历史“边缘”,发掘宏大历史叙事的“边角余料”来作为叙事的基础与意义的资源,创作者又怀有急切赢得国际性认同的心理期待。结果,文本审美建构虽然形成了新的价值视角和历史认知框架,却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诸多价值偏失和认知局限。

首先,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普遍存在借鉴和模仿国际流行艺术作品的痕迹,历史认知原创性不够。

这种模仿和借鉴的痕迹随处可见。《极地天使》和《音乐会》以高龄女主人公历经沧桑后的“晚年回望”为重述往事的由头,《重庆之眼》以一场“旷世的爱情”为线索和中心来描述国难事件,都与曾轰动世界并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灾难题材电影《泰坦尼克号》,表现出叙事模式的明显相似性。《远东来信》《疯狂的榛子》《金陵十三钗》《太阳底下》不约而同地以作品人物解读历史当事人的战时书信、日记和其他资料为基础虚构故事情节,则与电影《拉贝日记》以主人公的战时日记为叙事基础存在审美路径的一致性。哈金是在“看张纯如的书以后知道有一批美国传教士也介入这个事情,又读了台湾人胡华玲女士写的一本魏特林传记。真正开始想小说怎么写”^②,这就是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既是哈金书写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直接动因,也是他以明妮为作品主人公的题材来源。《音乐会》被称为“中国版的《拯救大兵瑞恩》”,《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远东来信》《极地天使》被赞为“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则堪称“国际版”与“中国版”之间存在核心意义关联的有力证明。虽然启发和借鉴属于文化创造中的正常现象,从文学个案的角度看无可厚非,但某一类创作中普遍存在借鉴乃至深层次模仿的痕迹,体现的就显然是审美原创力的整体性匮乏了。

其次,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囿于国际性因素的历史视野,难以充分展开中国抗战史的主流形态与核心特征。

^①[美]爱德华·希尔斯:《中心和边缘》,转引自李欧梵:《身处中国话语的边缘:边缘文化意义的个人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②朱又可:《哈金:“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南京安魂曲〉的逻辑》,《南方周末》2011年11月24日。

以国际互助因素为中心表现南京大屠杀就存在这种局限性。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国际互助因素毕竟只是个别性的事件,也处于相当逼仄的空间,从这种限制性极大的历史观察视角出发,文本审美建构的历史蕴涵丰厚度必然大受局限。不管是《南京安魂曲》《金陵十三钗》还是《南京不死》,在展现屠杀惨状和人道光辉方面虽然真切而细致,但是,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更内在的事实、更主流的真相,从南京保卫战始于抵抗而终于被屠杀的历史演变,到国际安全区之外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无辜的平民在生死存亡之际的群体状态,再到那些并未被杀绝的幸存者在南京沦陷后的心灵感受和人格蜕变,创作者都难以多层次、多侧面地展开探究和描述。这些作品对南京大屠杀施暴者形象的刻画也相当薄弱,甚至存在日军形象“只构成一种背景”^①的缺陷,结果极大地影响了谴责的力度。

再次,某些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的文本意义建构,还表现出人性逻辑建构与历史事实基础脱节乃至背离的现象。

《乙卯年雨雪》以中日豫湘桂战役为背景,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②,其深化战争叙事的意图相当明显。但作者却采用偶然事件的叙事策略,将日军武田夫妇的命运剥离到洞庭湖区的乡野民间来展开,这就使武田夫妻的精神觉醒与整个战役的进程脱离开来。作品所揭示的也就只能是被战争裹挟而本性向善的日军底层士兵的个体心理演变,而非豫湘桂战役时期日本侵略军的人性整体格局和普遍状态。历史上的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大溃败,小说中的武田夫妇被中国百姓的善行与道义所折服,二者之间在意义指向层面显然背道而驰。实际上,战争暴力的逻辑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和个体人性的范畴,作者拘囿于此,既不可能透彻地解释一场世界大战的诸多原委与复杂性,也难以透彻地“看到战争的本质”。孤立和盲目地对施暴者进行人性化书写,还有可能导致罪恶的虚化和仇恨的转换,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方面也难以切中肯綮。作者在《后记》中叙述日军制造岳阳“营田惨案”时义愤填膺,而深入小说文本,我们却找不到可予切齿痛恨的对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对比现代著名作家田汉《战后营田凭吊》的诗句“敌暴若豺虎,血爪及牛羊。至今沙滩上,随处皆骨肠”和“切齿东洋鬼,誓与之偕亡”^③,我们对此定会形成更为鲜明的感受。所以,历史基础有欠宽广和深厚、历史认知难以融会贯通的缺陷,在《乙卯年雨雪》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国际互助题材抗战小说以书写历史证言的姿态,呈现的却是人文慨叹的意味,力图在世界性意义平台庄严地“述史”,实际形成的却是一种战争人性的“传奇”和国际互助的“佳话”,由此达成的审美效应也就只能是人文意义大于历史意义、国际传播意义大于历史认知深度了。

①贺绍俊:《〈金陵十三钗〉:血与火中的一次宗教式洗礼》,《海南日报》2011年6月13日。

②熊育群:《乙卯年雨雪·后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387页。

③田汉:《战后营田凭吊》,熊育群:《乙卯年雨雪·后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372页。

Universal Meaning Appeal of International Mutual Aid Themed Anti-Japanese Novels and Cogni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Liu Qi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mutual aid themed anti-war novels, taking the universal meaning appeal as the purport, narrate war disasters and trauma, reshape China's wartime image, and show a historical cognitive strategy with emphasis and obscurity. At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concepts, taking the virtuous act of international mutual aid as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and humanism as the value standpoint, the "historical testimony" of war crimes and grave trauma is constructed, expos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war. At the level of China's wartime image construction, it focuses on the meaning of dimensions of the sufferings in the war, eulogizes Chinese morality, and criticizes cultural sickliness. The historical "margi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mutual aid elements and the eagerness of the creators to w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lead to some aesthetic limit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mutual aid themed anti-war novels have obvious traces of drawing lessons and imitation, the historical core features are difficult to fully develo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logic is disconnected with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utual aid themed anti-war novels; the meaning appeal of the world; humanitarian standpoint; China's wartime image; the "marginal" resource

责任编辑:孙昕光

《歧路灯》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杜贵晨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李绿园既是“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的公开的反对派,也是这些经典所代表传统的暗中模仿、继承者和挑战者。他把前人小说戏曲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其实是其受困于这一传统的魔咒难以自拔而力求推陈出新的表现。因此,《歧路灯》与“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等不仅有着同为通俗文学的本质联系,而且在小说艺术的手法上也多有旧瓶新酒、依样葫芦、偷梁换柱、脱胎换骨、拆旧翻新,种种模仿与“反模仿”,如对《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刘备托孤”“赤壁大战”,对《水浒传》中何涛捉白胜、“不完句法”以及以绰号写人物等的模仿借鉴,都是明显之例。由此证明,《歧路灯》反传统而实际未脱离传统,是“四大奇书”小说艺术的继承与发扬者。

关键词: 李绿园;《歧路灯》;《三国演义》;《水浒传》

中图分类号: I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036-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4

清代文学家、长篇小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于其《〈歧路灯〉自序》中,或直言,或借友人口,揭批《三国演义》为“幼学不可阅”,“淮南盗宋江三十六人……稗说”即《水浒传》“流毒草野,酿祸国家”,《金瓶梅》是“诲淫之书”,《西游记》“惑世诬民”,把其当代和前后至今称之为“四大奇书”的四部古典小说名著,以及“唐人小说,元人院本”^①等一概骂倒,贬得一无是处;加以《歧路灯》本自为小说,却于行文中再三诋毁《西厢记》、“四大奇书”等小说戏曲经典,可说李绿园是中国古代小说家中今古罕见的一位公开高调反潮流而动的作者了。这很容易导致读者认为《歧路灯》完全拒绝和背离了从“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到“四大奇书”的文学传统,其实不然。《歧路灯》不仅与上述传统未能一刀两断,而且还证明,李绿园正是从“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到“四大奇书”文学传统的知音。他公开高调拒绝和否定他所认为这一传统某些侧面的同时,也在悄悄模仿借鉴这些作品,从而写成了这部打着反“奇书”旗号的另类“奇书”——《歧路灯》。这种吊诡的关系甚至表明,如果未有“四大奇书”等的风行天下在前,李绿园也许根本不会有兴趣写一部《歧路灯》;而如果未有“四大奇书”等创作的示范在前,他也根本写不成《歧路灯》,或者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李绿园既是“四大奇书”公开的反对者,也是“四大奇书”传统的暗中模仿者、忠实的继承者和挑战者,其念念不忘在《歧路灯》中把“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等说得一无是处,实则是受缚于这一传统的魔咒难以自拔而力求推陈出新的表现。因此,《歧路灯》与“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等不仅有着同为通俗小说的衣钵因承,而且在创作手段上更是旧瓶新酒,有

* 收稿日期:2019-05-23

作者简介:杜贵晨(1950—),男,山东宁阳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李绿园:《〈歧路灯〉自序》,栾星编著:《〈歧路灯〉研究资料》,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94页。

许多依样葫芦、偷梁换柱、脱胎换骨、拆旧翻新,种种模仿与“反模仿”^①的表现。这使得《歧路灯》在“奇书文体”^②的传统上虽曰另类,实际则是除却一颗儒学“芯”之外,整个如七宝楼台,拆碎无多“自主产权”的成分,大都属于“四大奇书”等“零件”的仿品或升级。这不仅不影响《歧路灯》成就的评价,反而因其合众长而为一绝,有了跻身“四大奇书”之列的资本。《歧路灯》这种反弹琵琶而成功的现象与经验绝无仅有,不可不予以揭蔽和探讨。因其内容较繁,一文难尽,故先就《歧路灯》所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各举三例,依次分说如下。

一、谭绍闻“结盟”与“桃园结义”

《三国演义》开篇所写同时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故事就是“桃园结义”。《歧路灯》受这一故事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不仅模仿写出了男版的“桃园结义”,还写出了女版的“桃园结义”,在古代小说中把“桃园结义”写人叙事模式模仿利用发挥到了极致。

先说男版的“桃园结义”。第十五回至第十八回写由王隆吉引起,盛希侨与王隆吉、谭绍闻拜把子做干兄弟,后至第十八回又写夏逢若“猛上厕新盟”^③,由盛希侨主张收了夏为“四弟”。这一组人物关系的设定,虽是直接套用民间“桃园三结义,后续赵子龙”的俗说,但其根本仍在《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且王隆吉虽系引发之人,但至后来夏逢若取代王隆吉,成了“三结义”中与谭、盛二人真正鼎立的一足。所以,第八十四回写“谭绍闻筹偿生息债,盛希侨威慑滚算商”送走诸商人以后:

盛希侨道:“失送。”绍闻送出大门,回到厅上。盛希侨道:“爽快!爽快!”夏鼎道:“如何?是一千八不是呢?省了二百两,我猜着不曾。”盛希侨道:“作速摆你的席来,我首座,你弟兄两个打横,也不管谁是虎,谁是狼,吃上个桃园结义。”

这里盛希侨最后的话,是接早先盛希侨自认是“虎豹”、夏鼎道“我只算一只豺,狼是谭贤弟占了。人人都说他是个憨头狼”,说的既为眼前景,也是说破盛、谭、夏三人结义的关系,乃仿“桃园结义”而来。

《三国演义》写“桃园结义”是典型的“三极建构”^④,但《三国演义》“尊刘贬曹”,“桃园结义”之“三极建构”为三者相辅相成,导致建立了蜀汉,总体取正面肯定的意义;而《歧路灯》仿“桃园结义”写盛、谭、夏三人关系,却导致谭绍闻先是“亲近”上了盛希侨这个被程嵩淑骂作“不像门第人家子弟,直是三家村暴发财主的败家子儿。下流尽致”(第二十回)的人,身陷被盛公子这把“天火”“烧个少皮没毛”的危险,同时又被夏逢若这个“兔儿丝”缠上,使他原本还算规规矩矩的人生陡然生变,一下走上了“歧路”。所以从全书的布局来看,《歧路灯》实是写在谭孝移去世,谭绍闻年幼失怙以后,不慎中了“桃园结义”的毒而至于堕落,本质上正是对《三国演义》的反对,或至少是对当时社会上效法“桃园结义”以“拜兄弟”(第十五回)、认干亲现象的否定。因为很明显,就《歧路灯》所写,如果没有盛希侨所称的这个“桃园结义”,《歧路灯》就不一定这样写而写成另外的样子了。

再说女版的“桃园结义”。第八回写道:

原来这侯先生的女人,住的与曹氏后门不远。热天一处儿说话,早与开银钱铺的储对楼新娶的老婆云氏,在本街南头地藏庵尼姑法圆香堂观音像前,三人拜成干姊妹。

①杜贵晨:《〈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反模仿”和“倒影”论》,《求是学刊》2014年第4期。

②[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③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郑州:中州书画社,1980年,以下引此书均据此本,说明或括注回次,不另出注。

④杜贵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因为这一层关系,“所以一说谭宅请侯先生,曹氏早已十二分满意。春宇那里知道,他与侯先生早已是干连襟呢”。由此可见,谭绍闻失足堕落的另一重要外因,即王氏为儿子错请了侯冠玉为师一事,也与这女版的“桃园结义”干系甚大。

总之,虽然未必完全是李绿园有心,但从客观的描写看,《歧路灯》写谭绍闻的堕落从模仿“桃园结义”始是一大结想,由此生出谭绍闻走上“歧路”的两大契机:一是侯冠玉的误人;二是由生意人家子弟王隆吉出于招揽客户以逐利引起的谭绍闻结交“匪类”之始。这两大契机关系于书中总体布局,意义非同小可。如果说前一契机出于当时教育体制的病灶,那么后一契机则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影响。二者的结合,恰是当时社会急剧衰败、旧式家庭迅速解体变质的社会原因,也是《歧路灯》写社会历史的深刻处。另外,《歧路灯》对“桃园结义”遗神取貌的模仿,本质上已是一种“反模仿”。他又写女版的“桃园结义”,则是把这一“反模仿”推到了极致,是《歧路灯》对这一手法的创新。

二、谭孝移“托孤”与刘先主“托孤”

《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写刘备伐吴兵败,退守白帝城,一病不起,临终写遗诏毕,乃托孤于诸葛亮: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唤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近前,分付曰:“尔等皆记朕言:朕亡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罢,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毕,孔明日:“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先主谓众官曰:“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负朕望。”^①

此一节文字据《三国志·先主传》“章武三年春”纪事敷衍,虽与史实相去不远,但是更加生动感人,成为历史上“托孤”叙事的经典。李绿园写谭孝移死不瞑目,固然少不了写其临终托孤;虽其情景与刘备以帝业相托相去天渊,谭孝移“托孤”不过与挚友、忠仆诀别而已,但毕竟托孤的实质是一样的。尤其是谭孝移对王中的临终嘱托,一笔两面,在安排家事的同时也通过王中这个典型“写出纯臣样子来”(第三十六回),王中就是谭孝移所遗这个家的诸葛亮。

李绿园有意把《三国演义》中写刘备“托孤”诸葛亮的经典,作为写王中事谭孝移生死如一的蓝本,还在《歧路灯》中有明确的迹象。如第二十回写未曾当面受“托孤”之任的程嵩淑,固然针对娄潜斋等有“今二公受过孝老托孤之重,何以慰此公于九泉”的话,但至第六十二回写程嵩淑对谭绍闻的岳父孔耘轩则又道:“耘老,你看象荇真有合于纯臣事君之道者。一个平常人就挑起托孤的担子,他这‘象荇’二字,送的不错罢。”由此可知,《歧路灯》写受谭孝移“托孤”虽不止一人,但是谭孝移所重和后来真正依靠得上的仅仅是“纯臣事君”的王中。程嵩淑赠王中字“荇臣”,惠养民少有的明白话也是称王中“真正是贤人而隐于下位”(第五十五回),可见口碑中也是以王中受谭孝移托孤为谭宅的诸葛亮。

当然,《歧路灯》写王中与《三国演义》写诸葛亮也有很大不同,即王中因为仆人的身份,则无论如何实心实意都不可能得到刘备对诸葛亮那种“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似的授权。但也同样为王中虑后而有所安置。谭孝移临终对王中说:“你久后不愿在宅内住时——

^①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此下引此书均据此本,仅说明或括注回次,不另出注。

端福儿,你听着:久后城南菜园地二十亩,南街鞋铺两间门面、一进院子,连那鞋铺三十两本钱,都与了王中。”(第十二回)实际也是“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预留给他一份产业自己去过日子。

三、“谭贡士筹兵”与“赤壁大战”

李绿园虽然极诋《三国演义》演史“几成儿戏场”^①,但除上述所谓“三极建构”之外,《歧路灯》对《三国演义》情节的模仿,还有更加亦步亦趋、几至于以《三国演义》的“儿戏场”为蓝本者,如第一零四回写“谭贡士筹兵烟火架,王都堂破敌普陀山”即是。

这一回书写谭绍闻巧以火箭破倭,虽然早在第八回写“端福抱了三四十根火箭”就埋下了伏笔,但至第一零四回写破倭计策的形成与实施,仍然写了并非谭绍闻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而是先有第一零二回谭绍闻与“浙闽之士”的闲中论及沿海破倭用“火攻之法”:

绍闻道:“请问吾兄,这火攻之法,毕竟该怎样的?”浙士道:“我们中国元宵烟火架,那宗火箭甚好,比之金簇箭更厉害。天下虽有万夫不当之勇,断未有见蛇而不惊,遇火而不避者。倭寇袒胸赤膊,一遇火箭即可灼其身,入舱即可烧其船,着蓬即可焚其桅。顷刻可连发数百千箭。虹霓炮可以碎其船,而不能焚其船。”谭绍闻想起元宵节在家乡铁塔寺看烟火架,那火箭到人稠处,不过一支,万人辟易;射到人衣裳上,便引烧而难灭。当日金兀术在黄天荡,用火箭射焚韩蕲王战船,因得逃遁而去,想来就是这个用法。

又有第一零四回写元宵节放烟火,谭绍闻与烟火匠人们计议和制作烟火:

将近冬月,谭绍闻吩咐,明年新正元宵节,要在定海寺门前放烟火架,请本省最好的烟火匠来问话。……谭绍闻道:“烟火有两军交战的故事没有?”匠人道:“有有有。旱地里战,有‘炮打襄阳’。”绍闻摇头道:“不要这,不要这。”匠人又道:“水上战,有‘火烧战船’。”绍闻道:“这个好!这个好!你说。”匠人道:“曹操下武昌有七十二只战船。这烟火要做诸葛亮明坛上祭风。做几只小船儿是黄盖放火。黄盖船上放了火老鸦,撒了火箭,一齐发威。这黄盖船与曹操船儿有一根绳儿,穿了一个烘药马子。马子下带一个将军,手执一把刀,烘药走到曹船,一刀把曹操头砍下。又有一个马子带一个将军,到许褚船上杀许褚,到张辽船上杀张辽。这两个将军,还用烘药马子带回来,到孔明七星坛上献功。那七盏灯是硫磺配的药,可以明多半更。那七十二只曹船,这边火箭乱射,射中曹船的消息儿,那船上俱装的是炮,一齐几万炮乱响,响的船俱粉碎,齐腾火焰,登时红灰满地。这七星坛上披发仗剑的孔明,机儿烧断,还要慢慢的退入军帐。”绍闻道:“这个好,这个好。你们开上单子来我点。这‘皇王有道’‘天下太平’‘火烧战船’是一定要的。中间大故事我再检上五六宗,那小故事,你们拣手熟的、消息活动的随意做。该多少火硝硫磺,得多少纸张,你们算明,开上单子来,好发银子。总之,多做下几十万、几百万火箭,越多越好。一个走毒子不要。”匠人道:“这先得成千斤白矾。”绍闻道:“做什么?”匠人道:“纸上加矾就不带火。”绍闻道:“一分白矾不用,正要纸上带火。”

至此,谭绍闻才“发了银两,在定海寺开了作坊,做将起来”,甚至“俞总兵闻报,发来‘小心火烛,如违重究’告条。汤镇台也发来‘火药重地,兵丁巡绰’告条。绍闻道:‘元宵烟火架,原是民间赛神小事,不必粘贴告条。’烟火匠自行制造,绍闻每日走看一回”,颇似他小时候“新正已过,……日日在门前耍核桃,放花炮,弄灯笼,晚上一定放火箭”(第八回)的劲头。

由上引火箭破倭叙事中不时提及曹操、诸葛亮、张辽、黄盖、许褚等三国人物和“赤壁大战”的

^①李绿园:《〈歧路灯〉自序》,栾星编著:《〈歧路灯〉研究资料》,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94页。

“火烧战船”,作者已明确告诉读者,此谭绍闻火箭破倭之法的灵感与方法,虽因于谭绍闻自幼与“用心读书”相悖的好玩火箭习性,但根本乃来自于《三国演义》中“火烧战船”的启发。由此可知,李绿园虽公开说《三国演义》有各种不好,甚至把“桃园结义”影响下谭绍闻的参与拜把子作为一部大书写人物堕落之由,但其内心也深知《三国演义》于国家社会人生仍有积极的价值与作用,所以不避自相矛盾地模仿并借鉴它。

此外,《歧路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疑似处还有第七十二回写“谭绍闻幸脱埋人坑”:

须臾到了河边。德喜坐下解袜渡水,早有卢重环帮贴住了。谢豹、邓林掌着马嚼环,说道:“相公下来,俺背过你去。”绍闻道:“不敢劳。”谢豹早已掐住左腿,往上一掀。只听得德喜在河边怪声喊道:“不好了!杀人哩!”绍闻慌了,把鞭子往左边一打,谢豹着痛缩手。那马急的鼻息气粗,上下踊跃。邓林早抽出刀子来,绍闻急向右边又一打,恰好打到提刀的手腕,刀子落到马蹄下。那驿路跑差的马,见鞭就要飞腾,扑的一声,直奔河中,却把邓林带了一跤。谢豹连鞋带袜,下河直赶那马,已离三丈有余。绍闻又加一鞭,水星飞溅,波浪分涌,也不知何处深浅,竟是淋漓赴岸。绍闻抱鞍飞驰,连自己性命,也并不知是存是亡,那德喜儿的死活,早忘在东洋大海之外。

以此对照《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写“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却说玄德撞出西门,行无数里,前有大溪,拦住去路,那檀溪阔数丈,水通襄江,其波甚紧。玄德到溪边,见不可渡,勒马再回,遥望城西尘头大起,追兵将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马到溪边。回头看时,追兵已近。玄德着慌,纵马下溪。行不数步,马前蹄忽陷,浸湿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卢,的卢!今日妨吾!”言毕,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玄德如从云雾中起。

可见二者虽具体情节有异,但同样紧急时刻,同样仰仗坐骑的力量得脱于危难,则写法极为相似。这就不能不使人认为此情节描写很可能是从《三国演义》写“刘皇叔跃马过檀溪”中受到的启发。

四、边公捉赌与何涛追逃

《歧路灯》第六十四回写谭绍闻“开赌场打钻获厚利”,第六十五回写祥符县令边公先已略知一二,恰好因事路过萧墙街,捉了两个赌徒,供出“谭宅”:

边公因听得谭宅二字,触着旧日的心事,扭项向北边门楼上一望,只见悬着一面“品卓行方”金字匾额,旁边款式,有谭忠弼名字。心中道:“这定是谭绍闻的宅院,正要看看此人。”等不的张二粘竿说完,便吩咐把两个酒徒锁了,押赴衙门。一面下轿,便一直进门楼去了。……进了厢房,正是那虎镇邦仰面朝天,喉如吼雷,正在南柯好处。军牢叫道:“老爷叫你哩。”……只听得厢房内咳嗽,边公道:“厢房内还有人么?”军牢又向厢房去搜。四壁无人,却见墙角一张床下,略有形影,伸手一捞,却是夏逢若与刘家小豆腐儿。

而《水浒传》第十八回写济宁州观察何涛被派侦破黄泥岗“生辰纲”大案,缉拿劫盗,正犯愁找不到线索,却从其弟弟何清在赌场上得知案中人白胜消息。何清道:

“……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带我去村里相赌。来到一处三叉路口,只见一个汉子,挑两个桶来。我不认得他。店主人自与他厮叫道:‘白大郎,哪里去?’那人应道:‘有担醋,将去村里财主家卖。’店主人和我说道:‘这人叫做白日鼠白胜。他是个赌客。’我也只安在心里。后来听得沸沸扬扬地说道:‘黄泥冈上一夥贩枣子的客人,把蒙汗药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纲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谁?如今只捕了白胜,一问便知端的。”

于是何涛带了何清等来捉白胜:

迺奔到白胜家里。却是三更时分。叫店主人赚开门来打火。只听得白胜在床上做声。问他老婆时,却说道:“害热病不曾得汗。”从床上拖将起来,见白胜面色红白。就把索子绑了,喝道:“黄泥冈上做得好事!”

以上引述边公捉赌与何涛追逃两相比较,可见二者虽有很大不同,但有几点却是一致的:一是案件都由赌博而起或被发现;二是都有关“热病”或“风寒”;三是都因被捉当事人无意中“做声”或“咳嗽”导致被办案人发现;四是被捉当事人都在床上或者床下。这四个方面的高度相似,即使不能完全坐实《歧路灯》写边公捉赌,乃从《水浒传》何涛追逃描写模仿而来,但对于非常熟悉《水浒传》的李绿园来说,读者应该想到二者有这方面的关联。

当然,《歧路灯》非止于照葫芦画瓢,而是多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所以接着写道:

原来几个赌了一夜,正要以昼作夜,只因省会之地,官府来往不绝,所以全不介意。今日忽然听见街上传呼之声,到门前住了,像是消息儿不好。猛的有人进来,那脚步儿不似寻常人。又听见说话,已知边公到厅。两个顾不的叫虎镇邦,只得一齐钻在床底。方有漏网之喜,不料小豆腐连日冒了风寒,喉中作起怪来,痒痒的不住欲咳,夏逢若只是悄声掩他的口。谁知忙中有错,自己的喉痒不曾提防,却是夏逢若一声小咳,露出马脚。被边公搜出,一齐三个都跪在厅院。

由此可见,李绿园《歧路灯》借鉴《水浒传》也能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妙。

五、对《水浒传》“不完句法”的模仿

古代小说“不完句法”出自《水浒传》,指一句话没有说完,却被他人插话截断,后又接着说,实是一句话分两次才说完的一种句式。金圣叹评点首次揭出并命名,有关段落见容与堂本《水浒传》第六回、金圣叹评本第五回《九纹龙翦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官寺》,下面仅举其一。容与堂本写道:

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

按照这个版本,所谓“不完句法”还不够明显,甚至在似有似无之间。但金圣叹评本改作:

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

金圣叹把容与堂本“听小僧说”删去“说”字,又把“那和尚道”删去,只着一“说”字,然后就此改过的对话于回前评曰:

这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从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丘小乙进去,和尚吃了一惊,急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睁着眼,在一边夹道:“你说?你说!”于是遂将“听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说”字隔在下文……只为描写智深性急,此虽史迁,未有此妙矣。^①

可见,不仅“不完句法”之说是金圣叹首创,连“不完句法”本身也有他的参与,并且是经他的点赞提倡,此种句法才为读者所注目。

《歧路灯》成书在金本《水浒传》盛行的时代,李绿园应该就是读的这种“听小僧……说”的金本《水浒传》,并在《歧路灯》中学套,也有了许多“不完句法”。如第四十七回写孔慧娘病重,

^①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王氏为之求神许愿,有滑氏作陪,路遇一孙悟空神像,“有病乱求医”:

滑氏道:“谭门王氏,因儿媳患病,来拜神药。愿大圣爷爷早发灵丹妙药打救,明日施银——”滑氏便住了口看王氏,王氏道:“十两。”滑氏接口道:“创修庙宇,请铜匠铸金箍棒。”又如第七十回《夏逢若时衰遇厉鬼,盛希侨情真感讼师》写讼师冯健:

冯健道:“盛大宅若叫——”盛希侨道:“不是我当地。我也瞒不住你,是我的老婆当的。”冯健道:“说不到那里。盛大宅若叫令弟输个下风,……”

但《歧路灯》用“不完句法”,有学套,也有变化出新,如第七十四回写:

王春宇又喜又惊道:“你(引按指谭绍闻的儿子兴官)爷爷若在时,见这个孩子,一定亲的了不成。”王氏道:“他爷爷若在,未必——”便住了口。

这种话已出口留半句的说话,就更是真正的“不完句法”了。

总之,古代小说由《水浒传》经金圣叹完成的“不完句法”是一个创造。^①这种句法把一句话从中间隔断,显出人物瞬间心情的转变,既情理备至,又笔姿腾挪。《歧路灯》将它从金本《水浒传》模拟并有所发挥创造,使《歧路灯》的语言也染上了《水浒传》的色彩。而李绿园写《歧路灯》一面传播罗贯中写《水浒传》遭“三世皆哑”(第九十回)报应的瞎话,一面模仿《水浒传》写人物用“不完句法”说话,就有悖于他作为理学家诚心正意的主张了。但是幸而如此,成书于李绿园之手的《歧路灯》才得以接续发扬“四大奇书”的传统,并奠定了自己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六、以绰号写人及其他

《歧路灯》写人物符号化的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绰号。这一特点来源于古代民间或江湖的生活,及至水浒故事和《水浒传》才第一次有了大量集中的表现。但在早期水浒故事和《水浒传》中,绰号主要用于“梁山泊好汉”,其他虽然有“蒋门神”“飞天夜叉”“飞天蜈蚣”等,也主要是江湖中人,官员与普通平民人物中鲜见。

因此,《歧路灯》大量运用绰号写人,继承的主要是《水浒传》传统。然而相比之下,《歧路灯》中有绰号的人物远不如《水浒传》中为多,并且集中于“匪类”。不是“匪类”也说不上“比匪”的,只有一位惠养民人称“惠圣人”,可以算作有绰号。由此表明,《歧路灯》中人物有绰号本身就是一个贬低,绰号是《歧路灯》贬斥人物的一种“春秋笔法”。

这种笔法的延伸,就是其写失足但可以挽救者也有形似之笔,如盛希侨在胡作非为期间被称为“傻公子”(第三十七回),谭绍闻堕落以后“人人都说他是个憨头狼”(第八十四回)。《歧路灯》中“傻公子”与“憨头狼”,尤其是后者,虽然有时用为“门户型弟”的泛称,但是说到一个人的时候,就分别只是盛希侨、谭绍闻两个了。则知其虽含贬意,但是非真正的憎恶,而大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爱惜,与《水浒传》写阎婆惜称宋江为“黑三”(第二十一回)相类似。

《歧路灯》对《水浒传》以绰号写人手法的模仿与借鉴,还有个别表现为直接移用《水浒传》中的人物名号或绰号,如为没星秤张绳祖讨赌债的贾李魁,他的绰号就是“假李逵”(第四十三、四十四回);王春宇看那稳婆,笑道:“这不是一丈青么?”(第二十七回)

除上述之外,《歧路灯》其他有涉《水浒传》的,还有第七十二回写到小幕友们谈论说“《水浒传》李逵、武松厮打的厉害”;第七十三回写巫翠姐听说谭绍闻路遭劫盗险些送命,便接着婆婆王

^①按此“不完句法”也许还可以追溯至《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杨伯峻注:‘读盟辞未毕,晏婴插言改之。’)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99页。

氏的话说:“娘怕他断不了种儿么?这都是些没下场的强贼。像那瓦岗寨、梁山泊,才是正经贼哩。这些贼将来都是要发配哩。”这话虽然出自作者以为“好一张油嘴,通成了戏上捣杂”的一位女性形象之口,但至少说明作者也认为“瓦岗寨、梁山泊”有反抗暴政的一面,与普通“贼”不同,是“正经贼”。与第九十一回“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以及书中诸多“爱民”倾向的描写相参照,可知李绿园深知《水浒传》受民众喜欢,他自己也对包括“梁山泊”在内的反抗暴政的行为持有一定同情和理解,或至少看到和容忍了民间对“瓦岗寨、梁山泊”有与正统士人不同的评价,这是一直生活在皇权专制下的读书人所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李绿园既是“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的公开的反对派,也是这些经典所代表传统的暗中模仿者、继承者和挑战者。他把世代最大多数读者钟爱的小说戏曲经典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其实是受困于这一传统的魔咒难以自拔而力求推陈出新的表现。因此,《歧路灯》与“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等不仅有着同为通俗文学的本质联系,而且在小说艺术的手法上也多有旧瓶新酒,依样葫芦、偷梁换柱、脱胎换骨、拆旧翻新,种种模仿与“反模仿”,如上述六事都是明显之例。由此证明,《歧路灯》反传统而实际未脱离传统,是“四大奇书”小说艺术的继承与发扬者。

Qiludeng Compared with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Water Margin

Du Guichen

(School of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Li Luyan is not only an overt opponent to “Tang novels and Yuan dramatic scripts” and the “four marvelous masterpieces”, but also a covert imitator, successor and challenger of the traditions represented by these classics. To him, the predecessors’ novels and operas were almost good for nothing. In fact, he was trapped in the traditional magic spell, but he still attempted to bring forth new things.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Tang novels and Yuan dramatic scripts” and the “four marvelous masterpieces” and other works, *Qiludeng* (*The Misleading Road Lamp*) is not only related to mass literature in essence, but also to the techniques of the art of fiction, such as putting new content in the old form, making monkey-like imitations, making substitutions, making thorough changes, breaking up the old and renovating the old, and various ways of “stealing” and “modeling”, imitating and anti-imitating. “The Oath in the Peach Garden”, “Liu Bei Entrusting His Young Son to His Ministers” and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e Tao catching Bai Sheng in *The Water Margin*, “incomplete syntax” and the writing of characters by nicknames are obvious examples of his imitation and borrowing. Therefore, it is proved that *Qiludeng* is anti-traditional but not really divorced from the tradition, and it is the inheritor and promoter of the art of fiction of the “four marvelous masterpieces”.

Key words: Li Luyuan; *Qiludeng*;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Water Margin*

责任编辑:孙昕光

时尚修辞的自由

——修辞学视域中罗兰·巴特大众文化新论^{*①}

张爱红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济南, 250100)

摘要: 在罗兰·巴特后期的修辞学转向中,巴特以时尚修辞告别了自索绪尔以来语言结构的暴力,立足大众文化剖析,以文化修辞学破解符号学,以此来强调符号背后的意义。时尚修辞是巴特神话修辞和图像修辞的全面升华,在诸种修辞方式建构的时尚体系中,服饰符码在二元对立形成的矛盾空间中穿行,意指系统得以活跃,大众文化修辞的意义得以彰显。在时尚修辞形成的流动机制中,语言的张力成就了言语的自由,于修辞学的视域中,当代文化的赫拉克利特本质已昭然若揭。

关键词: 罗兰·巴特;时尚修辞;体系;大众文化;自由

中图分类号: J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1-0044-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5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有着极为复杂的思想背景,其间贯穿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等诸多哲思的交织。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运动的先驱及其在符号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学界对巴特的认定基本停留在符号学领域,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包括其少量的修辞学思想)也习惯从符号学视角来阐释、评析。然而,细细梳理巴特的学术思想史发现,语言学尤其是修辞学的思想在他的多部论著中都有体现,尤其在其后期的思想转向中,语言学思想实际已突破了符号学的界限,在结构主义的分崩离析中迸发出自由思想的激流。这在标志其思想转捩的著作《流行体系》^②(1967)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巴特在《流行体系》的序言中反思:“我们也许应该逆转索绪尔的说法,主张符号学只是语言学的一部分。”^③巴特也因此将《流行体系》视为自己向符号学的告别之作,并在1967年3月接受《法兰西文学》记者的采访时声明,《流行体系》“已经属于符号学的某种历史”。这标志着巴特由符号学向修辞学的重要学术转向。

从巴特思想的这一修辞学转向上来说,目前学界单从符号学视角来研究其学术思想便有失偏颇,其结果必会导致对其学术思想理解的片面化。基于此,本文拟从修辞学视角,以《流行体系》的文本分析为主,同时结合巴特的其他论著^④,来重新审视巴特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即以修辞

* 收稿日期:2019-06-05

作者简介:张爱红(1982—),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衍生品的时尚化开发”(2016CH00827)的阶段性成果。

②另有版本译为《时尚的系统》(The Fashion System),参见周进:《罗兰·巴特的时尚思想》,《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本文中的引文采用[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③[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序言》,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④除了《流行体系》之外,本文参阅的巴特的其他论文和著作有:《今日神话》(1957),《神话修辞术》(1957),《时尚的历史与社会学》(1957),《语言与服装》(1959),《照片的信息》(1961),《纨绔之风与时尚》(1962),《文学和意指作用》(1963),《广告的信息》(1963),《形象的修辞》(1964),《符号学原理》(1964),《古代修辞学》(1965),《物体的语义学》(1966),《时装与人文科学》(1966),《符号帝国》(1970),《文本之悦》(1973),《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1975),《从作品到文本》(1979)等。

学的目光凝视巴特的符号学和语言学思想,以时尚文化为窗口窥探巴特的时尚修辞与神话修辞、图像修辞在大众文化场域中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时尚修辞背后的意义。时尚修辞蕴含的自由思想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本质,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一、转形的束缚与言语的自由——从图像修辞到时尚修辞

在《流行体系》中,巴特以服装为载体阐述了时尚的三副面孔:意象服装、书写服装和真实服装。意象服装是以摄影或绘图的形式呈现的图像化服装;书写服装是文字描绘的语言化的服装;真实服装是现实中的实体化服装。若要探讨时尚的修辞,巴特认为,选取书写服装要比真实服装和意象服装更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势,因为“只有书写服装没有实际的或审美的功能,它完全是针对一种意指作用而构建起来的:杂志用文字来描述某件衣服,不过是在传递一种信息,其内容就是:流行(La Made)”^①。因此,需要明确的是,巴特在《流行体系》中关注的对象是杂志上的服装,而非实体化的服装和图像化的服装,确切地说,是杂志上文字描写的服装。因为在巴特看来,书写服装通过文字抛却了真实服装(实体化的服装)的实际功能和意向服装(图像化的服装)的审美复杂性,由审美滑向认知,从而直指服装结构背后的意义(Sens)。可以看出,在图像化的服装和书写服装之间,巴特明显偏向后者。这鲜明地体现出巴特对图像修辞的漠视,正如他在谈论绘画时的态度,认为“绘画仍然是文字和语言的延伸,绘画创作生产的主要是修辞格,而不是绘画作品”^②。这对于书写服装来说,由文字描述代表的时尚修辞就已经是一种修辞格,从而直达服饰符码背后的意义。可见,在巴特看来,符号的意义必须由语言的修辞来决定,意义产生于修辞,而不是符号本身。

巴特所说的书写服装并不是孤立、单个的符号,而是由3个系统组成:仿真系统、术语系统和修辞系统。巴特强调,对任何一种系统进行文字表述,都离不开转形和分形这两种操作手段。其中转形(Transformation)是在流行系统内部进行的自身简化,包括两种转形方式:1.从修辞系统到书写服饰符码(术语系统);2.从书写服饰符码(术语系统)到真实服饰符码(仿真系统)。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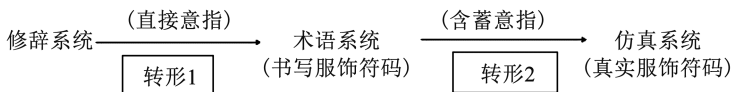


图1 书写服装的转形

转形1是把句子的修辞成分剥去,将其精简成服饰意指作用的一个简单的文字表述(即直接意指),从而使表达的信息简明化。在转形2中,服装的意义直接取决于书面文字的释义,从而形成一种模糊的含蓄意指关系。在转形2中,书写服饰符码并不能完全转变为真实服饰符码,转化后的语汇片段更无法呈现真实服装的具体状态,因此巴特将此视为一种伪真的符码,并认为:“转形2的这种不彻底性,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限制。通常的限制在于术语规则,因为它规定:不得违反所分析服装命名的本质,即,不得从词语转向意象或技术。”^③而转形2恰恰

①[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②[法]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③[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是把词语转向了意象——一种不确定的关系,这在术语规则的禁忌中,成为转形的最大束缚。

相对于语义的丰富性而言,这种束缚又不是绝对的。既然流行系统内部可进行转形,那就意味着语言可以超越一定的句法联系,文字也可在术语单元的层面上得以僭越。巴特认为,在一定的术语规则之内,“如果两个术语指的是同一个所指,他们的变化又是非意指性的,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取代另一个,而不会引起书写服装结构的嬗变”。也就是说,书写服饰符码并不一定要与真实服饰符码保持词语上的一致,关键在于语义的一致以及语言学价值观的统一。显然,书写服装中的同义词为转形2提供了一种术语系统之内的自由。巴特不无乐观地分析道:“我们被语言扼住了喉咙,以至于服装的涵义只能由概念来独立支撑。这种概念又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语言本身的认可。但我们从语言中获得的自由在于,这一概念的语言学价值观对服饰符码没有丝毫的影响。”^①换句话说,巴特衡量服饰语言能否获得自由的标准之一在于,书写服饰符码是否改写了真实服饰符码的所指。如若没有对真实服饰符码的所指进行改写,那么书写服饰符码在句法以及术语单元中均可以任意变化。

更确切地说,巴特所称的“语言的自由”实际指向“言语的自由”。在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上,巴特依然沿用了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的经典二分法,但与索绪尔偏重二者的内在统一性不同,巴特加入了辩证法,强调语言和言语在系统中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指出“语言是一种制度,是一个有所限制的抽象体。言语是这种制度的短暂的片刻,是个人为了沟通的目的而抽取出来并加以实体化的那一部分。语言来源于言语用词,而所有的言语本身又是从语言中形成的。”^②就语言的制度性而言,书写服饰符码的规则不可打破,然而通过言语的同义替换则可到达真实服饰符码。在此,言语同义词的介入,使书写服饰符码完成了向真实服饰符码的过渡。正如服装杂志上的文字得以诠释真实服装的文化特性,语言在言语中得以自由。巴特将语言与言语的这种关系比拟为“语言关系的幻景”,并对文本性的语言青睐有加,将其形容为:“它是这样一种空地,在其中没有一种语言会驱逐另一种语言,任何语言都自由地周游。”^③文本语言的这种优越性并不在于它突破了术语规则的束缚,而在于它找到了与其他语言方式的相处之道,从而使言语得以在语言的丛林中自由穿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巴特一再强调书写服装比意象服装和真实服装更易传达时尚本义的关键之所在。

循着巴特的这一思路带来的思索是:文本语言与其他语言如何关联才可实现修辞的自由?换言之,文本语言获得自由的条件是什么?尼采强调作为群体的修辞大众对语言本质的重要影响,认为“语言由个别言语艺术家炮制出来,但由群众集体的趣味作出抉择,这一事实规定着语言”^④。尼采的这一修辞观对巴特有着深刻的影响,巴特学术生涯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尼采的悲剧修辞。1964年,巴特在《形象的修辞》一文中从图像修辞的视角探讨了大众文化的论题,以视觉化而非语言、文本的方式审视了大众文化的影像,并把广告、电影、照片等视觉形象统称为“大众形象”。^⑤但经过对广告等图像信息的层层分析之后,巴特得出结论,孤立的图像并不存在,语言必须包含意义的惊讶。在形象的总体系统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结构功能:一方面是象

①[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46页。

②[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15页。

③Roland Barthes, *From Work to Text, See Textual Strateg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80.

④[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古修辞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2页。

⑤[法]罗兰·巴尔特、让·鲍德里亚等著,吴琼、杜予编:《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征层面的含蓄意指物的聚合,另一方面是作为直接意指层的图像话语等句段的流动性、表达的丰富性。如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图像修辞中,“总体意义的世界在作为文化系统和作为自然系统的句段之间被内在地(结构地)撕裂了”^①。于是,在《流行体系》一书中,巴特直接抛却了视觉化的方式,开始转向以文字修辞系统为主的分析方式。由此,巴特对大众文化的分析转变为以服装为载体,以时尚文化为窗口来阐释整个大众文化符码的系统结构,并强调时尚修辞在试图挣脱这一系统时所体现出来的意义。

巴特对修辞领域的这一拓展,深受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斯特劳斯把食物、时装、政治等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视为语言,称其为“巨型语言”,从整个文化的宏观层面重新审视语言,且这些社会现象都以语言结构为原型。^②就时尚文化而言,不同于西美尔对时尚本质的追寻,巴特关注时尚的语言结构,即用什么样的语言或言说方式可以表达时尚。在巴特看来,时尚涉及的领域不仅仅限于服装,还有广告、电影、照片等一切大众传媒方式。时尚的表达也不仅停留在视觉化、图像化的意象表达方式,而是会从视觉化的方式转向语言表达的术语系统,进而在言语的修辞中把握真实符码的所指,在语言的动态机制中体现时尚文化的流转与变迁。

在时尚发展史中,时尚与服饰系统的紧密关联始于14世纪的欧洲宫廷,尤其是法国路易十四的皇室风尚。其后,随着欧洲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尚的载体始终与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尚一直被视为特殊的衣着系统。波尔希默斯(Porthimus)和普罗克特(Proctor)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种特殊的衣着系统即是时尚本身,并且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西方的现代性。威尔逊(Wilson)也说:“时尚是一种衣着,其关键的特征在于款式的迅速而持续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时尚就是变化。”^③因此,在传统的时尚观念中,服饰与时尚之间是异质同构的关系,服饰即时尚,时尚就是指服饰。而在巴特的时尚体系中,时尚具有更为开阔、更为广泛的意义。巴特把时尚从服装的具象领域拓展至大众文化的一切领域,以符号学理论揭示时尚独有的系统结构,并揭示时尚背后的意义。由此,时尚迈进了除服装以外更广阔的天地,以大众文化的修辞走向泛时尚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理解当代文化的入口。“巴特承认,这种变化来自德里达、克利斯蒂娃、索莱尔斯等的解构风气之先者的教益和开导。”^④正是在对语言系统结构的剖析中,巴特发现了言语与语言系统的紧密与疏离、聚合与离散,在二者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巴特从书写服装言语(个体语言)的表达中揭示了时尚文化的独立及其自由。

二、含蓄意指的理性及其诗学自由——时尚修辞与神话修辞

整体而言,巴特的修辞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而是始终与其符号学思想交织在一起。从早期的文学符号到中期的文化符号,其修辞学思想始终贯穿于符号学理论中,但对时尚修辞的研究成为推动巴特后期学术转折的关键。在修辞方法上,巴特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融合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将符号学的二级意指系统予以普遍化,在文化修辞学(而不仅仅是文学修辞)中提出了直接意指(Denotation)和含蓄意指(Connotation)。意指

①[法]罗兰·巴尔特、让·鲍德里亚等著,吴琼、杜予编:《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②[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翟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③[英]乔安妮·恩特威斯特:《时髦的身体》,郗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④姚文放:《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解构性生成与后现代转折——罗兰·巴特批评理论的一条伏脉》,《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在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中是以整体的方式研究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模式。而巴特开始从整体中寻找差异性和个体性,侧重于从分类意识的角度分析能指与所指相对独立的活动模式及其文化意义。这种探索最早见于巴特的“今日神话”(Myth Today, 1957)一文中,其后又在其论著《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 1957)^①中继续探讨。巴特所称的“神话”并不是作为名词的神话故事,而应被视为一种形容词,意为“似神话般的”,具体是指一种言说方式。在巴特的神话修辞中,能指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子,能指对所指的不断追寻成为神话意指系统源源不竭的动力。当能指在第一级意指系统中找到了所指并形成一种符号后,这种符号随即又会转为下一级意指系统的能指,并与新的所指生成一个新的符号。因此,神话是一个二级意指系统。

在《神话修辞术》中,巴特在第一部分以41篇短文涉及了自由式摔跤、作家度假、王族的航游、玩具、嘉宝的脸、脱衣舞、占星术等大众文化现象;第二部分以“今日之神话”为题对神话作了读解和破译,把神话视为一种劫掠的语言,是一种“伪自然”的文化修辞。在巴特看来,神话修辞掏空了历史的形式但又重新填充进去自然的事物并赋予其意义,从而使其看起来自然并合乎情理。巴特指出,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对作为中间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进行文化渗透而体现出来的伪善和利诱。巴特认为,“小资产阶级规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残留,是降了级的、耗竭了的、商品化了的、略微有点仿古的、或者可以说是过时了的资产阶级真理”^②。可见,巴特的神话修辞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直接针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而似乎把矛头指向了一个社会阶层——资产阶级。然而巴特强调,神话修辞的这种转向并不带有政治色彩,而只是借用了一个阶层来解释符号对大众文化的这种看似自然的伪装。换句话说,神话修辞反映的是主流社会的愿望和集体性的惯性认知,是一种伦理选择和道德判断,而无关政治意图和权力话语。因此,这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神话修辞,实际上是对大众文化进行重新编码的理性行为,必须要遵循符号学的程式、规则和禁忌。

在《符号学原理》(1964)^③中,巴特把神话意指系统的这种特性转化为一般语符学的共性,把一级意指系统中从能指到所指的过程称为直接意指,二级意指系统中从第一符号(第一次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物)到第二所指的过程称为含蓄意指。直接意指直显语言的真实,具备话语的陈述性,往往客观描述某一事物的基本特征;含蓄意指具有符号的隐喻性,侧重语义学的阐释,往往指向符号背后的意义。在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中,巴特显然偏向后者,认为只有语符之外的意义才有可能通向语言的真正自由。可以看出,从图像修辞到神话修辞,巴特对含蓄意指的意义分析已内在折射出一条大众文化演进的轨迹。这种轨迹体现的不是含蓄意指的任性,而是一种理性,一种有关大众社会的理性。巴特直言:“我们社会的特定特征——尤其是我们大众社会的特征——似乎是在经由我们在这里用含蓄意指的名称来加以描述的原始过程,把符号自然化或理性化。”^④

符号的理性化是17世纪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在修辞学领域的体现。从培根的科学理性到笛卡尔的主体理性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现代修辞学中的理性精神早已冲垮了西塞罗主义

①注:巴特的著作 *Mythologies* 在中国目前有两个版本,其一翻译为《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蕾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其二翻译为《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③[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④[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2页。

中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基此, 帕特认为, 以服装为载体的时尚修辞更需以理性来构建含蓄意指的意义。这种建构需遵循两个理性原则: 功能原则和流行法则。在功能原则中, 修辞对象的实用功能是社会规范的基础, 也是直接意指在世事中确立的前提。帕特声明, “尽管流行被人们推崇备至, 但总有一种无用的负罪感……功能, 从修辞的层面上讲, 是世事在重新获取流行政程中的权力”, 它会给予时尚符号以现实的保障, 从而获得认可。功能在真实服饰符码中会以直接而鲜明的方式呈现, 而在意象服饰符码中则需借助文字语言来转达。在书写服饰符码中, 帕特强调, “符号的更改从来都不会体现为公开的规范性, 而只是功能性的”^①。可见, 即使以象征意义著称的书写服饰符码, 其含蓄意指的变迁也会以功能变迁为依据, 以看似理性的外观掩饰符号的内在意义。

理性对时尚符码的伪装也同样体现在意义建构的第二个理性原则——流行法则中。对服装来说, 流行是对服饰特征(能指)的一项特殊标记(所指), 如“今年裙子短穿”意味着短裙是今年的流行。在此, 流行法则需以看似自然的方式进行伪装, 从而证明修辞信条的合法性。通常它会以两种方式来乔装: 一是景观隐喻; 二是事实隐喻。景观隐喻会借助政治权力或宗教律令的权威建立起符合流行法则的规定, 强行赋予时尚符码的所指以严肃的文化内涵。如“穆斯林的面纱”就是借用了伊斯兰教的律令, 意味着带这种面纱既是特定地域的一种流行也是一种宗教律令。而事实隐喻则把时尚置于事物的规律之中, 不再人为地去干预——不去评论流行, 不去制造流行, 在所有省略式的修辞中只保留现象, 并任由这种现象自然发展。在此, 时尚修辞以审美现象为依托, 游向现象下面隐蔽的智性, 时尚的符码由审美滑向认知。

事实隐喻的伪装虽使含蓄意指以自然的形式凸显, 然而理性一元论带来的弊端却使含蓄意指构成了对直接意指的戕害。时尚修辞的这一症候正呼应了哈耶克的疾呼: “毋庸置疑, 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禀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 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发展的信念, 却有可能摧毁理性。”^②为消除理性修辞的这一苦痛, 帕特赋予了语言以诗学的特质。他寻求突破的方式, 不是走向理性的反面——语言的感性, 而是语言的诗性。亚里士多德把写诗视为一种更富有哲学意味的活动, 认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③, 因而诗性是包括语言在内的众多事物的本质。当代美学家王一川在构建修辞论美学时提到: “当诗学不仅关注语言, 而且进而使语言取代理性或内容成为关注的中心, 甚至成为解决诗学根本问题的理想途径时, 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独特的诗学景致就向我们展现了。”^④

诗学是修辞的一种形式。古典修辞学把修辞的诗学视为演说者的话语艺术,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 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 并把这种说服方式分为“不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和“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两种。前者主要指现成的见证、拷问、契约等, 后者是“指所有能由法则和我们的能力提供的或然式证明”^⑤。显然, 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中, 修辞的诗学被认为这是由一种属于艺术本身的说服方式, 具有论辩术的影子, 带有鲜明的技巧性和感性的意味。因而, 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诗

①[法]罗兰·帕特:《流行体系》, 敖军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245、246页。

②[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 邓正来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第80页。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 《罗念生全集》(第1卷), 罗念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45页。

④王一川:《修辞论美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7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 《罗念生全集》(第1卷), 罗念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145页。

学最终指向语言的艺术,而非话语的目的。也就是说,古典修辞学的诗学,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怎样去说。话语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成为一种艺术、一种诗学。

对于时尚修辞的诗学特质,巴特的理解更具有理性色彩。在巴特看来:“一件衣服的描述(即,服饰符码的能指)即是修辞含蓄意指之所在。这种修辞的特殊性来源于被描述物体的物质属性,也就是衣服。或许可以说,它是由物质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决定的。这种情形我们赋之以一个术语:诗学。”可见,含蓄意指诗学的关键在于时尚符码的物质属性。这再次反映了意义建构中的功能理性原则,不同的是这种物质属性仅是功能的表象,它是一种非生产型(非过渡型)的诗学——基于实际功能呈现出的语言的虚象。时装杂志构筑的这种虚象无关文学诗学的意境,而是在含蓄意指理性规则下言语对功能属性的简单告白。巴特说:“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服饰描述及其特性证明了这种‘诗学’倾向。现在,如果我们看着杂志给予衣服的表达,我们立刻会注意到,流行并不遵循着要赋予其对象以诗学的计划。它没有为实体的精神分析提供任何原始资料。这里的含蓄意指并不是指一种想象力的操练。”含蓄意指的这种修辞被巴特归结为一种平庸的修辞,一种缺乏信息度的修辞。他举例说:“暖意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含蓄意指,而流行却宁愿去模仿栗子小贩的叫卖声(时髦靴!这是最时髦的短靴!)来达到含蓄意指。”^①这种抛却文学诗学的惯常语言模式,打乱书面语言逻辑的修辞方式,也正是巴特含蓄意指诗学的独特之处。在巴特这里,古典修辞学强调的三段论结构被打散,但又试图重新组合。然而,由于时尚符码的能指与所指颠倒,含蓄意指开始反身向直接意指逆转,象征形象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书面语言的规则最终被打破。时尚修辞以一种理性诗学的自戕行为走进了大众文化,以大众最为简洁直白的日常话语,喊出了文化修辞中的自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时尚修辞虽然仍延续了神话修辞对意义的坚守,但与神话修辞对意识形态等“重大意义”的认知不同,时尚修辞更关注日常生活境域中对庸常、细小、琐碎事物的意义解读与文化关怀。可以说,时尚修辞是一种泛神话修辞。

三、修辞解码后的结构疏离——双重体系的意义及其被控制的自由

巴特时尚修辞中的言语自由并不来自语言本身,而是来自服装、世事与杂志共同构筑的流行体系。这种体系化的思想早在1962年巴特的《纨绔之风与时尚》(Dandyism and Fashion)一文中就已有体现。在该文中,巴特认为时尚是一种机制或建制,其社会学的基础和前提便是“现代民主社会”。古典修辞学把体系奉为圭臬,并十分注重它对现实的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史》中的修辞式三段论确立了修辞的逻辑体系,使“罗马修辞更注重理论的系统性,更加强调应用修辞学和理论的修辞学的分野,同时也更致力于修辞理论与修辞教育的融合”^②。现代修辞学延续了古罗马修辞的古典修辞学体系,但与古典修辞学重视体系的整体性不同,现代修辞学更加强调整理论系统内部的结构分析,在逻辑分析中标识每个语符单元在系统建构中的独特作用,从而使探索理论系统得以确立并有被阐释的可能。巴特把对时尚文化的理解置于一个由层层意指关系建构起来的流行体系中,通过不同的关联结构来分析不同的时尚符码所代表的特殊涵义。在巴特的流行体系中存在两组同义对比项:A组系统,服装=世事;B组系统,服装=流行。前者是对具有明确所指的服装世事的考察,后者是对具有隐含所指的流行理论的分析。

图2的A组系统以“世事”为修辞对象,整体由真实服饰符码、书写服饰符码、流行含蓄意指

①[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7、218、218-219页。

②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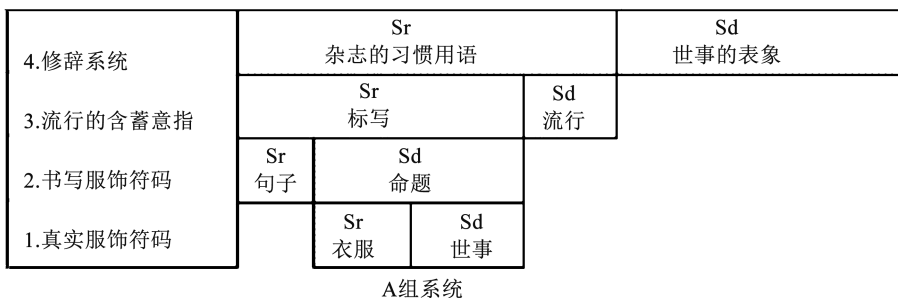


图2 巴特流行体系的A组系统

和修辞系统组成。这四种意指形式的构成方式来自叶尔姆斯列夫的ERC理论,即经由关系层R的联结,表达层E(能指)与内容层C(所指)才可组成一个系统。假如第一意指系统的表达层E与内容层C形成的符号构成了第二意指系统的内容层C(所指),就会形成直接意指,此种操作方法被称为元语言。而如果第一意指系统形成的符号构成的是第二意指系统的表达层E(能指)时,则会形成含蓄意指。以此分析,在上图中,依据叶尔姆斯列夫的ERC理论,第1项的能指“衣服”与所指“世事”形成的符号“命题”恰好充当了第2项的所指,所以前两项构成了A组的直接意指层;而第2项的能指“句子”与所指“命题”形成的符号“标写”,恰恰构成了第3项的能指,因此第3项属于含蓄意指层。同理,第4项也属于含蓄意指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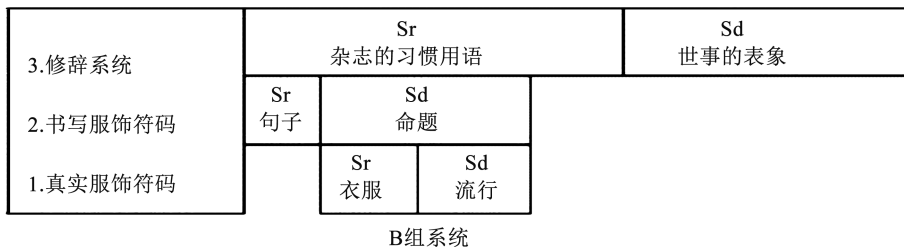


图3 巴特流行体系的B组系统

与A组不同的是,B组系统出现了两个变化见图3:1.修辞的研究对象变为“流行”。2.意指系统仅有三级构成,A组的第3项“流行的含蓄意指”消失。因为流行在B组的第1项充当了所指,这就与A组第3项的所指“流行”造成本义重复,所以在B组中就直接隐去了“流行的含蓄意指”。而在A组中,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作为真实服饰符码的“世事”,这一实体如不经过相应的中介便无法到达下一级意指系统。因此,A组的第2、3项就需分别借助“句子”和“标写”来表达。因而,“含蓄意指系统”在A组十分必要,但可在B组略去。

两组的相同之处在于,“修辞系统”均作为最高意指系统居于整个系统的顶端,这是巴特的意指系统区别于叶尔姆斯列夫二级意指系统的关键之处。巴特将这种由语言符号以外的符码构成的意指系统称为第三级最终系统,从而形成最终含蓄意指的能指。但是,巴特流行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由A、B两组共同形成了双重体系的结构。在A组中,流行是第3项的所指,处于含蓄意指层,它间接分享着一个由世事组成的开放系统,它与世事的交流是由明确世事所指的术语(“标写”)进行的,因而是一个对世事开放的系统。而在B组中,流行直接构成了第1项的所指,它与世事的沟通只能通过每一个符号代表的抽象概念(“命题”)进行,因而是一个对世事封闭的

系统。如此,流行在A组与B组中与世事不同的沟通方式确立了时尚意指系统的封闭与开合的结构。

巴特双重体系的这种特点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导致系统内部结构的复杂变化。一方面,经由能指与所指的不同组合,每个意指系统的所指也会各异。即使字面意义相同的两个所指,由于其能指的差异,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新的所指。这就造成了各个意指系统之间在功能和文化意义上的差异,从而使系统具有了游离性。这种游离性使语言结构与话语、能指与所指、语言与意义处于一种平等的组合关系中,体现出了时尚文化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基于意指活动的流动性,各个层级之间存在着互渗关系,因而系统又具有了一定的聚合性。其聚合性反映了各个意指系统之间嵌入式的依赖关系,意味着修辞对象与修辞语境的密切关联。这正如克里斯汀娃的“互文性”理论所谓:任何本文都以其他本文的存在为前提。巴特虽没有详细阐述修辞语境对修辞对象的影响,但却分析了一定的修辞对象是修辞语境之典型特质的反映。如在《形象的修辞》(1964)一文中,巴特提到的Panzani意大利面广告就形象地体现了意大利语的典型文化特质。也正如R·威廉斯所说,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修辞,虽然它具有相当特殊的特征,但也不能将其与一般的文化过程分离开来。^①

巴特封闭与开合的双重结构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意义——被控制的自由。意义是修辞的核心哲学问题,也是修辞运作的关键。伊格尔顿强调,“意义不仅是某种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②。巴特把对意义的理解限定在“结构”的框架中,认为“意义的制造是有一定限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限度约束着意义,正好相反,它构成了意义。拥有绝对自由或者根本没有自由的地方是不会产生意义的。意义系统的自由是有控制的”^③。这种控制是一种双重的控制,其外在的控制在于,时尚以修辞的方式让流行话语成为接受者深信不疑的事实;其内在控制在于,以修辞所指联合起来形成的世事的普遍视像(如杂志)与它的读者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视界。这种封闭与开合的双重结构恰好给时尚的运动提供了一种契机。这在巴特的另一篇论文《文学和意指作用》(1963年)中被界定为“时尚在下、历史居上”的等级制,时尚的运动演变为一种没有历史维度的时钟式的运动,在有限的时空和单调的因果关系中交替运行。^④由此,在时尚修辞中,语言的文化意义在历史维度缺席的境况下转向社会意义,意义成为社会限度中的自由。

哈耶克曾把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概括为两种:一种是非系统的、经验式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另一种是唯理主义、思辨性的法国自由主义传统。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自由传统主要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为代表;法国唯理主义的自由传统主要以百科全书派学者、重农学派、卢梭以及孔多塞为代表。在唯理主义的自由传统中,卢梭把自由分为天然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前者是以个人力量为其限度,后者受社会公意所约束,但卢梭认为只有社会限度中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传统重视“秩序”的重要性,包括人为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康德认为,先验的自由和实践的自由虽摆脱了一般自然作用而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自由的实践意义却要服从理性订立的道德法则。黑格尔认为,自由并不具有永恒的本质,是在同世界历史必然性的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德国的这种自由传统与美国的保守自由

①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0, p.33.

②[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③[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1页。

④[法]菲利普·罗歇:《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8页。

主义传统以及英国 20 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如英国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界定,自由是一系列原则的体系,既有规则的导引,又有理想的向往。英国的霍布斯强调,自由来自限度,“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①。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在其《自由四论》中把自由分为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强调自由的本性和结构要受普遍规律的支配。

巴特修辞学中的自由尽管有着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印痕,都强调了自由的限度,但与上述自由主义传统不同的是,巴特所说的自由是处于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自由。这种体系在巴特中期的神话修辞学中体现为明显的古典修辞体系;在后期的时尚修辞中,体现为一种略微松散、游离但又以递进式的结构演变串联起来的语符体系。时尚修辞中,在结构的裂痕处,符码虽被缚于语言的体系中,但修辞已使文本指向了时尚文化的远方,这正体现了结构原则在当代文化中的更替。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巴特的时尚修辞已经具有了现代修辞学的特质,具有了流动性、多元化以及语义的丰富性等特征。在通往自由的途中,巴特尤其强调“对立”在时尚修辞中的作用。这种对立并非纯粹的二元对立,而是在二元对立形成的矛盾空间中穿行、生成一种语言张力。巴特追求的是一种非平衡,是试图突破索绪尔语言学中多格扎(希腊语 doxa,原意为观念、主意)的静止体系、走向文化动态的言语自由。这是一种修辞的文化表达:在大众文化中,时尚符码企图控制意义,但其变动要素已暗含结构的疏离以及解码的可能。

或许巴特早已认识到,时尚体系内部这一不可避免的缺陷——语言的囚笼导致文化符码的错位。在结构主义的缝隙中,摆脱困厄达到真正自由的唯一途径便是时尚修辞体系的解体——通过意义的失落及其异化,完成乌托邦的自由。流行系统陨灭之际,也正是时尚修辞在现实世界的确立之际。这也预示着时尚符码从建构到解构的未来趋向。德里达以解构主义的方式提出了“移心化语言”(Decentering),意在使能指挖空所指,符号颠覆意义,使语言从逻格斯中心体系中离心、消解乃至幻灭,从而在涅槃中重建新的自由。《流行体系》的著书年代(1957-1963)正是西方哲学界思想最为敏感、丰饶与活跃的年代,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以及克里斯汀娃各从不同的视角开始重新解析文化的身份及其定位。在此背景下,巴特二元矛盾得到象征性解决的唯一方式便是时尚语言的解析、分离直至漂流——伴随着符号意义的瓦解以及语言大厦的轰然倒塌!散落的语段及其文化碎片造就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带来了时尚涵义的多变和个性化。这正印证了时尚鼻祖西美尔的论断:“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它实现后者一方面是凭借内容上非常活跃的变动——这种变动赋予今天的时尚一种区别于昨天、明天的时尚的个性化标记。”^②

结语

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人物,其著作《流行体系》被誉为“结构主义的尾巴”。巴特以时尚修辞告别了自索绪尔以来语言结构的暴力,以文化修辞学破解僵化的符号学,以此来强调言语与现实的对话。这种修辞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本质的批评与抨击,也不同于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与宽容,巴特的时尚修辞关注的是对大众文化的剖析与解读,以一种方法论面向客体而敞开,从而揭示大众文化背后意义的阴谋。巴特的时尚修辞是

①[英]霍布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页。

②[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其图像修辞和神话修辞的扬弃与升华,强调的是个体言语的自由,从而成为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亮点。巴特的自由不同于伯林、洛克、穆勒、贡斯当、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者的个体自由,也并非约翰·密尔的社会自由以及弗里德曼、博多·舍费尔所言称的经济自由,更无涉古典政治哲学家们卢梭、哈贝马斯、哈耶克所呼吁的政治自由。巴特试图以个体言语的特殊性来解放人类的语言,并把解放语言视为解构文化、实现文化自由的前提。

在通往自由的途中,巴特把修辞引向现代生活,以时尚修辞关注大众文化背后的意义。但时尚背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巴特并没有回答。也许,这种悬置的文化空白正是他的研究者们深入研究的理由。苏珊·桑塔格在《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一文中就曾提到:“巴特通过扩大意义的范围使这个概念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便达到这样一种自鸣得意的矛盾性,即空的主题反而无所不包,空的记号可赋予其一切意义。”^①巴特的时尚修辞尽管依然带有结构主义的宿命色彩,但他基于时代性而构建的修辞学流动机制,却使静止的结构主义体系在大众文化中焕发了无穷的生命力,也由此揭示出了当代文化的赫拉克利特本质。^②在时尚修辞的自由中,当代人的自由也已不远。

Freedom of Fashion Rhetoric

——A New Discussion of Roland Barthes' Mas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Zhang Aihong

(School of Ar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In his later years, Roland Barthes made a turn in rhetoric, in which, with fashion rhetoric, he bid farewell to the violence of language structure since Saussure, and based on the dissection of mass culture, he decoded semiotics with cultural rhetoric to emphasize the meaning behind the signs. Fashion rhetoric is a full sublimation of Barthes' myth rhetoric and image rhetoric. In the fashion system constructed by various rhetorical modes, dress codes pass through the contradictory space formed by binary opposition, which makes the signifier system active and the meaning of mass cultural rhetoric prominent. In the flow mechanism formed by fashion rhetoric, the tension of language brings abo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the Heraclitus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is totally obvious.

Key words: Roland Barthes; fashion rhetoric; system; mass culture; freedom

责任编辑:孙秋英

^①Susan Sontag, ed., *Selected Essays in Bar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Publishing, 1983, p.34.

^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该观点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本原以及物质的运动性、运动的规律性的哲学原理。罗兰·巴特时尚修辞的流动机制与该论点在本质上具有相通之处。

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的基本要求^{*①}

王增福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摘要: 现代化道路的独立选择与持续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需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来支撑。这不仅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基本经验,也是蕴含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从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是确保现代化成功转型并保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前提。从当代中国语境来说,坚持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和平发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充分表达。

关键词: 道路独立;文化自主;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055-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6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深厚丰富。当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双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只有在现代化进程中才能延展生命力和影响力,从历史深处走入现代社会,充分发挥当代价值和现实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只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获得充沛的文化滋养和思想动能,沿着民族与世界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方向发展。为此,理清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联系,把握二者既互为助力又间有阻滞、既协调促进又存在一定矛盾的客观情势,是我们深入开展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研究的必要与必须。在处理两者协力共进的过程中,需坚持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的基本前提,遵循正向支撑与良性互动的本质要求,落实自我扬弃与渗透融合的路径选择,实现文化创新与制度生成的目标追求。这些要素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的规律的基本内容。其中,确保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独立性和传统文化基因的自主性,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良性互动、协力共进的前提和基础。

一、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现代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同时也是现代化的文化反思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化过程。要顺利完成这些历史性转换,必须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独立道路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

* 收稿日期:2019-11-12

作者简介:王增福(1982—),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和山东省委党校创新工程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质研究”(2018BDCJ03)和作者参与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16ALJJ05)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山东省高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团队”建设经费资助。

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①。从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中国现代化的经历来看,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是保证现代化成功转型并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基本经验。

19世纪的西方现代化是中世纪之后在多个领域、多元层面发生显著变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工业化与市场化、政治的法治化与民主化、社会的契约化与城市化、精神文化的世俗化与理性化。尽管西方现代化的转型具有某些共性要素,但主要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却无一例外都是独立建构的。在文化形态上,纵然它们也曾普遍遭受同现代化伴生的“重估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的磨难和剧痛,但它们从价值废墟中拯救传统并创造新文化的实践也都呈现出鲜明的独创性和自主性。

西方的现代化基本属于“原生型”现代化,其主要代表是英国、法国和德国。英国的现代化是以经济现代化为主导的模式,通过“无声”的经济力量和社会革命推动现代化转型,其主要特色在于和缓、渐进、改革、稳重和守成^②,政治上的现代化不像法国那样极端和激进。作为现代化的第一个“吃螃蟹者”,英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立性无需深言,因为它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石头过河,自己开拓现代化之路。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其发展道路也独树一帜。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形成的君主立宪民主制度是在自身国情中走出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从经济体系到以《权利法案》和判例法为代表的法律制度,从科学技术发明到现代大学教育,从工厂制度到伦敦证券交易所,等等,英国的现代化在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带给世界无数的首创。正是这种独立尝试、自主建设的现代化之路,使英国被誉为现代化的“样板”“原型”和“领跑者”。

法国的现代化主要由政治革命来驱动,是一种以政治现代化为先导、由政治现代化牵引的现代化模式。法国现代化的基本特点是,“认知现代化引发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为经济现代化扫清障碍,经济现代化带动各个领域现代化全面开展”^③。我们赞成这一判断,因为在现代化转型之前,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封建和宗教势力强大,等级制度异常森严,小农经济和家庭作坊长期存在,贵族沙龙文化和封建价值观根深蒂固。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现代化须首先从思想观念上将社会唤醒,并以激进革命扫清障碍,不断的革命又导致社会持续动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法国工业化十分缓慢。正是这个原因,其工业化常被视为一个特殊的典型。由此可见,法国自身的国情决定了其现代化不可能模仿英国,只能走适合自己实际的现代化之路。

德国在西方早期现代化的“三强”中或许是最为独特的。“不但西方世界视‘特殊道路’为德国与‘西方’的分离,包括右翼和左翼在内的德国人也认为有一种德意志通向现代的‘特殊道路’。”^④其最大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直至19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发展仍十分落后,政治上四分五裂,统一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经济上仍以农业为主;文化上尽管经过启蒙运动,在18世纪末的上层社会出现了局部繁荣,但广大的日耳曼民众只是受到基督教的教化,没有多少世俗文化的积累,诗人歌德甚至认为当时的德国人还处于野蛮阶段。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注定其现代化之路非同寻常。但德国依靠在民族统一中形成的

①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②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

③马生祥:《法国现代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④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强大中央集权,对经济现代化进行纵深干预和规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各阶段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提升整个民族的生产技能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最终不仅在19世纪末完成了现代化,还一度超过英法两国成为当时的现代化强国。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类型,西方传统文化也惟有接受现代化的洗礼才能获得新生。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根基,所以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源于基督教的革命,起初是15—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随后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形成的现代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以浮士德精神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文化。“理性精神……为现代化观念本身的确立提供了一种文化承诺……西方文化在总体上是以理性方式来实现其真、善、美追求的。”^①但不同国家向理性文化的转化途径、对待自身传统文化的方式以及形成的理性文化形态各有千秋,这种差异性同时反映出其文化发展的自主性。

英国之所以能最早进行现代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地发生了文化变革和科学革命。文化变革主要通过“清教运动”这一宗教改革实现,结果是确立了以经验理性为内核的英式新教文化(自由、进取、宽容等)。在这种新文化形态中,传统文化(贵族精神、社会责任感、崇尚传统、保守等)被重构并融入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中,塑造出新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和企业文化,构成英国文化的新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启蒙运动事实上是从英国萌芽的,硕果却结在了法国。启蒙思想在欧洲大陆高歌猛进、轰轰烈烈,在英国却步履蹒跚、冷冷清清。这看似矛盾,但恰恰是英国文化发展自主性的反映,因为文化的相对保守使英国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免受激进文化运动的冲击,反过来,英国现代化的温和模式及成就也得益于这种文化演进模式的保护。

法国文化变革的两大途径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它们都得到了世俗国家权力的支持、拥护与推动。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在13世纪就已开始世俗的民族国家进程,世俗权力在同教会权力的斗争中逐渐占得上风,代表现代化一方的世俗社会需要新的宗教文化或宗教以外的新文化(如人文主义)为其提供合法性。早期对法国文化现代化影响最大的是加尔文宗教改革,它倡导信徒通过创造世间繁荣来实现对上帝的信仰,其实质是以宗教形式鼓励人们在勤俭的世俗生活中得救。换言之,使资本主义创造财富、追逐利润的世俗活动得到上帝的首肯、宗教的确认和神圣的意义,从而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加尔文宗教改革确立的新宗教文化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奠基了法国现代文化的基础,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双重洗礼,最终形成了以先验理性为骨架的现代理性文化。

对德国的文化现代转型影响较大的是路德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狂飙运动。其中,路德宗教改革是根本性的,它重新确立了信仰的权威,凝聚了当时尚处于分裂的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满足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但同时,“因信称义、不求事功”的信仰方式又助长了德国的精神自由主义或唯心主义自由文化,使得近代以来德国人更加看重内在的精神自由。因为它不像加尔文教那样强调通过创造富庶的尘世生活达到对上帝的信仰,这同德国启蒙运动中注重对自身的反思、强调个人的自我完善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重构模式“忽略了外在的实践自由,这是造成近代德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②。但反过来,这种现象又进一步表明,在当时社会历

①何中华:《“现代化”观念与西方文化传统》,《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

②赵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史条件下,德国的文化只能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发展,亦彰显其文化形态的独立性和文化发展的自主性。

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与现代化同体相连的资本主义,也并非仅在欧洲萌芽,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也曾出现,如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但只有北欧、中欧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它们物质现代化的转型中独立而又及时地进行了文化上的继承与创新。这再次说明,现代化如果没有文化上的长期支撑将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讲,地处北欧和中欧的这三个主要国家,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起来并走向现代化,其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在适时的宗教改革中得到了自主性改造,从而能够焕发生机。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地处南欧的多数国家现代化推进迟缓,这与它们在经济上的落伍、宗教上因循守旧从而在文化上缺乏自主创新有着莫大关联。

二、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探索的经验总结

现代化道路的独立选择与持续发展,以及现代化要取得成功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需要民族文化的自主与自强来支撑,这不仅那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基本经验,也是蕴含在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探索中的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

中国的现代化从时间序列上看是后发现代化,从发生学角度看是被西方列强倒逼出来的,即我们常说的“外源型”或“应激型”现代化。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富民强的征程,也是一个现代化开启并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教训,其中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在现代化转型的早期、革命初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期,没有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而是陷入了“模仿的陷阱”。清朝中期以后,中国在科学技术、军事力量等方面的进展速度与西方相比开始落伍。1840年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起初洋务派力图通过实业、军事、科学技术和西式教育救国复兴,但并未根本改变西强中弱的格局,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在于器物,而是制度,但戊戌变法的夭折表明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改良是没有出路的,后来爆发的辛亥革命也最终失败。所有这些努力之所以无效,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希冀在一个已经发生巨变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重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没有摸索出真正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道路。其中最为深刻的教训是,在全盘西化的过程中不仅画虎类犬、东施效颦,而且还试图剪断自己的文化脐带,一度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主性。

在屡遭失败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由此,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第一次走出了“模仿的陷阱”。这条为现代化转型奠定民族独立之政治前提的革命之路,第一次建立在对本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分析和判断基础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真正结合起来,第一次走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战线、实施两步走战略等适合自己的路,这些经验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都得到了系统总结。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也就是说,无论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扫清障碍,还是现代化的具体建设,作为思想旗帜的马克思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主义都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自主性的马克思主义。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期,受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及主客观多重因素影响,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①,因而再次掉进“模仿的陷阱”。不可否认,在当时的环境下,学习苏联对于巩固和壮大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照搬苏联模式也导致不少问题并留下诸多隐患,尽管党的八大力图纠正,但也并未完全消除模仿的后遗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拉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郑重宣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础的,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前提的,这实际是再度强调新时期现代化的建设道路是中国式的独立自主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转型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②习近平同志也着重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③

在现代化转型中,中华传统文化也在裂变的痛苦中续写、转型和创新。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潜在结论是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僵化与保守,这显然有“文化决定论”之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与其说它体现了激进的文化拒绝姿态,毋宁说,它是中国现代化匮乏而导致的精神痛苦的一种“征候”,表征着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塑造主体性的强烈要求。即便是那些对传统文化尖锐批判的全盘西化论者,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在今天来看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对国家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就此而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迷行”。但是,对传统文化的取舍,最终将取决于这个民族在实践上改造自己的方式,斩断自己文化根脉而发展现代化的那种企图必定是徒劳的。实际上,在五四后期即便是有些过于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开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也内在包含同中国历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尽管在两者结合路径的解释上还存在多种范式的竞争,但不论是“意识形态范式”,还是“文明范式”抑或“体用范式”,都绕不开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本身,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要处理的最突出的文化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必然包含同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当然应该重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对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④。陈先达这番话虽是针对当下中国讲的,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过程亦是一语中的。

毫无疑问,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比之前任何时期都更为彻底的革命性改造。但这种改造本身是以承认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从而承认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为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④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15年7月3日。

前提的,且这种改造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一次重构;同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并获得长久的生命力,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一深厚的精神土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对传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运用、改造和创新是十分明显的,这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文献中已经表达得格外清楚,国内理论界对此也达成共识。毛泽东思想对待传统文化的核心态度之一就是坚持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后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文化上都符合这种自主性要求。综上所述,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基础上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是对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的深刻总结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实际仍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下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①。

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中国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也体现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和文明演进史之中。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的是以儒家文化为骨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类型的最大特征是超稳定性,对异质文化超强的同化、改造和吸收能力,以及顽强的吐故纳新能力。儒家文化最初只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的主体文化,但在漫长的民族摩擦、交流和融合中,它不但对中原以外其他民族文化兼容并蓄,而且对其同化和改造,从而保持了自身传统的相对稳定性。从夏商周,经秦汉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即便那些靠武力征服华夏的少数民族最终也是被华夏文化所征服。对待外来异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表现出上述特征。不论是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还是于隋唐时期渗入中国的伊斯兰教,以及自公元7世纪始并在多个时期断断续续进入中国的基督教,直至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上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事实表明,外来异域文化只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和基础,并经过其长期、曲折的同化或重构之后,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异族文化和异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交流和碰撞中自我更新,但它又长期保持着其主体文化基因的相对稳定,始终维持着文化发展的自主性。

不论是从近代以来还是从五千多年这一宏大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得到的基本启示就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既不是在封闭保守中实现的,更不是在丢掉传统、全盘接受外来文化中实现的,而是在继承传统和自主创造中实现的。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经过近代以来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悟出了一条道理,那就是未来的中国文化,其发展必须首先以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作为坚实的精神根基。”^②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的实践注脚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基本经验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启示,还只是从静态角度证明了上述事实,即现代化道路的独立选择与发展以及现代化要取得成功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需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来支撑,那么,当代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则是上述事实的“现场”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不少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部分国家也曾不同程度地陷入“模仿的陷

①马敏、张三夕主编:《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②赵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阱”。在意识形态上,它们普遍以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为代表的发展理论和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作为自己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指针,其“标准版本”就是1994年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模仿者们最初的确有所受益,但好景不长,随后便陷入了经济滞胀、债务危机、两极分化、社会撕裂、民族矛盾激化等漩涡。经历了这些曲折后,他们深刻意识到,照搬西方模式会导致严重的“水土不服”。一方面是由于在先发优势已被西方锁定的新帝国主义条件下,后发国家试图通过模仿或与西方保持一致来实现现代化的机会是渺茫的^①,更根本的则在于,它们未能切实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尽管没有出现斯宾格勒预言的那种“没落”,但也无可争辩地陷入了危机:经济发展乏力,种族和阶级矛盾激化,贫富分化严重导致社会激荡,民族主义抬头,民主式微,政局不稳,严重且似乎无解的城市病,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精神空虚、价值混乱,等等。西方国家也开始反思和批判自身的现代化模式,它们当中不仅有西方内部的反对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也不乏第三世界出身却生活在第一世界的后殖民批判者。这些反思和批判的一个共同旨趣是指认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自负”“理论自负”“制度自负”和“文化自负”。

上述批判和反思的结果之一是,“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为现代化的模式是唯一的,相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解释了为何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模式是相互区别的”^②。撇开上述反思不论,事实上,人类对于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也从来不是唯一的。特别是自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多种现代化发展模式:西方模式、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当然,对于现代化模式的分类,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论怎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坚持道路独立和文化自主的新型现代化之路,这一点正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所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仍“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③:在硬件方面,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交通运输体系,投入大量资源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20多万千米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软件方面,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运动塑造了一个不存在任何强大分利集团的扁平化社会,在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消费领域也取得巨大成就。^④这些不仅稳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更重要的是为后40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前提与物质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和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一页。我们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路线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决定,从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的高度确立了我们今后经济和物质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方向。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

①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模范者之所以在现代化之路上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美苏争霸造成的发展空隙。

②王家峰:《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一个解释框架》,《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③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④王绍光:《中国·政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6-127页。

平理论并写进党章,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理论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于毛、成于邓”,但我们还须接着说,“兴于今”。党的十五大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又逐步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奋斗目标。我们逐步转变发展观念,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发展布局逐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推进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更加奋发有为,将现代化建设布局从“四位一体”推进到“五位一体”,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新时代的号召,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新战略布局,以铁的手腕狠抓党建,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纯洁性和先进性,在新的发展基础上将“三步走”战略升级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立了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理念,实施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连串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国内国际政策组合拳,大大提升了中国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开辟了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火热实践创造了一个被人热议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但它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政治国家片面强调所谓‘社会现代化’(物质和经济生活的现代化),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坚持传统的意识形态理念,不愿意以兼容并蓄的胸襟与气度,与主流文明保持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对话张力,拒绝推进和实现‘文化的现代化’”^①,这种观点显然是用西方现代文化类型和文化发展模式的坐标系来定位中国文化的本土实践,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注脚。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主义的物质现代化同体进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现代化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叶剑英等就强调要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党的十二大将培育“四有”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二届六中全会强调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强调实行两手抓的方针,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更加全面。党的十三大提出“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克服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②的文化建设任务。十四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旨在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十七届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①袁祖社:《“文化现代性”的实践伦理与精神生活的正当性逻辑——现代个体合理的心性秩序吁求何以可能》,《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倡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部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为重要战略,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①。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以中华文化的自主发展和创新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化本身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孕育而生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在历史最深处为西方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但同时,现代化的成就反过来助长了工具理性的独大和泛滥,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个体自身的分裂和冲突。如今,西方文化在拯救现代性危机方面表现得日益捉襟见肘,而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总体性为本位的思想理念、德性高于知性以及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文化定位、天人合一与崇中尚和的人文精神等文化传统对于现代性疾患具有潜在的矫治作用。与此同时,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转换与发展必须以接受启蒙和现代化的改造为前提,主动适应并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在现代化的全方位实践中进行。这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只能在斗争同一中携手共进,而不可能在并行不悖或各行其是中独善其身。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旨归,它着眼于正向支撑,同心同德、彼此激励、相互扶持;通过建设性的相互批判、相互改造和相互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从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道路独立与文化自主是保证现代化成功转型并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基本经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既不是原来那种“一大二公”和单纯计划经济的封闭僵化而又没有前途的老路,也不像某些人误解的那样是一条新自由主义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探索出的一条新路。它的根本原则是坚守道路独立和文化自主。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证,更是中国对于走和平发展这一新型现代化道路的深层自信的充分表达。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Road Independence and Cultural Autonomy: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Wang Zengfu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Abstract: Independent choi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road, as well as the success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ts own independence need the support of the autonomy of national culture, which is not only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 have successfully realized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clear historical clue contained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From the experience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urs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road independence and cultural autonomy are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s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adhering to road independence and cultural autonomy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demand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full expression of confidence in the peaceful rise of the new modernization road.

Key words: road independence; cultural autonom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王盛辉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①}

王清涛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摘要: 辩证唯物主义开辟了全新的世界统一性原则。此前,自苏格拉底以降的古希腊至康德、黑格尔,西方哲学的世界统一性法则是主观统一性。与以往全部哲学的世界统一性法则根本不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法则是世界本身的辩证统一。在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中,世界是被纳入到人的认识、实践(否定)中的世界,世界的统一性来自于人与给定存在结成的否定之否定关系。人对给定存在的否定,构成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一个过程的世界,在时间中展开,世界的辩证存在即世界的统一性本身。

关键词: 形而上学;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1-0065-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7

世界在人的否定中被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开辟了全新的世界统一性原则。前苏格拉底的巴门尼德哲学将世界把握为“物的共同体”,世界的统一是物自身的统一,但在这种统一中,人不能在其中实现对世界的本质性把握。此后,无论苏格拉底以降的古希腊哲学还是康德、黑格尔哲学,以往哲学的世界统一性法则是主观统一性——世界统一于意识。与以往全部哲学的世界统一性法则根本不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法则是辩证法。给定存在在人的否定中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运行,或者世界的运动本身就是辩证法。世界是辩证法的物质内容,辩证法是世界的规定。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世界统一于辩证法,这种统一性真正来自于世界之内,而不依赖于世界之外的某种精神。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统一性的光照中,理性统一性的唯心主义属性昭然若揭。康德的批判哲学让理性统一性的弊端暴露无遗,他指出理性统一性的有效性仅限于主观领域,仅在此岸世界具有有效性,具有法权地位,在彼岸世界,在物自体那里还是服从于上帝。黑格尔如同梦中人的呓语一样宣告了康德的客观的主观^②即彼岸世界的法则,主观(客观)精神是绝对精神,于是,黑格尔变成了经验世界中的上帝,完成了世界统一性的论证,但这种世界统一性仍然是纯粹的精神统一性、主观统一性。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以及以往全部旧哲学的统一性法则,开辟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法则。

* 收稿日期:2019-10-21

作者简介:王清涛(1966—),男,山东诸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18VJ012)的阶段性成果;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时代转换研究”(17JHQ010)的阶段性成果。

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揭示出人的主观中的客观部分。这些主观中的客观,即康德的先验要素。康德把先天知识“理解为绝对不依赖于一切经验而发生的知识”([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这些先天知识在捕获自己的内容后,仍然是主观中的客观知识。

一、人与给定存在结成的否定(辩证)性关系

在人类的意识中,世界总有所归属:要么由上帝创造,要么从属于某种绝对的法则,总之,世界服从于某种最高的统一性。然而,世界的本然状态并非如此。它是离散的、碎片的还是统一的,本不可知。但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因为进入了人的否定性存在中,成为了人的否定性结构的一部分,即通过人的否定而与人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即世界,这个世界是人对于存在物的否定。黑格尔早就表述过思想与对象之间的否定性关系,他认为思想与人的感觉经验是完全不同的,二者是一种否定性关系。“所谓经验是指直接的意识 and 抽象推理的意识而言。所以,这种要求就成为鼓励思维进展的刺激,而思维进展的次序,总是超出那自然的、感觉的意识,超出自感觉材料而推论的意识,而提高到思维本身纯粹不杂的要素,因此首先对经验开始的状态取一种疏远的、否定的关系。”^①黑格尔在这里讨论的是经验对象——经验(包括直接的和抽象推理的意识)——思想。它已经指出了在思想与经验之间是否定性关系,而经验与对象之间同样是否定性关系,那么,思想与对象之间应该是一种彻底的否定性关系,但黑格尔却玩弄了否定之否定,二者成为一种同一性关系。

世界根源于人的否定,世界的根本结构是存在物^②—人的否定—世界,世界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而,世界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在形而上学那里,与主体相对立的对象构成知性思维的世界,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相对立,形而上学的世界被二分。与形而上学根本不同,在辩证唯物主义视野中,孤立的存在物并不构成世界,人在其存在中与给定存在结成一种否定性关系。人的基本活动是认识和实践,而无论认识还是实践都是对给定存在的否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它是人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之下改造给定存在的客观的物质性活动。通过实践活动的改造,外在的客观的存在物变成了人所需要的样子。客观的存在物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被改造了,即其本来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实践是对给定存在的否定,通过实践,人与给定存在之间结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辩证性)的关系。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说人的认识活动也是一种否定性活动,通过认识,人与存在物同样结成一种否定性(辩证性)关系呢?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认识活动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物质手段使人的认识实践成为可能,但这些认识中介同样可能改变认识对象。认识可能是人介入存在物(认识对象)的结果(月亮在人类不观察它的时候谁也无法断定其存在)。更进一步讲,这种认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认识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因而,在这类认识活动中,人与认识对象结成否定性关系。其次,在传统的认识活动(低层次的不通过认识中介与对象直接发生认识关系的活动中),人与存在物之间也是一种否定性(辩证性)的关系。^③人对世界的认识,从本质来讲是一个建构过程。古人同今人对存在物(宇宙)的认识截然不同,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①[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2页。

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之为“感性自然”,下文多以“给定存在”指代“感性自然”。“给定存在”内容较“感性自然”内容更为丰富,“感性自然”并不包括人本身,但“给定存在”概念不仅包括“感性自然”,还包括感性自然之外的人。

③古希腊哲学就致力于揭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巴门尼德讲思维=存在,古希腊智者学派的高尔吉亚则认为思维根本不同于存在,因为思维须通过语言来表述,而语言与存在物之间绝不能划等号。黑格尔则将巴门尼德与高尔吉亚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看法扬弃为思辨哲学的内在环节,认为感觉与对象之间是既肯定又否定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此,我们要凸显人与认识对象之间的非同一般关系。

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其心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是人建构的,主体是什么样子,世界就被建构成什么样子。因而,认识活动服从于认识主体的知、情、意,认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活动。退一步来讲,即使所有人心中的世界完全相同,人对世界的认识仍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活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否定性(辩证性)关系。这就是说,人的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是被人赋予了各种意见的世界,但对于存在物来讲,这些意见或许根本不存在。例如,色彩是人的眼睛对光谱的定义,只是人的一种感觉;价值、美丑、道德判断等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讲:“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①

人的认识结论可能与本然的世界毫不相干,人的认识活动是对自在存在的否定。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系统论述。他指出,人对认识对象的感觉并不完全取决于认识对象,相反是人对认识对象的占有,这种占有是按照认识主体自己的本质对认识对象的占有,人的认识结论服从于主体的需要。“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②对这样一种人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否定性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之后又有了新的把握。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③。

感觉对象之所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只是因为感觉器官拥有这样的功能(属性),因而感觉对象才是感觉器官功能的实现,“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④。不仅感觉对象是感觉器官功能的实现,就连人的感觉器官,人的认识器官也是历史的产物,“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⑤。“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①。人的感觉是服从于主体的需要,而感觉所形成的对象当然是主体选择与建构的结果,“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②,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决定了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③。

由此看来,人的认识活动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实现”过程,将世界按照自己的本质建构即自己的本质的实现和对自己本质的占有,“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④。人在认识对象中所发现的只是自身,认识主体所不能发现的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⑤。人的认识活动与世界的自在存在是一种否定性关系,正如《心经》上所讲,人借助“眼耳鼻舌身意”等感觉器官所获取的“色声香味触法”皆是幻象,人与认识对象所结成的并非是一种同一关系(形而上学的知性判断),而是否定性(辩证性)关系。

二、辩证唯物主义开启的否定之否定的世界

认识和实践是最基本的生活动。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人与给定存在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否定性关系。人在认识 and 实践中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构世界,世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马克思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⑥在对给定存在的否定中,人与给定存在结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辩证性)的关系。人与给定存在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否定性(辩证性)关系,通过否定,人与给定存在统一起来,即所谓的世界是人通过对给定存在的否定结成的,通过否定所结成的世界其根本法则是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给定存在在人的否定中与人整合为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因而,这种统一是世界的历史性(在时间中的和过程性的)统一,即给定存在是正题,人的否定性活动是反题,给定存在物在人的否定中绽出的世界是合题,这个合题又是下一个环节中的正题,世界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向前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讲的,“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发展周期中,中间环节(否定)既和第一环节(肯定)相对立,又和最后环节(否定之否定)相对立,它作为前后两个环节的共同对立面这一事实,说明始初环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191页。

节和最后环节具有某些共同性”^①。

所谓的世界只是人的世界,因为人是辩证的,因而世界必然是辩证的,即是在人与给定存在的否定性关系中才结成的世界,因而,世界本身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的内容,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的“哲学范畴”,辩证唯物主义与世界是统一的。这个世界因人的否定性活动而生成,在人之前和在之后都不存在,它只能统一于人的否定性活动中,即世界的统一是世界自身的统一,绝不是世界之外的任何精神的统一。

辩证法是存在者整体的最根本大法。所谓世界,即人与给定存在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是人对于给定存在的否定性统一,这种否定性统一的本质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世界总体的根本的宪法,其他的一切知性的逻辑都服从于辩证法这一根本法则。辩证法是决定性的法则,只有在人的否定中世界才能敞开,知性的法则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知性法则是辩证法之下的次等(二级、三级)的法则。黑格尔就曾将知性扬弃在他的辩证法中,“早期的体系被后来的体系所扬弃,并被包括在自身之内”^②，“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③。黑格尔使知性成为其辩证法中的一个环节,只是他的哲学最终仍然沦为形而上学。黑格尔哲学并没有改变思维与存在分离与对立的根本性关系,他的世界仍然是二重化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则在世界(人的世界)本身的历史性(辩证性、否定性)运动中将知性纳入到世界的辩证统一性中。在此,世界是辩证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三位一体,知性被纳入到真理性之中。知性是对真理的抽象性认识,它永远也不可能是真理本身。知性的世界统一性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抽象反思,并且是一种后反思,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敞开的世界的反思,只有世界存在,知性思维对世界的统一性认识才成为可能,因而,知性思维必然滞后于人的否定性的实践活动,永远只有解释世界的资格。马克思讲,以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黑格尔讲,“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⑤,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只要是知性思维,只要是形而上学,其命运必然是注定的。

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于历史(时间)

世界是在人的生存性活动中生成的。世界一定是历史的,是在时间中绽出的,它绝不可能出现在非时间中。在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世界的统一性始终在时间之外。本源,是哲学史上最早的世界统一性范畴之一。本源与世界之间是生与被生的关系。阿那克西曼德讲,本源是“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⑥。本源貌似与万物在时间中交换,而从根本来讲,本源在时间之外,它是永恒的,它不生不灭,因而谈不到时间问题,因为时间只存在于生灭之间,永恒之物没有时间。此后,在西方哲学史上诞生的无数哲学范畴几乎都与时间无关。从柏拉图的“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质”,直到莱布尼茨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①萧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②[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0页。

③[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页。

⑥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页。

等等无不如此,都在时间之外。

时间是康德哲学的对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时间”和“空间”作为“先验感性要素”,认为“时间不是以某种方式从经验抽象出的经验概念”^①，“时间是先天地被给予的。惟有在时间中,显象的一切现实才是可能的。这些显象全都可以去掉,但时间自身(作为显象的可能性的普遍条件)却不能被取消”^②,时间是“感性的直观形式。不同的时间只是同一时间的各个部分”^③。很明显,康德的时间是物理的时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这种“流俗领会所通达的‘时间’的种种特性之一恰恰就在于:时间被当作一种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而在这种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中,源始时间性的绽出性质被救平了”^④。康德的时间是全裸的线性的,脱离人的生存内涵的纯粹的时间,“非人的”时间,而此在的时间虽非本真的时间,但它远比线性的、物理的时间更丰富,柴米油盐充盈于日常生活,Dasein 专心应对上手事物,时间在此在操持的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开,时间是属人的,但这还不是源始的时间。海德格尔揭示出源始时间的属人性,时间是我们自己的存在作为此在与所有其他实体对我们的启示,认为“源始的时间是有终的”^⑤,存在在源始的将来封闭,因为源始的将来存在,存在才是一种“不”的状态,“源始的将来的绽出性质恰恰在于:源始的将来封闭能在,亦即它本身是封闭了的,而它作为封闭了的将来使下了决心的生存上的对不之状态的领会成为可能”^⑥，“时间源始地作为时间性的到时存在”^⑦，“时间性在本质上是绽出的”^⑧，“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⑨。与海德格尔时间的属人性逻辑相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时间具有世界性(历史性)。既然世界是人的世界,世界是生成中的世界,因人而生,因人而灭,因而世界处在生灭之间,世界是时间(历史)中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理论应当对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有所启示,海德格尔的属人的时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时间)的具象化。这里并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揭示属人的时间,而只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提出的世界的历史性所确证的正是时间的属人本质,但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时间、时间的属人性始终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学”,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始终不将此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点来对待,只是在海德格尔揭示时间的属人性之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时间性)才被重视。

与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不同,形而上学没有时间,形而上学在时间之外。如果说形而上学那里存在时间,那也只能说形而上学的世界存在于时间之中,不过这个时间是物理时间,与人的存在没有关联。如果说本源还有接近提出时间的可能,那么本源之后,本原、原子等其他从结构上来解释世界的哲学范畴以及“存在”“逻格斯”“绝对精神”甚至“上帝”等范畴已经完全脱离了时间,根本不在时间之内。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到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再到康德的先验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系,哲学(世界)已经彻底抽象化、形而上学化,因而根本拒绝了时间。

辩证唯物主义则根本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的是人的生存,或者说是因人的生存而揭开的

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②[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③[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④[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75页。

⑤[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77页。

⑥[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76页。

⑦[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77页。

⑧[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77页。

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77页。

世界。人在生存中绽出了世界,同样,人在生存中绽出了时间。应该承认,黑格尔已经对康德的物理时间有所不满,他将康德的线性的全裸的纯粹的时间顺序理解为抽象的时间,“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其实不过指抽象空间、抽象时间罢了”^①,他对此不感兴趣,“当我们谈到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时,我们最初所想到的总是那时间的无限延长,空间的无限扩展。……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无穷地向前进展的思考,但并不是因为作这种思考太崇高了,而是因为这种工作太单调无聊了”^②,这种时间概念不应当是哲学的对象,“哲学从来不与这种空洞的单纯彼岸世界的东西打交道。哲学所从事的,永远是具体的东西,并且是完全现在的东西”^③。柯耶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生存论解读,并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开出了时间,“在黑格尔谈论的时间中,运动在将来产生,并经由过去走向将来:将来→过去→现在(→将来)。这就是本义上的人的时间,即历史的时间的特殊结构”^④。时间是人的时间,“时间是没有世界的人的历史。事实上,如果没有人,就没有在世界中的时间;没有人居住的自然只不过是一个实在的空间”^⑤。黑格尔将人视为时间,“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他避免使用‘人’这个词。但是,在《耶拿讲演》中,他说精神是‘时间’。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尤其在这一段的上下文中),‘精神’的意思是:人的‘精神’或人,特殊地说,是集体的人,即民族或国家,最终说来,是在其时间—空间的存在的整体中,即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的完人或人类”^⑥。虽然柯耶夫在《黑格尔导读》中开出的未必就是黑格尔的时间,但辩证法天然具有时间性结构,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成为我们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时间概念的重要启示。

时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展开,只有人具有这种谋划过去、现在、将来的能力,其他的一切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因而在其存在中不会有时间。时间是在人的生存中绽出的,而生存的基本样式即人对存在物(包括人自身)的否定性(认识和实践)活动,在这种否定性活动中,时间绽出,时间统一于人的否定性活动中,统一于人的生存之中,即世界是历史统一性,在时间之内。当然,这个时间并不是先验的物理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不是世界统一于时间之内,而是因为人的生存而绽出了时间。也就是说,是世界绽出了时间,不是世界在时间中存在,而是因为存在物是被否定为历史性存在,因而是世界绽出了时间,世界存在于时间之中,然而时间是世界自身绽放的花朵,世界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世界因为允诺了时间而自身成为了可能,反过来讲,是时间允诺了世界。

由是观之,世界的本质是时间,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是时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揭示的时间概念应该是马克思时间概念的启示,而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柯耶夫对黑格尔哲学的存在主义阐释,是我们深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时间性的重要参考。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揭开了一个根本判断,即存在(人)即时间,时间是在人的生存中绽出的。同样,辩证唯物主义是时间,辩证唯物主义绽出了时间,辩证唯物主义=时间。讲世界的辩证统一,事实上是讲世界是历史(时间性)统一,因而世界统一于时间(人之生存性活动:认识和实践),世界的精神性统一宣告结束。一切共时性统一都是形而上学的统一,其本质是在时间之外的统一,而辩证唯物主义

①[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8页。

②[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7页。

③[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8页。

④[法]柯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36页。

⑤[法]柯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40页。

⑥[法]柯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40页。

的世界统一性本质则是时间。于是,前述的“三位一体”变成了“四位一体”,即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历史(时间)。

四、世界统一性的正题、反题与合题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本身的统一的理解,时人因为接受了太多的形而上学训练,存在一定的认识论局限,对世界的本质主义的认识惯性成为我们认识世界辩证统一的障碍。要真正理解世界自身的辩证统一性,我们必须退回到形而上学之前。海德格尔将古希腊哲学区分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后苏格拉底哲学两个时期,后苏格拉底哲学是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形而上学。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到后苏格拉底哲学(形而上学)再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对象经历了从物到对物的抽象再次回到物(人与物的辩证统一)的正反合过程。

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物的共同体理论所确立的世界统一性,有助于我们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共同体理论提供了世界统一性的另一条思路,世界的历史统一性从本质来讲也是一种物的统一性思路,不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与巴门尼德的物的共同体理论的统一性分属于共时性统一与历时性统一两种统一性、两个维度。后苏格拉底哲学归属于形而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并非形而上学。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前后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是物的自我呈现。巴门尼德的著作残篇《论自然》中所讲的存在是“存在物存在”^①，“只有存在物是存在的”，“存在物是整个联系着的”，“存在物是一个共同体”^②。因为所有的存在物相互联系,并且共处于一个同一的空间,所以全部存在物形成一个同一体,即存在物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一切存在物的统一性存在,是存在物的整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巴门尼德的统一性是物自身的统一,而绝不是思想统一性赋予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巴门尼德处在古希腊哲学的开端处,他已经开始用抽象思维来把握世界,但这种把握尚处在哲学的童年,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来讲,它是尚待扬弃为其后哲学的一个环节而已。海德格尔过度推崇前苏格拉底哲学思维对物的直接把握,并据此将真理定义为“无蔽”“揭蔽”状态。海德格尔之所以得到这种片面结论,只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

如此看来,在哲学上,对世界统一性的理解存在着三种形式,即巴门尼德的存在物共同体的理解、苏格拉底以降西方哲学的理性统一性理解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统一性理解。巴门尼德的存在物共同体的统一将人排斥在统一之外,尚未引入精神元素;而西方哲学的理性统一性则抽象掉了世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将世界统一性置换为纯粹的精神统一性。以精神代替粗鄙的物质来建构世界统一性是哲学形而上学(知性思维)的“功绩”,然而却是根本背离物本身的“功绩”,只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赋予了世界统一性以全新的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在世界中引入了人,更进一步来讲,是世界缘起于人,因人而生,因而世界是生成性存在,向未来敞开。这与形而上学视域中的世界完全不同,在形而上学那里,世界是静止的、永恒的、既成的。人是根本不同于存在物的一种存在(海德格尔将存在物称为“存在者”,而只有人才配“存在”之名),人的特殊性在于人对存在者的否定能力,因人而生的世界,使人成为了世界的主体性因素,因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并非是物的简单统一,而是人撰写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一个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是对巴门尼德的物的共同体与形而上学的精神统一的超越和扬

①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2页。

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1-52页。

弃。存在物的共同体的统一,事实上是一种机械统一,即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巴门尼德的共同体是物和物的直接统一,人被排除在统一之外,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根本不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奠定在人对给定存在的否定基础上,是人对给定存在的否定而结成了世界;巴门尼德的物的共同体构成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否定的对象,其自身不能构成世界。这一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讲得很清楚:世界的统一性内容是文化赋予的,人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①，“在实践领域,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②之中。因此,世界所谓的关联只是人赋予了其关联,这种关联从属于主观认知结构(康德)——形而上学。

与物自身的直接统一不同,苏格拉底以降的形而上学知性统一性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人与认识对象的同一,这一个环节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则是人对给定存在的否定;第二个环节则是,既然人(精神)与认识对象(存在)相同一,那么认识对象(世界)的统一即人精神自身的统一,这个环节的统一,形而上学的结论当然是绝对脱离物自身的精神统一。康德的形而上学揭开了这种统一意识本质,他认为世界的统一根源于人的先验统觉的统一,一切表象统一于源始统觉,首先他讲一切表象统一于“我”,“‘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如若不然,在我里面就会有某种根本不能被思维的东西被表象,……直观的一切杂多在这种杂多被遇到的那个主体中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个表象是自发性的一行动,也就是说,它不能被视作属于感性的”^③。一切意识统一于“我思”,全部表象都是我的表象,“在一切意识中都是一个同一的东西的‘我思’表象而不能再被别的表象伴随的自我意识”^④，“我思”的表象的杂多在“我”之中被综合,“一种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的统觉,它的这种完全的同一性包含着一种表象的综合,并且只有通过这种综合的意识才是可能的”^⑤。表象的杂多在一个意识中统一,“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在一个意识中连接起来,我才能够表象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同一性”,而将一切表象的杂多统一在一起的就是先验统觉,“统觉的综合统一就是人们必须把一切知性应用,甚至把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的点,这种能力也就是知性本身”^⑥。于是,“这些在直观中被给予的表象全都属于我”^⑦，“我在一种自我意识中把它们(一切表象——引者注)统一起来”^⑧。康德的形而上学将知性统一性的本质暴露无遗。形而上学知性统一性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则是存在物在人的否定中结成世界,是过程统一性。第一个环节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属性。苏格拉底以降的欧洲哲学是主观与客观的直接同一,这种同一是形而上学的同一。黑格尔虽然复活了辩证法,但他构筑的体系却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绝对同一性、绝对精神与世界的绝对同一。因而,黑格尔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在这一环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正相反对,形而上学是同一,而辩证唯物主义是否定。在第二个环节,辩证唯物主义也与形而上学根本不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世界是辩证的存在,

①[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②[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③[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④[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⑤[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⑦[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因否定而可能,因而世界是在辩证的否定中统一起来的,这种统一既是共时性的统一又是历时性的统一。鉴此,根据世界统一性与世界自身的关系,如果将巴门尼德的存在物共同体理解为世界统一性的正题,那么整个苏格拉底以降的西方哲学理性统一性传统则是反题,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则是合题。

结语

本文对马克思的引证和分析仅局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尚处在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手稿》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最终实现向唯物史观转变准备了条件,《手稿》成为马克思向唯物史观跃升的最后一级台阶”^①。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在人的否定性活动中开出了世界,但《提纲》之前的实践仍然是抽象的实践,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形式,世界也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形式。然而,人的本质力量本身却只是抽象的预设,在抽象的预设前提下展开的一切所谓的实践活动都只能是抽象活动,由此而来的否定也必然是抽象的否定,世界也必然是抽象的世界。因此,马克思此时虽然看到了世界辩证存在的本质,但限囿于没有完成对人的社会历史性理解,尤其是没有认识到世界否定之否定力量的历史主体,此时的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取得其具体的内容,只是提供了世界统一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方案,并不是世界统一性本身。只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才完成了“现实的人”的建构,开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的统一性之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才算真正完成。“世界历史”理论将马克思之前的辩证法的一般的否定具体化为社会历史自身的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的否定是人对给定存在的否定。而在早期马克思这里,否定是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但这种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否定仍然是一般的抽象的否定。马克思在发现世界历史理论之后,一般的抽象的否定真正捕获了它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容。首先,此时否定的力量不再是人的抽象的本质力量,而是社会历史中的矛盾。矛盾的双方构成相互否定的力量,矛盾双方相互斗争,相互否定,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矛盾双方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于是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成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性统一中,马克思据此开出了具体的世界统一性,即世界统一于两个环节:其一是资产阶级借助资本的力量对孤立的碎片化的世界的否定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的世界统一性;其二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否定形成新的世界统一性——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之前的马克思,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统一性只是作出了初步尝试。

要真正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还必须订正两个错误:一是关于世界统一于实践;二是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世界统一于实践是一个不完整不严谨的说法。首先,它忽视了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和认识始终是分开来讲的。讲世界统一于实践,其本意是为了凸显人的实践活动的否定性,但这种说法剥离了认识,因而是片面的。其二,实践是一种具体的否定性,不具有总体性和完整性,实践不可能独自构成完整的世界。因而,只谈实践不可能构成世界的统一性,而只能构成部分世界的统一性。其三,实践存在于认识底板中,是认识活动敞开了实践的场域。实践的场域是认识敞开的,失却这一前提,实践不可能存在。离开认识谈实践,本质上是离开空间谈实践,因为时空首先在认识中敞开。康德的批判哲学将时间与空间视为先验感性要素,“空间”是纯直观,是显像的形式,“把属于感觉的东西如不可入性、硬、颜色等等都除去,那么,从

^①王清涛:《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唯物主义转向》,《哲学研究》2015年第7期。

这个经验性的直观中还给我剩下了某种东西,即广延和形状。它们属于纯直观”^①。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都是认识中的范畴,认识使实践成为可能。因此,离开认识谈的实践是抽象的实践,不可能形成世界的统一性,如果说实践形成世界的统一性,其统一性也只能是抽象的统一性。

世界统一于物质,说明世界为物质统一性,不是精神统一性。这种物质统一性并非仅仅断言世界的物质属性即宣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说,世界的统一性已不再是以往旧哲学的精神统一,而是物质统一,而物质统一性在于否定之否定。不是共时性的统一性,而是历时性的统一性,是在人改造世界(辩证=否定=历史)的存在中服从于辩证法,整个世界服从于辩证法,因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属性,决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面向未来敞开的历史统一性。只有将物质理解为运动的物质,并且这种运动是辩证的运动,即物质的运动是因为人的否定性活动才产生的运动,而不是物质自身的运动,据此结成的世界统一性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性。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呈现的世界统一性“图像”。

Unity of the World i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ang Qingtao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Abstrac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as set up a new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world. Before, from ancient Greek after Socrates to Kant and Hegel,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world in Western philosophies was the unity of subjectivity.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world in all previous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world i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world itself.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world is subsumed into human knowledge and the world of practice or the world of negation. The unity of the world comes from the the relation of negative negation that is formed by man and the given existence. The negation to the given existence by man forms a definite, then negative and finally negative negation entirety, and the entity is a world of process which spreads in time. The dialectical existence of the world is the unity of the world itself.

Key words: metaphysic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unity of the world

责任编辑:王盛辉

^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及规制^{*①}

刘云亮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摘要: 家族财产信托,是我国信托业新发展的重要领域。规范家族信托财产制度,是信托业市场化、规范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契机。认知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把握家族财产信托的信契性、家族性、用益性和传承性,是规范家族信托财产制度的核心。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集中体现出家业家产保障有据、家居家园合法延续、家誉家益信契继续和家族财产信托共益。构建家族财产信托法律制度,必须明晰家族信托财产范畴,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制度,规制家族信托财产责任,制定家族信托财产名录,等等。

关键词: 家族信托;家族财产;信托财产;信托制度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076-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8

2001年,我国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建立我国信托法律制度。该法将“信托”明确规定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信托是人类较早的一种因信任而在一定条件范围下委托管理相应财产的用益现象。形成信托制度的核心动因“财产用益”,被广泛适用到社会上各类财产管理,充分发挥“物尽其用、人尽其责”的社会价值效应。它是被世界各国广为适用流传并被称为“英国法律天才最具特色的杰作”“典型的英美法系制度”的代表作。^②当其被作为一种独特的财产经营模式进入到家族财产管理领域,便充分焕发家族信托魔力,融入信托制度的核心领域,再续古老信托制度的核心价值。家族信托迅速发展带动了传统信托业拓展新空间新发展。同时也让家族信托财产运营模式更加成熟。2014年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探索家族财富管理,为客户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这表明规范家族财富活动,已纳入信托公司风险监管范畴。2018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信托监督管理部下发《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专门规范有关家族信托的内容,形成家族信托制度的雏形。认知我国家族信托财产制度实施的法律价值,已是我们关注的要点和规制的重要内容。

一、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

据《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披露,2018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

* 收稿日期:2019-08-25

作者简介:刘云亮(1965—),男,海南定安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海南大学海南自贸(港)研究专项课题“构建和完善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法治对策研究”(19ZMQG02)的阶段性成果。

②[德]海因·克茨:《信托——典型的英美法系制度》,邓建中译,《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

净值人群规模达到 197 万人,全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 190 万亿人民币,中国私人财富市场增速较往年放缓,但仍具增长潜力。^① 这表明我国家族财产仍将持续增长,将继续促进家族信托业的迅猛发展。随着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总量不断持续攀升,尤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开板交易,隐喻着科创板造富效应将迅速得到释放,这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家族财产信托管理领域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快速发展。认知、分析和把握家族财产信托制度的核心价值,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家族信托财产主要有以下特性:一是信契性。信托财产管理关系是依据委托人与受托人所签订的信托协议(信契)而产生,其核心内容在于将信托财产用于受托人正当经营管理,确保受益人受益。其最大法律意义在于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两大法律效应和实际功效,即信托财产所有权依约不变与经营权依约管理获益。信契性,即明示信托,其设立就是为了实现某具体主体利益而以明示方式公然表达,只有满足所设定的条件要件方可有效。如“三个确定性”,意图的确定性、标的的确定性和对象的确定性。^② 不变与获益,成就了信托法律效应与定位,也拓展了信托制度适用领域和社会存在空间。家族信托更是将家族财产属性与信托关系的信契融合,助推家族信托业发展壮大,实现家族信托财产价值有效增进和良性循环发展。家族信托的信契性不仅显现如此,而且还激活家族财产信托管理的决策权。尽管家庭 and 家族概念存在法学与社会学的内涵之别,但在财产信托管理的决策权认识上却存有共识,都意识到财产管理的决策权是家族财产信托管理的前提,也是构成判定家族财产信托关系是否成立或信契是否有效的根本条件。信契性不仅是所有信托关系的法律属性,而且在家族财产信托关系上尤其显现其信契属性的家族财产管理的决策权或表决权。因为家族财产信托管理的决策权将直接涉及信契成立要件完备与否、效力状态如何,等等。

二是家族性。家族信托的重要属性体现出为富人家庭及其家族提供理财服务的一种受益产品,其根基在于家庭成员或一定亲属范围的家族性,在支付约定的信托费用情况下,最大化实现家族财产“肥水不外流”的根本目的,从而保护了富人财产。家族信托的前提是家族性,具有家族关联是其得以相应扩大发展的重要因素,此乃有别其他财产信托的重要识别点。与其他信托理财产品相比,家族信托理财本质上属于一种财产属性特殊架构,基于家族财产认定前提下进行财产信托架构设计,这便是家族信托的根本属性,其致力于满足高净值家族财产管理服务制度。家族信托的法律实质在于依据信契规定,将家族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受益权进行适当分离,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信契管理信托的家族财产,尽职尽责经营,保障家族财产良性运行,确保所指定的受益人依约受益。家族财产信托关系也在当今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形势下,出现许多新问题。如互联网金融的融资者和平台与投资者,进行涉众性债权股权和资金托管等信用交易时,往往就掺杂了家族财产信托与理财的法律关系,因信息不对称而具有一定法律风险性。^③ 该家族信托犹如有限公司一样运转,家族信托财产不会因为委托人身故而毁损终止,受托人责任始终保证了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受益人终生受益,根本上满足和显现家族信托关系的家族性。

三是用益性。信托财产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充分体现信托财产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发挥信托财产的用益权,显现“物尽其用”之属性功效。在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中,用益性的法

^①《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出炉:2018 年高净值人群达 197 万人》,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6-06/doc-ihvhiqay3892997.shtml>.

^②陈雪萍:《论我国〈信托法〉对信托有效要件规定之完善》,《政治与法律》2018 年第 8 期。

^③杨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

律意义尤其重要,是家族关系的利益相关人最为关注、最为敏感的属性。家族信托财产用益权,源于家族财产属性,是家族利益关系人的共同关注点。家族信托财产的用益性,即指家族财产委托人意识到享有和经营管理该财产增值、所得与受益,是家族财产得以传承和承袭的根本因素,也是家族财产信托管理的动力所在。事实上,无论是公益信托,还是私益信托,信托物的用益性,决定信托关系建立的根基,在于信托当事人相互之间诚实信用,公信是信用制度的根基。诚实信用原则也是信托制度的核心所在,如此也揭示了人们在运用用益权处分自己信托财产过程中,孕育着家庭信托的新芽。英国用益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价值评估与认知,足以意识到其在信托制度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信托和衡平法被适用到家庭法或家族财产管理,渐渐形成极具影响力的家族信托财产管理制度,这便是财产用益制度在家族财产领域的影响力和融合力。用益性是家族信托制度的核心特征,是家族财产信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或受益的融合点。这充分彰显了家族财产信托法律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所强加信契义务,并以此构成家族财产信托秩序的核心制度,即家族信托财产的用益制度。确保家族信托财产用益性,需具体明确家族信托财产确定性,其包含家族信托财产所有权与受益人受益权两方面的确定性。前者确定性,是家族信托关系成立或信契有效的前提;后者确定性,是家族信托关系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源。因为信托以财产权为物质基础,信托关系成立的核心还在于有独立且可辨认的信托财产。这表明家族财产的用益性相对一般信托财产更具有强烈意义和法律价值属性。

四是传承性。信托制度最早是英国基于衡平法发展而来的制度,其在英美法系国家有着巨大影响力,受到英美法系国家的认可。然而,大陆法系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否认其合法性。原因是不少大陆法系国家学者认为,信托财产普通法所有权和衡平法所有权并存的制度构造,与物权法所主张的“一物一权”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相冲突。^①后来随着信托制度被引入大陆法系的商事领域而被广泛适用,尤其是信托制度助推和充分实现“物尽其用”功效,信托制度便更加适用到大陆法系国家中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信托制度的关键内容,在于构建真实的信息披露制度。因为信托业作为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金融消费者作出相应决策的基础就是源自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最大化提升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信息对称性。^②这一制度也是适用信托制度与家族财产管理,不仅能够满足和实现“物尽其用”功效,而且能够充分满足和解决东西方国家有关家族财产传承与财富承袭的需要,成为深受贵族家族欢迎的家族财产管理制度。究其原因,在于家族信托制度的最大法律价值充分彰显和保障了家族财产利益核心,即传承家族财产并实现其增值受益,这与一般信托财产有一定差异。传统信托物仅仅彰显一般的持续性和连接性,其财产传承意义无法与家族信托财产的传承性及其价值意义相比。正因为如此,信托制度被极其广泛地适用到家族财产管理领域中来,成为助推信托业新一轮发展的主力军和主战场。准确认知和把握家族财产信托的这一重要属性,是规范和完善家族信托制度的关键所在。

家族信托的上述特性,显现出家族信托制度的核心内容及其法律意义,也更加明示了家族信托与传统信托制度的质与量之别,认知家族信托成为当今我国信托业迅猛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趋势。完善和规制家族财产信托关系,正是为了维持我国信托市场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社会民主等社会公共利益。基于此,探析家族信托财产的本质属性,目的在于研究家族

①夏小雄:《“得形”、“忘意”与“返本”:中国信托法的理念调整和制度转型》,《河北法学》2016年第6期。

②岳彩申:《民间借贷风险治理的转型及法律机制的创新》,《政法论丛》2018年第1期。

信托制度的核心价值及其适用实践意义,进而推动家族信托制度更广泛的运用和推广,更好地促进发展和规制家族信托业。

二、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认知

起源于英国的信托制度,有着巨大的社会效应。信托理论将物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用益权等有机分离,最大化拓宽信托制度适用于家族财产经营管理领域。家族信托财产的核心价值围绕上述4个特征属性,凸显家族信托财产的用益性。确认和维护家族信托财产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和规范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保护家族信托财产的受益权,是家族信托制度的焦点和基本点。完善家族信托法律制度,不仅要坚守信托法律制度的理念,而且更要突出完善如下方面的具体法律制度内容,认知和确保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功效,发挥家族信托财产制度实施的社会意义。

一是家业家产保障有据。家族信托业的发展,主要在于家族财产经营管理理念发生巨大转变。随着富豪家族阶层的财富观从“创造财富、保值增值”转变为“财富保障”,家族理财观念更多考虑财富传承。传统家族财产“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越来越引发“创富一代”的强烈担忧,家族财产信托经营模式恰好解其忧,助其家族财产传承。家庭或家族成员依据信契将家族财产托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进行信托化管理,并明确家族信托财产实现既定受益人管理,保障家族信托产业能够顺利正常经营,并确保家族信托财产利益既定最大化,最终实现家族家业家产得以永续传承、稳定发展。实现家族信托目的,其根本依据是委托人与受托人所签订的信契。受托人须信守信契义务,尽职尽责履行受托义务,经营管理受托家族财产,受益人方可依契约受益。因此,信契义务成为受托人最为基本的义务,是家族信托关系的利益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信托事务中,明确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是基于信契信赖义务,委托人诚实义务基于家族信托财产的合法性。我国《信托法》第8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明确信契形式的重要性,在于“白纸黑字”明晰信义,尤其是以此重在确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与方法,等等。受托人忠实义务也确立于信托法,明确要求“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此乃信契信托义务之核心内容,也是家族信托财产受益权的根本保障,更是家族家业家产得以永续传承发展的“家族元素”,也是当代信托业最接地气、最能够促进发展繁荣的信托市场“最具活力”的领域。

二是家居家园合法延续。家族信托财产与一般信托财产既具有共性,也有其特性。共性所指,即家族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受益权,也显现有机分离状态,家族对其信托财产仍享有所有权,受托人对此严禁染指,更不能主张权利。如《信托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即使“受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这足以表明信托财产根本属性在于其独立于受托人,具有与受托人固有财产的分离性,不与受托人共担财产风险,这是信托财产独立性的根本要求。^①受托人真实信守和履行受托义务之下,家族家产及受益利益具有确定性、保障性和持续有效性。诚然,家族财产信托效力始于信托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受托人实际取得信托财产经营权之时,信契才实际生效。同时,必须强化家族信托财产

^①楼建波:《信托财产分别管理与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关系——兼论〈信托法〉第29条的理解和适用》,《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独立性,确保家族信托财产与受托人财产(包括委托人的非信托财产、受托人的自有财产,等等)区别开来。家族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受托人履行信契信义,是确保家族财产信托收益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无论家族信托财产何种形式、种类、价值等,只要受托人依据信契接受信托财产,并施以管理、运用、处分该信托财产等信托管理活动,受托人就必须向受益人支付信托财产所衍生的收益。

三是家誉家益信契延续。家族财产信托管理模式,不仅仅能够确保家族财产得以延续收益,而且还能很大程度上延续家族家誉传承。这是一般信托制度所无法替代的,且又是家族亲人所渴望也能够延续的家族无形财产。事实上,家族财产的界定与认定,是家族信托财产的基本前提要求。认定家庭财产与家族财产的标准及其条件情形,是界定其财产可否转化和认定为信托财产的关键因素。信托往往被认为最早起源于古罗马的家庭土地用益权和遗产信托,后来才被英国吸纳发展成为以用益权为内容的信托制度。古罗马的土地用益制度,是家庭财产信托制度的渊源,英国中世纪的土地用益制则是认知土地信托法律制度不可忽视的渊源之一,如1535年英国颁布《用益法典》前,“信托”即被称为“用益”。事实上,古罗马常常把用益权用作处分遗产的一种方式,罗马人常把遗产的使用收益权遗赠给需要照顾的人,即受益人,仅仅保留所有权(虚名权)给其继承人,待用益权人死亡后,继承人再恢复其所有权。这便是古罗马的遗产信托制度的最初状态,后来的土地信托才是信托制度的高级发展形式。现代信托制度虽得到迅猛发展,却不能忘记信托制度的“初心”。家族财产信托的“家”成为信托制度的“芯”,“家”庭或族的信托财产界定,成为信托有效与否的关键。

四是家族财产信托共益。依用途功能,习惯上将信托分为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两类。在探究何类先产生时,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公益信托早于私益信托,其理由是用益制度的适用最初始于宗教活动,其公益性较为浓厚。家庭信托则显现私益性,其信托适用的时间晚于公益信托。也有人反驳此说法,认为用益权是个人处置其财产的一种方式,出于私人目的适用信托,应早于宗教活动而适用信托。^①表面看,二者主张都各有理由,都指出了信托适用的目的及其领域关联性。家庭财产信托的“初心”肯定是私益,问题是家族财产信托作为家庭财产信托的高级形式或更大更多家庭成员的集合体,其显现私益的“初心”则渐渐“变心”,越来越显现出家族的“公益”,这便是法律意义上“家庭”之“庭”变“族”的不同内涵。家与族的财产信托,更是基于信任关系,其显现出建立信任之下互动条件,推动互助和互利,进而实现互信而发展成为家庭财产信托的内外关系。因此推定,私益信托早于公益信托,进而预测出财产信托公益性基于家庭财产信托,发展到家族财产信托,直至向社会信托演变,其信托类型变化路径也是由“私益”信托发展成为“公益”信托。尤其是随着家庭财产种类及其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信托也不仅仅限于土地、实物、货币、股票、基金、股权和专利等有形或无形财产,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也促使家庭或家族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化。

“公益”信托更多情形似乎起源于“私益”之初心,还表现为小家庭财产信托。随着信托市场风险加大,家庭信托到家族信托的框架结构设计出现了复杂化、精密化、公益化趋势。家族财产信托渐渐出现了一些类似“公益”性质的部门机构,如家族委员会、信托监察人等,其目的在于共同合作及兼顾相互制约,确保家族信托制度平稳实施,保障受益人持续受益。认知家族信托财产本质,知悉家族信托制度的初心,顺应家族信托关系的发展规律,把握家族信托制度的核心,规范

^①赵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7年。

家族信托制度的具体内容,彰显家族信托制度的法律价值,成为构建和完善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规制内容

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注定了家族信托关系与其他信托有着不同的特性,由此需要就家族信托财产制度进行相应法律规制,尤其是探究家族信托财产运行管理的核心内容。西方发达国家将信托用来当作家族财富传承规划最为理想的重要管理方式,也是实现私人财产稳定有效过渡或规避税赋的理想途径。有绝大多数家庭或家族及其私人富豪,通过信托关系或设立信托基金会等方式,将财产传承给后代。家族信托财产系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信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等共同关注的财产标的,更是实施和作为一种家庭或家族财产管理、遗产分配的有效管理运行工具的信托财产,也因此深受众多家庭或家族企业等私人富豪“追捧”的理财方式。展望家族信托未来市场发展,我国家族信托未来市场发展规模仍将得到持续扩大。从最新财富规模看,2018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61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12%。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080万人民币,2019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随着新经济、新动能的崛起,股权增值效应使得企业中、高级管理层和专业人群为代表的新富群体涌现。如今经历数次资本市场风雨洗礼,富豪投资行为和心态业已生变,委托专业机构信托理财渐行渐近,日趋主流。^①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管理制度,已成为我国信托业新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有学者将“家族财富和事业传承”视为家族信托的核心价值,而且还把“家庭土地信托经营”列入家庭信托的特殊应用价值。基于此,构建家族财产信托法律制度就尤为重要和必要了。

一是明晰家族信托财产范畴。界定家族信托财产,是实施家族财产信托制度的前提。我国目前有关家族信托财产制度仍不完备,具体规范性文件也很少。《信托法》第三章“信托财产”涉及相关内容,但未能真正就“家族信托财产”进行专门具体规定。虽然该章条款已就信托财产入列情形、是否归属信托财产法律效力、信托财产法律属性、信托财产强制执行豁免等方面内容,作出相应规定,但相对于信托财产所需要规范的内容层面仍有待完善,尤其是涉及家族信托财产的内容规定更需要完善。家族信托财产属性认知和界定尤其重要,具体涉及家族财产中担保物之原物、孳息的分类。家族信托财产能否视同担保物权而主张行使家族信托财产的支配权,这需要从传统民法物权理论中进行创新性求解。有关家族信托财产管理的操作规范,主要是信托人与受托人签订的信契或信托协议,而且信托协议更多情形都是由受托人或信托公司单方面提供的信托格式合同规定,其对家族信托财产管理的规定往往偏向受托人,不利于委托人或受益人。《通知》指明“家族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一个人或者家庭的委托,以家庭财富的保护、传承和管理为主要信托目的,提供财产规划、风险隔离、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等定制化事务管理和金融服务的信托业务”。如此明确家族信托的内涵,也寓意了家族信托财产法律价值认定的重要性及其对信托业助推的重要作用。可见,构建家族信托财产明示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国家应尽快出台修改规范性文件,制定有关家族信托财产公示制度势在必行。诸如明确家族信托财产类型、形式、范围、情形等状况;规制家族信托财产认定条件、标准、程序等内容规则;有关家族信托财产的决策权,明确家族信托人资格、家族委员会或信托监察人等

^①《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出炉:2018年高净值人群达197万人》,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6-06/doc-ihvhiqay3892997.shtml>.

主体在家族信托决策问题上的权利、义务和职责等,并规定家族成员对信托财产决策权有异议时的处置与救济措施、机制等相关内容。

二是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制度。家族信托关系依法成立后,即使家族信托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家族委员会或信托监察人等主体,对信托财产存有不同的权利义务,但该家族信托财产仍具有独立性,任何一方主体或任何债权人均不得就该家族信托财产主张债权。如此规定,不仅仅是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及其价值所现,而且是依据家族信契或协议规定,保障受托人充分享有对家族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家族信托财产制度这两大特色,构建发展信托业的巨大吸引力和信托市场资源潜力。正因为如此,家族信托被广泛适用,尤其是家族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有别于信托人未用于信托的财产,相对独立于信托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等。我国《信托法》第15条规定了“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这便是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的法律依据。在实施“相区别”的管理制度时,关键是要明确规范哪些具体方面有别于“未信托财产”。诸如《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是否可以由被委托人及其受益人“自由处置”,作出具体相应规定:明确只有当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信托财产所有权或建议管理权才发生变更。否则,信托财产独立性不受任何影响,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经营管理权是独立的,也因此依法受到保护。同时,明确信托财产不作为委托人债务的担保,也不得列为受托人固有财产。受益人的债权人更不能主张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充其量也只能主张信托财产中受益人应得的信托利益。如此可见,家族信托财产管理制度可以循此而定,明确家族信托财产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管理权具体内容及其受托人行使信托财产管理权限等,排斥或限定家族信托财产委托人、受益人及其债权人等主体违法主张家族信托财产的权利。同时,禁止或限定家族信托财产受托人,行使除正当家族信托财产管理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如明确禁止强制执行家族信托财产的具体情形,禁止受托人将家族信托财产用于融资或再融资担保,禁止受托人转让家族信托财产,禁止受托人将家族信托财产列入自主经营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等等。上述内容规定,是确保家族信托财产不被非法处置或变相转让流失,也是维护受托人充分享有家族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实现信托利益。

三是规制家族信托财产责任。规范家族信托财产,不仅要关注和明晰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制度,充分认知和发挥其价值作用,而且要探究和分清家族信托财产制度具体运行中,信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等主体的有关信托财产责任范围及其免责情形。设置财产信托制度的前提,是在确保信托财产不受损失的保值前提下,鼓励受托人大胆科学积极管理,实施推动信托财产增值机制,充分发挥信托财产受益功效及其制度优势,实现信托财产价值最大化。因此,在家族财产信托制度实施过程中,防控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责任风险,规范家族信托财产责任制度是极其必要的。家族信托财产责任,将直接涉及家族财产信托制度的立足点是否稳定、法治运行是否有动力与潜力,可否列明相关主体责任情形、可否明确责任豁免等内容。依据不同财产形式特征,家族信托财产的风险状态及其可控性等情形,认知和研究划定其责任风险。现在家族财产信托已从单一功能家庭信托产品,发展到综合类家族信托产品,甚至形成了家族办公室这一顶级家族信托业务。^① 这便给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带来更多风险隐患、更大难度的防控。在家族信托种类上,也存在很多新的功能偏向型信托产品,使其信托财产责任也有相应变化。如养老型、财产保值增值型、家族企业传承型、子女抚养型等家族信托产品类型。更有甚者,还有信托公司正

^①岳峰:《财富传承之忧催生新模式——家族信托探析》,《武汉金融》2015年第1期。

在探索境内实际控制人对境外权益设立的离岸家族信托产品,这也是家族财产信托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态。随着我国高净值人群剧增,家族信托财产及信托产品类型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而家族信托作为家族财产管理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下,有必要依据家族财产信托产品的不同类型,结合其功能要求及信托财产风险可控程度,对受托人经营管理家族信托财产进行风险分类管理,并划定其相应责任。其所产生的家族财产信托纠纷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在一般民事案件中,我国相当比重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权利的实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①同时,还要确保家族信托财产的合法性,防范和化解家族信托财产违法转移财产或涉嫌“洗钱”等违法问题。

四是制定家族信托财产名录。家族信托财产管理,先于明确和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确定可纳入家族信托范围的财产情形及其种类,尤其明确家族信托财产是否公示或告知,如何规划可以公示的家族信托财产,又如何厘清家族信托财产公示与家族隐私保密的界限关系,等等。有必要修订《信托法》,明确有关家族信托财产属性定位,尤其是规范家族股权信托的法律制度内容。事实上,家族财产信托产品,由于家族信托财产种类、类型及属性不同,也有必要适当将家族信托财产进行相应的分类名录。不同名录有不同管理制度,也有明确相应的法律制度。诸如主要涉及家族信托财产具体分类标准、信托财产登记规则、受托手续流程、相关税费义务、信托登记对抗第三人条件,等等。明确家族信托财产登记法律效力、登记与否的效力层级等。在是否强制实施家族信托财产名录问题上,有主张实行自愿原则,其决定权由委托人、受托人通过家族信契或信托协议来具体规定,并决定是否能够对抗第三人。一般认为,倘若家族信托财产未纳入登记名录,进行信托登记,其信托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区分或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登记与否,将成为其是否给予征纳有关税或可否抵免税,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生效成立的明示信托具有信托设立的完整形式要件,但不能仅以明示信托的表现形式作为认定信托关系的唯一标准。”^②认定家族财产信托效力,并不是单一问题,其将涉及家族信托关系许多因素。诸如家族信托财产登记公示与否、信契或信托协议公证与否、信托财产私密性保护与否、信托财产管理监管状态、信托人或信托机构专业性资质情况,等等。这些因素都与家族信托关系主体、客体、信托财产种类、信托方式、信托活动专业性、信托市场监管等方面内容的规范化、法治化有关。

规范家族财产信托制度,是家族信托财产管理本身所需,更是全面推进我国信托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规范化与法治化,是我国家族财产信托管理制度的营商环境优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和健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具体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路径选择上,结合所需规范家族财产信托具体内容的轻重缓急、强制与自愿、专业与职业等情形,选择通过信托格式合同模式、信托业行业自律性规范、银行保险业监督部门规章、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修改《信托法》等方式,循序渐进地实现家族财产信托规范化、法治化,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信托法律制度,以此助推我国家族财产信托业的科学有序发展。

^①章武生:《我国证券集团诉讼的模式选择与制度重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

^②李晓龙、赵宜楷:《信托法适用视角下的委托理财纠纷审理探究》,《天津法学》2018年第1期。

Legal Value and Regulation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Liu Yunliang

(School of Law,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28)

Abstract: Family property trust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ust industry. Regulating the family trust proper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marketization, regulation, leg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rust industry. The core of regulating the family trust property system is to understand the legal attribute of the family trust property and graspi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familial nature, usufruct nature and inheritance nature of family property trust. The legal value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concentratingly embodies family property security evidence of family business and family property, legal continuation of the residence and homeland, and contractual maintenance of family honor and family interest, and common interest of family property trust and so on. To establish the legal system of family property trust, attempts can be made to clarify the category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regulat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regul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and work out a list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Key words: family trust; family property; trust property; trust system

责任编辑:王盛辉

论班固“山西出将”说*

杨兆贵

(澳门大学 教育学院,中国 澳门,999078)

摘要: 班固提出“山西出将”说,指明西汉“山西”多出将军。这是他以人文地理的观念阐论地理与产出将军之间的关系。为阐论此说,先厘清西汉山东、山西的地理范围,进而从经济、自然地理角度阐论“山西”的农业、经济发展之故;再从人文、历史地理方面论述此区域民风、多出将军之由,这亦与秦人在此区长期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主要论述秦人长时期与周、戎交杂的关系并形成尚武精神。

关键词: 班固;山西;将军;汉代;自然经济地理;人文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085-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09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下简称《赞》)说:“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辛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①这里,班固提出自秦汉以来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现象,说明山东、山西所出的人才有别,并从人文历史地理角度解释人才与地理的关系。其大意是说,某一时期的政治人才、军事人才与其所生长的地域有密切的关系——该地域若有某些人文特性,则由此地域所产生的人才亦有该种文化特性。可见,人才与地理的关系相当密切。^②汉代山西出将,还因山西与羌胡相处日久,民风好武尚力。此风俗自秦人从周代居此就已逐渐养成。又适逢武、宣用兵匈奴等外敌,因此一时军事人才济济。本文主要承班固之意,参稽史乘,以经济、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的观念,阐释山西能出将之故,至于其他与此有关的制度等方面,非本文所能详论。

一、西汉山西的地理范围简介

讨论山西出将,须先厘定其地理范围。对此,傅乐成、邢义田、王子今等各有专文论述。^③一般而言,学界认为山西或以华山、崤函为界,或以太行山为界。笔者认为山西的主要范围即《汉

* 收稿日期:2019-10-05

作者简介: 杨兆贵(1971—),男,福建漳浦人,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90页。本文《汉书》引文都引自此书,文中只标注页码。

②杨兆贵:《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6-204页。

③傅乐成:《汉代的山东与山西》,《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65-80页;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秦汉史论稿》,台北:三民书局,1987年,第91-113页;王子今:《“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秦汉人才的区域分布》,《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9-260页。

书·地理志》所说的秦地,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虽然劳榦批评北方诸郡只有防边一途^①,然而北方诸郡在汉代的军事外交关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征服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民族。北方边防在汉廷国策上有重要的分量^②,将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汉代出现了不少流芳千古的名将。我们有必要客观正确地评价地缘、将军、边防、汉廷等的相互关系。

班固提到的诸将军,分别来自郁郅、义渠、成纪、上邽、襄武、狄道,分属北地、天水、陇西诸郡。可见,《赞》所提到的“山西出将”是就这几个郡而言的,也就是“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下文简称四郡),其范围比秦地小。与这四郡民俗相近的尚有上郡、西河,《地理志》把这六郡归于秦地,且一起认为它们的民风“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第2824页)然而,班固没提到上郡、西河,可能另有原因。^③

二、论班固提到的西汉诸将军

(一)论《赞》里提到的诸将军

欲分析山西诸将与地理的关系,先要分析《赞》提到的几位将军。他们是王围、甘延寿、公孙贺、傅介子、李广、李蔡、苏建、苏武、上官桀、赵充国、廉褒、辛武贤、辛忌。

班固提出“山西出将”说,并举这几位为代表。他们是否都是将军?西汉一朝实无固定的常设将军,以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等位高权重,“位上卿,金印紫绶”(第869页)。武帝元狩四年以大司马冠将军,进一步提高其地位。大司马所冠的将军包括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昭、宣以后,大司马将军领尚书事,权位最重,往往成为最高决策者。^④《赞》中提到的几位绝大多数当过将军,只有傅介子、甘延寿未曾当过(不过,甘氏当过的长水校尉,秩二千石,地位很高。下文为行文方便,皆称将军)。可见,班固所说的“将”不一定指武官系统里官阶最高的大将军、骠骑将军等,而是指曾经带兵参战的武将。

这几位将军绝大部分生活在武、昭、宣、元、成时期,只有李广曾在文、景时打仗任职。可见,这几位将军都生活在汉武帝及其后时期。易言之,汉武帝及其后时期,汉朝攻伐匈奴、羌胡等边境民族,才出现“山西出将”现象。

循班氏的思路,山西地域与将军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地域在一段历史时期涌现很多将军,这除了与地域思想、文化、习俗、历史等方面有关系外(详见下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理论部分),还与个人经历有关,也可能与他的家族家风有关。汉代曾出现经学世家,军队也会出现。为了对此现象有较深入了解,下文以李广家族为代表加以论述。

(二)山西将军世家:以李广家族为论述对象

李广,陇西成纪人,出身良家子。^⑤他的先祖李信是战国时秦将。李广先后曾任上郡、陇西、北地、云中等地太守、未央卫尉、骁骑将军、将军、前将军。元狩四年,他因与“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卫青“令长史簿责广,广自杀”(第4001页)。

李广常常打败仗,未立军功。但他很受士兵尊敬。他为人豪迈,待人宽厚,治军简要,不喜用

①劳榦:《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之第二分(1935年),第191-192页。

②学界对地缘军事的研究,可参考贾文丽:《汉代河西军事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

③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地区没出过将军。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所记诸将军,其出生地域没有来自上郡、西河郡的。

④张金龙:《西汉将军制度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⑤杜志强:《“六郡良家子”考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第3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繁琐的纪律来约束士兵。他的崇高威望使军队形成向心力,“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匈奴非常害怕李广的简单”^①。

李广重视对家庭子弟的军事培养。他的三个儿子都从军:大儿李当户,任郎。次子李椒,曾任代郡太守。三子李敢,曾先后任郎、关内侯、郎中令等。元狩二年夏李敢随父出右北平,英勇善战,“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第3950页)后被霍去病射杀。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曾任侍中建章监、骑都尉。他带兵打仗,与李广相同,重视培养勇士。李陵后来投降匈奴,故旧门下及陇西士大夫都以此为耻,这个延续百年、名将辈出的军人世家由此衰败。

李广之弟李蔡曾先后任郎、轻车将军、乐安侯,后任丞相,因“诏赐家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第3950页)而被迫自杀。由此可见,李广家族素来重视军事培养,所以自秦国李信开始,一直到李广之孙李陵、李禹,几代人都英勇善战。虽然史书没记载他们所用兵法,但相信他们作为军事世家,皆读兵书;地方社会尊重他们,可能受他们影响,不少人喜欢从军。

其他如苏建、苏武父子,最有名的事迹是苏武牧羊。赵充国在武帝时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名震匈奴。他在湟中屯田。他的儿子赵印也从军,任右曹中郎将。可见,李广家族与其他几位将军有几个特点:(1)他们都英勇善战。(2)他们出身军人世家,大多重视家庭教育。(3)他们大多熟悉边疆事务,真正上沙场,过金戈铁马的生活,靠自己的战功而升为将军,并非靠姻亲关系或一直居于庙堂之上运筹帷幄而获封将军。

(三)论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提到的将军

西汉时期除了山西出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军外,山东也有不少将军。根据《百官公卿表下》所载,封为“列将军”的姓名及人数如下表:

将军衔	人数	担任者	备注
将军	5	酈商、韩安国、李沮、赵食其、任千秋	
大将军	5	窦婴、卫青、霍光、王凤、王商	卫青、霍光、王商为大司马大将军
车骑将军	12	薄昭、金日磾、上官安、张安世、韩增、许延寿、史高、王接、许嘉、王音、韦赏、王舜	张安世为车骑将军、光禄勋及大司马,韩增、许延寿、史高、王接、许嘉、王音、韦赏、王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王舜为太保车骑将军
骠骑将军	3	霍去病、王根、丁明	霍去病、王根、丁明皆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卫将军	6	宋昌、张安世、王商、丁明、傅晏、董贤	张安世、王商、丁明、傅晏、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
左将军	12	上官桀、冯奉世、王商、任千秋、史丹、辛庆忌、孔光、王咸、师丹、彭宣、丁望、公孙禄、孙建	冯奉世为左将军、光禄勋
右将军	25	王莽、张安世、霍禹、常惠、冯奉世、许嘉、王商、任千秋、史丹、王章、辛庆忌、韩勋、廉褒、尹岑、王咸、傅喜、彭宣、公孙禄、峤望、王安、王崇、马宫、甄丰、孙建、甄邯	王莽为右将军卫尉,张安世、甄邯为右将军光禄勋
前将军	3	韩增、萧望之、何武	
后将军	2	赵充国、朱博	
复土将军	3	左威、耿丰、左咸	
度辽将军	1	范明友	
强弩将军	1	许延寿	
步兵将军	1	王骏	
祁连将军	1	田广明	

^①蓝永蔚:《飞将军李广和他的家族》,《文史知识》1987年第8期。

所记有将军衔的共80人,剔除重复的有65人。按山东、山西来分,则山东籍将军的姓名、出生地/籍贯如下:

今山东省15人:许延寿、许嘉(昌邑),史高、史丹、韦赏(以上鲁国),孔光(曲阜),丁明、丁望(山阳郡),王咸(济南),师丹、左咸、王骏、王崇(琅邪),马宫(东海郡),萧望之(东海)。

今山西省7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霍禹、尹岑(以上河东),冯奉世(上党),常惠(太原)。

今河北省9人:窦婴(父世观津人),王凤、王商、王莽、王音、王根、王舜(以上魏郡),王安(涿郡),甄邯(中山郡)。

今河南省8人:酈商(陈留),韩安国(梁国),傅晏、傅喜(河内郡),薄昭(父应为魏人),韩增(韩襄王后代),彭宣(淮阳郡),公孙禄(颍川)。

山西籍将军的姓名、出生地/籍贯如下:

今陕西省6人:董贤(云阳),张安世、朱博(杜陵),耿丰(茂陵),田广明(郑县),赵食其(左冯翊)。

今甘肃省7人: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上官桀、上官安、赵充国、范明友(以上陇西),廉褒(襄武),辛庆忌(狄道)。

今四川省1人:何武(蜀郡)。

《汉书》未明确记载出生地或籍贯的有任千秋、王接、宋昌、孙建、韩勋、峤望、甄丰、左威8人,而李沮是云中入,属今内蒙古。

以上山东将军共39人,占六成;山西人14人,占两成强。如果从这一数字来看,则班固的“山西出将”说受到挑战。但如上文所论,班固这个看法是基于他所提到的几位将军多上沙场,靠自己的战功而升为将军。实战经验是最重要的因素。《百官公卿表下》所记的将军们,尤其是生活在元帝以至平帝的,大多没有上过沙场。他们能任将军,有不同的原因:一是他们有的依靠外戚关系而任将军,如最有名的王凤家族;二是有的是依靠父荫如张安世靠其父张汤之荫,后被任为车骑将军、卫将军;三是有的既依靠父荫,又曾上沙场,如任千秋、韩增;四是有的不熟悉军事,依靠自己的经学名望而拜为将军^①,如萧望之、孔光;五是得到皇帝宠爱,如董贤是哀帝的男宠。

可见,班固说“山西出将”是从上沙场而建功的角度出发,而非纯从有将军衔的角度来写传的。所以,那些依靠外戚、父荫的就不从这方面来写传。

三、从自然、经济地理论述山西出将之故

某一地区人才济济,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有建树的,当地经济多发达,以资运用。山西多出将军,其地除民风尚武勇战外,经济亦发达。四郡在现甘肃省东南部,属于《地理志》所记的秦地。秦地包括四郡与关中。下文分别论述四郡与关中这两大地区的自然、经济地理状况。

(一)北地、安定、天水、陇西四郡

先谈四郡的土壤、气候。四郡属于《禹贡》所记的雍州,该区土壤为黄土,是中国土地最好的地区之一。^②四郡气候温润。《货殖列传》说该区“饶材、竹、谷、纁、旄、玉石”^③。《地理志》说:

^①西汉后半叶重视经学,举凡为相者或三公者,必多明经致用,否则很难胜任,任期也极短。参杨兆贵:《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1-175页。

^②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52页。

^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3页。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第2824页)竹子生长快,生长量大,说明水湿充足,土壤深厚肥沃,排水良好,适合山林生长。秦地有很多栗树,山地林木茂盛。反过来说,山林多,山林植被更能涵养水源,还能保持森林里多样的生态。

次谈四郡水系。据《禹贡》记载,雍州有渭、弱、泾、漆、沮、沔等水系。渭水出于陇西郡首阳附近的鸟鼠同穴山,流经陇西郡、天水郡而进入关中。^①泾水发源于安定郡泾阳,东南至阳陵而入渭水。可见,这四郡或是河流发源地,或有河水经过。

汉代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大多数集中在黄河、淮河及汉水流域。^②武帝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③通过开凿河渠,引河水灌溉,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西汉王朝还在这一地区修渠道。《汉书·匈奴传上》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第5643页),在今内蒙古河套平原至兰州的河谷平原上修渠道、辟农田,发展屯田。

四郡的经济模式是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地理志》说:“畜宜牛、马,谷宜黍、稷。”(第2173页)《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④羌指居住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族群。所谓“关中之俗”是指秦始皇把内地贵族、百姓迁移于关中之前的民俗而言,即《货殖列传》所说的“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百姓看重土地,发展农业。四郡也有畜牧业。这里自古以来以产马、牛、羊而闻名天下。《地理志》说:“古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第2825页)又记北地郡有堵苑、白马苑。苑是汉朝在边地设置管理马匹的机构。马在军事、交通、生活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匈奴浑邪王在元狩二年降汉后,汉就在这一地区养马,设置六牧师苑,非常重视这里的畜牧业资源。^⑤养马业发展,增强汉军实力,使河西的亦农亦牧经济模式更为加强。^⑥

农作物方面,据许倬云考证,汉朝最重要的是禾与麦。禾有抗风能力,不需很多水分,这对干旱多风的北方来说是一种理想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可以在春、冬生长。^⑦

最后谈四郡的人口。自秦始皇以来,王朝对边地采取“徙民实边”措施,如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后,先后迁大姓于陇西。武帝元狩四年冬把关东受灾的大约72.5万人移居到四郡及会稽。大规模移民,不仅增加人口,而且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农耕技术,更有利于推广农耕。^⑧赵过发明代田法及新农具后,“又教边郡及居延城……用力少而得谷多”(第1594页)。据《地理志》记载,陇西郡,户53964,人口236824;天水郡,户60370,人口261348;安定郡,户42725,人口143294;北地郡,户64461,人口210688。可见,四郡人口不少。

(二)关中

关中位于今陕西省中部,介于秦岭与渭北北山之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因在函谷关与大散关之间,故称关中、秦中。西汉前期气候温暖,年均温度比现在高1度,年降雨量也比现在多。武

①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②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4页。

④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⑤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29页。

⑥徐水兰:《汉代河西养马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6年。

⑦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90页。

⑧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4-135页。

帝之后,气候波动。^①

关中土壤主要为黄壤,不干燥,适合农作物生长。《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②关中平原在秦汉以前植被覆盖良好,有大片的森林。《地理志》说:“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岛膏腴。”(第2822页)可见,这一带有竹林、檀树、柘树,还有梅树、桑树。丘陵、山地的森林覆盖繁茂。

关中水系发达,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形成所谓“八水绕城”^③,交通便利。《沟洫志》记秦修郑国渠,凿通泾水,引泾水冲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4万多顷,用以灌溉农田,既增加农田面积,又提高亩产量。

汉代重视水利灌溉工程,除了维修完善旧有的水利工程,还开凿许多新的干渠,如文帝时在郑国渠上流南岸开了“六辅渠”,武帝时先后开凿了白渠、漕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沛渠。^④渠道渠水不仅冲刷掉土地中的碱性物质,还提供水源,扩大关中地区农田灌溉面积,提高农产量,且便于水路交通运输。^⑤另,汉人发明了“井渠法”,解决了由于明渠渠道易于崩塌而堵塞水道的问题,也收到减少出土量和加快工程进度之效。这是水利史上的一项创举。^⑥

关中农民改进农耕工具、农耕技术及方式。从陕北米脂石画像中捡拾牲畜粪便积肥的情形,可见农民重视利用有机肥。^⑦汉代肥料主要有绿肥和粪肥两种。关中农民能把动物的粪便、骨肥、种子拌在一起,使种子得到充分的养料供应,这是提高种子周围土壤的好方法。赵过发明了耧车、耦犁。耧车能一次把开沟、下种、覆盖的任务完成,有省力、省人、生产效率高的优点。关中也发明、使用形制大小不一的犁铧、起着翻土成垄作用的犁镜,牛耕日益普遍。^⑧赵过新创了“代田法”、区种法,对农田进行休耕,有利于地尽其力。^⑨

综上所述,关中土地肥沃,沃野千里,耕种面积大,水资源丰富,实施精耕细作,发明新农具,农作物品种较多,因此,歉收失收的情况较少,百姓生活比较富饶。

农业发展,手工业技术也改进。关中的铁器铸造和加工都有较高的水平,冶铁场所也明显增多,因为农田垦殖、农业发展需要铁制工具。

农业发达,社会安定,人口较多。关中是秦、汉之都所在地,除了本地原有的人口外,秦始皇曾徙12万户富豪于咸阳,汉帝为了保护帝陵,在陵区设国县邑,并三次徙民。所徙的居民都是全国各地的豪杰、官吏、家产300万以上的家族。一些陵邑如茂陵就集聚了不少富翁,他们有经济实力,在政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⑩,且使关中文化改观,形成“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第2823页)现象。学者估计,这些人数若以西汉的一般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加,平帝至元始二年可达120万人。^⑪据《地理志》所记:三辅地区共2436360人。这一数字不是西汉关中人口的最高值,最高值

①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③八水指长安附近的泾、渭、灃、涝、沣、漓、泾、灞。赵锐:《两汉关中地区自然灾害与政府应对策略相互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

④杨亚长:《陕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9年第5期。

⑤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

⑥黄留珠、周天游:《陕西通史·秦汉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⑦林正同:《从画像砖、石看汉代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⑧杨亚长:《陕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9年第5期。

⑨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40页。

⑩黄留珠、周天游:《陕西通史·秦汉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3页。

⑪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应在武帝时期。据《地理志》记,当时全国人口共约 59594978 人,则关中人口占全国的 4%。把关中人口与山东大郡相比,山东人口较多的有汝南(2596148)、颍川(2210973)、沛郡(2030480)、南阳(1942051)、河南(1740279)等。关中人口比这些单个的人口大郡还多。^①

关中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发达,综合表现在都市的繁荣。关中有名的都市有雍、栎邑、咸阳、长安。史念海指出,关中的自然资源、丰富的物产、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的重要地位等,都使这些都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咸阳和长安在全国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述四郡、关中,土壤肥沃,水利兴修,农耕技术改进,农作物品种多。关中人口稠密,都会较多,一些都会民庶富有,就有多种追求;人口稠密,易于传播学术文化;又山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终西汉一代,无世无之,多所建树。四郡与边疆为邻,汉人自古就养成尚武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四郡多出实战型的将军,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理所当然。

四、以人文历史地理阐述山西出将之故

上文从经济、自然地理方面阐述了山西农业经济概况,下文以人文历史地理阐述山西出将之故。四郡地处今甘肃东南部、河西走廊的南端,接近关中。这里是秦人长时期活动过的地方。秦人自商周时期就迁移到此地,他们既与戎狄杂处,受戎狄文化影响,又接受周文化;既有勇武善战的特点,不断与戎狄发生战争,在战争中不断洗礼、壮大自己,又有善于吸收其他文化(包括周文化)的进取精神,形成秦独有的文化特点。可见,秦人深受戎文化、周文化影响,具有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双重特点。先秦时期秦人发展史可说是河西、四郡、关中区域文化的集中反映,从中亦可见河西、四郡、关中的人文特点。人文历史地理方面,从秦人发展史可以诠释山西出将之故。

秦人应来自东方,属东夷部族。^②清华简《系年》记载三监乱平后,一大批秦人被迁到陇东朱圉山(今甘肃甘谷县)^③,过着耕、牧结合的生活,其后由礼县(属陇西)逐步向其东北的秦安、清水、天水一带扩展。同时,秦人一边看守周的西垂,一边与周联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

秦人善于养马,“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闲,马大蕃息”^④,非子出自秦的大骆之族,初居于西犬丘(属陇西郡)。^⑤秦久居西垂,与西戎为邻。秦人与西戎的关系复杂。戎人“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⑥,势力大,剽悍善战,经常袭扰关中。当时秦的军力远不如戎狄,依靠与周人建立婚姻关系,以加强自己的实力,如秦襄公取和亲政策,元年“以女弟繆嬴为丰王妻”^⑦,丰王是周的贵族^⑧。虽然秦与戎为世仇,但秦受戎狄文化影响,如甘谷县毛家坪秦人遗址发现社会中下层人的屈肢葬、西首葬。学者认为屈肢葬是秦接受戎狄文化的例证。^⑨战国游士都批评秦与戎狄之俗基本相同,如商鞅

①尚新丽:《西汉人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3年。

②赵化成:《秦人从哪里来 寻踪早期秦文化》,《中国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

③清华简《系年》:“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④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7页。

⑤西犬丘有两层含义:一为地区名;一为城邑名。见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西犬丘属陇西郡西县。

⑥范晔:《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

⑦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页。

⑧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⑨戴春阳:《秦墓屈肢葬管窥》,《考古》1992年第8期。

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①秦受戎狄文化影响是战国时山东人的共同看法。

周室东迁后,西戎占领关中,山西只剩下秦国诸侯,秦形势险恶。秦、戎又常常发生战争。秦文公不得不迁都汧邑。汧邑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属司隶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适宜建都。另,襄公因救周有功,平王“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②。《诗经·秦风·终南》也称颂这件事。^③秦此时才立国,这是秦人以勇武打败戎狄而取得的成果。

秦人势力在文公时进入关中。秦人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大,如在墓葬、葬俗、社会制度(如宗法制、昭穆制、世卿世禄制等)、宗庙祭祀、井田制、国野制、文字等方面都学习、模仿周人。^④《秦公簋》记秦公说“必宅禹迹”,这是秦人入居关中、自视为华夏之列之语。^⑤周文化以《诗》《书》《礼》《乐》为中心,这四者是儒家的经典,阐释儒家的理想。^⑥秦人重视的是经典的诵习,强调礼乐、《诗》《书》的现实政治作用,不重视儒学创新,所以秦国没有闻名的儒家。^⑦

秦德公元年把都城搬到雍城,并命宫廷为“大郑宫”,因周穆王曾在这里建了郑宫、春宫两座行宫。德公这样命名可能是为了表示秦是周的合法封国,是岐西的合法继承者、使用者。另,雍的地理位置优胜,成为秦国多年的政治中心。它是秦以后向东发展、进军中原的重要都邑。

秦穆公即位后,一方面继续学习、吸收东方六国(山东)文化;另一方面一直与戎狄进行战争,且先后战胜关中东部陆浑之戎、茅津之戎。^⑧秦想向东扩展,但其东边是春秋霸主晋国。秦无法向山东扩张,只能向西扩展。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称霸西戎,统一了关中、河西,结束西周以来多年的戎患。秦与戎狄经过多年的战争,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与秦的尚武、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有密切关系。

秦人的尚武精神,到秦孝公时更加提升。秦孝公即位,锐意变法图强,任用商君,以强国为目标,把秦国置于高度的军事化基础上,倡导功利思想,使秦国成为以功利尚武为主导的侯国。^⑨商君推行军功爵制,以通过提高秦军的社会地位、获取特权而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此后,秦国尚武精神更加强烈,并把尚武精神转化为战斗精神,秦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史记》称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⑩。秦国在其后所参与的战役中,多胜少败。苏秦称赞商君变法后的秦国,“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⑪,指出秦人有“兵法之教”,可见当时秦人已熟习兵法战阵之事,可见秦军的厉害。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前,曾把山东不同侯国的贵族迁移到山西一带,如迁楚上官氏于陇西。迁

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4页。

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页。

③程俊英、蒋见元指出秦襄公时,周平王东迁,把古都长安一部分土地赐给秦国。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48页。

④乔鑫:《从出土资料看秦的文明化进程》,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

⑤李零:《春秋秦器试探——新出秦公钟、钲铭与过去著录秦公钟、簋铭的对读》,《考古》1979年第6期。

⑥有关孔子、儒家的理想社会,参见杨兆贵、吴学忠:《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管子学刊》2019年第2期。

⑦有关秦国儒学发展,详见高华平、朱佩弦:《论春秋战国儒学在秦国的发展演变》,《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⑧沈琳:《秦国与戎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0年。

⑨田延峰:《秦思想研究——以秦统一前的思想发展为核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4年。

⑩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1页。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关系,参见熊梅:《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培育》,《滨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⑪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2页。

移的地点包括临洮、严道、陇西、上邽、天水等。^① 陇西、上邽分别是李广、李蔡与上官桀、赵充国的故乡。始皇统一天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②,富豪多来自山东诸国,其中必有文学之士。虽然始皇未加重用,但是他们带来东方齐、鲁、楚等地的文化思想,对关中、四郡风气产生影响,自不待言。

汉高祖即位,一仍秦旧,想强本弱枝,因此把山东诸豪族迁到诸陵。高祖九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到关中。《地理志》云:“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第2823页)可见所迁徙的有世家豪族,决非普通的市井庶民。迁徙到关中的豪族中,必有好礼、文学之士,学习、继承《诗》《书》、礼乐,如丞相石庆之父石奋是赵人,后从高祖入关,徙居长陵。石庆生于斯、长于斯,孝谨有名,深得儒教,终至为相,即为明证。关中文教事业发达,传统诸子百家书籍、思想,都有人传承、发扬。关中为政教文化中心,对附近地区产生影响。

另外,由于秦人长时期在河西、天水等六郡活动,六郡人也尚武(很多秦人后代仍会生活在此区域)。《地理志》说: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第2824页)

班固这段文字指出几个重点:一是从地理、民俗指出六郡的民风“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李广家族就是擅长射击的。二是在这种民俗风气下,六郡出了很多良家子。良家子出现在六郡,而不出现在关中,这与两地地理、风气有异有关。关中是首善之都,富豪巨贾多,其子弟未必能吃苦,肯学习射箭;反观六郡自古与戎狄杂处,秦人进入关中前已养成尚武精神,流风遗泽,根深蒂固,成为这区域的集体无意识。另外,这一区域自古多出将领,存在军事世家,深受社会尊重。

总括而言,秦人自周代就在山西生存、发展,由于戎狄杂错其中,且秦最初力量较弱,常处于被动。秦人没有自暴自弃,反而从非子以来,历代国君在进入关中前大多继承祖先传统,好勇尚武,积极开拓,国力日强。自文公开始,秦开始转败为胜,打败戎狄,又逐步向东发展,进入关中,继承周文化,建设法制。商君变法,推行军功爵制,更提高秦人的尚武精神。六郡地迫戎狄,民风高上气力,喜欢射击,修习武备,军事世家存在。反观关中,自秦始皇迁徙山东贵族,富豪奢靡,当然或有好学之士,传播诸子百家知识,对宣扬兵法思想应有帮助。在这几个因素影响下,六郡多出良家子,进而从军,参与战争而获封侯,晋身将军,就不难理解了。

五、结论

本文从经济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阐述班固“山西出将”说。西汉的山西,即《地理志》所说的秦地。班固在《赞》里提到的“山西出将”是特就“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言,其范围比山西小。

从班固提到的几位将军及其家族成员的生平事迹,可见他们的出生地(或籍贯)在四郡。他们均为武、昭、宣、元时期英勇善战的将军,大多熟悉边疆事务,真正上过沙场,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靠

^①有关秦移民的情况,参见黄佳梦:《秦移民及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

^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自己的战功而升为将军,但未能升到最高的将军位阶。他们有的出身于军人世家,绝大多数重视家庭教育,他们的子孙多继承先人之职业,长大后从军杀敌。班固从这一角度来论述他们。

山西之所以在西汉中后期出现一批实战型的将军,这与山西的经济、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从经济、自然地理言,山西农业经济发达,为当地百姓提供生活保障。关中、四郡土壤肥沃,气候温润,兴修水利,交通便利,农耕技术改进,农作物品种多,关中人口稠密。四郡又是农业与畜牧业的交汇带,宜农宜牧,养马技术高,马匹繁颖,为汉朝打仗提供了充足的马匹来源。

就人文历史地理言,关中、四郡自周代开始,秦人就一直在此活动。秦人与戎狄杂居,双方一直不断发生战争,从而影响、塑造了秦人的尚武精神。秦自春秋以来,势力逐步往东开拓。由西周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人一步一个脚印,在战争中洗礼、壮大、发展起来。秦一方面与戎狄战争,另一方面受戎狄影响,也受周文化的影响,进入关中后以周文化继承者自居。秦人这些特点,对四郡、关中都有影响。四郡民风尚好善战,除了地迫戎狄外,显然深受秦风的影响。秦始皇、汉帝把山东豪族迁到关中,他们有的深有学养,传播传统诸子百家知识,这对山西军学思想、兵家知识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山西将军作战能善用兵法,应与这一文化传播、家教、历史沉淀有密切的关系。加上武、昭、宣时用兵西边,在这种情况下,四郡多出实战型的将军,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理所当然。

On Ban Gu's View of "Army Generals are produced in Shanxi"

Yang Zhaogui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China, 999078)

Abstract: By saying that "Army Generals are produced in Shanxi (western region of Xiao Mountain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an Gu meant that more generals are produced there. He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enomenon and the region in terms of human geography. In order to explain Ban's view, the essay firstly clarifies the geographical range of Shandong (eastern region of Xiao Mountains) and Shanxi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n expounds the causes of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n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n discusses the folk customs in this region and the causes why more generals are produ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also the close relation to the long-term activities of the Qin people in this area. He mainly discussed the interming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 people and the Zhou people and minorities, which nurtures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Qin people.

Key words: Ban Gu; Shanxi (western region of Xiao Mountains); generals; the Han Dynasty; physical and economical geography; human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责任编辑:张登德

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及其现代价值^{*①}

时晓红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由讽谏君主的箴文演变为百官恪守的戒条;从单纯的道德说教到务实性的从政经验介绍;针对范围由国家的高级官员扩大为包括书吏、杂役在内的地方胥吏。从内容上看,传统官箴的主要类型可分为道德说教型、从政经验型、帝王御制型、言行辑录型、公牍选编型、综汇融合型等六种类型。传统官箴文化从整体上讲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官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糟粕,但从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传统文化的视角看,它体现着一定的合理内核和丰富的且可资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治国理政的智慧对现代官德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发展走向;合理内核;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095-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10

所谓“官箴”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为政者道德与操守的文化,其中蕴含着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想精华,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吏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而官箴文化又是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传统官箴文化在中国古代起到了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引领官场良好风气、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促进和监督官员的自身道德修养的历史作用。

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的主体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基本一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对当今官德建设具有借鉴价值,其合理内核有着丰富的且可资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告中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②,这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都有珍惜名节、注重操守、干净为官的传统,历来都讲‘为政以德’‘守土有责’,领导干部要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遵纪守法的模范。”^③这既是对当前我国官德建设的重要指示,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所以,研究中国传统官箴文化既是探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切入点,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 收稿日期:2019-11-20

作者简介:时晓红(1963—),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官箴与中国古代官德建设”(17CLSJ02)的阶段性成果。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③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纪检监察》2016年第10期。

一、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的发展轨迹及走向

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官箴王厥”到“官吏自箴”,其发展进程漫长、曲折而反复。中国的官箴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商代的《小人之攸箴》是目前保存下来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官箴文献,其内容是反对盘庚再次迁都,箴谏对象是商王盘庚。^①《虞人之箴》则是周代传世官箴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篇,作者为周代史官辛甲,主要内容是规谏周王节制田猎,规谏对象是周武王。^②由此可知,早期的官箴呈现“官箴王厥”的特点,箴谏对象是君王。百官作箴以规谏王的过错,成为西周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目前所知,春秋时期的箴文仅有《毫箴》与《勤箴》两篇。《毫箴》系春秋早期卫武公为鼓励臣下直言进谏而作^③,《勤箴》系春秋中期楚庄王为告诫楚国国人而作。^④1973年,在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了战国末期在秦国出现的官箴文献《为吏之道》,从“正直”“慎谨”“毋私”“微密”“毋苛”“忠信”“清廉”“善行”“恭敬”等方面论述了官吏应遵守的行为规范。^⑤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官箴形态开始出现从箴君到箴臣的变化。

两汉时期,官箴发展出现了儒学化倾向。硕儒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后崔骃及子瑗、临邑侯刘驹馭又增补十六篇,胡广复继作四篇,文辞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⑥对不同官职提出不同的要求,官箴内容由宽泛到具体,职业特色越来越明显,呈现出专业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性的官箴有:潘勖《符节箴》、温峤《侍臣箴》、王济《国子箴》、潘尼《乘舆箴》^⑦,及梁武帝萧衍《凡百箴》^⑧、北朝王褒《皇太子箴》等。由此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箴君”的传统影响力还在,官箴形态呈现出箴君与箴臣同时存在的形态。

隋唐时期,官箴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首次出现了帝王专为臣僚制定的官箴书,即武则天所作的《臣轨》。《臣轨》从不同方面对为官者提出了行为标准与规范,是官箴文化发展历程中强化“箴官”色彩的一个里程碑。唐玄宗《令长新戒》则是唐代“君箴臣”的代表作,专门针对县官这一群体作官箴,要求他们革除旧弊,维新政事,教化风俗,体恤贫苦,劝农养富,勤劳躬亲,最终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良臣”。^⑨《令长新戒》还被刻为铭石,立于衙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时的官箴在总体上演变为帝王约束告诫百官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的官箴文化颇有君臣互箴的色彩。除前述君主作箴劝诫百官外,百官也作箴以谏君。隋代大臣戴逵作有《皇太子箴》^⑩,唐初中书省官员张蕴古上《大宝箴》以讽唐太宗,吏部郎中柳公绰上《太医箴》以讽唐宪宗,李德裕上《丹扈六箴》以讽唐敬宗,杜希全作《体要》以规谏唐德宗。^⑪隋唐时期在“箴官”主体下之所

①裴传永:《先秦时期官箴文献考论》,《东岳论丛》2010年第8期。

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38-840页。

③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4页。

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⑤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260-261页。

⑥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11页。

⑦刘勰著、黄叔琳注:《文心雕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⑧张溥编、吴汝纶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

⑨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一部·第一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521页。

⑩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5页。

⑪刘昉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杜希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21页。

以会出现君臣互箴的特色,一方面是唐代政治生态相对良好,另一方面是“官箴王阙”的遗绪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宋元明清时期,官箴文化呈现“官吏自箴”的特点。初步统计,宋代官箴书有十余种,^①如吕本中的《官箴》、许月卿的《百官箴》、李元弼的《作邑自箴》、陈襄的《州县提纲》、朱熹的《朱文公政训》、真德秀的《西山政训》、张铉的《仕学规范》等。^②这些官箴书的创作者均为官员士大夫,所规诫对象则是文武百官。一些地方官甚至主动将官箴刻为铭石立于衙署堂前,“官吏自箴”的特点已经形成。

明清时期是官箴书创作的集大成时期,形成了官箴文化的巔盛之态。^③官箴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多达数百种。明代官箴书以吕坤的《实政录》对后世影响最大,清代代表性的官箴书主要有:李容《司牧宝鉴》、黄六鸿《福惠全书》、陈弘谋《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徐栋《牧令书》、刚毅《居官镜》及田文镜、李卫奉雍正帝令所撰《钦颁州县事宜》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还涌现出专门以胥吏和幕僚为规诫对象的官箴书,如汪辉祖《学治臆说》《佐治药言》、万维翰《幕学举要》、李庚干《佐杂谱》、庄某《长随论》等^④,这使得官箴书的箴诫对象再次扩大,由单纯的“官员”群体扩展至“书吏”“幕僚”“杂役”“长随”等人员。

宋元明清时期,官箴形态定格成为“官吏自箴”,既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与传统中国的政治生态、思想形态以及社会变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官箴文化的发展走向。官箴文化的第一个发展走向,是由讽谏君主的箴文变成了百官恪守的戒条。这个变化是汉代官箴儒学化的直接后果。“独尊儒术”后,儒学与封建君主专制结合在一起,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官箴出现了逐渐由臣子谏讽君主演化为君主告诫臣子或儒臣告诫其他官员的情况。官箴文化的第二个发展走向是从单纯的道德说教到务实性的经验介绍,再到吸纳不同领域知识的融合体。汉唐时期的官箴书,主要是针对官员进行道德说教;到宋元时期,官箴书的内容以从政经验、政务指导为主,或人际关系,或刑狱诉讼,或钱粮征收,针对性极强,如张养浩的《庙堂忠告》囊括了为官从政的方方面面,被称为入仕指南。^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理学取代汉代经学的结果,与儒学发展进程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到了晚明及清代,官箴文本融合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或混编公牍文书,组成了新式文本,成为更加实用的行政教科书。官箴文化的第三个发展走向是,其针对范围由高层官员扩大为包括书吏、杂役在内的一切从政人员。唐宋以前的官箴,主要是针对高层官员。到明清时期,官箴针对的范围扩大为县级以上官吏,一些地方胥吏也成为官箴告诫的对象。明清时期儒学群体从单纯的社会精英下移到普通民众,儒学呈现出了平民化、大众化的趋势,这种儒学发展的走向直接推动了官箴针对范围的层级下移。

二、传统官箴的类型

中国历代官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今人对传统官箴的分类不尽相同,各有表述,这是由于各

①彭忠德:《古代官箴文献略说》,《文献》1995年第4期。

②《官箴书集成》收录:陈襄:《州县提纲》一卷,李元弼:《作邑自箴》十卷,吕本中:《官箴》一卷,胡太初:《昼帘绪论》一卷,许月卿:《百官箴》六卷,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页。

③时晓红、唐百成:《官箴书在晚明的发展流变》,《齐鲁学刊》2018年第6期。

④陈伟:《清代官箴文化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

⑤全晰纲:《张养浩〈三事忠告〉的现代价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自的分类标准与所显重点不同。如高成元将官箴分为记语录体、概论体及类书体^①,是强调体裁形式;如李玉阁将其分为皇帝御制、官员私撰对以往官箴的辑录、续编等,^②则是侧重强调编纂者身份;而周保明所主张的道德说教型、专业技术型、案例辑录型、从政经历型、档案实录型等^③,实际上强调官箴内容,其中同时掺杂了其他分类标准。再如法国学者魏丕信将官箴文献分为官箴(狭义)、指南与公牒三种类型^④,此种分类是出于综合考虑的结果,而非某一标准。但正因上述情况的存在,今人一般对传统官箴类型的表述往往穿插多重分类标准,而略显随意性与模糊性。实际上,有关传统官箴的分类问题,应根据官箴自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阶段进行较为系统与明晰的区分与表述。故本文将中国传统官箴文献主要分为以下六大类型:道德说教型、从政经验型(入仕指南型)、帝王御制型、言行辑录型、公牒选编型和综汇融合型。

(一)道德说教型

道德说教型官箴书是中国传统官箴的主体。隋唐以前的官箴以“箴文”为表现形式,箴文是一种以规劝告诫为主的文体;先秦时期的箴文,多以历史教训为鉴进行说教,内容重在阐述为政之道。如《虞箴》以后羿贪恋田猎、不恤百姓而导致灭亡为例,规谏周成王节制田猎、关爱百姓。汉代“独尊儒术”后,箴文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箴文的内容侧重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官德,强调官员自身的道德素养,说教的重心由为政之道嬗变为为官之德。隋唐以后的官箴受此影响,道德说教的色彩依旧浓厚。如唐代武则天的《臣轨》有《至忠》《守道》《公正》《廉洁》等篇章,明代徐榜的《宦游日记》有《秉公》《训廉》《训勤》等篇章,都是道德说教的经典之作。总的来说,道德说教型官箴主要是针对从政者的为政品行、职业素养和个人品德等方面进行说教,企冀官吏群体通过接受说教,塑造为“有德”之官。这种说教型官箴,对官员品格塑造和营建官德建设氛围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从政经验型(入仕指南型)

从政经验型官箴书常见于宋明时期,是指官吏士大夫依据个人在从政中形成的心得体会与经验方法所撰写的官箴书。其内容重在人际关系与政务操作,表达或教导相关的原则规范、注意事项及办事方法等,具有劝诫与教授双重目的,与“道德说教型”官箴书相比,更为凸显方法性、务实性、具体性及实践性。^⑤代表性官箴书有宋代陈襄《州县提纲》、元代张养浩《三事忠告》、明代吕坤《实政录》、余自强《治谱》等。此类官箴书的内容多细致、具体,有可操作性,尤其对缺乏办事经验的新任官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入仕指南与行政手册,因此,又习惯称之为“入仕指南型”。如余自强的《治谱》一书,涉及初选赴任、待人处世、钱粮税务、社会治安、司法狱政等从政施政的方方面面,是从政者官场应酬、施政执法的重要参考读物。^⑥经验总结和传承,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官箴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达到立足当下、审视过去、烛照未来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政经验型官箴含括了许多中国古代长期积淀的政治智慧。

(三)帝王御制型

①高成元:《官箴的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②李玉阁:《试论明代官箴勉廉》,《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③周保明:《明清官箴文献论略》,《新世纪图书馆》2011年第2期。

④[法]魏丕信著、李伯重译:《明清时期的官箴书与中国行政文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⑤唐百成:《晚明官箴研究——以〈官箴书集成〉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8年。

⑥余自强:《治谱》,明崇祯十二年呈祥馆重刊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

帝王御制型官箴书是由帝王撰写或主持编纂,相比于官员自撰的“从政经验型”“帝王御制型”往往有一定的法律效能,具有强制规范的属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劝诫。如武则天《臣轨》:“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准绳”^①,唐玄宗《令长新戒》是专门针对县级官员所作,被刻石立于衙署,时时警戒。明宣宗《御制官箴》:“凡中外诸司,各著一篇,使揭诸厅事,朝夕览观,庶几有儆。”^②再如由清雍正主持、田文镜等撰的《钦颁州县事宜》,内有“圣谕条列事宜”“圣谕条列州县事宜”等条目,^③以帝王圣谕的形式颁发全国,文武百官依照执行,这已经超出了单纯劝诫的范畴,具备了强制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官箴的制度化特征。对官吏群体而言,官箴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自律层面,而且具有了强制规范的性质,为制度监督奠定了基础。

(四)言行辑录型

辑录型官箴书多辑录先儒前贤的嘉言懿行,多从儒家经典和前人所论中摘录为政之道和为官之德。此类官箴书多见于明清时期,如明代彭韶辑编《政训》采掇《朱子语类》中论政之语。^④明代杨昱辑《牧鉴》,“是书以经史百家之言有关政治者,裒辑成帙……上述经传,中纪古人政迹,下摭儒先议论。”^⑤再如薛瑄的《从政录》多为从政名言和警世之辞;王天锡的《官箴集要》辑录了自古以来儒家典籍和其前官箴书中的名言名句。还有一些辑录型官箴附有注解和心得,如清代陈宏谋的《从政遗规》除采录先贤言论外,还有个人的按语。清代隋人鹏的《治镜录集解》则是对张鹏翮《治镜录》的集解之作。言行辑录型官箴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官箴的内容,特别是对先儒前贤嘉言懿行的辑录整理,整合了中国传统官箴的精华,对弘扬和光大优秀官箴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公牍选编型

公牍选编型官箴书,即官箴书直接收录官府档案作为内容,这些档案包括告示、榜文、移文、手训、报告、批词、判词、碑记、田记、条约等。此类官箴书出现于晚明时期,如明代刘时俊的《居官水镜》,其内容包括《批词类》《公移类》《告示类》《禁谕类》等公牍,多为作者在知县任上所撰写的文书选编。明代江东之的《抚黔纪略》,包括《右文田记》《开河檄》《募兵防守榜文》《黔中手训》《恤隐局谕》等多条公牍,多为作者巡抚贵州任上所撰。此类档案选编不仅树立了一种官方文书的书写典范,也可以让施政者从中体会与学习公牍撰写者(发布者)的治政思想与理念,为广大基层官吏群体提供了学习的样本,起到了垂范作用。

(六)综汇融合型

综汇融合型可分两类。第一类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官箴内容(大致可理解为“从政经验型”与“道德说教型”),融合专业知识,如法律条文、法医鉴定、公文套式、礼仪规范等知识,或混编公牍文件等所组成的新式文本。如明代苏茂相辑《大明律例临民宝镜》,及清代潘杓灿的《未信编》,黄六鸿的《福惠全书》。第二类是指丛书汇编型,如明末官员的重要读物《官常政要》共收录了29部文献,文献种类包括传统官箴类、文告套语类、法律解释及运用类、法医类、礼仪类等。此类官箴书主要出现在清代,逐步走向了行政百科全书模式,起到了官箴集大成的作用,优胜劣汰、综汇融合,是官箴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武则天:《臣轨》,佚存丛书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页。

②朱瞻基:《御制官箴·圣谕》,国朝典故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47页。

③田文镜:《州县事宜》,清道光八年刊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61页。

④纪昀、陆锡熊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34页。

⑤永瑛等撰:《四库家藏·子部典籍概览》,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99页。

三、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的当代价值

从整体上讲,中国传统官箴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下形成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虽不乏其糟粕,但从总结经验、借鉴传统的视角看,它有着一定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吏制是社会治理结构的主体机制,治国先治吏,为官先立德。古代官箴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且可资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其中蕴涵的治国理政智慧对当今官德建设和官员的官德修养具有借鉴价值。

(一)人格塑造与官德建设

为官要有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公正无私、为国为民的个人品格与为政操守。若能塑造良好品德,坚守个人操守,也即达到了“不想腐”的目的。道德说教正是中国传统官箴的主体,官箴中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有关官德培育的内容,正所谓“操守者,仕之主帅”^①,强调为官操守乃从政之本。战国末《为吏之道》中提出为吏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②武则天在《臣轨》中提倡公正、诚信等官德,“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③;“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④。宋人吕本中在《官箴》中将官德概括为“清”“慎”“勤”三字,即清廉、慎言行、勤政。《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居官七要”曰:“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⑤明末官箴书《初仕要览》言:“爱民者,政之先也。”^⑥清代陈宏谋《从政遗规》中极力提倡节俭,“俭,美德也。余谓仕路诸君子,崇尚尤急。”^⑦诸如此类,历朝历代官箴书不胜枚举。

当然,这种个人品格的塑造是以整个官员队伍的官德管理为基础的,没有良好的官德建设,也很难培育出高尚的个人品格。传统官箴中蕴含着丰富的且优秀的价值与品质因子,为今天建设良好的官德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思想源泉。这些价值理念、道德品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尤其应该得到传承与弘扬。

(二)警示为先与预防机制

在官吏队伍建设过程中,对违纪犯罪行为的惩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除上述对人格塑造进行正面说教外,传统官箴还会对官吏采取警示告诫与劝勉奖励双管齐下的方式,预防其贪腐堕落,其中又以警示告诫为主要表现形式。这既有“不敢腐”层面,也包括“不想腐”层面。如《臣轨》以强烈语气警示臣子处世要慎密:“夫不慎于始,则祸成于末,虽终身积悔,其可及哉!”^⑧

再有警示其廉洁与德行:“夫不义而处富财,必招却夺之患,无德而居高位,必践倾危之

①不著撰者:《初仕要览》,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9页。

②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260-261页。

③武则天:《臣轨·公正章》,佚存丛书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2页。

④武则天:《臣轨·诚信章》,佚存丛书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0页。

⑤高成元:《官箴的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⑥不著撰者:《初仕要览》,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30页。

⑦陈宏谋辑:《五种遗规·从政遗规》,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411页。

⑧武则天:《臣轨·廉洁章》,佚存丛书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3页。

灾。”^①明代徐榜《宦游日记》将宦者廉洁与女之贞洁同等看待:“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②吕坤《实政录》中针对有司乱抽税,对其严厉警告:“本院原有禁约,但有违犯,定行挈问追赃。毋悔!呜呼!”^③《初仕要览》更是列举了贪腐官吏的惨烈下场:“有遗臭乡里,唾骂及父母者,有貶辱于子孙,至不敢认己祖者。念及于此,何以贪为?”^④除采取警告方式让其有所忌惮外,官箴书也多以勉励鼓舞的方式以期官吏做好本职工作,预防贪腐。如《实政录·明职》屡屡强调尽职尽责可得奖励、升迁,“有一好官,自然荐拔,自得优升”,并列举实例,树立榜样,“近见一二佐贰,既能洁己,又肯惠民,本院深所爱重。各官勉乎哉!”^⑤清人刘衡在《庸吏庸言》中采用“许以授官”的方式劝勉书吏守法,“期满之日,例准考职授官,理宜守法”^⑥。还列举了明代徐况从吏员到名臣的事例以激励。《宦游日记》论述了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气,劝勉官员厉行节俭。传统官箴的这一特点启示我们,在预防贪腐的问题上,既要为广大干部时刻给予警示、告诫,陈明利害,又要给予正面鼓舞、疏导,尤其要优化考评及升迁机制,以助他们激发热情,树立信心,为其创造优良的工作环境。

(三)弊病揭露与制度监督

官员的个人操守与官德建设固然重要,但制度层面的监督体系也不能忽视,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整体上看,传统官箴重在强调官德自律,而对制度监督笔墨较少,这当然也是由“官箴”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但传统官箴对当时的“现实弊病”与吏治腐败有较多揭露与剖析,虽时过境迁,古今不同,但仍有较多类似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传统官箴犹如一面镜子折射昭示,自我警醒。如《初仕要览·爱民》言:“多爱民之言,心怀剥民之毒,笑刀腹剑”^⑦,这在当今也十分常见。《实政录·明职》揭露库官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纳户,轻放以苦支人,暗盗以亏公帑”^⑧。《治谱·到任门》指出了官场上的互相推诿现象:上司行文,户、礼二部便互相推诿。再有官员借办事之机索取钱财,等等。

《州县提纲》中揭露亲朋好友常借从政者之势谋取利益:“士大夫闲居时,亲戚追陪,情意稠密,至赴官后多私贩货物,假名匿税,远至官所以求售”^⑨。《福惠全书·凡例》概述了各个领域施政存在的弊病:“如钱粮征比,弊在朦混,即于朦混剔之”;“如编丈丁田,弊在隐漏,即于隐漏剔之”;“如人命弊在假捏,盗逃弊在诬扳,即于假捏、诬扳剔之”;“如保甲弊在骚扰,赈荒弊在虚冒,即于骚扰、虚冒剔之”^⑩。传统官箴对官场弊病的揭露与剖析,既有益于当代干部的自我警戒,也对我们从制度层面完善监督体系具有启迪意义。查漏补缺,具体针对,防范与规避各种陋规及腐

①武则天:《臣轨·廉洁章》,佚存丛书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5页。

②徐榜:《宦游日记·训廉》,泾川丛书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381页。

③吕坤:《实政录》(卷一),明末影抄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13页。

④不著撰者:《初仕要览》,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31页。

⑤吕坤:《实政录》(卷一),明末影抄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21页。

⑥刘衡:《庸吏庸言·劝谕书吏告示》,张希清、王秀梅主编:《中国历代从政名著全译·官典》(第四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⑦不著撰者:《初仕要览》,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30页。

⑧吕坤:《实政录》(卷一),明末影抄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13页。

⑨陈襄:《州县提纲》(卷一),四库全书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2页。

⑩黄六鸿:《福惠全书·凡例》,清康熙三十八年金陵濂溪书屋刊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16页。

败现象,以完善“不能腐”的层面。

(四)为政艺术与施政技术

官员在从政理事时,既要坚持官德原则,又要讲求为政艺术、办事方法。清人汪祖辉曾强调,刚则易折,柔则易暗,应刚柔相济。不可优柔寡断,亦不可刚愎自用。^①黄六鸿也言道:“一事有一事之法”,“善行其法,务在剔弊而兴利”^②。只有当刚则刚,当柔则柔,刚柔相济,掌握一定的办事方法,才有可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使政务管理更加合理有效。

传统官箴有许多人际交往的经验智慧。吕本中《官箴》言:“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③如事上司,明代官箴书《居官必要为政便览》认为,见上司不要有傲态,亦不可至亟奉承。余自强《治谱》中提到,见上司前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司问及,便随事问答。”^④如何与同僚相处,宋代陈襄《州县提纲》认为,同僚不和多因彼此积蓄矛盾,一旦爆发而伤和气,“不可不察始至,须明以此相告,语凡有嫌疑,宜悉面白。”^⑤清代陆陇其《莅政摘要》中视同僚“犹兄弟也”,唇齿相依。元代张养浩强调“以礼下人”。如遇豪强势族,“平日易气处之,不可受其笼络挟制,亦不可故意窘辱”^⑥。此外,传统官箴还提及避嫌疑、居宠思危、谢绝恭维奉承等,这些处世经验在今日看来都颇具价值与借鉴性。

在事务处理上,官箴书也有丰富的智慧资源可供借鉴。如吕本中《官箴》中说:“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⑦张养浩《庙堂忠告》言:“事固有声,虚以钓实……疑似之间,不可不察……权以济才,随宜应变”^⑧。《初仕要览》提倡勤理政事,但又强调事分轻重缓急,“精爽胜政,兼缓急轻重而理之,稍不能兼,择重急者先。”^⑨《治谱》建议新任官员选择易小之事先处理,以便树立威信,“盖易而小者,顷刻可发落十数起,人自见其神速。”^⑩

官箴书还有许多针对具体政务操作实施层面上的经验方法。如见形察影法、秘密调查法、突击调查等破案方法;隔离审查、往复参错、揣摩心理、审大招妙法等审案技巧;离间盗伙、截杀法等抓捕方式,以及钱粮税收方面的自报法、自审法、投柜法、朝四暮三法等施政技术。这些方法技术不一定都适用于当今的政务处理,但其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仍可资借鉴。

(五)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

传统官箴的时代价值,不仅体现在官德自律、制度监督等反腐倡廉层面,也不仅是为政艺术、

①常万里主编:《官箴智慧》,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②黄六鸿:《福惠全书·凡例》,清康熙三十八年金陵濂溪书屋刊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16页。

③吕本中:《官箴》,百川学海景刊宋咸淳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99页。

④余自强:《治谱》(卷九),明崇祯十二年呈祥馆重刊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71页。

⑤陈襄:《州县提纲》(卷一),四库全书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1页。

⑥不著撰者:《新官轨范·词讼第九》,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750页。

⑦吕本中:《官箴》,百川学海景刊宋咸淳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98页。

⑧张养浩:《庙堂忠告·应变第八》,民国上海涵芬楼景刊元刊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39页。

⑨不著撰者:《初仕要览·勤政》,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0-29页。

⑩余自强:《治谱》(卷四),明崇祯十二年呈祥馆重刊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11-112页。

实施技术等经验能力的层面。从宏观层面来说,传统官箴所蕴藏的思想、经验对当代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都有一定的启发思考与价值借鉴。如吕坤《实政录》与余自强《治谱》都有极其强烈的“民本”思想,整本官箴书处处可见“爱民”“重民”,众多规范、告诫、建议都围绕“爱民”的基本目的而展开,正所谓“宇内之重,无重于民生矣”^①。张养浩《牧民忠告》也言:“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②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当代仍然是治国理政可资利用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具体社会保障方面,陈襄《州县提纲》中即有劝告父母官做好“赡养乞丐”“收抚遗弃”等工作,《居官必要为政便览》主张将乞丐一律收入养济院:“道路乞丐之人,不论老幼笃废,若无依即与付收养济院”^③。《实政录》主张有义士善人收养鳏寡孤独者,授予其乡约记善、牌匾冠带、乡饮酒礼等荣誉。诸如此类社会政策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现当代,但仍不失为一种历史参照。

官箴书还十分重视社会医疗健康问题,如《实政录》主张,主管部门官员应对行医者进行严格要求与资格考核,充分保障医疗经费,并密切掌握本地疫情。在教育问题上,《实政录》将教育成败上升到关系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世道之衰”^④。在社会治安问题上,《实政录》深刻地分析了盗贼兴起的根源,将其概括为饥寒所迫、游惰闲散等六大因素,提出化盗、恤盗、防盗与捕盗四层机制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颇具合理性与可实施性。《治谱》则分析了五类人群易破坏社会秩序,应多加防范。《实政录》还十分注重生存就业问题,主张官府解决有房无地、房地俱无,或无业而受饥寒者的营生。责令里长等对上述人群“各开处法”,“某人其才堪以何用”,无处法者,进入贫民册。^⑤官箴书还含有丰富的司法观念及精神,其中不少思想都对当代司法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如依法审判,追求司法效率,事、理、律相结合,慎用刑法,禁牵无干之人,重视口供,重视司法档案等。

历史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积淀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探索和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这些正是我们国家文化自信的来源与基础,所以,客观地历史地多角度地看待包括官箴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现代化的转化利用,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文化相融合,与现代社会现实相协调,是我们当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①吕坤:《实政录》(卷二),明末影抄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40页。

②张养浩:《牧民忠告·民病如己病》,民国上海涵芬楼景刊元刊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10页。

③不著撰者:《居官必要为政便览》,《礼类》,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二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3页。

④吕坤:《实政录》(卷三),明末影抄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73页。

⑤吕坤:《实政录》(卷四),明末影抄本,收入《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514页。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fficial admonitions and its modern value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basic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fficial admonitions covers three stages: evolution from the admonitions of the monarch to the commandments of all official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ere moral preaching to the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f governing experience, and extension of the aimed category from the state senior officials to the local petty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clerks and the factotums. In content, the traditional official admoni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types: moral preaching, governing experience, emperors' writings, compilation of words and deeds, selec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n the whol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fficial admonitions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reaucracy of Chinese feudal autocracy at a certain stage, and in it there exist lots of dreg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radition, it embodies a certain reasonable core, and has rich and usabl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ts wisdom of governing is still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rality of contemporary officials.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fficial admonitions; development trend; reasonable core; modern value

责任编辑:张登德

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的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社群自尊的调节作用*^①

朱 瑾

(山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摘要: 在线社群是企业获取创新动力的重要外部来源,故此社群运营主体激发社群成员创新动力的机理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运用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研究在线社群的支持性氛围和控制性氛围对社群成员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通过实证检验相关假设,得出结论:支持性和控制性社群氛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完全中介作用对顾客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成员的社群自尊能够调节内部人身份感知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该结论为在线社群运营者区别性地运用两种社群氛围策略激发成员的内部人身份感知,进而促进顾客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策略建议,并充分说明塑造成员社群自尊对于顾客创新的重要调节作用。

关键词: 社群氛围;支持性氛围;控制性氛围;顾客创新;内部人身份感知;社群自尊

中图分类号: 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105-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11

日益激烈的企业竞争和不确定性加大的经营环境要求企业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以构建和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了解决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难题,大量企业向外部寻求创新动力,其中顾客聚集的在线社群就成为企业创新动力的重要来源。在线社群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搭建了顾客间沟通交流的社会网络^②,成为当前企业和顾客沟通最便捷最有效的平台。在线社群能够帮助社群成员交流互动、搜寻信息^③,满足其多层次的需要,是企业和顾客价值共创的重要源泉^④。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社群逐渐成为顾客创新的重要平台,例如人气火爆的小米社区,通过“酷玩帮”“荣耀顾问团”等板块及相关活动激发顾客参与小米产品的测试、研发、体验和建。社群活跃的互动气氛为社群中的顾客提供了发散思维、参与讨论的条件,有利于社群管理者了解并收集消费信息、整合顾客的反馈建议。这就启示我们,社群氛围有可能是在线社群成员创新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在线社群成员创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者们通过案例或实证研究方法证实了在线社群成员对创新的贡献,其中一部分学者聚焦在线社群氛围对创新的影响。Scott等^⑤

* 收稿日期:2019-09-02

作者简介:朱瑾(1978—),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生态隐喻视角下在线社群迭代创新机制研究”(18YJC630273)的阶段性成果。

②Albert Muniz et al.,“Brand Community”,*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No.3,2001,pp.412-432.

③王新新、薛海波:《消费者参与品牌社群的内在动机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10期。

④Nick Hajli et al.,“Branding Co-creation with Members of Online Brand Communitie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No.70, 2017, pp.136-144.

⑤Susanne Scott et al.,“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No.3.1994,pp.580-607.

首次提出,支持性组织氛围感知有利于促进组织成员的创新行为;朱瑾等^①指出支持性社群氛围能够促进社群成员自我决定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创新活动。上述学者运用社会交换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刺激-机体-反应理论(下简称“S-O-R”理论),揭示了社群支持性氛围下成员的整合动机、社群信任、互惠规范等对成员创新的作用机理。但在现实中我们发现,社群既存在大量支持性因素,又制定了规则和准入等限制性因素,将支持性氛围和限制性氛围同时作为社群氛围进行成员创新的研究应该更加符合现实的情况。此外,在线社群氛围对社群成员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很多成员只是“潜水者”,但还有成员有积极的行为意愿,这说明社群氛围对成员的影响机理中还存在重要的调节因素,探究关键的调节变量成为重要议题。成员创新动机的差异除了个性因素外,应当与社群运营政策有密切关系,在线社群作为没有正式权力、结构松散的特殊组织,对成员创新不具有强制性作用,因此如何激发成员的内在心理动机成为重中之重。

“S-O-R”模型着重揭示在外部环境(如社群氛围)的刺激下,作为有机体的个体如何感知并进一步行动。现有文献指出,组织内部人身份感知作为一种个体感知要素,是创新行为的重要前因。^②那么社群成员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是否也会对社群成员的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呢?此外,基于组织的自尊是近年来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不仅能够带来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心理健康、组织公民行为和创新行为,而且还是组织可控可干预的重要变量,有重要的管理价值。Chen等^③将组织自尊作为调节变量,验证了高组织自尊的员工有着更积极的自我认知,进而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因此,本文尝试将成员的社群自尊作为调节变量,探索社群自尊对顾客创新的调节作用。

一、研究综述

(一) 社群氛围的研究进展

组织氛围最早源于 Lewin^④提出的“场”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所处的环境会对个体行为动机以及情感认知产生影响。德国社会学家 Tönnies^⑤认为社群成员具有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共同的精神意识构成了社群氛围。营销大师 Kotler^⑥也强调了“氛围”的重要性,他指出氛围对顾客行为的驱动力大于来自商品本身的吸引力。

国内外学者从心理氛围、组织氛围等角度对社群氛围进行了分类。在基于心理氛围的研究中,卜正学^⑦基于环境心理学的“S-O-R”理论实证分析得出,社群氛围是促进社群公民行为的重要调节变量。在基于组织氛围的研究中,Amabile和王端旭等将组织氛围分为支持性氛围和控制性氛围,学者们进而全面探究这两类组织氛围对组织成员、相关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机理。

①朱瑾、林敬梓、王兴元:《在线社群氛围对社群成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自我决定视角》,《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年第8期。

②王永跃、王慧娟、王晓辰:《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和遵从权威的作用》,《心理科学》2015年第4期。

③Zhen Xiong Chen et al., “Delegation and Employee Work Outcom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ediating Processe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No.1, 2007, pp.226-238.

④George H Litwin et al. “Moti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Bibliography*, No.4, 1968, pp. 209-214.

⑤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p.19, 189.

⑥Phillip Kotler, “Atmospherics as a Marketing Tool”, *Journal of Retailing*, No.4, 1973, pp.48-64.

⑦卜正学、李星星:《基于心理授权的在线品牌社群公民行为塑造模型研究》,《企业经济》2017年第7期。

Amabile 等^①提出支持性组织氛围促使员工完成工作;Broeck 等^②发现支持性氛围可以提高员工就业能力。具体到社群氛围角度,张宁等^③提出控制性社群氛围能够影响社群成员的人际信任和互惠规范,从而促进社群认同和社群承诺;陈洋等^④发现控制性社群氛围能够促进社群成员对社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王端旭等提出支持性氛围能够正向影响员工的内在动机,从而促进员工的组织创新行为。上述关于社群氛围对顾客行为影响机理的研究多聚焦于氛围的单一类型,但也有学者将两种社群氛围同时研究。赵建彬等^⑤将支持性氛围作为前因变量,将控制性氛围作为调节变量,证实了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既然诸多学者将此两类氛围分别作为前因变量,本文试将此两类氛围同时作为前因变量进行验证,以求与学者们商榷。

(二)内部人身份感知的研究进展

学者们尝试从“内部人”和“外部人”来形容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学者 Stamper 等^⑥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诱因—贡献理论以及领导—下属理论提出了内部人身份感知的概念,认为内部人身份感知就是员工在某一特定组织内能够感知到其内部成员身份的程度。研究表明,内部人身份感知可以通过影响员工的积极态度而促进积极行为。^⑦ 特别是尹俊等^⑧指出,在中国这一有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情境下,提高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从而激发其创新等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王雁飞等^⑨提出内部人身份感知会使组织内成员超越对岗位的认知,从而激发其更多的创新行为。王永跃等^⑩提出内部人身份感知与组织内成员的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另外,Blau^⑪提出,具有高水平身份感知的员工会愿意付出超出职责范围的努力,自觉地为组织整体的有效运作作出贡献;Chen 等^⑫指出,组织内成员的内部身份感知程度越高,其社群认同感就越高,从而激发更高的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创新行为。

社群作为一类特殊的组织,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而言,没有正式的权力影响,而更依靠

①Teresa Amabile et al., “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No.5, 1996, pp. 1154-1184.

②Van Den Broeck et al.,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s Value Support and Perceived Employability: Insights from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o.13, 2014, pp.1904-1918.

③张宁、周志民、苏晨汀、周南:《在线品牌社群的控制性氛围、社会资本与品牌社群承诺研究》,中国市场营销国际学术年会,2014年。

④陈洋、何有世、金帅:《社群氛围能促进成员的冲动性购买吗?——不同氛围成分的作用与影响机制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8年第4期。

⑤赵建彬、景奉杰:《在线品牌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管理科学》2016年第4期。

⑥Christina L. Stamper et al., “Insider or Outsider? How Employee Perceptions of Insider Status Affect their Work Behavi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No.8, 2002, pp.875-894.

⑦Marjorie Armstrong-Stassen et al.,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Membership and the Retention of Older Worke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No.2, 2011, pp.319-344.

⑧尹俊、王辉、黄鸣鹏:《授权赋能领导行为对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影响:基于组织的自尊的调节作用》,《心理学报》2012年第10期。

⑨王雁飞、蔡如茵、林星驰:《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0期。

⑩王永跃、王慧娟、王晓辰:《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和遵从权威的作用》,《心理科学》2015年第4期。

⑪Peter M. 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4, p.48-65.

⑫Zhen Xiong Chen et al., “Delegation and Employee Work Outcom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ediating Processe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No.1, 2007, pp.226-238.

成员间共同且独有的氛围感知来促进各类社群成员的行动。赵建彬^①提出参与社群的人分为积极者和“潜水者”,其中“潜水者”的内部人身份感知相对较弱。因此,社群内部人感知对社群来说,比正式组织更为重要,这种内部人身份感知会激发社群内成员参与活动的热情,产生有利于社群发展的积极行为,例如创新行为。

(三)组织自尊的研究进展

Pierce等^②学者在组织情境下,在自尊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组织的自尊这一概念。组织自尊是组织成员对组织情境下的角色对其个人需求的满足程度,它反映了组织员工在组织中的自我价值判断。Hui等^③将组织自尊定义为一种来自组织特定情境和过去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一种态度和知觉,陶建宏等^④认为,组织自尊是组织员工对自己能够胜任组织工作、满足组织需要的一种自我感知。本研究基于社群的自尊是社群成员对自我能否胜任或满足社群需要的一种自我感知,探究社群成员自尊是对中国传统情境下成员自尊心和“爱面子”的一种深度的解读。

目前学者们已经通过研究证实了组织自尊对组织成员的重要作用。严丹等^⑤认为当个体感知到组织自尊时,就会因此而获得成就感,进而促进其作出有利于组织的行为。部分学者将组织自尊与创新相联系,Rank等^⑥在研究中发现,组织自尊能够调节领导和下属员工的关系,下属员工在感知到组织自尊之后会产生更多创新行为。

本研究发现社群自尊与组织自尊一样,是社群赋予个体的自我感知。当下,社群开始从“自组织”群体逐渐发展成赋予权力的“他组织”群体,例如社群内设置群主、管理员,设立奖励机制、监督机制,设置社群准入门槛等,这种权力架构能够更好地带给成员来自社群的自尊。目前关于社群自尊的研究较少,而这种社群自尊对社群内成员的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需要得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四)顾客创新行为的研究进展

Von Hippel^⑦将顾客创新界定为顾客对其体验的产品和服务提出新的设想和改进意见。Brodie^⑧则将顾客创新概念进行了扩展,将其重新定义为顾客驱动创新,指企业与顾客合作进行新产品开发,通过整合顾客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促进企业创新。目前,在线社群的商业功能日渐凸显,将传统线下的客户关系管理、产品营销等内容转移到了线上^⑨,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拉近与顾客的距离,利用社交媒体这一平台让顾客自由表达和分享想法,或通过互联网与企业进行协同营销,使顾客变成“产销者”。

近年来,学者研究证实,顾客参与创新为企业的研发注入新活力,同时也为企业产品的设计

①赵建彬:《在线品牌社群互动信息对潜水顾客购买意愿的影响》,《中国流通经济》2018年第6期。

②Jon L. Pierce et al., "Self-Esteem within the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 Review of the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Litera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No.5, 2004, pp.591-622.

③Chun Hui et al., "Moderat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Uncertainty and Employee Respon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No.2, 2000, pp.215-232.

④陶建宏、师萍、段伟宇:《自我领导与组织自尊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电子通讯、制造企业的数据库》,《研究与发展管理》2014年第3期。

⑤严丹、黄培伦:《辱虐管理对员工建言行为影响:组织自尊和个性控制点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12期。

⑥Johannes Rank et al., "Three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Initiative", *Applied Psychology*, No.4, 2004, pp.518-528.

⑦Von Hippel E. et al., "Shifting Innovation to Users via Toolkits", *Management Science*, No.7, 2002, pp.821-833.

⑧Kleinaltenkamp M. Brodie et al., "Resource Integration", *Marketing Theory*, No.2, 2012, pp.201-205.

⑨孟韬:《品牌社区中管理员支持感、社区支持感与顾客创新行为》,《经济管理》2017年第12期。

和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这种开放式创新的提出也为企业创新找到了新的动力源,而顾客就成为来自企业外部的重要创新来源。^① 现有研究证实了在社群中顾客参与能够提高企业新产品的接受度。^② 顾客在社群中可以参与企业的新产品研发,^③以此提高顾客对产品的认同感,^④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另外,Schreier 等^⑤发现,顾客参与创新能够提升未参与创新过程的消费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感知,因此建立社群促进顾客参与创新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目前,基于社群氛围的顾客创新研究较少,尤其是成员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作用尚未在社群研究中得到验证,这正是本研究力求填补的空白。

二、研究假设及概念模型

(一)支持性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

支持性社群氛围可以理解为社群鼓励成员自由分享信息、包容成员创意思考、支持新观点、群内成员地位平等、享有自主权等。这种氛围能够为成员的发展提供支持性资源和帮助,因而能够满足成员们的创意需要,激发成员们的创新动机。沈伊默等^⑥提出,组织的支持性氛围会促进个体的组织认同感,从而激发其组织公民行为。顾远东等^⑦认为,支持性组织氛围能够使成员得到来自组织的支持和关怀,从而使其更有动力去挑战创新性的工作。Rogiest 等^⑧认为,组织的支持氛围能够提高社群成员的参与和尝试意愿,从而产生更多创新行为。以上学者均提出支持性组织氛围对组织内成员的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以此类比社群这一特殊的组织,可以得出在社群情境下,社群支持性氛围能够对社群成员的顾客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支持性社群氛围显著正向影响社群内顾客创新行为。

内部人身份感知可以理解为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所感受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和支持感,认为自己是组织的内部成员,从而产生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Eisenberger 等^⑨发现,组织内部成员在感受到组织支持感后,会激发其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从而增强其努力、承诺和创新意愿。Sukoco 等^⑩研究发现,社群支持性氛围能够强化社群成员的组织归属感,提升社群内部成员的自豪感,使其产生积极行为。现有研究表明,拥有高水平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员工具有更强的组

①王晓川、陈荣秋、江毅:《网络品牌社群中的创新活动及其前因与后效研究》,《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

②卢俊义、王永贵:《顾客参与服务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顾客知识转移视角的理论综述与模型构建》,《管理学报》2011年第10期。

③Thompson Scott A. et al., "Brand Communities and New Product Adoption: the Influence and Limits of Oppositional Loyalty", *Journal of Marketing*, No.6, 2008, pp. 65-80.

④牟宇鹏、吉峰、汪涛:《顾客参与创新:第三方消费者对产品创新性的感知》,《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年第8期。

⑤Martin Schreier et al.,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User Design: Exploring Consumers' Innovation Perceptions of Firms Selling Products Designed by Users", *Journal of Marketing*, No.5, 2012, pp.18-32.

⑥沈伊默、袁登华、张华:《两种社会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认同和自尊需要的不同作用》,《心理学报》2009年第12期。

⑦顾远东、周文莉、彭纪生:《组织支持感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管理科学》2014年第1期。

⑧Sofie Rogiest et al., "Climate,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mpacting Commitment to Chang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No.6, 2015, pp.1094-1106.

⑨Robert Eisenberger et al.,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mployee Diligence, Commitment,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No.1, 1990, pp.51-58.

⑩Badri Munir Sukoco et al.,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Motivation of Customers' Participation in Brand Community",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No.5, 2010, pp.614-622.

织认同,从而更愿意参与到组织中,产生更多更有效的组织行为,也更愿意留在组织中。

社群是特殊的组织,社群内部成员在社群支持性氛围下会产生内部人身份感知,例如社群成员在社群中的发言和分享得到社群其他成员的支持和肯定,会增强其荣誉感和支持感,从而提高其内部人身份感知。在此基础上,社群成员将会更愿意参与到社群活动中来,产生更多、更有利于社群发展的组织行为。由此我们认为在支持性社群氛围促进顾客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内部人身份感知起中介作用,于是提出假设:

H1a:内部人身份感知在支持性社群氛围与社群内顾客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二) 控制性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

控制性社群氛围可以理解为对社群的管理和规范,为社群成员创造一个良好的交流环境,净化社群信息和内容,从而激发社群成员在社群内参与活动等行为的动机,使社群能够正常运行。赵晓煜等^①认为,对社群的管理和控制可以引导社群成员规范行为,为成员创新行为提供条件,从而促进其产生创新行为。赵建彬等^②提出,管理和控制社群环境可以提高社群成员积极性,从而促进社群成员参与创新。以上研究表明,控制性社群氛围对激发顾客创新行为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有效管理社群成员,净化社群环境,激发社群成员在良好的社群环境下参与活动意愿,产生创新行为。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2:控制性社群氛围显著正向影响社群内顾客创新行为。

Baker^③提出,对组织的管理和控制能够促进成员形成共识,有助于强化成员对组织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从而作出对组织有利的行为;Van Dyck等^④提出,通过控制社群氛围,可以建立起顾客和社群之间的心理联系,提高顾客信息交流的意愿,从而表现出积极的社群行为,例如创新行为;张宁等^⑤基于协和控制管理战略提出,控制性社群氛围能够使社群内部建立的制度规范达成共识,深化成员对社群的认同感,从而提高其参与社群活动的意愿。

综上所述,控制性社群氛围能够增强社群内部成员的内部人身份感知,从而产生更多创新行为,例如社群通过提高准入门槛,使得加入社群的成员产生强烈的自豪感、优越感和归属感,也就是内部人身份感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更加有意愿参与到社群活动中,产生创新行为,促进组织发展。因此在控制性社群氛围下,内部人身份感知能够增强社群内部成员产生顾客创新行为。由此可以得出,内部人身份感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2a:内部人身份感知在控制性社群氛围与社群内顾客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 基于社群自尊的调节作用

基于组织的自尊与内部人身份感知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基于组织的自尊更强调个体对自己能否胜任的判断,而内部人感知描述的则是员工对其组织的归属感。目前关于社群自尊的研究较少,主要以企业组织为研究对象,探究组织自尊在内部人身份感知对行为的影响方面起到的作

①赵晓煜、孙福权:《网络创新社区中顾客参与与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技术经济》2013年第11期。

②赵建彬:《在线品牌社群互动信息对潜水顾客购买意愿的影响》,《中国流通经济》2018年第6期。

③Jame R. Barker, "Tightening the Iron Cage: Concertive Control in Self-managing Tea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No.3, 1993, pp.408-437.

④Cathy van Dyck et al., "Organizational Error Management Culture and its Impact on Performance: A Two-study Repli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No.6, 2005, pp.1228-1240.

⑤张宁、周志民、苏晨汀、周南:《在线品牌社群的控制氛围、社会资本与品牌社群承诺研究》,中国市场营销国际学术年会,2014年。

用。其中 Pierce 等^①在深入研究后提出,当成员具有内部人身份感知之后,其行为还会受到组织自尊的影响。尹俊等^②基于此研究提出,组织自尊高的成员会更认为自己能够胜任组织内的工作,从而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行为;组织自尊低的成员则会质疑自己的能力,担心自己行为对组织的不利影响,从而降低行为动机,由此得出,组织自尊调节了内部人身份感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将这些研究延伸到社群里具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成员中,具有高社群自尊的成员会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够促进社群的良好发展,从而激发其参与动机,提高其创新意愿。因此社群自尊能够调节内部人身份感知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3:社群自尊在内部人身份感知与顾客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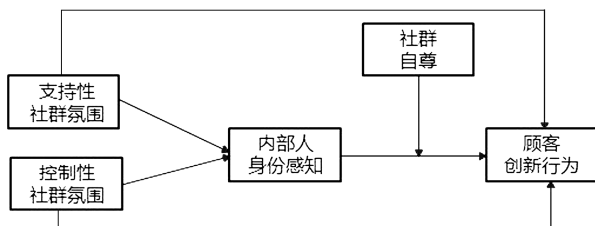


图1 假设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 调研背景与数据采集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可以利用各种终端针对某件产品参与讨论和分享感受,这种社群活动为企业的产品创新提供了参考意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社群中顾客的产品体验和 product 建议,并开始将这些想法纳入产品设计和研发中,例如小米的“小米社区”、华为的“花粉俱乐部”,等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线社群中的顾客逐渐由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供应链参与者,企业也能够利用社群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从而节约设计产品的成本,进而与顾客共创品牌价值,创造更多的企业效益。鉴于此,我们以参与在线社群的顾客作为调研对象,探究社群氛围对社群成员参与创新活动的相关机理,从而为企业如何运营社群提供参考方向。

课题组采用“问卷星”进行线上问卷设计和发放,通过滚雪球方式在在线社群、微信群、QQ群等线上社群进行发放,并在问卷开始部分就在线社群等概念进行了简单介绍和举例,以此使被测试者能够深入理解并以正确的角色定位来回答相关问题。经过一轮预调研,正式调研时间为2018年10月12日至10月16日,收集此阶段问卷共454份。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将支持性社群氛围和控制性社群氛围作为起始变量,以内部人身份感知作为中介变量,顾客创新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加入社群自尊调节变量,以此来探究支持性社群氛围和控制性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本研究测量变量采用的是已有研究使用并且具有高信度和参考价值的成熟量表,在此基础上根据当下国情及现状进行一定的调整和设计,最终组合形成

^①Jon L. Pierce et al., “Moderation by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f Role Condition-employee Response Relationshi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No.2, 1993, pp.271-288.

^②尹俊、王辉、黄鸣鹏:《授权赋能领导行为对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影响:组织的自尊的调节作用》,《心理学报》2012年第10期。

本研究的量表。所有的量表采用 liker 七级量表进行设计。其中参考 Litwin^① 的量表测量社群支持性氛围,共设“成员愿意帮助其他成员解决问题”“如果我遇到挫折,社群里的其他成员会鼓励我”等 4 个题项。参考 Glisson^②、赵建彬^③ 的量表测量社群控制性氛围,共设“如果有成员发布广告信息,社群管理者会予以警告、删帖或剔除出群等处理”“如果成员有不文明言行(如辱骂其他会员),社群管理者会予以警告或禁言等处理”等 3 个题项;参考杨宁^④ 的量表测量内部人身份感知,共设“我很荣幸能参加该社群活动”“我要尽力维护我和该社群的关系”等 3 个题项;参考朱瑾^⑤ 的量表测量顾客创新行为,共设“我积极地通过在线社群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积极地参加社群组织的创新性活动”等 3 个题项;参考 Sukoco^⑥、赵建彬^⑦ 的量表测量社群自尊,共设“参与社群活动可以证明我自己”“参与社群活动可以让我很愉悦”等 5 个题项。除设计测量变量题项之外,为使测试者的回答更准确,在问卷简介中对在线社群等关键名词进行解释说明,并在问卷中设置题项,以便进行人口特征变量设计,了解测试者的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与现实成员的人口统计变量的吻合程度。

四、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 信度分析

本文通过 AMOS20.0 测算 Cronbach's α 系数和组合信度(CR)作为信度检验的标准,来帮助考察结构效度的准确性。表 1 为本文数据的 Cronbach's α 系数和组合信度(CR),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在 0.8 以上,组合信度也均在 0.8 以上,因此根据经验判断方法,可以认为本文的问卷数据可靠,通过效度检验。

表 1 信度检验

变量名称	Cronbach's α 系数	组合信度(CR)
支持性氛围	0.861	0.889
控制性氛围	0.901	0.935
内部人身份感知	0.889	0.899
顾客创新行为	0.856	0.895
社群自尊	0.909	0.915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AMOS20.0 对问卷中所涉及的 5 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创建共变关系图和进行拟合之后发现,CMIN/DF、GFI、CFI、NFI、IFI、RMSEA 拟合结果都满足各自指标标准,呈现比较理想的状态(见表 2)。

①George H. Litwin et al., *Moti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14-215.

②Charles Glisson,“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limate in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ness”,*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Leadership & Governance*, No.4,2015,pp.245-250.

③赵建彬、景奉杰:《在线品牌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管理科学》2016年第4期。

④杨宁:《虚拟品牌社群中存在消费者公民行为吗?——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视角》,《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⑤朱瑾、林敬梓、王兴元:《在线社群氛围对社群成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自我决定视角》,《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年第8期。

⑥Badri M. Sukoco et al.,“The Personal and Social Motivation of Customers' Participation in Brand Community”,*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No.5,2010,pp. 614-622.

⑦赵建彬、景奉杰:《在线品牌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管理科学》2016年第4期。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结果

拟合指数	CMIN/DF	GFI	CFI	RFI	IFI	RMSEA
标准	1-3	>0.9	>0.9	>0.9	>0.9	<0.08
结果	2.351	0.902	0.931	0.914	0.935	0.059

表 3 给出的是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相关系数情况。其中对角线上的数字是各潜变量的 AVE 平方根, AVE 值以 0.500 为临界值, 其中高于 0.700 为理想结果。根据表 3 结果显示, 各潜变量的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涉及对应潜变量的相关系数, 因此, 可以证明各维度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分效度。另外, 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 1.000, 说明每一个潜变量的观测变量间内部一致性程度高。

表 3 判别效度、潜变量相关系数

变量名称	1	2	3	4	5
1 社群自尊	1.671				
2 控制性氛围	0.695	2.239			
3 支持性氛围	0.908	0.893	1.176		
4 内部人身份感知	0.749	0.899	0.970	1.631	
5 顾客创新行为	0.791	0.715	0.796	1.162	1.290

注: 对角线的数字为各潜变量的 AVE 平方根

(三) 假设检验

在模型拟合效果良好的情况下, 利用 AMOS20.0 软件对概念模型的路径系数进行检验, 潜变量之间结构关系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结果见表 4。根据表 4 显示, 路径 Z1、Z2 的 P 值均小于 0.05, 得出支持性氛围对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影响和控制性氛围对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影响均显著; 路径 Z3、Z4 的 P 值均大于 0.05, 说明支持性氛围和控制性氛围不会直接影响顾客创新行为; 路径 Z5 的 P 值小于 0.001, 说明内部人身份感知对顾客创新行为的影响十分显著。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知, 内部人身份感知起完全中介作用, 假设 H1、H2 不成立, 假设 H1a、H2a 成立。路径 Z6 的 P 值大于 0.05, 说明社群自尊对顾客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效果不显著, 但根据调节效应检验, P 值小于 0.05, 因此, 社群自尊在内部人身份感知与顾客创新行为这一关系中影响显著, 说明假设 H3 成立。

表 4 路径系数及显著性

研究假设	标准化系数	S.E.	T 值	P 值	结果
主效应					
Z1 内部人身份感知←支持性氛围	0.745	0.067	11.128	***	接受
Z2 内部人身份感知←控制性氛围	0.104	0.043	2.446	0.014	接受
Z3 顾客创新行为←支持性氛围	0.032	0.075	-0.449	0.668	拒绝
Z4 顾客创新行为←控制性氛围	0.025	0.036	-0.716	0.474	拒绝
Z5 顾客创新行为←内部人身份感知	0.607	0.055	11.054	***	接受
Z6 顾客创新行为←社群自尊	0.064	0.058	1.099	0.272	拒绝
调节效应					
T1 顾客创新行为←内部人身份感知×社群自尊	0.001	0.000	2.460	0.014	接受

注: P 值小于 0.05 即为显著, *** 表示 P 值小于 0.001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创新则成为企业发展必须面对和重视的问题。随着社群经济的发展,社群成员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本文以聚集了顾客的在线社群为研究对象,探究社群氛围对顾客创新的影响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支持性氛围能够对顾客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经由内部人身份感知对顾客创新行为产生的。社群支持性氛围不能直接带来创新行为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线社群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对成员行为缺乏强制性作用,而创新行为作为一种高难度行为,具有较多的约束条件,仅仅通过支持性氛围不能够直接激发成员的创新动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成员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才能够更好地刺激顾客创新。在社群的支持性氛围下,只有那些强烈感受到自己属于这个社群的成员,才会更愿意在社群中发言和交换意见,产生更多创新行为。

2.控制性氛围能够对顾客的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也不是直接的,只有通过控制性的氛围加强了成员的内部人身份感知,社群成员才愿意付出顾客创新行为。之所以控制性氛围不直接影响顾客创新,也是因为控制性氛围不是针对创新行为作出的,而是为了净化环境、划分边界作出的,因此社群控制性氛围对于成员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显著。在社群的控制性氛围下,社群内部环境能够得到筛选和净化,为顾客创造良好的社群氛围,从而使其感受到本社群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更愿意产生创新行为。

3.支持性氛围比控制性氛围能够更好地促进内部人身份感知。虽然两个完全中介效应都得到了验证,但是相比较控制性氛围,支持性氛围更好地支持了内部人身份感知。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线社群是一种自由参与的松散组织,自由意愿非常重要,过度的控制性氛围会抑制成员参与,更不能带来社群成员创新。而相比来说,社群需要更多的鼓励性支持政策,这样成员才会更好地参与社群活动,进而促进创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在松散环境下的动机是为了寻求自尊和自我价值,支持性氛围鼓励了成员的自我整合动机,加强了其自我决定的感知。因此,社群支持性氛围对于内部人身份感知乃至创新是更加有价值的。

4.社群自尊在内部人身份感知影响顾客创新行为这一过程中起重要的调节作用。顾客的社群自尊越强,在社群里感受到的自我价值和意义就会越高,因而在得到内部人身份感知之后,产生更多的顾客创新行为。否则社群成员即使觉得自己是内部人,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来自社群的尊重,其创新动力也会受挫。

(二) 管理启示

根据本研究结果,建议社群运营者应当以支持性氛围营造为主,以控制性氛围营造为辅,加强社群成员内部人身份感知,并采用策略加强成员在该社群的自尊,进而获得更多的顾客创新,推动企业和品牌的创新。

1.社群管理者要营造一种自由、积极、轻松的支持氛围,提倡社群内成员畅所欲言。社群可以通过创建话题讨论、产品体验分享、问答奖励等活动,鼓励或奖励积极参与社群讨论的顾客,从而让顾客增强创新意愿,提出新创意。在这个过程中,社群管理员应当加以引导,比如在顾客提出新创意时,将其置顶,引导大家跟帖、回帖,以便收集有效和完善的信息,融入到企业后期的创新中。同时设定一定的奖励机制,例如等级、积分等,让顾客在参与社群的过程中,感受到来自社群的支持氛围,从而激发更多的创新行为。

2. 社群运营过程中,要设定一定的规则和门槛来净化社群氛围。在社群的控制性氛围下,社群内不文明行为的减少会对社群内成员所处的环境起到良好提升作用,有利于顾客适应社群环境;同时通过控制准入门槛,以保证参与社群活动成员的质量和规模,当具备共同爱好的成员聚到一起时,会更有利于顾客产生参与社群活动的意愿,与社群其他成员共同讨论创新。

3. 社群管理员可以通过设计多样化的社群活动来提高社群成员的内部人身份感知,从而激发其参与和建设社群的意愿。社群运营者在管理社群时,应当着重考量如何让社群成员感知到自己是内部人。例如设置社群专属周边礼品、设置社群特色活动、推出社群文化标识、创造社群内部人自己的行话或“梗”,让社群内部成员感受到社群内外部的明显差异,从而对社群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提高创新意愿。

4. 社群管理员要充分考虑社群自尊的影响作用,通过措施提高顾客社群自尊。社群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等级、积分、社群角色来提高顾客的社群自尊。当顾客为社群发展、产品设计提出建设性意见时,社群管理员可以给予该顾客一定的管理社群的权力,从而提高其在社群内的威望,使其得到自尊。另外,可对参与社群活动的顾客进行贡献值核算,设置等级晋升、积分积累等规则,让顾客切实感受到社群对其付出的认可,从而获得心理上的荣誉感和满足感,激发其参与社群和创新的更多意愿。

How Online Community Climate Influences Customer's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munity Self-esteem

Zhu Jin

(School of Busines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Abstract: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ve that online communities are an important external source for enterprises to gain innovation power, and how community operators motivate the innovation intention of community members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is research uses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theor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upportive climate and controlling climate of online community on community members'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upportive and controlling community climate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customer innovation through the full intermediary role of insider status perception; the members' community self-esteem can moderate the influence of insider status perception on customer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trategic advice for online community operators to use different community climate tactic to motivate members' insider status perception and promote customer innovation,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haping members' self-esteem in the community for members' innov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climate; supportive climate; controlling climate; customer innovation; insider status perception; community self-esteem

责任编辑:孙秋英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的社会学分析

——以山东省域数据调查为例*^①

傅海伦 张丽

(山东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中小学乡村教师群体中存在的消极情绪问题,已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采用田野调研与大数据分析论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社会学视角去分析研究山东省中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状态,深入探究影响其消极情绪的社会因素,即从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中观层面社会关系、微观层面个体社会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利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研究社会因素对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的影响及关系。尝试构建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社会影响因素模型,并利用 AMOS-21.0 软件验证模型中的假设修正模型。根据模型结果提出改进策略,为乡村教师的情绪体验研究提供全新的分析向度,从而促进山东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关键词: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社会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116-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12

一、问题提出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和命脉,其身心健康及整体素质水平与教育教学质量密切相关。2018年1月,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号)要求“拿出务实举措,帮助乡村青年教师解决困难,关心乡村青年教师工作生活,巩固乡村青年教师队伍。在培训、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等方面向乡村青年教师倾斜,优化乡村青年教师发展环境,加快乡村青年教师成长步伐”^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探究并改善乡村教师的情绪状况,实现乡村教师积极持续的内涵式发展,已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是一“乐”。教师工作的情绪对教学及学生会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如果教师一直以消极的情绪进行工作和教学,性急易怒,缺乏工作热情,那么其自我价值和职业理想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更不能顺利完成工作任务。近几年,山东省虽然出台了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教育均衡化和教育公平化,但城乡教育仍有差距,教育资源分配不够均衡。作为专业性、技术性工作者中的高情绪工作者^③,乡村教师群体仍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付出更多的精力给大量需要关怀的留守儿童,繁重的工作和压力等都

* 收稿日期:2019-10-12

作者简介:傅海伦(1970—),男,山东曹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1986—),女,山东聊城人,山东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数学质疑式教学模式创新与实效研究”(17YJA880020)、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提升综合竞争力视域下学校内部管理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2018JXY3010)的阶段性成果。

②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8-01/31/content_5262659.htm.

③田学红:《教师的情绪劳动及其管理策略》,《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年第3期。

会导致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情绪。这种情绪如果长期积压且无法通过恰当的方式来排解,就会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通过田野调查与实地访谈,发现抑郁、焦虑、疲劳、厌倦、缺少激情等消极情绪在山东省乡村教师群体中尤为突出,这些消极情绪不可避免地给教师、学生、学校以及社会带来负面效应,甚至会波及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实现教育公平。^①那么在山东省这个教育大省中,乡村教师群体的情绪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这种状态,用什么样的研究工具分析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以便更好地服务我国乡村和边远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②,都是本研究探讨解决的问题。

二、调查研究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教师的工作压力、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关于教师消极情绪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局限于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教师情绪的研究归为心理学科的任务。虽然对教师情绪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探究影响教师消极情绪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而且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社会学侧重分析教师个体以外的环境因素对其情绪的影响,包括经济地位、组织公平、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等,现阶段鲜有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调查分析教师消极情绪的相关研究。乡村教师作为社会人存在于社会之中,每个个体存在于特殊的社会网络之中,必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将乡村教师身边的各要素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会体系,这个体系必然对乡村教师的情绪体验产生影响,而社会体系中的情感关怀和支持是有效缓解消极情绪的对策之一,它能调节个体因认知失调或行为失范所带来的各种消极情绪体验,从而帮助教师合理调节和管理自身情绪。因此,只有把教师的情绪问题置于社会学领域中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才能更精准切实地把握影响消极情绪的社会学因素,及时采取调节措施逐步消除消极情绪,激发积极情绪,以期在社会学领域推动教师消极情绪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

(一) 研究假设

假设1.山东省中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得分较高,程度较为严重。

假设2.山东省中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在地域、性别、学校性质、教师教龄、最高学历、教师身份等个体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假设3.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中观层面社会关系、微观层面个体社会发展能力的各个因素显著影响中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并呈负相关。

假设4.能够建立及修正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的社会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研究结果,提出改进策略。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摘自某科研机构于2018年在全省层面开展的“中小学乡村教师工作现状调查”项目,采用两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田野访谈等量化与质性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阶段抽取学校,第二阶段抽取教师。抽取学校按照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外部分层变量为学校所处地域(鲁东、鲁中、鲁西南地区),内部分层变量为学校规模;抽取教师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有效样本为17727个,样本分布见表1。

①谭敏达、蔡亮:《教育政策在“进步”与“公平”之间寻找支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②钱小龙:《教师教育MOOC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适用性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表1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调查教师样本分布

变量	类别	次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男	8445	47.6	47.6
	女	9282	52.4	100.0
学校所在地域	鲁东地区	7002	39.5	39.5
	鲁中地区	5726	32.3	71.8
	鲁西南地区	4999	28.2	100.0
学校性质	公办	17548	96.7	99.0
	民办	179	99.0	100.0
教龄	3年及以下	2223	12.5	12.5
	4—5年	962	5.4	18.0
	6—10年	1464	8.3	26.2
	11—20年	3621	20.4	46.7
	20年以上	9457	53.3	100.0
任教学段	小学	11627	65.6	65.6
	初中	6100	34.4	100.0
最高学历	高中	2096	11.8	11.8
	中专	5346	30.2	42.0
	大专	6762	38.1	80.1
	本科	3394	19.1	99.3
	硕士研究生	129	.7	100.0
职称	未定级	1617	9.1	9.1
	初级	6328	35.7	44.8
	中级	8338	47.0	91.9
	副高级	1422	8.0	99.9
	正高级	22	.1	100.0
身份	其他	98	.6	.6
	代课教师	638	3.6	4.2
	合同制教师	448	2.5	6.7
	在编教师	16543	93.3	100.0
月工资水平	3000元及以下	1111	6.3	6.3
	3001—4000元	3178	17.9	24.2
	4001—5000元	5488	31.0	55.2
	5000元以上	7950	44.8	100.0
参加校际交流次数	0次	8158	46.0	46.0
	1次	3851	21.7	67.7
	2次	2350	13.3	81.0
	3次及以上	3368	19.0	100.0

(三) 研究内容

1.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调查量表。刘青荣在2018年研究教师教学情绪结构、现状及其影响效应中提出了《中小学教师教学情绪问卷》。Parrott在2001年提出的情感属性框架,其中消极情感体验类型分为厌恶、害怕和悲哀3个维度,恼怒、恐惧、失望、同情等14个因素。根据中小学乡村教师的自身情况,综合2个量表分析,改进编制出《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调查问卷》,共分为愤怒、受挫、厌恶和悲哀4个维度,恼怒、恐惧、失望、同情等12个题项,采取Likert五点计分法,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计1—5分,量表得分为12个题项得分的均值,分值越高,说明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程度越高。问卷结构效度和信度良好;4个维度的RMSEA值区间在0.072—0.083之间,GFI、CFI、IFI均大于0.90;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本次调查中,

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2~0.85之间。

2.中小学乡村教师社会影响因素调查量表。经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研究分析、专家论证和半结构访谈等大量的前期工作,将问卷内容设置为3个层面的消极情绪社会影响因素: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中观层面社会关系、微观层面个体社会发展能力。宏观层面以社会经济地位为首要维度,包括职称、收入、晋升、社会地位4个因素;中观层面以社会关系为第二维度,包括与领导同事关系、家庭成员关系、家长关系和师生关系4个因素;微观层面以个体社会发展能力为第三维度,包括岗位与能力匹配度、个人目标实现程度、积极参加培训交流项目,重视个人发展、相当一部分教师从农村学校流向城市学校4个因素。最终研制确定12个题项的《中小学乡村教师社会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见表2)。采取Likert五点计分法,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计1~5分,量表得分为12个题项得分的均值,得分越高,说明教师对此社会影响因素现状越满意。问卷结构效度和信度良好:4个维度的RMSEA值在0.078—0.086之间,GFI、CFI、IFI的指标值均大于0.90;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4,4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07~0.797之间,折半信度系数在0.78—0.86之间。

表2 中小学乡村教师社会影响因素调查量表

潜变量	观测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	对现在的职称和收入很满意	A ₁
	我很满意我的收入	A ₂
	对学校的晋升机制和落实很满意	A ₃
	我的社会地位较高	A ₄
社会关系	领导、同事的关系融洽	B ₁
	家庭成员关系融洽,家庭和谐幸福	B ₂
	师生关系融洽,能很好地教育管理学生	B ₃
	家长关系融洽,互相配合帮助	B ₄
个体社会发展能力	个人能力与工作岗位相匹配	C ₁
	个人的发展目标能够很好地实现	C ₂
	参加培训交流项目,重视个人发展	C ₃
	相当一部分教师从农村学校流向城市学校	C ₄

3.基本模型与变量。本研究主要分析社会环境的各因素对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的影响,初步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Y_{ij} = \gamma_{00} + \beta_{ij}X_{ij} + \gamma_{00}S_j + \varepsilon_{ij}$ ^①,模型的因变量为中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因素,自变量为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中观层面社会关系、微观层面个体社会发展能力的各个因素。

三、分析与讨论

(一)中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现状及差异分析

通过描述统计和差异分析结果发现,山东省中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得分较高,其中小学学段为4.56分、初中学段为4.10分,程度较为严重,因此接受原假设1。中小学教师消极情绪体验在学段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小学学段教师的程度显著高于初中学段教师;在性别上

①杜玲玲:《中小学生学习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6期。

存在显著性差异,男性教师显著高于女性教师;在地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鲁西南地区显著高于鲁东地区、鲁中地区;在学校性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公办学校教师的体验程度比民办学校教师要低;在教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教龄在3年及以下和20年以上教师的体验程度显著低于其他教龄段教师的水平;在最高学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最高学历越高的教师消极情绪体验程度越高;在教师身份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编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程度显著低于其他身份教师的水平,因此接受原假设2。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中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得分

分类		小学			初中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合计		11627	4.56	0.67	6100	4.10	0.84
性别	男	5539	4.61	0.59	2096	4.18	0.89
	女	6088	4.47	0.71	3194	4.01	0.88
学校所在地域	鲁东地区	4593	4.39	0.66	2409	4.00	0.82
	鲁中地区	3756	4.59	0.66	2006	4.03	0.78
	鲁西南地区	3279	4.62	0.63	1720	4.13	0.87
学校性质	公办	11509	4.48	0.62	6039	4.09	0.86
	民办	117	4.63	0.64	62	4.39	0.84
教龄	3年及以下	1458	4.28	0.65	765	4.02	0.85
	4—5年	631	4.62	0.67	331	4.13	0.82
	6—10年	960	4.70	0.68	504	4.12	0.81
	11—20年	2375	4.40	0.65	1246	4.05	0.80
	20年以上	6203	4.38	0.64	3254	4.01	0.86
最高学历	高中	1375	4.10	0.66	721	3.98	0.85
	中专	3506	4.21	0.66	1840	4.01	0.84
	大专	4465	4.50	0.68	2327	4.06	0.81
	本科	2226	4.68	0.67	1168	4.11	0.87
	硕士研究生	85	4.73	0.69	44	4.18	0.86
身份	其他	64	4.55	0.71	34	4.22	0.85
	代课教师	418	4.71	0.70	220	4.23	0.83
	合同制教师	294	4.73	0.69	154	4.28	0.82
	在编教师	10850	4.40	0.68	5693	4.06	0.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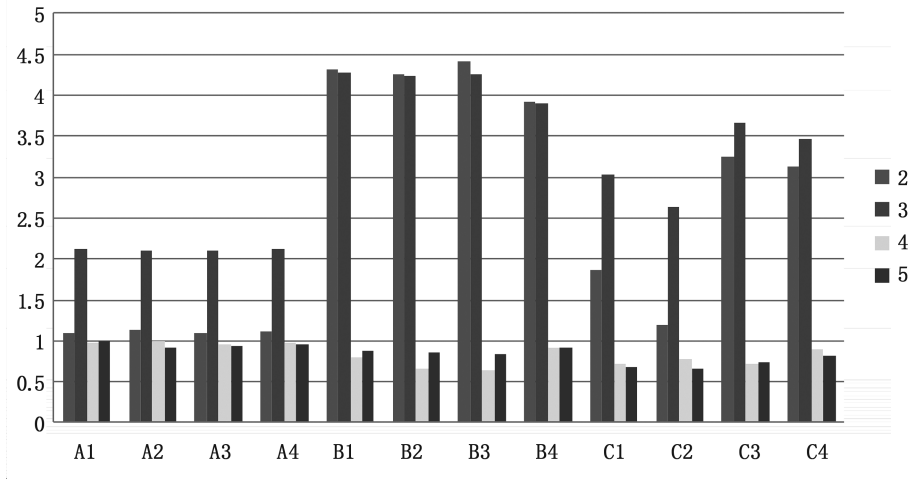
(二) 中小学乡村教师社会影响因素的现状及其差异分析

图1呈现了社会影响因素各个因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宏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微观个体社会发展能力两个维度的均值显著低于中观社会关系维度的均值。其中,初中乡村教师相比小学乡村教师的均值要高;中观社会关系层面的均值在中小学乡村教师群体中影响程度较高,其中初中乡村教师的均值略低于小学乡村教师。

(三) 教师消极情绪的社会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由表4可见,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D)与职称、工资收入、学校晋升、社会地位、领导同事关系、家庭和谐度、师生关系、岗位与能力匹配度和目标实现程度呈现显著性负相关,与参与培训项目、教师流动呈现显著性正相关,家长关系影响不显著。

由表5可知,初中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与职称、工资收入、学校晋升、社会地位、领导同事关系、家庭和谐度、师生关系、家长关系、岗位与能力匹配度和目标实现程度呈现显著性负相关,参与培训项目、教师流动呈现显著性正相关,社会地位和家长关系影响不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3。



2=小学消极情绪均值,3=初中消极情绪均值,4=小学标准差,5=初中标准差。

图 1 中小学乡村教师社会因素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4 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的社会因素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A ₁												
2A ₂	-.291**											
3A ₃	-.286**	-.401**										
4A ₄	-.281**	-.396**	-.117**									
5B ₁	-.269*	-.381*	-.114*	-.319*								
6B ₂	-.253**	-.384**	-.108**	-.342**	-.171**							
7B ₃	-.237**	-.351**	-.101*	-.318**	-.169**	-.212**						
8B ₄	-.216**	-.350**	-.112**	-.306**	-.168**	-.209**	-.106**					
9C ₁	-.195**	-.364**	-.105*	-.293**	-.159**	-.223**	-.112*	-.206*				
10C ₂	-.193**	-.343**	-.104**	-.284**	-.155**	-.218**	-.103*	-.204*	-.289**			
11C ₃	.188*	.338**	.098**	.267**	.161**	.205**	.101**	.293	.274*	.322**		
12C ₄	.184**	.332**	.096**	.248**	.148**	.199**	.098**	.296*	.282**	.299**	.252**	
13D	-.228**	-.357**	-.117**	-.279**	-.157**	-.211**	-.105**	-.242	-.283**	-.317**	.252**	.301**

*表示通过 0.05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0.01 显著性水平检验。

(四)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以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为因变量,首先把宏观社会经济地位因素:职称、工资收入、学校晋升和社会地位作为第一组自变量放入模型 1;其次把中观社会关系因素:领导同事关系、家庭和谐度、家长关系和师生关系作为第二组自变量分别放入模型 2;最后把微观个体社会发展能力因素:岗位与能力匹配度、目标实现程度、培训和教师流动作为第三组自变量放入模型 3。考察它们对因变量的贡献率,具体结果见表 6。对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解解释率 R^2 为 0.532,加入社会关系因素后,解释率 R^2 增至 0.631,再加入个体社会能力因素后,总体解释率 R^2 增至 0.706。其中,家长关系对小学教师消极情绪体验影响不显著,重视个人发展、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从农村流入城市呈现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表5 初中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的社会因素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A ₁												
2 A ₂	-.121 **											
3 A ₃	-.124 **	-.157 **										
4 A ₄	-.131 **	-.124 **	-.278 **									
5B ₁	-.156 *	-.103 *	-.294 *	-.119								
6B ₂	-.112 **	-.132 **	-.289 **	-.121 **	-.141 **							
7B ₃	-.108 **	-.109 **	-.271 *	-.113	-.109 **	-.292 **						
8 B ₄	-.119 **	-.127 **	-.262 **	-.110 **	-.118 **	-.271 **	-.234 **					
9C ₁	-.106 **	-.163 **	-.255 *	-.106	-.098 **	-.217 **	-.236 *	-.206 *				
10C ₂	-.103 **	-.102 **	-.252 **	-.102	-.135 **	-.248 **	-.233 *	-.214 *	-.279 **			
11 C ₃	.137 *	.097 **	.248 **	.117 *	.167 **	.235 **	.201 **	.223	.259 *	.301 **		
12 C ₄	.141 **	.122 **	.231 **	.108	.124 **	.251 **	.228 **	.263 *	.219 **	.308 **	.279 **	
13D	-.117 **	-.123 **	-.265 **	-.111	-.137 **	-.262 **	-.223 **	-.229	-.253 **	-.303 **	.281 **	.326 **

*表示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0.01显著性水平检验。

对初中乡村教师消极情绪而言,同理逐步建立3个模型,考察它们对因变量的贡献率。具体结果见表6。对初中乡村教师消极情绪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解釋率R²为0.544,加入社会关系因素后,解釋率R²增至0.651,再加入个体社会能力因素后,总体解釋率R²增至0.728。其中社会地位、家长关系对初中教师消极情绪体验影响不显著,重视个人发展、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从农村流入城市呈现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因此接受原假设4。

表6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的社会影响因素模型逐步回归及结果

乡村教师 消极情绪		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关系				个体社会发展能力				常数项	R ²
		A ₁	A ₂	A ₃	A ₄	B ₁	B ₂	B ₃	B ₄	C ₁	C ₂	C ₃	C ₄		
小学	模型1	-.107 ***	-.261 **	-.107	-.210 ***									1.011 ***	0.532
	模型2	-.104 ***	-.242 *	-.101 *	-.201 **	-.099 **	-.174 ***	-.093 ***	-.288					-.341 **	0.631
	模型3	-.101 ***	-.225 *	-.007 *	-.178 **	-.083 **	-.162 ***	-.077 ***	-.203	-.292 ***	-.333 ***	.286 *	.375 ***	1.107	0.706
初中	模型1	-.096 ***	-.116 **	-.241 ***	-.076									1.027 ***	0.544
	模型2	-.082 ***	-.093 *	-.197 **	-.061	-.112 **	-.278 ***	-.107 ***	-.129					-.323 **	0.651
	模型3	-.055 ***	-.064 *	-.146 **	-.048	-.087 **	-.193 ***	-.081 ***	-.096	-.291 ***	-.313 ***	.295 *	.396 ***	1.219	0.728

*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果与建议

(一)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结果分析

1.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总分偏高。研究表明,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程度普遍偏高,作为乡村教育的主力军,中小学乡村教师群体亟需社会予以高度关注。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显著高于初中乡村教师,这与教师群体职业生命的情感体验、社会经历、认知以及职业融合有关。入职初期满怀期待与理想情怀,渴望迅速地融入乡村教育,其情绪体验是积极的,但随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比如晋职晋身渠道的窄化、社会关系的单一与相对低龄留守儿童的师生关系等问题导致小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越来越强烈。但随着教龄的增长、职称的晋升、阅历的增加、社会的关注度提升、学生的成长以及工作激情的消退,中学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程度就会呈减弱趋势。

2. 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在个体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经统计描述和差异分析

发现,男性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显著高于女性,这与不同性别间的职业理想与抱负责任有关。其中鲁西南地区的消极情绪体验显著高于鲁东和鲁中地区,这与不同地区乡村教师激励政策的颁布与落实情况有关,说明鲁东、鲁中地区的“乡村支教”“县管校聘”及“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等积极政策比鲁西南地区落实、监管得到位。而公办学校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程度比民办学校要低,在编教师的消极情绪体验程度显著低于其他身份的教师。以上说明教师的情绪与教育政策、职业连续和职业危机有关,正如凯尔克特曼(Kelchtermans, 1996)的研究表明,学校变革、社会支持或者政策、职场关系都是教师消极情感的来源。另外,教龄3年及以下和20年以上的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显著低于其他教龄段的教师,说明作为刚入职的乡村教师(3年及以下)满怀教育热情和工作张力,但随着教龄的增加(5年以上),面对更高的社会要求和社会期待以及现实的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产生了心理落差,消极情绪体验越来越强烈,而面对同样的问题,具备丰富的工作和社会经验并且享受更多社会保障的教龄较长(20年以上)的教师就会习惯、适应并能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因而消极情绪也因此减弱。研究结果还显示,最高学历越高的教师消极情绪水平越显著,说明对社会的认知程度、个体社会发展能力也显著影响教师的工作状态与情绪体验。

(二) 社会因素对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的影响

1. 社会经济地位及个体社会发展能力因素的影响。宏观社会经济地位及微观个体社会发展能力对于中小学乡村教师消极情绪体验产生较高的影响力,其中岗位与能力匹配度、个人目标实现程度、教师流动等因素更能对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产生较大的影响。说明工作岗位要求与个人能力相匹配会降低工作压力,消除精神焦虑,进而产生愉悦的情绪状态。否则就会感到精神紧张、焦虑恐慌,如果个人能力高于工作岗位所需,教师就会感到强烈的心理落差,进而产生失落、悲观、不积极进取等消极情绪。而人际关系良好、充满关爱、工作目标设计合理以及按个人能力分配工作岗位、按劳动付出分配劳动报酬的工作环境,则有利于促进乡村教师积极情绪的产生。在这两个层面,初中教师的总体状况要好于小学教师,除了个体心理状态成熟和调试以外,也会受到教育政策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影响。

2. 社会关系因素的影响。中观社会关系层面对于中小学教师消极情绪体验的影响程度略低,说明“支教”政策、教师轮岗制度、“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等政策措施仍需落实到位、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其中,与家长关系因素对中小学教师影响不显著,一是说明随着生活水平和对教育认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子女教育,很多有条件的家庭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而进城买房择校,即便选择乡村学校的家长也会积极配合教师共同教育学生;二是说明在“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的社会环境下,随着“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等教育改革政策的实施与落实,乡村教师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乡村教育质量提高,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相互提供工作上的社会支持,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缓解工作压力,降低消极情绪体验。因此,在城市化、市场化导致社会群体分化显著、公众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以及科层制式的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尚未充分建立完善的社会现实下,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不能简单地放在个体层面进行研究,而需要置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中,放在社会网络系统中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分析和解决。

(三) 提升中小学乡村教师情绪体验的建议

1. 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提升乡村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经济激励机制的逐步完善能够让更多优秀乡村教师聚焦教学、扎根乡村和服务乡村。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福利待遇,促

进绩效工资的实施,激活乡村教师的良性竞争。一是建议实施特殊岗位津贴和差异化待遇政策机制。在政策的实施方式上,可以依照教师在乡村学校工作的年限、职称、等级发放岗位补助,根据不同地区乡村教师的实际需要给予各种津贴补助,如教师的子女教育问题、教师的重大疾病救助问题等。二是完善改革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打破学历、资历的限制,灵活掌握评聘标准,让更多奋斗在一线的乡村教师专注育人、安心教学。加大对乡村教师财政支付力度,缩减城乡区域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缩小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三是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议在各种组织和决策层面,加大乡村教师代表的名额,让更多的乡村教师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四是优化乡村教师生存环境。更新教学仪器设施,美化乡村学校自然环境,改善教师工作生活环境。

2. 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的工作氛围。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充分发挥个体潜能,提高心理协调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情绪体验。置身于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更容易使教师获得来自他人的关心和帮助、信赖和理解,从而帮助其迅速适应社会环境,减弱消极情绪体验,舒缓心理紧张与压力。一是应帮助乡村教师积极构建和完善一个涵盖领导关系、同事关系、家庭关系、家长关系以及师生关系的良好人际关系网络^①,并借此来保持积极的情绪体验和有效应对各种心理压力。二是开展丰富多样的集体活动,鼓励学校领导、教师积极参与。学校领导应关爱一线教师的工作及生活。教师通过参与学校的集体活动,建构互帮互助互信的伙伴关系,进而形成协同共生的社会交往群,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产生强烈的激励作用,提升集体凝聚力以及归属感。融合内生的乡村教师伙伴关系能够缓解新生代教师心理孤独感和迷茫感,提高新生代乡村教师角色认同感和归属感。研究表明,家庭和谐程度和师生关系更能影响教师情绪,根据不同性质的学校活动邀请教师的家庭成员或者学生和家長共同参与完成,让家庭成员、学生和家長更细致、深入、全面地了解教师的工作境遇,通过互相了解、包容、尊重和支持,建立起良好和谐的关系,使乡村教师体验身为教师的生命之美及乡村教学的生命意蕴,进而满足其安全、社交、尊重等精神上的需求。

3. 完善社会支持系统,为乡村教师提供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生命关怀,唤醒教师的积极情绪。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生命关怀能给予乡村教师心灵的呵护和慰藉。一是开好道德讲堂,注重教师的师德培养。建立榜样引领,利用学习强国、身边的榜样等,鼓励年轻教师树立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精神,培养扎根农村教育的崇高情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二是设立各种荣誉制度,满足教师文化心理需求。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营造舆论氛围,真正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举办各种学习经验交流会、教研成果交流会,便于交流与思想碰撞,通过多种途径向乡村教师传递温暖、消除疲倦、缓解工作压力、感知生命的意义、体会生命的尊严、满足生命的价值,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情绪。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能为乡村教师提供改变自我的机会,激励乡村教师个体化发展,让自己变得更达观,内心更富有活力,保持积极向上的情绪,从而释放更多的潜能,以更阳光的心态走进生活和教学,获得职业生命的愉悦体验。

4. 树立发展式的职业成就观,减轻教师的竞争压力和负担。从调查结果看,个体社会发展能力是缓解教师消极情绪的激励因素。提高这方面能力,一是建立创新评优评模方式,加大表彰力度,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形式的优秀乡村教师表彰活动,增强其提升能力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激发工作热情,提高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二是鼓励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建议在区域层面构建城乡教师命运共同体。借助“互联网+”,引进优质教育培训资源,提供个性化、定

^①徐长江:《教师情绪胜任素质探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年第3期。

制化的培训机会服务乡村教师,使其拓展眼界、更新理念、提升个体发展能力。通过开展“名师共享”“影子跟岗”“送教下乡”“工作坊研修”等多种形式的培训交流活动,定期邀请德才兼备的名师名校长、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等到乡村学校献计献艺、帮扶指导,以共同发展为愿景,形成共生共荣的社会新生态,为乡村教师的成长搭建良好的平台。三是完善教师流动激励机制,促进青年教师区域间交流与提升,尊重教师意愿,丰富教师流动模式。构建以城镇优秀教师支教、乡村青年教师学习提高为主的流动模式,逐步推广、实现城乡学校“一体化”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减轻教师从业的竞争压力和心理负担,让乡村教师充分体会职业成就感,对职业产生真正的兴趣和热爱,体验积极向上的乐趣和自我成长的快乐,体验更多积极健康的情绪,从而更自觉更主动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Rural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ial data survey

Fu Hailu, Zhang Li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rural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 of field research and big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a new analysis method concerning the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 of rural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negative emotions are studied in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t the macro-level, social relations at the meso-level, and capacity of individual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micro-level. Using SPSS20.0 to collate and analyze the data, the impacts and relationships of the sociological factors on negative emotions are researched. A model of negative emotional sociological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ural teachers is tried to be built, and then software AMOS-21.0 is used to verify the assumptions in the model and correct the model.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 improvement strategies to provide a new analysis for rural teachers' emotional experience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Key words: rural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negative emotions;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relations; capacity for soci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时晓红

心理发生视域下学习进阶机制的研究^{*①}

高 嵩

(山东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学习进阶已成为基础教育各学科教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如何构建和阐释学生在某一阶段的学习状况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研究。借助皮亚杰的心理发生理论构建起描述和解释学习进阶的模型,解决了对学习进阶设置的随意性和难以借鉴的问题。以初中原子物理概念体系的学习进阶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保证研究的严密性和可靠性,运用 Rasch 模型对测评工具和结果进行分析和论证。研究结果既提供了学生的与原子相关知识的数据,也证明了我们的解释方案的可行性。

关键词: 学习进阶;物理教学;发生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 G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1-0126-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13

一、学习进阶的界定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各国都在关注如何培养人才、怎样更好地促进公民核心素养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教学中仅肤浅地关注知识点的学习,则很难形成有机的知识体系,并且非结构化的知识往往会在其他信息的影响下转变成错误的形式^②,所以,我国 2017 年颁布的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都强调了观念的养成。由此,我们的教学应将视野置于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甚至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发展,以形成前后一贯的学习进程。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学习进阶的状况进行研究,帮助一线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从而使得他们在教学中能更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策略,更恰当地为学生提供帮助,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形成结构良好、便于迁移的知识体系^{③④}。

如何描述学生的学习进阶现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实际的研究中,人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观点是预成的,或者说是“自上而下”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习进阶是“概念的发展序列”或“概念的发展路径”^⑤,因此,学习进阶与学科知识的逻辑发展是一致的,这样进阶的框架可以从学科体系出发,根据学科的知识体系梳理出来;另一种则是基于教育现实的,或者说

* 收稿日期:2019-02-11

作者简介:高嵩(1972—),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人文社科研究课题“核心素养视域下核心概念的学习进阶研究”(J16YG06)、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课题(SDYJD17064)的阶段性成果。

②[美]普莱斯顿·D·费德恩、罗伯特·M·沃格尔:《教学方法——应用认知科学,促进学生学习》,王锦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③Salinas I, “Learning Progressions in Science Education: Two Approaches for Development”, *The Learning Progressions in Science Conference*, Iowa City, 2009.

④姚建欣、郭玉英:《为学生认知发展建模:学习进阶十年研究回顾及展望》,《教育学报》2014年第5期。

⑤Roseman J E, Caldwell A, Gogos A et al., “Mapping a Coherent Learning Progression for the Molecular Basis of Heredit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2006.

是“自下而上”的,认为进阶是对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表现的反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 Schwarz 认为学习进阶的表现在于学习过程中对于模型的建构和发展^①,Linn 认为学习进阶的表现在于知识间关联特征的变化^②,以及 Wilson、Liu 等人对学习进阶的假设和验证。^{③④}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都存在着这样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学习进阶界定简单化的问题。前者是在课程领域谈学习进阶,而后者则是在评价领域谈学习进阶,虽然有文献将二者结合起来^⑤,但是相互的联系并没有梳理清楚;其次,对学习进阶的发生机制缺乏合理的解释。这样,人们关于进阶的解释就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撑和恰当的解释模型,也将造成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局限性,在其他研究中难以印证和借鉴,尤其关于进阶的研究难以被运用于教学中。^⑥

对学习进阶的认识既不能脱离学科概念体系,又不能超越学生实际。本文把学习进阶定义为:在一定的目标预设之下,学生通过经历一定的学习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围绕某一科学主题核心观念的概念序列。因此,对学习进阶的描述,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目标预设,这取决于各地区、各学校对课程的规划和安排;其次,是学生在具体某学段的知识水平的表现;第三,则是学习进阶机制的解释,在横向上给出教学任务和进度以及学生表现之间的联系,在纵向上可以说明学生的发展。当下在第三个方面,几乎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对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对于一线教师而言,只有明确了学生学习的机制,才能在实际教学中有较为明确的行动方针,我们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真正转化到教学实践中去。

本研究借助皮亚杰的心理发生理论构建学习进阶机制的模型,对初中原子物理概念体系的学习进阶进行了实证研究,以说明进阶机制模型的適切性。之所以选这个主题,原因是在我国初中物理课程标准中这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与此相关的学习对学生原子物理概念体系的构建,对物质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⑦⑧}

二、基于心理发生理论的学习进阶理论构建

对学习进阶机制作出解释,必然地又回到皮亚杰。皮亚杰的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个体的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并且他的研究成果对教育有着极大的启发。但是当人们实际进入教学研究的时候,却极少直接运用皮亚杰的理论,尤其是他晚年的理论。这当然与皮亚杰的研究不是直接面对教学实践有关,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不仅要面向心理的发生,更希望凭借其研究成果与哲学、心理学形成呼应,这对于一般教育实践者来说便显得过于晦涩。但是当我们仔细研读他的著作,尤其是将他物理概念的心理发生的解释与当下研究正热的学习进阶结合起来的时候,发现确实可以为我们分析、理解相关的问题提供一个明晰的思路。

①Christina V.Schwarz, Brian J.Reiser, Elizabeth A. Davis et al., “Developing a learning progression for scientific modeling: Making scientific modeling accessible and meaningful for learne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46, No.6, 2009.

②Linn, M, The knowledg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struct in R. K. Sawyer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43-264.

③Wilson M, Scalise K, “Assessment to Impro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BEAR Assessment System”, *Higher Education*, Vol.52, No.4, 2006.

④Xiufeng Liu, Anne McKeough., “Developmental growth in students’ concept of energy: Analysis of selected items from the TIMSS databas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42, No.5, 2005.

⑤王磊、黄鸣春:《科学教育的新兴研究领域:学习进阶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4年第1期。

⑥姚建欣、郭玉英:《学习进阶:素养的凝练与范式的演变》,《教育科学》2018年第4期。

⑦[英]温·哈伦编著:《科学教育原则与大概概念》,韦钰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⑧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科学素养的导航图》,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一)皮亚杰关于物理学发展机制的说明

皮亚杰晚年的新理论是建立在对对应性、态射、范畴和转换等新的概念体系上的,并且强调了“水平”概念和“意义”逻辑,从而超越了大家所熟知的他的早期理论中“四阶段”的划分。因此,皮亚杰本人就是“皮亚杰理论的最大的叛逆者”,这也使得他直到去世都始终站在建构主义的理论前沿。^①我们在此不打算对皮亚杰的理论进行详细的阐述,而是选取与本研究主题“物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知识的发展过程应该如何来描述”相关的理论来加以整理和研究。

皮亚杰强调个体的心理发展与科学史本身是可以比较的,都是连续的构建过程。皮亚杰认为关于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机制可以用图1进行表示。^②

第一, T 代表的是某物理学理论。不同的阶段物理学理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T^i ,如解释地球表面物体下落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解释为物体的本性,牛顿解释为万有引力,而爱因斯坦解释为时空的弯曲。

第二, E 表示实验平面, S (情境)和 F (现象)出现在其中,是“可观察事实”的场所。对处于某一理论阶段的人来说,能进入他的视野,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可观察事实 F 只能局限于 E 的某一个领域 D ,这些 D 有时候是重合的,有时候是分离的。这取决于认识主体的经验。

第三, O_0 和 O_1 分别表示描述 F (现象)和情境 S 的某些概念,这些概念对高一级理论来说是可观察事实,对低一级理论则是理论建构,它们分别用某些概念来表达。如我们为表示杯子压桌面的“压力”,而做的垂直于桌子向下的有向线段。对于高一级的理论,如牛顿运动定律,这个表达是形象的、经验的。而对于低一级的“杯子压在桌面上”的生活认识,这个有向线段便是一种抽象的表达。

第四, A_0 和 A_1 分别表示对理论 T 的经验抽象和反省抽象。经验抽象使得新的理论 T 立足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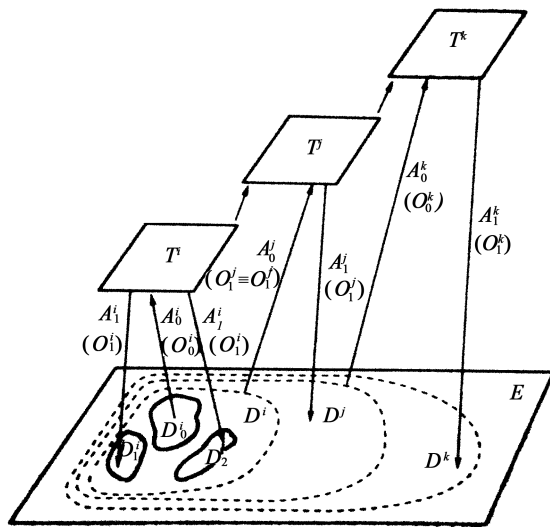


图1 物理学理论连续发展机制

注:

D 表示:领域

E 表示:实验平面, S (情境)和 F (现象)出现在其中,它是“可观察事实”的场所

O_0^i 表示:对 T^i 而言的“可观察事实”

O_1^i 表示:对 T^i 而言的理论建构,对 T^j 而言的可观察事实

T^i, T^j, T^k 表示:连续的物理学理论

A_0^i, A_0^j, A_0^k 表示:对理论 T^i, T^j, T^k 而言的经验抽象

A_1^i, A_1^j, A_1^k 表示:对理论而言的反省抽象

①蒋京川:《皮亚杰晚年的“新理论”及其思考》,《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3期。

②[瑞典]J.皮亚杰、R.加西亚:《心理发生和科学史》,姜志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原有的经验——通过 O 描述的 F , 而得到建立, 反省抽象, 则是皮亚杰理论的独创^①, 通过反省抽象使得原来未考虑的领域里的某些现象在新的理论中得到了解释。如认识到大气压强之前, 人们从“自然界厌恶真空”来解释气体的扩散和把水抽到高处等现象, 认为真空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 17 世纪, 随着托里拆利、格里克等人的一系列实验的展开, 最终建立起大气压强的理论。以此人们既能理解“抽水机可以把水抽到高处”, 又能解释原来不可理解的“水不能被抽到比 33 英尺高的地方”等问题, 理论也因为有着更广泛的适用性以及更强的解释力而得到了确立。

由此, 物理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就清晰了: 一种物理学理论 T^i 的出发点始终是人们试图解释的一个现象。对这个现象(或所有现象)的选择和描述, 意味着人们将考虑某些个体(或人们与某些个体打交道), 而忽视其他个体, 考虑某些关系, 而忽视其他关系。当通过一个抽象过程建立起一个理论的时候, 各种现象便被分为了对主体来说可观察的证据和事实, 以及主体还不认为理论能解释的其他领域。此时物理理论的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 因为它只是说明性的。而当它成为解释性的理论, 通过反省抽象, 将理论的适用范围拓展到其他的领域 D , 这个理论就获得了合理性。每当某一理论从较低的阶段 T^i 发展到较高阶段 T^j 的时候, 发生的机制是一样的, 以上描述的过程都会重复发生。

(二) 学生学习进阶机制的构建

皮亚杰通过大量的考证, 证明了个体的心理发展与学科的历史发展是可以对应的, 根据皮亚杰关于物理学理论发展的模型, 我们构建起学生学习进阶机制的模型, 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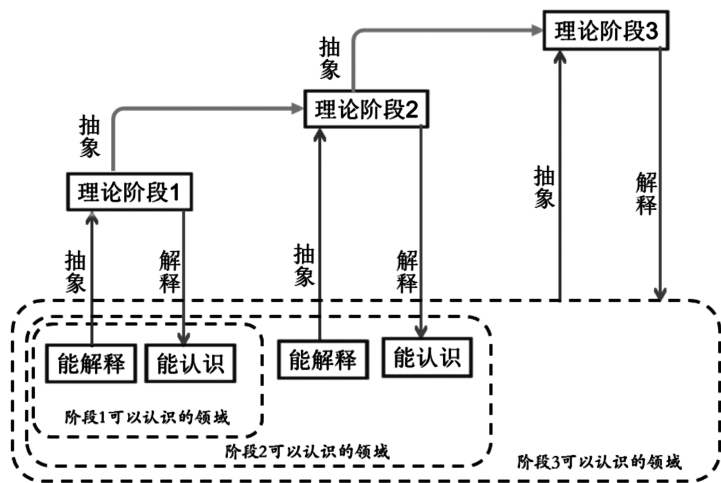


图2 学习进阶机制模型

第一, 学科理论 T 在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我们表示为各“理论阶段”, 对应于图 1 中的各个 T^i 。以本文研究的原子及相关概念的学习进阶为例, 对于小学或刚上初中的学生而言, 他们对于原子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 在他们的视野里, 大的东西是由小的东西组成的, 而原子, 就是很小的东西之一。

第二, 不同阶段学习者对原理的领会和把握, 都是在具体的情境里发生的, 这包括学习者对涉及到的各事物间的情境 S 和对这些事物存在的现象 F 的经验分析。如刚上初中的学生, 在解释物质构成的时候, 他们必须面对具体的事物, 如“一杯水”“一块铁”“一堆石头”等。这些东

①李其维:《评发生认识论的“反省抽象”范畴》,《心理科学》2004年第3期。

西连同他们的“原子”,必须在一定的时空里存在。学生描述的石头、水、铁块、空气等就组成了他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他们的经验基础,在图2中即为“能解释”的范围,这是构建高一级的理论阶段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三,理论需要通过一个基于现实的抽象过程建立起关系。但不同于科学家的研究,在限定的时间里,学生很难发现自身所拥有理论的缺陷,所以也就没有发展理论的动力,这就需要教师构造这样的场景,让学生从可以解释的经验开始,对相关问题、情境进行提问、辨析和取舍。这是一个经验抽象的过程,生动的现象和经验被模型化成“理论阶段1”。然后通过反省抽象的过程,帮助学生拓展可解释的领域,这样阶段1的理论逐渐得到确认和接纳,而学生可认识的范围——从一个理论阶段的认识范围,扩展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的认识范围,并且阶段越高,可以认识和解释的范围也越大。

第四,随着理论水平的提升,对同一事物的解释也会发生变化。学习科学知识,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复述的问题,而是要考查学习者是否真正基于理论“认识”了某个或某类事物。学习的结果既不是完全取决于纯粹的客体,也不是完全取决于主体,而是取决于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①这样,学习者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对同样的情境和现象的描述都会不同。比如在日出时刻,持“地心说”的人“看到的”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持“日心说”观点的人则“看到了”地球围着太阳转。一般情况下,人们“看到”的“事实”依赖于观察者的概念体系。

由此可见,学生学习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各门科学知识,既不是头脑空白的文字复制,更不能以是否可以复现理论的文字表达而告终。学习的关键在于可以构建起科学的解释体系^②。综上所述,科学概念或理论的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理论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超越原有理论的新的情境的出现。教学中评价个体是否“学会”了某个物理概念,或者是否实现了进阶,不仅要考查他能否复现原理的文字表述,还应从与理论对应的实践经验的判断和判定、相关模型的构建、思维和解释方式等方面予以确定。

三、以初中原子主题重要概念为例进行学习进阶研究

(一)测试过程

以小学到初中这一阶段学生关于“原子”这一主题的学习进阶情况为研究对象。首先,我们分析了我国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小学科学教材、初中物理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年级和九年级教材,并参照美国的NGSS(下一代科学标准),整理了关于“原子”的重要概念,把“物质结构”重要概念列表中小学阶段需要理解的重要概念作为起始概念,绘制出依据教科书及学习时间先后的概念关系图。然后,构建原子主题的双向细目表,制定原始题库。之后,运用Rasch模型进行分析、修改、测评等一系列环节,直到得到符合Rasch模型要求的题目。最终选取青岛某城区中学八年级、九年级各一个班共100个学生进行测试,试卷发放100份,回收100份,有效问卷94份,获得了测试题目的难度与被试对象的关系,并进一步得到了初中原子主题下重要概念的学习进阶模型。

(二)研究结果

通过测试,获得了测试题目的难度与被试能力关系的怀特图,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一个

①[瑞典]J.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21页。

②高嵩、洪正平、王其超:《科学探究中的科学解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X”表示一个被试,右侧为题号。从图中可以看出,题目和被试都有较好的匹配,保证了测量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从图3可以得到非常有趣的结果。首先看第3题(3.一杯水可以分成许多滴水,那么一滴水还可以无限分割下去吗? () A.能 B.不能 C.不清楚),该题问的是一滴水是否能无限可分,这与前后两个题(分别让被试分析小木块和封在袋子里的空气是否无限可分)考查的范畴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涉及考查被试对常见状态的物质是否理解它们是可分的,但这个题对被试来说却非常难。他们难以理解“小水滴”有多小,原子有多小,这说明对初中生来说,在头脑中无法构建起二者间的数量关系。而另一道与大小相关的11题(11.下列各物体的尺度,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夸克、原子核、质子、原子; B.质子、原子核、原子、夸克; C.夸克、质子、原子核、原子; D.原子、原子核、质子、夸克),让被试把夸克、原子核、质子、原子按照尺度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这对他们来说却是难度适中,这是因为在学习过相关内容之后,初中生对原子核的构成、电子的位置等在头脑中有较为清晰的模型,所以出错率较低。

其次,关注第9题(9.下列关于原子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的; B.所有原子都由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 C.所有原子内部的质子数和电子所带的电荷数不相等; D.带正电荷的电子在原子核外空间绕核高速运动),这个题目考查的是学生是否理解原子的结构,被试的出错率也比较高。在测试之后我们进一步做了访谈,发现学生之所以出错,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考虑到氢原子这个特殊情况。

本测试题中学生感到最困难的是第7题(7.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用胶水将对联贴到墙上,是因为胶水分子间存在_____的缘故。 A.粘性; B.引力; C.斥力; D.不存在),该题考查被试是否可以从分子间相互作用来解释胶水贴春联的现象,但很多被试认为胶水不同于学过的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种状态,所以粘性也不应该用“分子间既存在引力也存在斥力”来解释。胶水这种物质的分子还应具有引力、斥力以外的“粘力”,这说明初中生还没有很好地构建起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的模型。

而对于“原子主题”下的最后一个部分——对核能的解释,由于初中阶段,甚至整个中学阶段都不需要基于核的模型做出更多的解释。所以仅让被试判断关于核能说法对错的第13题(13.下列关于核能的说法正确的是() A.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中有原子核,所以利用任何物质都能得到核能; B.到目前为止,人类获得核能有两种途径,即原子核的裂变和聚变; C.原子弹和氢弹都是利用原子核裂变的原理制成的; D.自然界只有在人为的条件下才会发生裂变),对被试来说难度适中。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原子主题”的重要概念学习进阶,如图4所示。

虚线以下的是小学科学的学习内容,是初中原子概念建立的基础。图4与最初按照课程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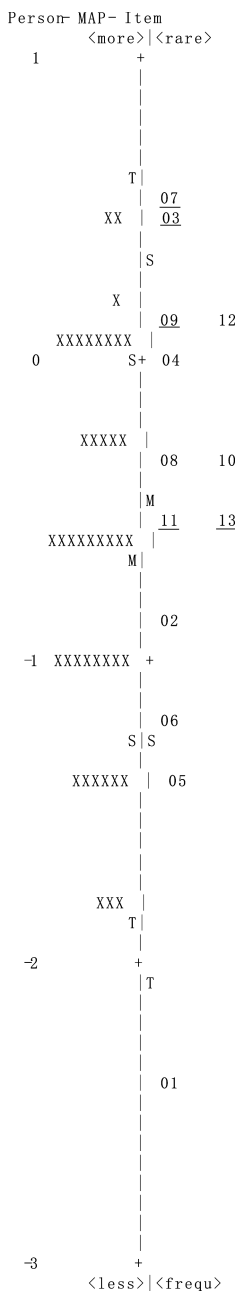


图3 初中物理原子重要概念测试题目与被试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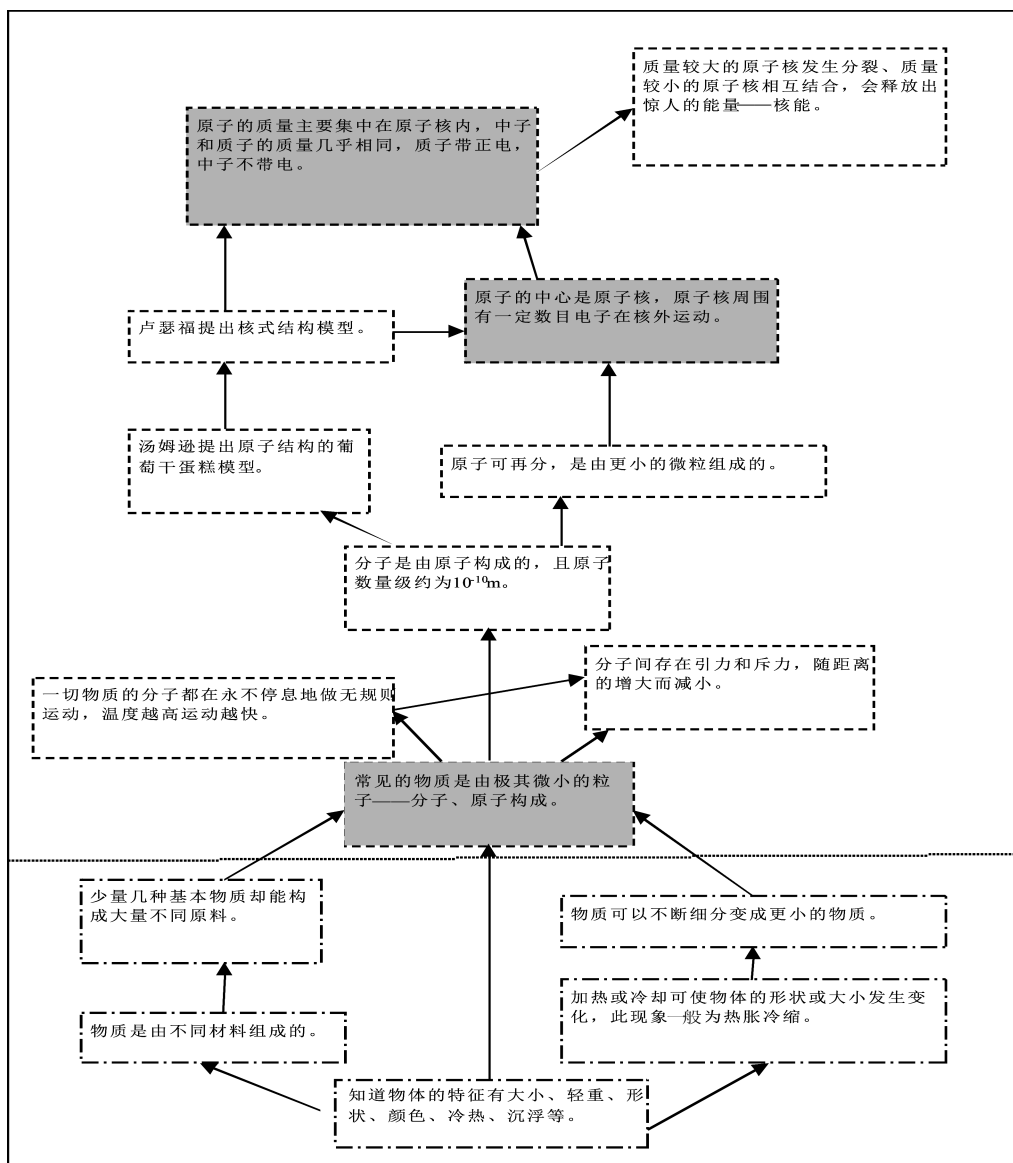


图4 “原子主题”学习进阶图

准和教科书制定的学习进阶存在以下三个明显的改变：

第一,对于分子动理论三条基本原理,许多教师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难度区别,然而在实际测试中,对于涉及原子大小的问题,学生依旧出错率很高,所以在修改后的“原子主题”进阶图中,将“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且原子数量级约为 10^{10}m ”设置为更高的进阶。第二,学生对分子动理论中“一切物质的分子都在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温度越高运动越快”的理解,对理解“分子间有引力也有斥力”有影响,所以二者不是绝对独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三,在图4中可以看到与原子相关的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即以原子、分子为解释模型的对宏观物质的构成和变化的理解;以“原子的核式模型”为解释模型的对原子本身的理解;以“原子核也有结构”为解释模型的对物质分类问题以及核物理问题的理解。而核能的利用则属于第三个层次的一个具体应用。所以,进阶的表现与学习时间的先后不是必然联系的。

四、结语

通过本研究,我们有如下结论:

第一,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的确有着明显的进阶。但是进阶不是指某一条概念或规律的进阶,而是与此相关的一组概念的发展。所以当我们考查学生的学习进阶时,要分析相互联系的概念组。越到高阶的认识,其相应的概念网络会更加的严密。

第二,通过本研究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构建学习进阶的过程是一个回归的过程。起点仍旧可以是教科书、课程标准,但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情况确定概念体系的层次,Rasch模型可以在学生的能力和题目的难度间建立起较好的对应性。当然,关于其他的研究,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该研究的认识,选定更加合适的方法。

第三,随着学习的展开,认识范围的变化并不是单一扩大。图2中某“理论阶段”的认识范围的变化并未像我们最初设想的那样仅仅是扩大,而是有两个方向:精确化和扩大化。比如小学阶段学生并没有清晰的原子的概念,所以,包括固态、液态、气态的所有的物质几乎都在他们的认识范围之内,但到了初中,原子图景越来越清晰,仅有微观的问题才能进入到原子主题的认识范围,使得研究的问题越加精确。另一个就是往更大的范围发展,基于氢原子的结构,便可以更好地了解 and 认识更多更复杂的原子的结构,并以此为基础,理解诸如金属为何能导电、物体间发生相对运动时为什么可以产生摩擦力,等等。

第四,物理概念的进阶,还体现在学习者所运用的工具上。进阶的层次越高,数学推理的工具介入得就越深。如本研究中的两个判断句“原子数量级约为 10^{-10}m ”和“一切物质的分子都在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字面上难以说明哪个难哪个易。但当面临具体问题时,前者要用数学表征、推理和运算,而这种能力的形成是非常不易的,对不同学生来说差异非常大。^①所以物理学大师费恩曼在讲解原子的时候,非常生动地讲到:“如果把苹果放大到地球那样大,那么苹果中的原子就差不多有原来的苹果那样大。”^②

第五,学习进阶还体现在描述所用的概念(或语词)上。如初中伊始,学生所说的原子可能就是很小的东西,虽然模糊,但它可以帮助学生为建立有关小得看不到的微粒概念做准备,而到了初中,学习了相关理论之后,他们逐步建立起“球形”的原子和分子的模型,此时,原子、分子也并未严格的区分,都是指的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分子动理论。这些站在认知的终点来看很不严格的语词,却能帮助学生逐步构建起以原子为核心的概念系统。

这提示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分析学习进阶的目标和学生的现实,采取恰当的手段,如合理设置学习情境,恰当引入物理学史的内容,循序渐进地引入数理工具,都可以有效帮助学生达到学习进阶的目标。

(青岛城阳第20中学的李雪莹老师,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焦蕊、王子龙参与了本文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①柳笛、杨纯:《儿童数量表征研究评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②[美]费恩曼、莱顿、桑兹:《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第1卷),郑永令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Research on the Mechanics of Learning Progression Based on Psychological Occurrence

Gao Song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At present, learning progress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basic education research, but how to construct and explain students' progress in a certain learning stage is not well explained. Based on the model to explain learning progression put forward by Piaget's Principle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som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to interpret the randomness in setting up learning progression an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drawing lessons. Taking as an example the learning progression of the study of atomic physic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empirical researches are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rictness and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Rasch model is used to expound and prove the testing and appraising tools and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 the data of students' knowledge of atoms but also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our explanation scheme.

Key words: learning progression; physics teaching; Principle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责任编辑:时晓红

《史记》三家注引《孔子家语》考^{*①}

王其和

(山东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重要文献,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对《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宋代以前,学者对《孔子家语》的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史记》三家注中就大量引用了《孔子家语》的内容,共计138次,或指出《史记》内容之来源、或对《史记》进行补苴、或对《史记》进行疏证、或指出与《史记》之异。这些材料对进一步研究《孔子家语》的成书时代和版本流传,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史记》三家注;《孔子家语》;考证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135-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14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重要文献,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对《家语》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王肃伪造说。此说始于宋代的王柏、陈振孙等,认为《家语》全系伪造,目的在于攻击郑玄之学。二是王肃“增加”说。《礼记·乐记》孔颖达疏引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②此说认为传世本《家语》有王肃窜入的成分,而非全部伪造。清代的沈钦韩、钱馥等亦持此观点。三是《家语》非王肃伪造说。宋代的朱熹、黄震,元代的马端临等持此观点,尤其是清代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意在证明《家语》渊源有自,决非王肃伪造。

晚近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家语》乃王肃伪作,以致《家语》的研究陷入僵局,鲜有学者从事《家语》的研究。直至20世纪70年代,《家语》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40号墓西汉竹简(《儒家者言》保存有二十七章)、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木牍的发现,特别是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面世和英国藏敦煌写本《家语》的公布,对《家语》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家语》的学术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和肯定。此后,学界又陆续出现了诸多研究成果,大多倾向于今本《家语》并非伪书,其原型早在汉初就已存在。

其实,在宋代以前,学者对王肃注《家语》是持肯定态度的,如《史记》三家注(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下简称“三家注”)^③中就引用了诸多《家语》的内容。据统计,三家注共引《家语》138次,其中《集解》引《家语》10次,《正义》引《家语》15次,《索隐》引用次数最多,达113次。所涉篇目中,以《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内容最

* 收稿日期:2019-11-20

作者简介:王其和(1976—),男,山东青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语言学视野下今本《孔子家语》研究”(18BYYJ01)的阶段性成果。

②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34页。

③ 本文所引《史记》三家注版本为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多,《五帝本纪》《乐书》诸篇也偶有涉及。三家注引用《家语》或指明《史记》内容的来源、或对《史记》进行补苴、或对《史记》进行疏证、或指出与《史记》之异,这对进一步研究今本《家语》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家注引《家语》指明《史记》内容之来源

三家注通过引用《家语》来指明《史记》内容的出处或来源,有时明确指明“见《孔子家语》”,说明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借鉴参考了《家语》的相关内容或材料。如《乐书》:“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索隐》:“此诗之辞出《尸子》及《家语》。”按:《南风》诗见《家语·辩乐解第三十五》: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又如《留侯世家》:“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索隐》:“此语见《孔子家语》。”按:“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见《家语·六本第十五》:“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文字与《史记》所引稍异。再如《陈杞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正义》:“《家语》云: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喟然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时之忠,弗能建其义;非楚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也。’”此文语出《家语·好生第十》,张守节引《家语》指明《史记》所载之文献来源。

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涉及孔门弟子的名字,大多与《家语》所述相同,《索隐》通常注作“《家语》同(也)”,如:“石作蜀,字子明。”《索隐》:“《家语》同。”“公肩定,字子中。”《索隐》:“《家语》同也。”“颜之仆,字叔。”《索隐》:“《家语》并同。”据统计,这样的例子共有14处之多。由此可见,司马迁在撰写《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时,的确把《家语》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资料。但我们发现,三家注引《家语》认为与《史记》所载相同,而与今本《家语》内容存在差异。如《仲尼弟子列传》:“公西舆如,字子上。”《索隐》:“《家语》同。”按:“公西舆如”,覆宋本^①、同文本^②《家语》作“公西与”,四库本^③、陈本^④《家语》作“公西舆”,与《史记》不同。又如《仲尼弟子列传》:“狄黑,字皙。”《索隐》:“《家语》同。”按:“字皙”,覆宋本、同文本《家语》作“字皙之”,陈本《家语》作“字皙之”,与《史记》所载亦有差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推测唐时司马贞所见《家语》的本子与《史记》所载内容应是一致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家语》在传抄刻印过程中出现了讹传,从而导致今本《家语》与三家注的内容出现了文字上的差异。

二、三家注引《家语》以补苴《史记》

三家注通过引用《家语》之文,有时用以补充说明《史记》的内容,使相关事件和人物更加翔实和丰富。

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史记》对一些孔门弟子的记载只有简单的名字,非常简略。三家注会引用《家语》内容,对其加以补充说明。如“冉雍,字仲弓”,《索隐》:“《家语》云:伯牛之宗族,

①覆宋本,指《四部丛刊》影印明黄曾覆宋本《孔子家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②同文本,指同文书局石印影宋抄本《孔子家语》,又见新世纪万有文库《孔子家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四库本,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孔子家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④陈本,指清人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

少孔子二十九岁。”^①又如“漆彫开，字子开”，《索隐》：“郑玄云鲁人。《家语》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岁。’又云：‘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可以仕矣。’对曰：‘吾斯之未能信。’”《正义》：“《家语》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岁。习《尚书》，不乐仕。’”司马贞和张守节通过引用《家语》对“漆彫开”的籍贯、年龄和性格特点进行了补充，有助于读者对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再如“叔仲会，字子期”，《索隐》云：“《家语》‘鲁人。少孔子五十四岁。与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执笔迭侍于夫子，孟武伯见而放之’是也。”按：此文语出《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见孔子而问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学岂能识于壮哉？’孔子曰：‘然，少成则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索隐》在作注时进行了概括处理，虽然不是原文引用，但也对叔仲会的主要情况作了介绍。

除了孔门弟子，对孔子本人的事迹，三家注也引《家语》对相关事件进行了补充。如《孔子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索隐》：“《家语》云生三岁而梁纥死。”按：《家语·本姓解三十九》：“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史记》没有说明叔梁纥去世的时间，《索隐》通过引《家语》指出叔梁纥是在孔子3岁时去世的。又如《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索隐》：“《家语》师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盖师襄子鲁人，《论语》谓之‘击磬襄’是也。”按：《家语·辩乐解第三十五》：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

三、三家注引《家语》疏证《史记》

三家注通过引《家语》之文对《史记》进行分析和疏证，有时引《家语》以证《史记》，有时引《家语》以驳《史记》。如：

(1) 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云“颜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少孔子六岁”，故此传云“父子异时事孔子”。

按：《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颜由，颜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少孔子六岁。”司马贞引《家语》以证《史记》颜回“父子异时事孔子”之事。

(2) 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仲尼弟子列传》）

《正义》：《家语》云：“瞿年三十八无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过四十，当有五丈夫子。’果然。”

按：此事详见《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梁鱣，齐人，字叔鱼，少孔子三十九岁。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谓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从之。二年而有子。”《正义》引《家语》对《史记》所载商瞿之事加以疏证。

(3)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世家》）

《索隐》：《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为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

^①今本《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无“少孔子二十九岁”句。

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

《正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纣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为颜氏,颜氏有三女,小女微在”。据此,婚过六十四矣。

按:孔子之父叔梁纣与颜微在婚姻之事,在《家语·本姓解第三十九》中有详细叙述: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纣,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微在。颜父问三女曰:“嚠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贫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微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对于《史记》中的“野合”的说法,司马贞认为不合礼仪的婚配为“野合”,张守节认为结婚时超过了适当的年龄为“野合”,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二者俱引《家语》为证。《家语》的地位和文献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4) 孔子生鲤,字伯鱼。(《孔子世家》)

《索隐》:《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名其子也。

按:此事见《家语·本姓解第三十九》。《索隐》引《家语》补充了孔子的婚姻情况,特别解释说明了孔子给儿子取名的背景和缘由。

(5) 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孔子世家》)

《集解》:服虔曰:“车子,微者也;鉏商,名也。”

《索隐》:《春秋传》及《家语》并云“车子鉏商”,而服虔以“子”为姓^①,非也。今以车子为主车车士,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则“子”非姓也。

按:此事又见《左传·哀公十四年》《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家语·辩物第十六》及《孔丛子·记问》等。《左传》《公羊传》俱作“车子鉏商”,《孔丛子》作“叔孙氏之车子曰鉏商”,《家语》作“叔孙氏之车士曰鉏商”,因此“车子”即“车士”。王肃注:“车士,持车者。子,姓也。”司马贞认为“子”非姓,车子即是以驾车为业的人,“人微故略其姓”。上古时期平民无姓,如“庖丁”“弈秋”“匠石”之类,司马贞的意见是正确的。

(6) 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而上文云“灭明状貌甚恶”,则以子羽形陋也。今此孔子云:“以貌取人,则失之子羽。”与《家语》正相反。

按:子羽,即澹台灭明。《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岁,有君子之姿。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据此,子羽应是相貌出众,所以孔子“以容貌望其才”,但结果却是“其才不充孔子之望”,因此孔子说:“以貌取人,则失之子羽。”除《仲尼弟子列传》外,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也提及此事:“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但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述澹台灭明时,司马迁云其“状貌甚恶”,与《家语》所载子羽“有君子之姿”“有君子之容”不合。

(7)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仲尼弟子列传》)

^①服虔,疑当为“王肃”之误。

《索隐》:郑玄云卫人。《家语》“齐人,高氏之别族。长不盈六尺,状貌甚恶”。此传作“五尺”,误也。

按:《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高柴,齐人,高氏之别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岁^①,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而有法正,少居鲁,见知名于孔子之门,仕为武城宰。”各本《家语》皆作“不盈六尺”,司马贞据此认为《史记》所记当有误。

四、三家注引《家语》指出与《史记》之异

三家注在引《家语》过程中,会指出《家语》与《史记》文字上的差异,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材料对于进一步深入考察《家语》的版本以及校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按其内容,又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 所载语句文字有异

(1)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货”作“化”。王肃云:“废举谓买贱卖贵也。转化谓随时转货以殖其资也。”

今按:覆宋本《家语》无此句。四库本、同文本、宋抄本《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子贡好贩^②,与时转货,历相鲁卫而终齐。”亦作“转货”,司马贞所见《家语》当作“转化”。“化”,“货”之古字。《尚书·益稷》:“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孙星衍疏:“化”即古文“货”字。^③

(2) 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三十岁。(《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云“鲁人,字子贱,少孔子四十九岁”,此云“三十”,不同。

按:覆宋本《家语》作“少孔子四十九岁”,四库本、同文本《家语》均作“少孔子四十岁”。古文“三”“四”形近易混,容易致误。这种情况在三家注引《家语》中较为常见,如《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索隐》:“《家语》云:‘鲁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岁。’今此传云‘四十二岁’,不知传误,又所见不同也?”《正义》:“《家语》‘鲁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岁’,不同。”

(3) 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于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大宰嚭用事。”(《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王劭按:《家语》《越绝》并无此五字^④。是时子胥未死。

按:覆宋本、同文本、四库本、陈本等《家语》均有“申胥以谏死”五字,当为《家语》流传过程中窜入。

(4) 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世家》)

《索隐》:《家语》作“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王肃云:“言听则仕,不用则去,保身全行,臣之节也。”

按:此二句文字有出入,但语义相近,当是司马迁以意重新表述,非原文照搬《家语》。

(5)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孔子世家》)

《索隐》:《家语》作“西方”。王肃云:“鲁国近东,故西方诸侯皆取法则焉。”

①四十,与《史记》所载有异,当为形误。

②好贩,四库本、同文本《家语》作“行贩”。

③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63页。

④五字是指“子胥以谏死”。

按:《家语·相鲁第一》:“孔子初仕,为中都宰。……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王肃注:“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史记》改为“四方”,与《家语》之意不符。

(6)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弩,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孔子世家》)

《索隐》:《家语》《国语》皆作“陈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鲁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则此湣公为是。

按:孔子在陈国时,有隼停在陈侯门庭死去,楛木做的箭矢穿透了它的身体,当时的国君不知为何物,故问于孔子。此事《家语·辨物第十六》和《国语·鲁语下》均有记载,俱作“陈惠公”,而《史记·孔子世家》作“陈湣公”。陈惠公于公元前533即位,在位28年。陈湣公是陈怀公之子,于公元前501年即位,在位24年。据《史记·陈杞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这与《孔子世家》所述正相合。据此,司马贞认为《史记》作“陈湣公”是正确的,《家语》和《国语》作“陈惠公”当为误记。

除此以外,还有如《孔子世家》“起累继之中”一句,《索隐》:“《家语》无此一句。孟子以为‘不然’之言也。”又如《孔子世家》“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一句中的“几然而长”,《索隐》:“《家语》无此四字。”再如《孔子世家》:“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索隐》:“《家语》无‘上’字。且《礼》云‘适墓不登阼’,岂合庐于冢上乎?盖‘上’者,亦边侧之义。”这些资料对于深入研究和校勘《家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辨析。

(二)所载人物籍贯或名字有异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载孔门弟子与《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记录的大多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弟子的籍贯或名字存在不同,三家注特别加以说明和分析。如:

(1)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云鲁人。按:偃仕鲁为武城宰耳。今吴郡有言偃冢,盖吴郡人为是也。

按:《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言偃,鲁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时习于礼。以文学著名。仕为武城宰。”司马贞根据言偃墓地所在认为其当是吴人,因为曾任武城宰(今属山东省德州市)之职,所以《家语》误其为鲁人。

(2)公冶长,齐人,字子长。(《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云:“鲁人,名莠,字子长。”

按:今本《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作“公冶长,鲁人,字子长。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无“名莠”二字。

(3)南宫括,字子容。(《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作“南宫缙”。

按:覆宋本、同文本《家语》作“南宫缙”,四库本《家语》作“南宫缙”。

(4)公皙哀,字季次。(《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作“公皙克”。

按:丛刊本、同文本《家语》作“公析哀”。

(5)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

按:四库本、同文本《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

子九岁。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覆宋本、陈本《家语》无“一字季路，少孔子九岁”二句。

(6)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岁。（《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伯虔字子折。《家语》作“伯虔字子皙”，皆转写字误，未知适从。

《正义》：《家语》云“子皙”。

按：伯虔之字，各本记载不同，《史记》作“子析”，《索隐》作“子折”，引《家语》作“子皙”，同文本、四库本《家语》作“子楷”，覆宋本《家语》作“楷”，陈本作“子皙”。“折”当为“析”之形误，“楷”当为“皙”之形误。

(7)秦冉，字开。（《仲尼弟子列传》）

《正义》：《家语》无此人。王肃《家语》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颜亥、仲叔会四人，《家语》有事迹，而《史记》阙。公伯寮、秦冉、鄒单，《家语》不载，而别有琴牢、陈亢、县亶三人。

按：此条张守节具体分析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家语·七十二弟子》中所收录孔门弟子的区别。

(8)郑国，字子徒。（《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薛邦字徒，《史记》作“国”而《家语》称“邦”者，盖避汉祖讳而改。

《正义》曰：《家语》云薛邦字徒，《史记》作“国”者，避高祖讳。“薛”与“郑”，字误耳。

按：依据《索隐》和《正义》的观点，郑国，本作“郑邦”，《史记》因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为“国”，《家语》作“邦”，不避讳，说明《家语》在西汉之前已成书。

除以上诸条，三家注引《家语》涉及孔门弟子名字的差异还有一些，如“公西葳字子上”，《索隐》：“《家语》‘子上’作‘子尚’也。”“县成字子祺”，《索隐》：“《家语》作‘子谋’也。”“端木赐，卫人，字子贡。”《索隐》：“《家语》作‘木’。”“罕父黑字子索。”《集解》和《家语》俱云：“《家语》曰：‘罕父黑字索。’”这些材料对进一步校勘今本《家语》和研究孔门弟子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三家注引《家语》有时也存在不足之处，现举一例：

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仲尼弟子列传》）

《索隐》：《家语》云“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不同也。

按：司马贞认为《史记》所载为“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而《家语》所载为“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故云“不同也”。其实，《家语·辩政第十四》原文为：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众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语丘所以为之者。”对曰：“不齐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举善矣。中节也，中人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齐之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以所治者，小也。”

《家语》所言“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正与《史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表述一致，非“不同也”。司马贞当是误解了《家语》之意。

以上仅就三家注引《家语》对《史记》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如三家注所引《家语》之间的异同、三家注所引《家语》与今本《家语》的异同等，这对《家语》的成书时代和版本流传等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A Textual Criticism of *Kongzi Jiayu* in Three Annotated Editions of *Shiji*

Wang Qi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Kongzi Jiayu* is an important Confucian document that records the words and deeds of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which is firstly recorded in *Record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Books of Han Dynasty*. As to the authenticity of *Kongzi Jiayu*, there have been controversi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cholars had he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value of *Kongzi Jiayu*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The content of *Kongzi Jiayu* was heavily quoted for totally 138 times in the three annotated editions of *Shiji* (*Historical Records*), in which the origins of the content of *Shiji* were pointed out, supplements made, the content expounded and annotated, and confusions marked out. These material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times of publication and the spread of versions of *Kongzi Jiayu*.

Key words: three annotated editions of *Shiji*; *Kongzi Jiayu*; textual criticism

责任编辑:孙昕光

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

——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①}

李 华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汉代“文景之治”源于对黄老思想的践行,这一观点几为学界共识。然而系统梳理汉文帝诏令发现,其对《孟子》中记载的仁政思想却多有言及,并且这一特点贯穿了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甚至官方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定位也与《孟子》中的仁政记载若合符节。这表明汉文帝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高度认可,“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儒术治国的一次成功践行,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又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同时此说也可以合理解释,孟子学史上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在汉文帝时代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对孟子“政治之学”的关注不应仅集中在学术层面,在汉代孟子学史的梳理过程中,统治阶层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同样不容忽视。

关键词: 汉文帝;诏令;孟子;仁政;文景之治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1-0143-14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1.015

由汉文帝开创的“文景之治”为人们称道 2000 余年,而究及“文景之治”的学术背景,学界多将之归因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成功践行。司马迁有“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②的记载;应劭有“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③的判断。自此而下 2000 余年,前贤时修对此结论亦多持认同态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称“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皆宗之。”^④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直接以“文帝黄老之治”为专章标题,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亦称“西汉初期。统治阶级知道人民需要休息,所以采取黄老‘清静无为’政策”^⑤,吕思勉《秦汉史》提到:“汉以无为为治,由来久矣……文帝颇多仁政”^⑥。郭沫若《中国史稿》也明确提到从刘邦到文景之时“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在政治上起了指导作用”^⑦。然而,以上观点却无法解释:为什么黄老之学的成功践行反而促成了儒学地位的迅速上升?为什么文、景之后的继任者汉武帝没有延续前代黄老治国的成功经验,却迅速将目光转向儒家学说并继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黄老之学却逐渐淡出统治阶层的视野?尽管学界对前说已偶有质疑^⑧,今人罗义俊也曾试图以“儒道双规制”的说法对前人观点与

* 收稿日期:2019-11-16

作者简介:李华(1982—),女,山东济宁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中国的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以孟子与两汉经学为中心”(14CZW019)、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NO.tsqn20161024)的阶段性成果。

②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0、3117页。

③ 应劭撰,王利器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6页。

④ 王鸣盛撰,黄曙辉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⑥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⑦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4页。

⑧ 如古永继、罗义俊均指出了这一说法中“见道不见儒”的理论偏失。见古永继:《“文景之治”非“黄老无为之治”——文景政策与思想剖析》,《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罗义俊:《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史籍记载进行调和,但却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文景之后黄老之学渐衰而儒学臻于极盛的问题。此外,《史记》《汉书》等记载文帝治国事迹的文献,也没有找到时人对文帝以黄老之术治国的具体描述。这都提示我们,之前的判断或有待商榷。

了解文帝治国思想倾向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从其诏令入手探讨。梳理汉文帝涉及治国理念的诏令^①——主要涉及帝王身份定位、振贷养老等民生政策、重农政策、对外政策、尊贤求谏等部分——能够发现,无论是在言辞还是在思想倾向上,诏令内容均与《孟子》内容存在高度相似:目前汉文帝诏令共计43篇,其中传世文献中有41篇,地湾汉简等出土文献中可见2篇。43篇诏令中与《孟子》语句或思想直接相关的便达24篇,占据总数的56%。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即位初期,即文帝元年正月至二年年末的16篇诏令中,就有11篇与《孟子》中的内容高度相似,占据了这段时间内文帝诏令总数的69%;而如果剔除封赏功臣、征召官吏等行政诏令,汉文帝施政诏令涉及王道仁政思想的内容与《孟子》相关比例则高达100%。这一现象,在秦火之后典籍散佚、学术与文化亟待重建的背景下出现,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一、汉文帝即位初期诏令与《孟子》的高度契合

汉文帝刘恒为汉高祖刘邦庶出的第四子,原封代王。公元前180年,周勃、陈平等高祖老臣联合刘氏宗室起兵诛灭诸吕后,因刘恒“仁孝宽厚”(《史记·吕太后本纪》)、“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汉书·文帝纪》)而拥其为帝。汉文帝于吕后八年闰九月即位,旋即颁布《即位赦诏》,大赦天下并分封功臣。此后,自汉文帝元年正月到三月不到90天的时间里,汉文帝陆续颁布3份诏令,而这3篇诏令的主旨均与孟子思想关系密切^②,而其后续有关仁政政治的诏令,也均在思想、主旨乃至用语方面与《孟子》高度相关(详见附表三)。

(一)《答有司请建太子诏》:人主身份定位“忧天下”

除吕后八年颁布的赦天下、封功臣的《即位诏书》外,文帝元年正月的《答有司请建太子诏》可以被视为能够体现汉文帝政治思想及施政主张的首篇诏令。虽然这篇诏令是对有司预建太子问题的答复,但由于其出现的时间节点恰恰是文帝初立之时,其中的语句或许最接近汉文帝早期的整体政治思想倾向: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

^①关于汉文帝时期的诏令是否为其手书的问题,前贤多有论及。如真德秀认为汉文帝诏书都发自内心:“《太史公书》于高景二纪诏,皆不书,独《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实意故也。不然,则山东老嫗扶杖听诏,愿见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动邪?”(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页)目前主要有两个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诏令均为汉文帝手书;而另一观点则认为,文帝诏令有一部分应为文帝口授之后,有专门的官员记载并整理发布。无论是手书还是口授,文帝诏令都是能够高度反映文帝治国理念和文化态度的最直接材料。

^②因本文将从文献的梳理与对比的角度展开讨论,这势必会面临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公共素材问题的界定与厘清,故在此对先秦两汉公共素材问题及本文所采用的文献对比方法进行说明。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公共素材问题,最早见于柯马丁(Matin Kernidao)在《〈尚书〉里的“誓”》(刘耘华、李爽学主编:《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4年第2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中提到的“文本库”(Repertoire)概念,及特别强调的早期典籍中的“文本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问题。徐建委在《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中也曾提到“公共素材”的问题,指出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一些相似的故事、说理、短语素材存在相似的情况,或许是因为源于同一语料库,“那些精彩的叙事或说理段落,虽不排除其出于作者原创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它们出于‘公共素材’的可能。”(第29页)诚然,柯说与徐说都提示我们在对先秦两汉文献的梳理过程中,仅凭文字和段落的相似即断定两者存在着关系的必然性的做法欠妥。但是如果相似之处不仅仅包括文字与段落等“素材”,同时在思想倾向、乃至整个思想体系,甚至对特殊情况的处理问题上均能保持高度的一致,那我们便可以跳脱所选材料为“公共素材”的困扰,而清楚辨识其资料来源到底是“公共素材”还是《孟子》中的私人著述。也正是因为这种担心和考虑,本文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将选择两者高度契合的部分进行探讨,所谓“高度契合”指在文辞、思想、主旨等各方面均相近者。为了表述的严谨,文辞相同而主旨不同的——如《求言诏》中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化用,不在此列;思想一致而未见文辞相同的——如《遗匈奴书》等,亦不在此列。如果以上两种类型皆列入,文帝诏令与《孟子》相似的内容比例将更高。

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①

文帝初立,面对有司让自己提前确立太子的建议,汉文帝的直接反应是再三婉拒。剥开倾覆其上的层层政治辞令的包裹,我们能够发现汉文帝拒绝预建太子的原因在于:“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即担心天下人认为汉文帝不重贤能、无法心怀天下苍生,而仅考虑自己一家之利。可见,甫一即位的汉文帝对帝王身份与任务的定位明确,即“忧天下”。

那么,“忧天下”这一概念源于何处呢?在目前可考的汉文帝时期及以前的文献中,惟《孟子》对“忧天下”的阐释最为完备: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

这段论述出现于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向齐宣王指出,君王应把百姓的忧乐放在首位,以百姓的忧乐为自己的忧乐,才能使得天下百姓归心,并达到“王”天下的最终目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正是称王于天下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天下人对他的基本要求。

反观汉文帝的诏令,文帝担心“人其以朕……非所以忧天下”,可见他非常在意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担心天下人认为自己不是心怀天下百姓的帝王。在仅200字的诏令中,汉文帝便提到“天下”7次,由此足见汉文帝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敏感程度。为此,汉文帝甚至不惜将“忧天下”与“建太子”相对立,并把“忧天下”的重要性置于“建太子”之上。虽然预建太子的事情在有司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得以推行,但不得不承认,文帝元年正月的这组诏令,体现出了汉文帝对帝王身份的理解与定位,以及对心忧天下的仁君人主形象的重视。“忧天下”的人主身份定位显现出汉文帝与孟子思想之间的深层关联。而其后的一系列诏令,也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二)《振贷诏》:“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文帝元年(前179年)三月,汉文帝颁布了《振贷诏》和《养老诏》。这两则诏令中,孟子仁政思想体现得更为明显,尤以《振贷诏》为著。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鰥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阡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③

这是汉文帝即位后所发布的第一篇切实关系国计民生的诏令。这篇诏令目的明确,针对百姓中的特定群体——“鰥寡孤独”,提出应当对鰥寡孤独之人给予特别的优抚与救济。

如果对这一思想追根溯源,最迟自西周时期,执政者已经注意到应对“鰥寡”之民予以特别重视。《尚书》中屡见“不敢侮鰥寡”的记载,如今本《尚书·康诰》载周公言:“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鰥寡”^④。《尚书·无逸》:“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⑤《诗·大雅·烝民》亦提到:“不侮矜寡,不畏强御。”^⑥《毛公鼎》中记载的施政注意事项中,也着重提到不能“侮鰥寡”一项:“王曰:父厝,今余唯申先王

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9页。

②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9页。

③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页。

④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5页。

⑤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0页。

⑥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99页。

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汝顛于政,毋敢龔囊,乃侮鰥寡。”^①此外,应对鰥寡孤独之人给予特别优抚的记载,亦见于今本《管子》《孟子》:

当春三月,……举春,祭塞久禱,以鱼为牲,以麩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鰥寡,賑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②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③

虽然周代以来“不侮鰥寡”的记载屡见不鲜,但是把对鰥寡孤独之人的抚恤上升到施行仁政问题首位的,却唯《孟子》独然:“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④《尚书》《诗·大雅》中强调了鰥寡孤独人群的重要性;而《管子·禁藏》对鰥寡孤独的优抚政策是与春三月的诸多时令政策并列出现的,并没有强调其特殊性和重要性。这一记载与《吕氏春秋·仲春纪》《礼记·月令》中仲春月应“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等记载较为相似。^⑤唯有《孟子》特别强调了周文王在施行仁政过程中,对鰥寡孤独之人的优抚是其施行仁政的首要任务,直接将鰥寡孤独问题放到施行仁政政策的最优先位置。在与齐宣王的问对中,孟子以儒家理想政治制度中的代表人物周文王为例,指出“王政”包括减轻赋税、开泽梁之禁、罪责不及家人等一系列政治举措,而其中最关键也是首要需解决的问题,即是对鰥寡孤独人员的抚恤。孟子指出,鰥寡孤独“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是最无所依傍且最需救助的人群,因此周文王把对这四类人群的抚恤作为施行仁政的第一步。换言之,在孟子看来,这应是仁政政策施行的首要任务。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的南宋理学家张栻曾评价说,此章所记载的“文王始治岐之法,即经理天下之法”^⑥,而重视鰥寡孤独的政策是“王政之本”,即仁政政策的核心与根本。

回到汉文帝的《振贷诏》,这则诏令无论是在发布时机还是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都与孟子所倡导的“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若合符契:从时间上来看,颁布该诏令时正在汉文帝即位之初,距离汉文帝即位仅半年时间,是汉文帝在确立自己地位的合理合法性后所发布的首份关乎国计民生的诏令。换言之,这是汉文帝以帝王身份治国理政的第一次尝试。因此,这次诏令的内容选择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份诏令足以在总体上反映汉文帝的执政基调。而在内容选择上,汉文帝特别强调对鰥寡孤独等穷困之人的救济问题,并敦促手下官员商讨具体抚恤方案。汉文帝的施政举措的第一步恰恰与《孟子》中所记载的文王施行仁政政策的首要举措高度相似,即均是从对鰥寡孤独的抚恤开始的。

结合汉文帝拒立太子时的“忧天下”一说,以及史书中对汉文帝“施德惠天下”的记载可以推测,汉文帝在其即位之初的首次政治实践中选择关注“鰥寡孤独”人群,并与《孟子》中记载的周文王施行仁政的首位要务遥相呼应并非偶然,其中蕴含了汉文帝施行仁政、比肩文王的政治期待。其后的一系列诏令均为佐证。

(三)《议除连坐诏》:文王治岐“罪人不孥”

与《振贷诏》一样,文帝元年十二月的《议除连坐诏》同样也与《孟子·梁惠王下》“王政可得

①《毛公鼎铭释文》,《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②房玄龄注,刘绩补注:《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③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3、136-137页。

④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6页。

⑤《续汉志·百官志五》有郡国“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的记载,邢义田也曾指出“月令之一的春令,曾对汉代地方行政发生指导的作用”。见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新史学》1998年第1期。

⑥张栻:《孟子说》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通志堂经解本,第16页。

闻与”章关联密切。这也再次体现了汉文帝执政理念与孟子王道政治思想间的深层关联。

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①

文帝元年年底，汉文帝下诏召集大臣商议去除连坐制度。汉文帝在诏令中指出，犯法者受到惩罚之后，其本身并没有罪责的父母妻儿等应免于刑责。这一“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的思想与《孟子》中的“罪人不孥”的记载高度一致。焦循《孟子正义》中对“罪人不孥”曾有详细解释：“何忌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正文王罪人不孥之事也。罪人，谓加罪于人，即不慈不孝不友不恭，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也。不孥，谓本身恶宜加罪，其父子兄弟不从恶，则不坐也。若从恶，即是本身有罪，当不止奴戮。”^②焦循明确指出，孟子“罪人不孥”思想可以从《尚书·康诰》中找到依据。孟子所载的“罪人不孥”宣扬的是周文王时代追究罪责不累及家人的仁政举措，即罪犯犯禁理应受到相应惩罚，但如果罪犯家中父兄没有协同犯禁，那么他们不必因其罪责而受到牵连。而汉文帝“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的论述恰恰是对“罪人不孥”的详细表述。且更为直接的证据在于，汉景帝元年十月，言及汉文帝一生功德的诏令，也直接援引“罪人不孥”一词评价汉文帝的历史功绩。

孟子“罪人不孥”的思想同样见于《孟子·梁惠王下》的“王政可得闻与”篇。由于该篇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孟子仁政思想的多个层面，一向被视为孟子仁政思想的代表性章节。南宋理学家张九成曾因孟子此篇对王道政策阐释的完备、蕴含着治理天下的智慧，而盛赞“孟子可谓能用天下国家矣”^③；南宋理学家张栻也曾指出《孟子》中所提到的“罪人不孥”等内容“皆王政之纲目”，是推行仁政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如果与汉文帝政策的背景相结合能够看到，汉文帝此处诏令的内容选择并非偶然：文帝元年三月的《振贷诏》贯彻了“王政之本”政策；文帝元年十二月的“除连坐”的执政思想又恰恰是对“王政之纲目”的贯彻。并且，《孟子》中“罪人不孥”与重视鳏寡孤独的论述，不仅出现于同一章的同一节，而且为前后相邻的两句，由此可见汉文帝对《孟子》中这一章“文王始治岐之法，即经理天下之法”的熟稔程度。尽管孟子并非“罪人不孥”思想的首倡者，但却是汉文帝“除连坐”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④

(四)《养老诏》：“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

文帝元年三月，与《振贷诏》同时颁布的，还有《养老诏》。

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⑤

这则诏令的主题是给予年长者在衣食方面以特别的优抚。随后，《汉书·文帝纪》记载了有司根据诏令要求而进一步细化的具体措施：“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⑥

诏令最终以“具为令”结尾。对于以“令”结尾的诏令，陈梦家在《汉简缀述·西汉施行诏

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4页。

②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5页。

③张九成：《孟子传》卷三，四部丛刊三编景本，第30页。

④虽然孟子“罪人不孥”的思想与今文《尚书·康诰》存在渊源关系，但是汉文帝的这一诏令却并非直接绍继《尚书》。据《史记》记载，汉文帝曾遍寻天下，最终找到伏生才使得《尚书》之学得以保存和流传：“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24页）虽然《史记》并没有详细记载汉文帝求治《尚书》具体发生哪一年，但这恰恰佐证了汉文帝发布《议除连坐诏》时无缘接触《尚书》的事实。

⑤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页。

⑥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页。

令》中曾专门提到,有“令”结尾的诏令不仅预示着其行政效力的长期性,同时也是对前“律”(即之前行政举措)的一次较大变动:“汉代律、令、诏三者有分别,有混同之处……诏书是天子的命令,以特定的官文书形式发布,皆针对当时之事与人,是临时的施政方针。但诏书所颁布新制或新例,或补充旧律的,可以成为‘令’,即具有法律条文的约束力。杜周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后者指时主的诏书可以编订为‘令’,《宣帝纪》注引‘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凡诏书而编著为‘令’者,有时在诏书中明白注出”^①。可见,“具为令”在这有两层意思:其一,这意味着对前代或刘邦以来的律令相关内容的一次重要调整。这种以“令”结尾的情况,在汉文帝发布此诏令之前,仅在汉高祖刘邦的诏书中出现过一次;而再次出现则是在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诏中。其二,这次调整并非临时性的政策变动,而是被视为一项需要长期贯彻实施的施政方针。据地湾汉简显示,文帝二年七月又颁布并施行了与之相似的一则诏令,该简长约36.5厘米,为“文帝二年七月诏,命郡国养老诏”,“简所记之诏是命郡国养老之令,与文帝元年养老令不同。”^②此后,《武帝纪》元狩元年四月、六年六月、元封元年也均有涉及优抚老年的诏令。《后汉书·章帝纪》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诏中提到“甚违诏书养老之意”^③,所指亦为汉文帝元年三月的养老令。自汉文帝元年三月的养老诏令颁布之后,经武帝时再到东汉时期,这一诏令的有效性仍是持续存在的。由此可见,这份不足百字的诏令,其中的分量是不容忽视的。这一政令不仅是汉文帝执政之初针对秦汉政令的一次较大变革,而且具有长效性和律例性,并得到了切实的推行和贯彻。^④

作为汉文帝即位之后的首项长效施政方针,《养老诏》首句即提到此次发布诏令的直接原因是“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而这句话为我们寻找汉文帝发布这篇诏令背后的思想倾向提供了线索。《孟子》和《礼记·内则》《礼记·王制》中,均曾出现过类似记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礼记·王制》最终成篇于汉文帝十六年^⑤,从时间上来看,难以成为汉文帝元年诏令的理论来源;且《礼记·内则》侧重于记载家庭内部成员所当遵循的法则及礼制^⑥,在代表国家意志的诏令中出现似不合常理。但是,如果将诏令与《孟子》相比对的话,这些问题却都迎刃而解了。《孟子》中“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相关记载出现过3次,在《孟子》中占据重要比重,是孟子仁政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

①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8页。

②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1、282页。

③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7页。

④汉文帝时期,相关行政部门要求县道等地方行政机关,根据不同的年龄对老人采用相应的优抚政策。《汉书·文帝纪》中记载了有司的相关做法,而在居延地湾地区出土的西汉初期施行诏令中,也记载了相关诏令和施行情况。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2页。

⑤有关《礼记·王制》的成篇时间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2页):“(前164年)夏四月,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此后,班固、郑玄、卢植等皆沿用此说,汉文帝十六年“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14页),卢植:“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郑玄:“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但是,唐代孔颖达则认为“《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此后,各种观点频出。然而作为《礼记》研究的翘楚,清人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和朱彬的《礼记训纂》也均主张《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考虑到距汉文帝时间最近的《史记》,以及得到了官方认可的《汉书》均有此记载,本文此处采用通行观点,以《史记》中的记载为准,认为《王制》成于汉文帝十六年的博士诸生之手,晚于文帝元年三月养老诏令的发布。

⑥郑玄《目录》云:“名曰《内则》者,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孔颖达《正义》曰:“以闺门之内,轨仪可则,故曰《内则》。”郑玄《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分见: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28页,第330页;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0页)

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①

梁惠王曰:“……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③

以上内容,分别出现于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言及具体仁政措施时,以及孟子对仁政思想的总结中。《孟子》中曾三次系统论及“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问题,并明确指出这一问题是仁政政策的题中之义和重中之重:“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老者(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指出文王的仁政举措中,对老者以特别的优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冻馁之老者”是后人主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与保证。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在专门谈及西伯(周文王)善于养老的问题时,孟子明确指出养老政策的根本解决方式在于制民之产:“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④这与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问对的两篇遥相呼应,不仅指出王道政治的施行过程中养老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论及解决养老问题的具体举措:“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可见,无论是从篇幅、谈论对象还是从出现频次来看,“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问题不仅是孟子仁政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引发孟子具体仁政举措的关键环节。

汉文帝元年三月的养老诏令体现出与孟子仁政思想的高度一致性。首先,汉文帝命令有司根据不同的年龄安排相应优抚措施,即赐给 80 岁以上的老者以米、肉和酒,赐给 90 岁以上的老人以棉和帛的做法,恰恰与孟子老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的政治期待相呼应:“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⑤其次,从汉文帝的“具为令”一词来看,在汉文帝之前,对老者的存问抚恤问题并没有提升到国家政令的层面。而在文帝元年岁首的时候,汉文帝特别强调了养老问题的重要性,并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长期政令的方式固定下来,由此可见汉文帝对养老问题的重视程度之高。结合《孟子》中对养老与仁政问题之间的深层关联,文帝发布此诏令的思想倾向可明:汉文帝把养老问题放在了自己德政政策的重要环节。虽然汉文帝元年三月的《养老诏》与地湾汉简所见汉文帝二年的养老诏令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其指导思想却是一以贯之的,且得到了切实推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汉文帝确实在治国策略上系统效法孟子仁政思想的话,那么他不会止步于在养老政策上的简单呼应,孟子仁政思想中最核心的“制民之产”的部分在其诏令中也应有所体现。

①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11页。

②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2、55、58-59页。

③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95页。

④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11页。

⑤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页。

那么在随后的执政时间里,文帝诏令中有没有涉及制民之产的相关政策呢?答案是肯定的。文帝二年至文帝十三年六月的一系列劝农诏,再次展现出与孟子仁政政策高度相合的内容。

(五)《劝农诏》:“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在史籍可见的汉文帝诏令中,《劝农诏》出现了数次: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纪·二年九月劝农诏》)^①

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汉书·文纪·十二年三月劝农诏》)^②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廛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汉书·文纪·十三年六月劝农诏》)^③

从汉文帝十二年三月诏能够看出汉文帝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汉文帝在其诏令中提到“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④,可见重农政策已施行多年且被多次强调。查考文帝十二年以前诏令,关于劝民农桑的诏令有两道:一是文帝二年正月的《开藉田诏》:“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耜,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⑤。二是当年九月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⑥这两条诏令应是汉文帝所说的“数下”的部分诏书。

从诏令内容来看,文帝“岁劝民种树”的动机在于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如果用表格的形式,把汉文帝的劝农诏令与《孟子》中有关章节放在一起对比——能够发现两者在制民之产的主题上存在着诸多一致(见附表一)。

首先,汉文帝的几次劝农诏令中均首先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农业是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强调应当重视农业,“道民之路,在于务本”,这与孟子在与齐宣王的问对中的“盍反其本”的观点如出一辙,均指出了以农为本的重要性。其次,两者在具体举措上也存在相似之处,孟子指出解决百姓温饱问题的具体手段为“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即包括种植桑树、开辟草莱、养殖禽畜等具体措施,使百姓的生活达到最基本的自给自足;而汉文帝的“劝民种树”,也是着重强调劝民农桑,开辟草莱。此外,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通过重视农桑的方式,使得百姓免于饥寒。

附表一:汉文帝《劝农诏》与《孟子·梁惠王上》内容对比表

主题	《孟子·梁惠王上》	诏令内容	诏令时间
务本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二年九月
		道民之路,在於务本;	十二年三月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十三年六月
种五谷树桑麻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岁劝民种树	十二年三月
百姓不饥不寒	可以无饥矣	民有饥色	十二年三月

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页。

②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4页。

③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页。

④从尹湾《集簿》的内容来看,“春种树”亦应作春季耕种农作物解。见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

⑤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7页。

⑥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页。

二、汉文帝诏令对孟子仁政思想的系统承继

以上仅以汉文帝初期诏令为例探讨了二者在仁政思想上的高度相似性。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诏令与孟子仁政思想的一致性不仅在其执政初期有所体现,而且贯穿于汉文帝执政的整个阶段。但凡涉及养孤老、减刑罚、薄税敛、求贤等与仁政密切相关的内容,均出现与《孟子》高度一致的现象(具体可参见附表三);甚至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以及处理淮南王谋反等事情上,汉文帝也借鉴了《孟子》“以大事小”“舜封弟象”的思想^①。更为重要的是,汉文帝诏令中所体现出的仁政思想体系同样也与孟子的仁政思想系统高度一致;甚至汉景帝时期,制诏御史直接化用《孟子》“王道可得闻与”篇中的“文王治岐”部分作为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官方总结。

尽管王政问题历来是儒家学者着重关注的问题,孟子托名先王的王政思想也并非独创,但孟子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对王政问题的系统化。“王道可得闻与”篇正是《孟子》中最为典型的一篇: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②

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托名文王治岐,提出了王道政治的具体举措,其中涉及保民、省刑、薄税、重贤等方面,即便并不接受其王道主张的齐宣王也不得不称赞“善哉言乎”。尽管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散见于《孟子》中不同的篇章,但该篇却是孟子王道仁政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的南宋理学家张栻曾评价此篇说:“文王始治岐之法,即经理天下之法也”,即其中所言是治理天下的基本内容“皆王政之纲目”与“王政之本”。

文王始治岐之法,即经理天下之法也。耕者九一,八家各耕百亩而同养公田,助而不税也;仕者世禄,赋之采地也;关市讥而不征,察非常禁奇袤而已不征其物也;泽梁无禁,与人共之也;罪人不孥,不及其妻子也。凡此皆王政之纲目也,而发政施仁必先于鰥寡孤独,盖是四者人情之所易以忽而文王每笃之,不使其独无告也,此可见公平均一不遗匹夫匹妇仁人之心,王政之本也。^③

张栻指出,“政施仁必先于鰥寡孤独”的观点是仁政思想的根本内容;而涉及保民、减税、解除关禁、罪人不孥等内容,是王道仁政的具体表现形式。以上诸部分,正是“经理天下之法”,即以王道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无独有偶,南宋理学家张九成读《孟子》至此时,也曾盛赞孟子王道政策思想的完备及施行的可能性,称“周家八百年基业造端于此时”“孟子可谓能用天下国家矣”:

^①《孟子·万章上》记载了孟子与弟子万章有关“象至不仁,封之有庠”的问对。万章对舜不仅不惩罚屡屡伤害自己的弟弟,反而对其加封的事情表示不解,而孟子则强调此事彰显了舜的仁心,指出“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31页)在处理淮南王刘长的相关事情上,汉文帝显然效法了孟子的思想。他没有采纳群臣“长当弃市”的建议,而是屡屡强调其“不忍”和“亲爱”之心,对淮南王从轻处罚:赦免刘长死罪、废其王号,谪徙蜀郡严道邛邰。甚至为他提供相对优渥的条件:“给肉日五斤,酒五升,令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之。”(荀悦:《汉记》卷四,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刻本,第49页)刘长病死后,汉文帝又追尊刘长为厉王,并立其三子为王:“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26页)

^②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3、136-137页。

^③张栻:《孟子说》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通志堂经解本,第16页。

余读孟子之对,有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以至发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独。呜呼!王政之大,乃如此其忠厚乎。生斯时也,其亦何幸哉。夫耕者九一,则百畝之田,得九十畝以遂仰事俯育之心;仕者世禄,则贤者之后、功臣之世无贫贱饥寒之患;关市讥而不征,则商贾乐出于道路;泽梁无禁,则伐木取鱼,养生送死可以无憾;罪人不孥,则家族保全,无横死之苦;发政施仁,先鰥寡孤独,则老幼无依者皆以文王为父母矣。夫使为农者足于谷,为仕者足于禄,为商贾者安肆于懋迁,为王者无憾于生死,有罪者血食不絕,为天下之穷民者困苦有依,合一国之间,为农、为士、为商贾、为民、以至有罪者、鰥寡孤独者一皆得其所。熙熙然如春台,盎盎然如醇酿,乃知周家八百年基业造端于此时也。余涵泳其意,吟哦其风,心不忘念,口不停诵,深仰王政使人如此优裕也。呜呼文王之所以为文王,其在兹乎!其在兹乎!……宣王正堕蛊惑昏醉中,亦知以此言为善,孟子可谓能用天下国家矣。^①

学者每每论及此篇,无不对《孟子》思想中王道政教内容的系统性和可行性持高度认可态度。这种认可不仅出现于汉代以后,而且在汉景帝时期的《定孝文帝庙乐诏》中也有明确体现。

汉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代拟的《定孝文帝庙乐诏》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给予了官方评价。这一汉代最高行政文书中对汉文帝功业的盖棺定论,恰恰与《孟子》“王政可得闻与”篇若合符契:

(汉景帝)元年冬十月,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嗜欲,不受献,罪人不孥,不诛无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②

为彰显汉文帝一生功绩,汉景帝元年十月在汉文帝庙为《昭德》之舞,“舞者,所以明功也”。诏令指出“祖有功而宗有德”,其中的“宗”所指即为汉文帝,应劭解释称:“始取天下者为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可见,在汉代官方文件《定孝文帝庙乐诏》中,汉文帝的重大功绩在于其施行仁德之政。而此段记载恰恰与集中反映孟子仁政思想的代表篇章,即《孟子·梁惠王下》“王政可得闻与”篇高度契合。如果以表格对比的方式来看这部分内容,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见附表二)。

附表二:《定孝文帝庙乐诏》与《孟子·梁惠王下·王政可得闻与》内容比较

篇名	汉景帝元年《定孝文帝庙乐诏》	《孟子·梁惠王下·王政可得闻与》
所涉人物	孝文皇帝临天下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内容比较	——	耕者九一,仕者世禄,
	通关梁,不异远方。	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
	除诽谤,去肉刑罪人不孥,不诛无罪	罪人不孥。
	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	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	(齐宣)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①张九成:《孟子传》卷三,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29-30页。

②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7-138页。

对比上表可以发现,诏令有意将“孝文皇帝临天下”与“文王之治岐”一事对举,以彰显汉文帝的德政举措比肩于周文王的地位与影响。相较于《孟子》“王政可得闻与”篇,《定孝文帝庙乐诏》在总结汉文帝的仁政举措时,仅仅没有提到《孟子》中的“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部分,其余内容不仅在思想倾向上,甚至在仁政内容的具体排列顺序上都与《孟子》的“王道可得闻与”篇高度相似。此外,在具体的仁政举措以及言辞选用上,两者也均存在高度相关性。例如“罪人不孥(斃)”一词的使用,仅见于《孟子》与《定孝文帝庙乐诏》。再如,“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所涉及的保证市场有序、货物正常流通的思想,不仅在《定孝文帝庙乐诏》中有所涉及,在汉文帝政令中也有所体现:“孝文十二年,除关不用传,令远近若一。”^①甚至还见于汉文帝时期组织编撰的《礼记·王制》篇中。焦循《孟子正义》在阐释“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句时,引用赵佑《温故录》:“《王制》古者……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并称《王制》“与孟子此文吻合”^②。“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的记载,也恰恰与孟子仁政思想高度强调“鳏寡孤独”的问题高度相似。

《定孝文帝庙乐诏》出现于汉景帝即位元年,授意于汉景帝、成于汉代制诏官吏之手、载于《史记》,是汉代官方对汉文帝一生功绩评价的最直观记录,有极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其中内容与《孟子》的高度相似,为我们理解汉文帝仁政思想与孟子仁政思想之间的关联,再次提供了有力佐证。而系统梳理汉文帝执政时期诏令能够发现,《定孝文帝庙乐诏》将汉文帝与《孟子》记载中的“文王治岐”对举并非过誉。汉文帝诏令在涉及仁政思想的相关诏令中,均展现出与孟子仁政思想体系高度相关的特点,如附表三所示:

附表三:文帝诏令与《孟子》仁政思想体系对照表

诏令主题	诏令时间	诏令名称	诏令主旨	《孟子》仁政主旨
帝王身份定位	元年正月	答有司请建太子诏	忧天下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收恤孤独	元年三月	振贷诏	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振贷之	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鳏寡孤独)
赏赐长老	元年三月	养老诏	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使人存问长老,……布帛酒肉之赐	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
	二年七月	命郡国养老诏 ^③	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	
省刑罚	元年十二月或二年	议除连坐诏	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 ^④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
	十三年五月	除肉刑诏	故夫训道不纯,而惠民陷焉。	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处理邻国关系	元年	赐南粤王赵佗书	以大事小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
	后二年六月	与匈奴和亲诏	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元元之民。	
	后二年	遗匈奴和亲书	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嘉。	

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8页。

②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3页。

③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1页。

④“不孥,谓本身恶宜加罪,其父子兄弟不从恶,则不坐也。”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5页。

诏令主题	诏令时间	诏令名称	诏令主旨	《孟子》仁政主旨
以农为本 薄税敛	二年正月	开籍田诏	夫农,天下之本也。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圣人治天下……,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王如施仁政于民,……薄税敛。……故曰:“仁者无敌。”
	二年九月	劝农诏	农,天下之大本也……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三月	劝农诏	道民之路,在於务本	
	十二年三月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	力田,为生之本也(生民之本)	
	十三年二月	耕桑诏	亲率天下农耕	
	十三年六月	劝农诏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减轻百姓负担	二年十月	令列侯之国诏	民不劳苦,上下欢欣	以佚道使民
	未详	却献千里马诏	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关注民生	未详	议以佐百姓之急诏	阴阳不调,日月薄蚀,年谷不登,大遭旱蝗饥馑之害,滴见天地,灾及万民。丞相、御史议可以佐百姓之急。	民事不可以缓
	未详	言罢作露台	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推举贤良 求言直谏	二年五月	除诽谤妖言法诏	来远方之贤良	养老尊贤,俊杰在位。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
	二年十一月	日食求言诏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十五年九月	策贤良文学诏	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以匡朕之不逮。……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	
	后元年三月	求言诏	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	
处置侯王	六年	徙淮南王长制	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	象至不仁,封之有庠。

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就诏令与《孟子》中的诸多具体相似之处一一尽指,而仅从其思想倾向上作简单分类梳理。通过附表三可见,汉文帝诏令与《孟子》相关的共计 24 篇,具体涉及帝王身份定位、对鳏寡孤独和老人的抚恤政策、轻刑罚、薄税敛、以农为本、减轻百姓负担、举荐贤良、求言、和平处理邻国关系等 10 个主题。除有关如何处置淮南王的相关问题因发生时间较晚而在其执政之初的诏令中没有体现,其他诏令的主题均在汉文帝执政初期诏令中明确出现过:例如养老问题在汉文帝元年三月和二年七月均有所涉及;省刑罚的相关主题同样也是最早出现于文帝元年,其后在文帝十三年五月的《除肉刑诏》中再次得到体现;而以“以大事小”的方式处理邻国关系的做法,同样也是最早在文帝元年中有所体现,其后二年再次颁布诏令(虽然对象不同,但是方法却是一以贯之的);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以农为本的相关诏令,在汉文帝二年正月的《开籍田诏》及二年九月的《劝农诏》确定以农为本的基调后,汉文帝诏令“数下”,到文帝十二年 and 十三年还曾在《劝农诏》《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耕桑诏》《劝农诏》等相关诏令中反复言及。但从汉文帝诏令的内容分类中能够明显看出来,汉文帝诏令内容,几乎均是其执政初期诏令主题的延

伸,涉及保民、省刑、薄税、重贤等不同的层面。

可见,汉文帝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承继贯穿了其整个执政阶段,孟子仁政思想构成了汉文帝仁政实践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余论

赵岐曾在《孟子题辞》中对孟子思想价值有如下评价:“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①但是,历代学者对《孟子》思想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卿大夫”和“守志厉操者”的士人层面,而鲜见从“帝王公侯”的角度来探寻其价值所在。然而,孟子对其自身的学说定位却恰恰是主要针对“帝王公侯”的学问。所谓“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②,孟子之时,天下“红紫乱朱”^③、诸侯“争于气力”^④,为解民倒悬,孟子游历齐梁诸国、向各国国君推行其仁政主张,尽管连连碰壁:“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⑤,但却一直对其学说充满信心,即便最终因游说失败而离开齐国也依然发出“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⑥的感慨。可见,孟子对其学说价值界定明确,即旨在为人主提供“平治天下”的方法。后世学者在探讨其思想价值时,仅从士人阶层的角度探讨人们对孟子思想的承袭,而罕言孟子“迂阔”之言对“帝王公侯”切实影响的做法,无疑偏离了孟子的初衷。

如果我们把孟子学说的接受主体从“卿大夫”和“守志厉操者”的范围扩展到“帝王公侯”层面,能够发现,孟子“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预言在汉文帝时代已得以应验。梳理汉代孟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孟子身后百余年,与孟子学术承传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多集中出现在汉文帝时代:其一是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⑦,“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⑧汉文帝设置的一经博士中,即包含《孟子》,这不仅是《孟子》在汉代最早见于著述的记录,也往往被认为是汉代孟子学兴起的重要标志。从赵岐开始,前贤时修谈到汉初孟子地位,必首先言及此处;其二是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汉文帝诏命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王制》中出现了大量引用《孟子》的现象。比照汉代孟子学发展史上的其他事件,汉文帝时代不仅频繁出现涉及孟子学发展的大事件,而且在时间上也非常接近,这两件事仅相隔四年。^⑨此外,十年之后,河间献王得古文书中又特别强调有《孟子》一书的存在。可见,在汉文帝执政中后期限的短短十余年间,有关孟子学发展的重大事件即频繁而集中出现。其背后原因何在,前贤时修却罕有提及。

如果把汉文帝诏令高度借鉴孟子仁政思想的因素考虑进去,在此基础上反观上述问题,可以

①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页。

②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第383页。

③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页。

④韩非:《韩非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3页。

⑤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3页。

⑥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1页。

⑦另一说认为,这一事件出现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7页。

⑧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页。

⑨如按《汉晋学术编年》出现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的说法,则相隔15年。此外,另外载于典籍的汉代孟子学发展史上的几件大事还包括,汉景帝时期河间献王得古文典籍中,包含《孟子》;以及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大量采用《孟子》中的内容与御史大夫辩论。

发现一切疑惑均可迎刃而解:孟子学发展在汉文帝时期出现一个高峰期并非偶然。早在孟子对汉代学界产生具体影响之前,其仁政思想就已被纳入统治阶级视野,并构成其治国理念的关键一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①汉文帝中后期学界对孟子的高度重视,恰恰是对汉文帝重视孟子思想的一次次积极回应。此外,这也提醒我们,由汉文帝所开启的“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对儒术治国的一次尝试,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则开启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孟子曾对其学说在将来大一统时代所应具有的价值充满信心,称“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从以上事实来看,孟子诚不予欺也。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ementation of Mencius' s Benevolence and the Prosperity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Wen and Jing

Li Hua

(Institute of Qi-Lu Culture Studi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reign of Wen and Jing in the Han Dynasty was the result of implementing Huang Lao’s thoughts, and this view was almost the academic consensus. However,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imperial edicts finds that Emperor Wen quoted many times Mencius’ s thoughts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written in *Mencius* and this feature continued throughout his reign. Even the official evaluation of Emperor Wen’ s lifetime achievements completely matched the records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in *Mencius*. This clue suggests that Emperor Wen had a high regard for Mencius’ s thoughts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and “the reign of Emperor Wen” may be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ig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and the success of this attempt also became the prelude for Emperor Wu to pay “respect only for Confucianism”.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mment can be reasonably explained that in the history of Mencius studies, the swarming occurrences of symbolic events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en were not accidental but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a. It also reminds us that attention to Mencius study of politics should not be paid only at the academic level,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g up the history of Mencius study in the Han Dynasty, the attitude and stance of the ruling class to Mencius’ s thoughts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should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Emperor Wen; imperial edict; Mencius; benevolent governance; the reign of Emperor Wen and J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责任编辑:张登德

^①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0页。



《南瓜》《紫藤》 张锡杰 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于2017年收藏)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5卷 第1期(总第288期)
 1956年创刊(双月刊)

主 管 单 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 办 山东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发行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中国济南文化东路88号 邮编 250014)

国 外 总 发 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印 刷 山东金邮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Vol.65 No.1(Serial No.288)
 Since 1956 (Bimonthly)

Institution in Charge: Shando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ponsor: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88 East Wenhua Road, Jinan 250014, China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Foreign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China)
 Printer: Shandong Jinyou Printing Co., Ltd.

ISSN 1001-5973



9 771001 597202

电话 (0531)86180064
 网址 www.jstu.sdnv.edu.cn

刊号: ISSN 1001-5973 定价: 15.00元
 CN 37-1066/C